

魏晉

WEI JIN

NAN-BEICHAO

TONGSHI



南北朝

通史

岡崎文夫 著
肖承清 译



中西書局

内编

第一章 魏晋时代

第一节 东汉宦官之害

第二节 内乱的发生与权力的分散

第三节 董卓之乱

第四节 曹操统一北部中国

第五节 三分之势形成

第六节 曹操、刘备称王号

第七节 三国分立及其纷争（一）

第八节 三国分立及其纷争（二）

第九节 魏室衰败，司马氏兴起

第十节 西晋的统一

第十一节 西晋的衰亡（一）

第十二节 西晋的衰亡（二）

第二章 东晋五胡时代

第一节 秦汉以来胡汉关系概述

第二节 北部中国匈奴兴亡始末

第三节 东晋——晋政权复活于江南

第四节 前燕、前秦始末及北部中国诸国

第五节 东晋的衰亡

第三章 南北朝时代（南朝篇）

第一节 刘宋的全盛期

第二节 宋的衰运

第三节 南齐的兴亡

第四节 梁武帝之治

第五节 北魏与齐梁的交涉以及侯景之乱

第六节 陈的兴亡

第四章 南北朝时代（北朝篇）

第一节 鲜卑拓跋部的迁移

第二节 北魏的兴隆

第三节 北魏的全盛

第四节 北魏的衰亡

第五节 新势力的兴起

第六节 北齐、北周的兴亡

外编

第一章 魏晋的文明

第一节 东汉的经术主义

第二节 东汉风俗的败坏

第三节 东汉末的乱离状况

第四节 汉末三国初期的政治论与曹操的统治方针

第五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一）

第六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二）

第七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三）

第八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一）

第九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二）

第十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三）

第二章 南朝的文明

第一节 江域被化小记

第二节 建康的奠都与南地的文运

第三节 南朝治下江南的一般经济状况及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

第四节 南朝的社会制度

第五节 南朝的风俗思潮梗概

第六节 南朝的佛教

第三章 北朝的文明

第一节 “五胡之乱”期的北部中国

第二节 北魏的统治

第三节 北魏的政术

第四节 北齐北周政术概论

第五节 北朝佛教梗概

后记

译后记

版权信息

书名：魏晋南北朝通史

编者：〔日〕冈崎文夫

责任编辑：吴志宏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ISBN：9787547516768

序

李延寿《南北史》出而学者不复读《宋》《齐》《梁》《陈》《魏》《齐》《周》《隋》之书，司马氏《资治通鉴》出而学者不复读《南北史》。朱晦庵谓《南北史》凡《通鉴》所不取者，皆小说也。今冈崎焕卿之书出，然后学者亦当知八书、《南北史》所书《通鉴》所不取，有非小说者存，而焕卿读书之精于是乎可见矣。焕卿昔游京都大学，潜研乙部，夙晓义法，及乎教授东北大学，用力益专。贯穿蔚宗、承祚以下南北史诸书，而典制礼俗参之《通典》《潜夫论》《昌言》《人物志》《抱朴子》《颜氏家训》、汉魏六朝家集，释老二氏之言参之《藏经》、《僧传》、《弘明·广弘明》二集，乃至近代顾宁人、赵瓯北、章太炎及此间并世师友之说，洽览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数世道潜运默移之故，犹燃犀而烛照焉！可不谓良史之才乎？其未论及文辞术艺者，盖有待焉云尔。余尝在大学所讲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为断，近代之史，晚唐至元为限。其东京以还至唐宋，虽卸任以后，亦用三数月之力，颇补说之，而所言止于礼俗文化，未涉政治典制，加以颓龄绵力，不能专述作，止有讲稿未经杀青，无从印行问世。今焕卿之书于中世之史余所未能要删，十已成七八，其用功之勤、识力之透，虽孤行当世可也。但问学之道，日就月将，无有穷已，以焕卿年力方壮，自今之后，再经十年，其所得益精，未必安于此书所成，此书所已有，亦当讨论润色以求善美，而此书所未有，岂无可续修笔削以为信史乎？夫周秦以来，六艺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于新莽，而后有东京礼俗之美；魏晋以后，扩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于南北二朝，而后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为归墟。焕卿更用力于此，能尽成余所未要删，则余虽桑榆景促，不能目睹其成，亦将无憾焉。焕卿倘或有意于此乎？

昭和七年（1932）七月十日 内藤虎

自序

笔者撰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外二编，内编主要探究权力的迁移，外编专述人文化成之迹。但其间多有错出之处或合观内外二编始能解明其意之处。强分内外二编，本是为了一时论述的方便。又，外编直接采用研究结论，不详述其考证过程，这些考证笔者有意另出专著。笔者认为：秦汉帝国，以汉族为中心之国民性帝国的色彩较深；隋唐帝国，法制统规下胡汉两族融合之天下的旨趣较多，而联结其间的即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因此，在叙述之际对此点自然有所留意。又，汉族四千年之生活，分时代而切断之，如实描写其断面之生活样貌，是笔者最留心之处。材料主要取自正史，取自他书及取自正史而必要时，必注明出处。但基于某学者之说而变更其意时，不一一表明出处，乃恐歪曲其说而累及其人。学中国史而必读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等，略称《考异》《商榷》《札记》等，或仅举其人而不称其书。

内编

第一章魏晋时代

第一节 东汉宦官之害

延康元年（220）十月，东汉献帝让位于魏王曹丕。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即天子位以来，为刘氏所统治的中华帝国历经约四百年，转而拥戴曹氏新王室。曹丕承继帝位第二月，改年号为黄初，行天子之郊祭礼，[\[1\]](#) 追尊祖父曹嵩、父曹操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于邺，别营洛阳宫于东汉旧都，由此天子的形式已然具备。不过，实际上魏的统治范围限于黄河流域的北部中国，[\[2\]](#) 对于久惯于汉室一统之治的当时人心而言，魏的威严不免有所欠缺。素来与曹氏一党极力抗争的刘备，在曹丕即帝位后的第二年称帝，并以四川为根据地扩张其势力。接着，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孙权也效仿刘备称帝。中国于是三分，魏、蜀、吴相互对立，争夺势力。中国建立统一大帝国本是秦汉以来的事，而刘氏前后两汉四百年之久的统一再次发生了分裂，因此三国时代成为整个中国史上有趣的时代。汉何至于灭亡？为了解三国时代，这是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范晔著《后汉书》，记录东汉一代的历史，《宦者列传》论曰：“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阹尹倾国。”[\[3\]](#) 宦官是受了宫刑的人，在王室内宫之中，与妇人交涉方便。史书记载，远在周代就已出现了具有某种势力的宦官。秦、西汉时期，宦官、士人皆可为内官；至东汉，内官悉用宦官。此后又设定其员数与级别：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宦官的任务主要是“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自然，他们一般被当作奴隶而受到轻视。然而，东汉王室不幸，幼弱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舞弄权力，隔绝外臣与和帝之间的联系。和帝于是与宦官郑众谋杀了窦宪。一般认为，这是宦官占有势力的第一步。

和帝死，皇后邓氏听政，作为中国的惯例，宦官自然要伸张权力。清朝史家赵翼认为，其后宦官和权臣相倚为奸，权臣欲排斥不利于自己的宦官乃至其他权臣时，必须与某一派宦官同盟。于是，宦官的势力变得不可忽视了。

据赵翼考证：在整个中国史上，宦官之害最重的是东汉及唐、明三代。但唐、明宦官，先害国，而后及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后及国。也就是说，东汉宦官的特色是其流毒直接及于一般人民。为了论证其说，赵翼列举了群臣的种种奏文，所说的不过是夺人田宅、掠人妇女、发人坟墓等事。这种权力的滥用并不限于宦官，皇族、外戚与其他权臣也常有这些问题。而之所以宦官尤其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大概是因为历来受鄙视的这一阶级新挤入权力阶级之中，而且仅是肆意模仿权力阶级的缺点及其流毒的一面。不管怎样，宦官的跋扈成为怨府是一个事实。

公元125年，顺帝即位。他虽由宦官孙程等拥立，但即位前也曾遭外戚、宦官一派排斥而陷入失意的境地，因此甫一即位，就志于匡正时弊、显示汉室威势。其措施之一是察举地方名士，任于中央，破格对待，使之改革政治。南阳（河南鲁山）樊英第一个被推举至朝廷。范晔著《后汉书》时，将此人归入方术者，则他是什么性行的人，略可推知；而他当时在地方上博得非常大的名声，也是事实。察举地方名士，是汉初以来实行的制度。今谋划政治改革之际，顺帝想通过进一步推广旧制度来取得成果，但如范晔所论，这只是蹈袭了前代的弊病而已。事实上，樊英并未能提出什么高明的匡救之策，樊英一派所谓的地方名士也多是这种类型。由此，朝廷周边的权臣发难，说处士之辈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有愤于此，名士党的首领李固写信激励他的同党黄琼：王室自身有改革之志，这实在是辅政济民的好时机。顺帝时，朝廷曾以周举以下八人为特使，派遣他们去州郡检举不正的地方官。他们主要揭发宦官一派徒党的不正，并请求罢免之，李固从中极力声援，顺帝于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不过，李固得以一时实行其

主张，受外戚梁商庇护之处实多，而外戚又常交通宦官以获取位置，因此李固通过梁商来排斥宦官的企图注定落空，他只能匡正地方上宦官弊害的一部分而已。顺帝死后，至冲帝朝，梁商子梁冀反而勾结宦官杀害李固，顺帝尝试的改革遭到彻底的破坏。据范曄所记，梁冀的暴行远非宦官的跋扈可比。而在他得势时，并不见有人联合起来对抗他。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与天子联系紧密而可暗中给予援助的人。然而，当时天子桓帝因一件私事与梁冀相争，遂借宦官单超以下五人之力诛杀了梁冀，五人皆封列侯。这实是以天下重爵供一家之用。据

《后汉书》，此后宦官恣意弄权，与之相应，各地方官的反抗态度也变得明显起来。例如，汝南范滂、南阳岑晷等身处地方，严厉排斥与宦官交通之人，由此在地方上博得了名声。这种风潮遂由地方蔓延首都洛阳。言论比较自由的太学，诸生三万人，与当时在中央政府有声名的陈蕃、李膺等相互推重，毫无忌惮地批判时政。处士横议之端由此拉开序幕。原本在梁冀伏诛时，作为收揽人心之策，宦官一党使黄琼、陈蕃等名士执政，黄、陈等也暗自相信这是改革良机，照例察举地方名士，以之担当改革要冲，但这时被举荐的五位名士都对时势持悲观态度，辞退了中央的征召。

就这样，一方面，有的人冷静而悲观地看待汉室的前途，同时另一方面，热心时政改革之人的行动自然流于矫激。处士派首领李膺利用当时司隶校尉的位置，尽其权限所及，裁制宦官一派，博得了极高的声望；宦官于是诬告李膺等一派为党人，下发逮捕党人之令。这是桓帝延熹九年（166）的事。宦官使反对他们的一派背负钩党之名，但此举随之表明钩党诸人是清流，反而煽起了地方上反对宦官的热潮。这时朝中尚有钩党一派的陈蕃以及外戚窦武。尤其窦武利用他所处位置，成功使桓帝解除了党禁。适逢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以定策之功，权威愈高，于是与陈蕃同心合力，在新朝之初即着手推进扫灭宦官的计划。压迫渐次加在宦官身上，不料窦武关于诛灭宦官的奏文被一内官发觉，所有宦官如梦初醒，异常震惊，于是一同起誓，决意反

抗窦武。首先，宦官们把禁兵收在手中；又适逢西北猛将张奂刚回国都洛阳，对事情毫无所知，他们利用这点，以天子之命，使张奂讨伐窦武。结果，窦武和陈蕃都被杀。这是灵帝建宁元年（168）的事。第二年，宦官以天子之诏，再次发出了逮捕党人之令。为了了解这命令是如何穷凶极恶地得以执行，以下叙述党人张俭所受的迫害。

张俭是山阳高平（山东邹城）的名族之子。宦官侯览恰好也出身于山阳，其徒党飞扬跋扈。张俭聚集同志，结党对抗宦官一派，于是成为党人，列在逮捕令的名单上。张俭亡命，所到之处，天下人闻其名者均掩护他。几经流转，他终于从河北北边出塞，逃到了辽西地区。但据说因掩护他而伏诛的有数十人，他的宗亲惨遭殄灭，郡县因之残破。虽程度有深浅，但这类事情在各地都有发生，只要宦官还在，这类现象就决不会终焉。正当这一全国范围的党争逐渐变得惨烈时，黄巾起义突然爆发，某些有良心的宦官也感到应停止党争，灵帝于是依吕强的建议，发出大赦党人的命令。据说党人被释放，一回到乡里，地方士大夫慕其名者争相欢迎；然而这时黄巾起义已席卷全国，正如范曄所说，“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4\]](#)。

注 释

[\[1\]. 黄初元年十一月，奉汉献帝为山阳公，保留“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的特权，并未记载曹丕郊祭。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76页。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后省“译者注”。——译者注](#)

[\[2\]. 本书“北中国”等词所涉地域笼统，译作“北部中国”等。冈崎氏关于中国地理的区分，可参见《内编》第二章第一节。](#)

[\[3\].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537页。](#)

[\[4\].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第2189页。](#)

第二节 内乱的发生与权力的分散

在东汉一代，以“盗贼”之名扰乱地方秩序，随之成为中央政府巨患，以至被记载在《后汉书》帝纪中的，首先是安帝之时就“残掠”沿海诸郡的“海贼”张某，以及勃海、平原郡的“剧贼”刘某、周某。此后，关于“海贼”“盗贼”“妖贼”等的记载连续不断地散见于帝纪中。桓帝延熹八年（165），勃海郡“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用以署置部下。而黄巾的勃发最为迅猛。

据《后汉书》帝纪，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巨鹿郡张角自称黄天，分其部帅于三十六方，使之头戴黄巾，同日“反叛”。既然“同日反叛”，可见他们之间长久以来已确立了联系。张角通过一种宗教聚集徒党。不过，关于张角以及奉事相似宗教的各人之间的异同，今日得见的史料有矛盾之处，学者的见解也多少有些龃龉，难有定论。综合来看，大体是这样的：

东汉顺帝时，在今陕西南部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张陵创出一种新宗教，聚集了徒党。他似乎为这一宗教取名“太平道”，自称太平道师。入道之人，起初皆称鬼卒，其中有被任命为祭酒、奸令的。道师主要持九节杖，为符祝，治疗疾病，使病人自白所犯罪恶，然后将带有魔力的符水交给病人，念咒文，规定：如果病人相信这一宗教，则一定会痊愈。祭酒的任务是诵读《老子》五千言，奸令则为病人请祷。信教者一般要出五斗米，因而这一宗教通常被称作“五斗米道”，它被视为今日道教的前身。张陵将其术传给自己的儿子张衡，张衡传给沛人张鲁。此外，四川巴郡有张修，巨鹿有张角，据说他们与张陵一派道术相似，因此即使其间师授关系不明，也可说他们同出一源。又，在同一时期，以陕西西安为中心，骆曜通过教给人们一种“缅匿法”的幻术来聚集徒党。这可归到历来的左道、妖术之中，与张陵一派系统有别。张陵所创太平道在汉中、巴郡时并没有多大势力，但张角在河北平原的巨鹿宣传太平道后，徒党突然增加。据范曄

所记，张角从事传教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所及范围包括河北、河南、山东的大平原以至长江流域。然而他没有仅仅满足于扩大宗教，而是设立三十六将军，以军队的方式组织徒党，并倡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暗中预言自己将代汉即帝位。这一秘密行动因某种缘故败露而为政府所知，他们于是一起举事，徒党们缠上表征黄天的黄巾，所在之处，烧毁官府，劫掠村落。

黄巾极大地地震动了朝廷，天子立即下诏，令州郡做好防备。又在自函谷关（位于河南、陕西接壤处）至小平津的环绕洛阳的黄河、伊洛的要塞八关，设置都尉官，以加强帝都的防御。然后命皇甫嵩、朱儁讨伐。皇甫嵩有名将之器，请求先解除党锢之令，以收揽天下人心。宦官吕强在内支援，解除令于是发出。皇甫嵩率精锐队伍，在黄巾勃发的当年暂时平定了内乱。不过，与黄巾关联而起的黑山、白波之众仍依据太行山脉，横行山西、河北、河南接壤地区。不仅如此，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大吏中，似已有很多人认为汉室命运难以挽救了。实际上，对于因平定黄巾而威望赫赫的皇甫嵩，原信都令阎忠甚至热心忠告他：如果此时不舍弃汉室而图谋自立，将危及自身。皇甫嵩拒绝此谋，保全了他的名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处于中央权责重任位置的人物之中，已有人知道汉室不可挽救，并想去地方谋求自立。

眼见天下乱离之状，汉宗室刘焉上议说：今朝廷所任地方刺史，权威较轻，不足以保全境内之安宁，宜从中央派遣重臣以镇地方。而他自身则暗中考虑去交趾，以图自立。当时此议并未立即被采用，然而地方刺史在叛乱中频遭杀害，刘焉之议终被采用。刘焉出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官兼任地方官。范曄自注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大概汉家统一之政由此完全被打破，地方分权之实已经成立。因而在新任州牧中，即使刘虞等欲坚守传统名节以奉汉室，但事实上却为地方情势所左右，其威信始终仅限于州境之内。要之，汉室号令已无力控制地方，个人才望仅

能维持秩序，当这一才望转而为武力取代时，完全的群雄割据状态就将呈现出来了。

注 释

[\[1\].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第2431页。](#)

第三节 董卓之乱

陈寿著《三国志》，将《董卓传》放在《魏书》列传之首。董卓的确是开启英雄时代的第一人。为了了解他的发迹过程，自然有必要察看朝廷的状况。黄巾起义爆发时，朝廷感到有必要对帝都洛阳城严加戒备，于是以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命他修整武器，统率禁卫军队，弹压城内。何进原是卑下的屠家出身，通过贿赂同郡宦官郭胜，将胞妹送入宫中（参照惠栋《补注》）。其后此女受灵帝宠幸，又生了皇子辩，被立为皇后，何进于是以外戚身份掌权。此时宦官首领张让等与黄巾首领张角暗中交通之事败露，天下人对于宦官的愤慨之情愈加痛切。与之相对，宦官恣意的行为反而增加。他们劝说灵帝开卖官之例，其行事越来越露骨，有论其短处者，立遭诛灭。他们又用所得金钱，肆意在洛阳城内“并起宅第”，相传为了不让灵帝看见自己的宅第，还向灵帝建言不能登高。范晔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将这段插话作为汉亡之先兆。灵帝确实被宫妾、奴隶环绕在小小宫城内，对世情动态无意了解。

作为大将军，何进名义上握有洛阳兵权，但当时城内妖言盛起，传言城内即将发生兵乱，因此何进一党认为为了威压四方，必须建立更强的军队。何进于是在西园新设置了八校尉。[\[1\]](#) 这时，灵帝去世，何皇后所生皇子辩即位，何进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是名家子孙，好结交天下名士，他建议何进诛灭宦官。何进虽采纳其说，但内心虑及宦官与何太后，未能立即实行计划。而袁绍等建议召集四方猛将，使之引兵向洛阳，借此威胁宫廷。西北猛将董卓应召，已向河东（山西省）进兵了（参照《通鉴》）。这些人都以诛灭宦官为名，何太后若仍以朝命加以抵制，则朝威难立。而宦官等在内百般哀诉于何太后，乞求救命，何进以兄长的威严欲说服太后。适逢宦官听到两人的密谈，他们于是反过来拿起武器，斩何进于殿前，把他的头丢在尚书省，欲求善后之策。然而这消息一传开，袁绍

就命部下闯入宫中，把没有胡须的人全部杀掉（宦官在生理上没有胡须）。事情发生在日暮时分，士兵烧宫门闯入，不分少长，见无须的人就杀，帝辩（即少帝）与陈留王协勉强逃出宫城外时，已经是夜晚了，两人借着萤光彷徨于洛阳北面的邙山之时，恰好碰见向洛阳进发的董卓军。[\[2\]](#) 董卓于是拥帝入城。

董卓是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他曾跟从皇甫嵩讨伐黄巾，但与皇甫嵩意见不合，违背朝命而返回地方，并在那里纠合了许多部下。董卓所居之地与西方少数民族氐羌接壤，因而驻屯了很多军队；但东汉末中央政府号令已不及此地，军人的给养也不能送达，这些军队自然就变得凶残起来了（参照下章）。董卓巧妙地怀柔了这些军队，他的大名使中原人士震怖。因此袁绍为诛灭宦官而将其招至京师的行为，受到极大非难，据说八校尉之一的曹操也嘲笑这种做法。果然，董卓拥帝入洛阳后，自命为司空，废帝辩，立陈留王协（即献帝），接着弑杀帝辩及何太后。曾是何进手下的袁绍及曹操等于是被迫逃离帝都。董卓愈加专横起来。据说，他曾向满堂宾客放言：“我相，贵无上也。”[\[3\]](#) 《三国志·魏书》这样描述他残暴的一面：

“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4\]](#) 这些故事多少有些夸张，甚或穿凿不实，但不管怎样，他们给予中原人士的恐怖印象被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董卓有废天子的行为，加之他本人也不受人欢迎，中原地方大吏于是发兵征讨董卓。诸大吏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并向洛阳进军。董卓听到这一消息，知道长驻洛阳不利，于是迁天子于陕西首府长安，自己暂时留在洛阳，迎战联军。但他屡次被袁术（袁绍之弟）部下吴人孙坚打败，于是烧毁洛阳宫室，发掘诸陵墓，逃往长安去了。这时联军诸将并没有彻底追击董卓的意志，盟主袁绍也以建立自己的地盘

为当务之急，只有曹操孤军奋战，而战斗失利，不得不退兵。从此以后，群雄割据各地的态势逐渐形成。时为献帝初平元年（190）。

董卓拥献帝至长安，并派部下向北方、东方扩充势力。但在长安，他仍旧肆意诛杀追随献帝的旧汉室大臣，使凉州人与汉室之间激烈的反感不断发酵，最终汉室名臣王允说服董卓部下一一以骁勇著称的吕布，使其诛杀了董卓。就这样，失去首领的凉州诸将受激烈的复仇心的驱使，杀入长安城与吕布进行了巷战。吕布战败，逃出长安，王允被杀。凉州诸将又在献帝之下，被任命为各种大吏，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统制，各自埋头于扩充势力的争斗。长安附近完全陷入无秩序状态，据说天子连米和牛骨都吃不到。其间，天子乘机逃出长安，回到了洛阳。《魏书》这样叙述当时洛阳的情形：

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5\]](#)

注 释

[\[1\]. 《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中平）五年（188），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宏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第2246—2247页。又据《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冬十月，……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于平乐观。”第356页。](#)

[\[2\].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第172页。](#)

[\[3\].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注引《魏书》，第175页。](#)

[\[4\].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第174页。](#)

[\[5\].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第186页。](#)

第四节 曹操统一北部中国

董卓在洛阳极尽专横之时，何进曾经的部下——八校尉中的袁绍、曹操等，皆以出仕董卓为不洁，逃奔东归。袁绍的行为尤其博得了普遍的赞赏，被认作英雄。事情是这样的：对董卓为显示权威而废立天子一事，袁绍坚决反对，丢下一句“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而出，把符节悬挂于洛阳上东门（东门之一），出奔冀州。[\[1\]](#)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袁绍素来与天下之士结交，被许为豪杰之士，与董卓的这种对抗，无疑提高了他的名声。于是山东强吏一起征讨董卓时，袁绍被推为盟主。然而他并没有彻底讨灭董卓的雄图，而以名门之子，每日与各地方强吏置酒高会。董卓丢弃洛阳、依据长安后，袁绍回到根据地冀州，并谋划着推举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即帝位。据《后汉书·刘虞传》，当时刘虞以大义名分为由，严词拒绝了他的推举，并遣使长安，表达了拥戴汉室之意。刘虞以东汉传统政策统治境内，对黄巾起义所造成的大量失业流民施恩安抚，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声名不错的人；但实际的势力却归于他的部下公孙瓒。公孙瓒是辽西人，屡与外族乌桓、鲜卑相战，他自然要施展所谓英雄拳脚，蓄养很多徒众，图谋壮大自身势力，常有压迫刘虞之嫌。于是袁绍推举刘虞即帝位被拒绝后，就与公孙瓒联络，致力于在冀州获取稳固地盘。据范曄所载，袁绍作为盟主讨伐董卓时，董卓大怒，将袁氏一门仍在洛阳者全部杀害。袁氏惨祸使得天下之士同情袁绍，各州郡多有以袁氏之名而蜂起者。恰好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而袁绍人望非常高，且为了在冀州取得地盘，已与公孙瓒及其他英雄联络，韩馥抵不住这种压迫，于是将冀州牧之位让给了袁绍。其后此事得到朝廷的追认。袁绍于是割据黄河之北。冀州州治在今河北南部，今河北北部之地是公孙瓒的所在，北京一带是刘虞的所在；这时，以实际势力而言，刘虞不是问题，形势完全在于公孙瓒与袁绍的对立，结果两者

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后汉书·公孙瓒传》载有公孙瓒所作讨伐袁绍的檄文，他向天下公示袁的罪恶。其中有如下两条值得注意：

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

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2\]](#)

袁绍自制印玺任用官吏，将自己的命令称作诏书，显然以天子自居；又，利用世俗迷信，施与钱财，攻略州郡，也是乱世之雄的所为。不过，公孙瓒到底敌不过袁绍，不久即被讨灭，河北一带归入袁绍。只是其间曹操的势望剧增，反而显示出压倒袁绍的气势。

曹操原与袁绍同讨董卓，据说他不满袁绍等人优柔的态度，常与董卓奋战；兵败，不得不东归。这时黄河下游南部兖州地区混乱至极。今河南省黄河北汤阴县地区的黑山，是太行山脉的一支。以此山为巢穴的“剧贼”——所谓的黑山贼，大举越过黄河，闯入东郡（郡治为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又，山东青州黄巾余众也南下进入兖州境内。地方太守难以抵挡这些势力。曹操与这些“贼众”相战，屡获大胜，又经袁绍推举，受任东郡太守。兖州之南是徐州，这里有江南人陶谦坐镇，其部下曾杀了曹操之父；曹操托言为父报仇，大举攻入徐州。这时曹操大施暴行：屠戮泗水流域诸郡县，大约杀了数十万男女，鸡犬不留，泗水为之不流，地方行旅断绝。适逢原董卓部将——以骁勇闻名的吕布，由长安逃入兖州，他得到袁绍从弟袁术声援，又为地方强吏所拥戴，于是进犯曹操的根据地。袁术虽是袁绍的从弟，[\[3\]](#)但他自负母系血统比袁绍更正统，常不平于袁绍的人望，欲交通吕布、公孙瓒，抵挡袁绍。袁绍自然与曹操相结，与之对抗。战争的结果，吕布被打败，兖州暂且重归曹操之手；但袁术仍未丢掉向兖州地区伸张势力的野心，亲自率兵从根据地南阳东入陈留。然而曹操联合袁绍将其击破，袁术遂退据九江郡（治寿春县，今安徽寿县）。作为名家子孙，袁术友人陈珪曾与袁术交往密切。这时陈珪正

担任安徽北部下邳相。袁术欲结之以图曹操，但陈珪寄回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拒绝信。《三国志·袁术传》载：

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
信有征矣。以为足下当勦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
以身试祸，岂不痛哉！[\[4\]](#)

由此可清楚看到：曹操的威望在黄河、淮水之间逐步提高。这时适逢汉天子从长安逃至洛阳，曹操抢先迎立天子于许。这实是曹操势力凌驾袁绍的一个重要契机。

兴平二年（195），献帝逃出长安，被董卓部将击败于曹阳（河南陕州），东汉的命运已经到了断绝的边缘。袁术听到这一消息，大会群臣，讨论代汉称帝之事。勇将孙坚的长子孙策却建议他派兵迎接汉帝，努力复兴汉室，未被听从。又，袁绍的谋臣沮授也以这一建议游说袁绍，但部下大多否定此议，认为若现在拥立汉室，袁绍独断的行动反有受牵制之虞。袁绍最终听从了后一种意见，甘于做一个割据的英雄。而曹操的谋主荀彧向曹操献上此议后，曹操立即进入洛阳，拥立天子于许。于是，年号改为建安，天子下诏，责备袁绍地广兵多却专树朋党，未尽心勤王。这一诏书的下发，不知曹操一派是否有献策，总之，曹操以拥立之功升为大将军，位在袁绍之上。由此，袁、曹之间渐生裂痕。但据当时的情势揣测，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这时徐州牧陶谦死去，勇将吕布取而代之，在淮南又有袁术，此二人皆欲谋取曹操的根据地兖州；曹操遂亲与两人多次激战。幸而到了建安三年（198），吕布伏诛，第二年袁术大败于曹操，自己去掉帝号而投袁绍，未达目的，呕血身亡。由此，河淮之间已经没有可以和曹操抗衡的人了。这时适逢袁绍灭亡公孙瓒统一了河北，于是形成了以黄河为界，曹、袁两雄对峙的格局。

袁绍的部下之中时常涌动着两股潮流。其一，以田丰、沮授等为代表的名义派欲使袁氏始终辅佐汉室；而另一派却以即帝位一事煽起袁绍的骄心。袁绍本身缺少充分调和这两股潮流的度量，因而尽管田

丰劝他趁曹操苦于应付吕布、袁术之际，将天子从曹操手中夺过来，他也不能采用。而曹操则将内部事务交给谋臣荀彧，委任不疑，自己往来于兵马之间，以期迅速讨灭反对者。我们尤其可以看到，曹操有计划地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裴松之所引用《魏书》中有以下记载：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5\]](#)

许在今河南省许昌附近，当时属于颍川郡。当兵乱之时，颍川郡是天下四战之地，以至荀彧早率乡人迁移河北，因而土地的荒废可以想见。曹操采用屯田策——带有军事性质的开垦法，恐怕是合理的权宜之计。

袁、曹两雄的冲突最终由袁绍挑起。毫无疑问，他想趁讨平公孙瓒之势使曹操屈服，不过因为出师名分不正，部下之中多有反对者。不管怎样，两者之间的和平已经被打破。建安五年（200）在黄河以南的官渡（河南中牟东北）大会战中，袁绍一败涂地，《魏书》本纪说，曹操已“天下莫敌”了。第三年，袁绍忧死，他的儿子等也相继被讨平。除了陕西地区，北部中国大体上都归于曹操势力之下。

注 释

[\[1\]. 《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第2374页。](#)

[\[2\]. 这是公孙瓒讨袁绍前的上疏，非檄文。见《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第2360页。](#)

[\[3\]. 袁绍是袁逢庶子，出继袁逢兄袁成之后。袁术是袁逢的嫡子。见《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李贤注，《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裴注。](#)

[\[4\].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术传》，第209页。](#)

[\[5\].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第14页。](#)

第五节 三分之势形成

曹操大略统一北部中国后，下一步要统一的是长江流域。原本在整个汉代，作为河淮流域与江汉流域相接的地点，西边要数河南南部的南阳，东边则是安徽北部的寿春。自南阳向南，可到湖北荆州府江陵，自寿春翻过山坡，出至合肥，就可直接乘江潮牵制大江下游；因此汉代，南阳及寿春被视为要地。东汉末，南阳为袁术摧残，此地名族大量南下，移居湖北北部的襄阳；当时荆州刺史刘表坐镇襄阳，招抚湖广之地。又，孙权以吴郡（江苏苏州）为根据地，经营着江东。就当时的势望而言，刘表的地位远高于孙权。刘表作为汉朝宗室，又是东汉末山阳郡（郡治为昌邑县，今山东巨野县南）八骏之一，名望很高；作为荆州刺史，他在襄阳镇靖境内，表现出相当的手腕。当时自湖北南部至湖南北部，被称作“宗贼”的地方势力骄横跋扈。据惠栋的解释，当时长江流域有一种被称作“宗部”或“宗伍”的地方团体，是地方人民以家为中心而结聚在一起的团体，他们趁汉末丧乱，劫掠郡县；从朝廷方面来说，他们也被称作“宗贼”。就其性质而论，他们是反对官府的徒党，因而刘表努力起用地方名人，以恩抚之法成功镇压了“宗贼”。不过，他始终依据东汉传统之策，以地方治安为主，不涉足中原的丧乱。但在曹操、袁绍两雄要在中原决出胜负的情势之下，他自然也被卷入其中。最终他与曹操断绝，声援袁绍。袁绍倒后，曹操为讨灭袁绍余党以及趁丧乱而骚扰河北北部的少数民族鲜卑、乌桓等，前后费时五六年。适逢袁绍倒后的第二年，刘备从北方逃来荆州，栖身刘表幕下。他劝刘表乘曹操北伐之虚，突袭许都，拥立天子，刘表不能用。其间曹操完成北方的经营，将矛头指向荆州，这时刘表病死，少子刘琮继位。刘琮之兄刘琦怨恨家统被少子继承，由此刘表的势力一分为二。刘琮一派以荆州全境投降曹操，相反刘琦与刘备一致，据夏口（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一带）以抗曹操。

刘备是河北北部涿州人，据称是汉朝宗室，但出身贫困，母亲以织席贩履维持生计。自幼时起，刘备的举动就异于常人，因而受到地方的信赖。在黄巾军攻打到当地之时，有个商人给了刘备很大一笔钱，让他募集军队维持当地治安。刘备屡战黄巾军，逐渐立起勇名；但他久久不能拥有稳定的根据地。徐州牧陶谦死时，欲将徐州让给他。刘备自谦，推荐当时在寿春的袁术而不受。然而汉末名士孔融，以及后来为曹操经营江苏北部的陈珪之子陈登等，皆推崇刘备的为人，热心劝他接受徐州。刘备于是答应了，但为袁术所苦，又被吕布所破，只得一时托身于曹操。他虽受到曹操上宾的待遇，但最终背曹而投靠袁绍。袁绍表面敬重而暗中疏远他。袁绍倒后，刘备投靠了刘表，而所受待遇与在袁绍处一样。不过，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受人信赖的禀赋，到荆州后，对他寄予好意的人士非常多。刘表死后，其子刘琮举荆州而降曹操时，刘备在襄阳北边，完全没能与闻此议。因此，在曹操的军队就要围攻襄阳的形势之下，他才狼狈逃至湖北南部的当阳县。曹操迅速追击，但刘备已与刘琦及部将关羽合军，据夏口，迎击曹操之军。

此前，刘备已罗致诸葛亮于幕下。此人本籍琅邪郡阳都（山东沂南县），跟从父移居荆州。他在襄阳附近的山村隆中静心读书，起初并没有出世的志向。但他的友人皆知其伟才，向刘备推荐他，刘备三顾茅庐的有名传说就此流传了下来。当时诸葛亮是个二十七岁的书生，知其名者只是少数友人而已。以三顾之礼来对待他，刘备爱才求才心切，可见一斑。诸葛亮的主要献策，概括来说是：刘表不足倚赖，为对抗曹操一定要与吴孙权联合，然后必须据有荆州、夺取巴蜀。现在，刘备为曹操所破，仅保夏口，于是派诸葛亮到吴，使之促成联合之计。

曹操南征取得襄阳后，立刻寄手书给孙权，劝其投降。吴因此处于或战或降的分岔口上。孙氏本是吴郡富春（浙江省富春县）人，汉代以北部中国为中心的国家建立之际，这一出身地已是边鄙之地，况

且孙氏家族也并非名族。到了孙坚时，他作为武将逐渐显露头角，尤其在袁术部下时与董卓血战洛阳，屡击破之，由此一跃而变得醒目出众。其后，孙坚奉袁术之命攻略荆州，为刘表所杀。其子孙策继承其父之业，依靠袁术的援助，主要平定了江东（即江苏、浙江地区），又以其阔达的性格罗致北方名流。适逢袁术称尊号，孙策遂与之绝交。他常有见机图霸中原的大望，却不幸早死，其弟孙权继承了他的位置。曹操进入荆州时，孙权还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对于曹操的劝降，心里似乎暗藏反抗的意气。但以张昭等为首的辅佐孙氏的北方名族以此际降曹为得策，因此孙权的决心不免动摇。这时，恰好诸葛亮受刘备之命，以他洗练的辩舌巧妙地建议孙权自立。另一方面，孙权部下鲁肃为了窥探刘表死后荆州的状况渡江北去，在刘备败退当阳的途中与刘备相见，他深服刘备的为人，回来后热心提倡主战论。此时，孙氏部下中兵力最多的是周瑜，他与孙策最是相得，许为知己。鲁肃劝孙权与周瑜商谈。而周瑜以坚定的决心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揽于一身，于是孙权态度愈加明确，决定与刘备联合，邀击曹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之军与联合军战于赤壁（湖北嘉鱼），[\[1\]](#) 曹军大败，曹操南下的大计遭到重大挫折，由此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势。

注 释

[\[1\]. 赤壁，在今湖北赤壁市西北赤壁山，北对洪湖市乌林矶；一说在武汉市西南赤矶山。](#)

第六节 曹操、刘备称王号

曹操败于赤壁后，与书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1\]](#) 又，王粲《英雄记》记载：曹军在湖北南部云梦泽中遇到大雾，迷路了，因而失败（据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所引）。这些记载多少包含一些事实，但在这场战争中击溃北军的，自然是赤壁水战。当时北军总数六十万，号八十万。周瑜谨慎估算，犹以为有二十余万，因此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其中水军实际占比多少并不清楚，总之，曹操给孙权的信中说“治水军八十万众”，张昭也说“今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浮以下江，水陆俱进”[\[2\]](#)，因此荆州水军似为此时曹军中坚，在此基础上配备了大量北军。这许多的船舰首尾相接，荫蔽江中。对此，周瑜使部将黄盖在各大船后系上走舸，火烧敌船，北军整个部队遂陷于溃乱。曹操退至陆上，被刘备追击，只身逃回其根据地——邳。（王鸣盛曰：建安元年，操自洛阳迎天子，迁许都，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邳。余按：本纪、《荀彧传》并云九年操拔邳，领冀州牧，操之迁邳当始于此，汉百官随而迁，固在其后，史不详记耳。）此次战败之后，曹操屡自合肥进攻孙权，皆不得志，从此永远失去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机会。但在西北陕西、甘肃方面，曹操的势力得到充分的伸展，下面就此作一简单叙述。

毫无疑问，甘陕之间的中心地带是渭水流域，首府是长安。董卓被杀、天子逃往洛阳后，董卓的旧属部将互相残杀，多死于乱军中。这时作为汉廷官吏而身在长安的钟繇对曹操常怀好意，曹操的谋臣荀彧也劝曹操深赖钟繇，曹操于是将此地区事务全然委托钟繇，从而尽力于中原的经营。然而，与董卓系统完全不同，且比董卓更早播下扰乱地方之种的甘肃人马氏（马氏本贯扶风茂陵人，今从其居住之地也）、韩氏等，与出身地不明的许多豪族一起，各拥部兵，割据此地。曹操与袁氏一家相争之际，这些豪族或依曹，或附袁，其扰乱甚

至延及山西、河南地区。身处其间的钟繇以及张既一心为曹操经营，主要利用马氏势力，镇靖关中。其间曹操完成了河北的经营，大举南征。为除后顾之忧，曹操逼召马氏首领马腾来邺，使其子马超统辖部兵。然而马超对曹操常有疑心，以至江南风闻他欲在曹操南征时举兵，周瑜还以此激励孙权。曹操赤壁战败之后三年，即建安十六年（211），马超等终于反叛，占据潼关之险。其间情由颇不明了。据《三国志》，因为曹操声称要征讨割据陕西南部汉中的张鲁，马超怀疑他的意图，于是起而谋反。总之，曹操亲征，以奇袭之法自山西进入陕西，马氏被击败，退据其根据地甘肃。由此渭水流域完全归于曹操之手。曹操又派部将攻略甘肃，前后五年左右，先平定了甘肃，又降服了汉中张鲁，欲入四川时，被刘备军击败，由此曹氏的势力范围大体确定下来。马超自甘肃逃亡，一度依于张鲁，最终归于刘备，成为他的部将。

刘备是曹操明确对手。联合孙权于赤壁破曹后，刘备表刘表之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在刘琦之下经营湖南西部沅水流域，屡收其功。适逢刘琦病死，刘备代为荆州牧，治公安（湖北省公安县东北）。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将要征伐汉中张鲁的风声传到了南方。这时以四川为根据地的刘璋听此风声，惴惴不安，招刘备共防曹操。刘备占据四川的机会因此到来了。

刘璋是益州牧刘焉之子，虽继承父业坐镇四川，但一般被视为暗弱之人。据《英雄记》，河南西南部流民曾大举涌入四川。刘焉将其编作军队，称为“东州兵”。但这支军队趁刘璋统制宽柔，掠夺四川旧民，一时引起全川骚动。由于刘璋在四川地区没有威望，以至诸葛亮在初会刘备之时，就已预先进言夺取蜀地。曹操大举南下之际，刘璋迅速派使者到曹操那里，奉其命令。及曹操已取荆州，刘璋所派张松不受曹操优遇，怀恨在心，于是与其党法正商谈，在风闻曹操将伐张鲁之际，将刘备引入蜀地。

刘备留下谋臣诸葛亮及股肱之将关羽镇守荆州，亲率大兵入蜀，为刘璋担当北边的防备。据称刘备在当时擅得人之死力，入蜀后，声望逐渐提高。刘璋部下张松、法正一派尤其从一开始就有以刘备代刘璋的念头，自然在内部为刘备出谋划策。此事为刘璋所知，张松因此被杀，由此二刘之间的争斗变得公开化，刘备于是进攻首府成都。建安十九年（214），刘璋出降，第二年曹操入汉中，其部将进攻四川西部，为刘备之军所破，刘备、曹操的势力在汉水上游形成了对抗局面。

当初赤壁之战刘备、孙权结盟时，热盼援助的是刘备。两者之间为此交换了什么条件，史无明文。但战后刘备在荆州扶植势力时，孙权方面屡次以“荆州是借与刘备的”为口实，要求返还荆州。史家赵翼在《札记》中说，荆州原本就不在孙权的势力范围内，将荆州借给刘备之说没有道理。不过据《先主传》可知，刘备得蜀后，孙权直接要求得到荆州，刘备对此的回答极为暧昧。以意推之，或许刘备求援孙权之际，两者之间有过某种密约也未可知。当然正史文字层面上并无证据。借荆州的问题暂且不论，原本湖北为天下要冲，控制此地与否，对势力之消长影响颇大。尤其赤壁之战的勇者周瑜本是孙权之兄孙策的莫逆之交，志在天下，不以偏安一方为意，因此“必取荆州”是他心藏的一个计划。周瑜的目标是湖北北部的襄阳，他欲使刘备取蜀，自己出襄阳，谋取中原。而正当着手此计划时，周瑜病死，他推荐鲁肃继续经营荆州。鲁肃也始终以结盟刘备谋取曹操为志向，因此在孙、刘势力错杂于湖北之地时，一意调停双方。另一方面，为刘备专守湖北的关羽一时击破曹操的大军于樊（襄阳对岸），中原为之震惊。不过此时鲁肃已死，代任者吕蒙暗通曹军，袭杀了关羽，孙权的势力因此延伸至湖北。三国的势力范围因之大体确定了下来。当荆州尚在刘、孙两势力之间时，双方之所以看重这种平衡，是因为他们欲联合起来打倒曹操；但孙权原本就以自己的偏安而非天下大计作为着眼点，因此当吕蒙杀掉关羽，其目的达到了。而与此同时，三国对立

之势也确立了。中国的史论家屡有论说吕蒙取荆州之功过者，不过，是非对错另当别论，事实上它正是将长久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导向分裂的大事件。时为建安二十四年（219）。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下诏，合并天下十四州，恢复古九州之制。同年，策命曹操为魏公，封冀州十郡之地。梁章钜认为这两件事相互关联。其论述的要点是：十七年（212）已扩大了魏郡的范围，今又增益冀州的区划，使魏郡包含于十郡之中，逐渐以曹操的势力占据王畿的中枢，以便其后取代汉室云云。[\[3\]](#) 并十四州为九州之说，在建安九年（204）就有了，当时由于谋臣荀彧反对而中止。建安九年正是曹操拔取邺城，成为冀州牧之时，因而可以说复九州之说暗含曹操增大势力的野心。在曹操封为魏公前夕，复九州之宿论实行了，这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使曹操名实相符的计划。曹操之所以能够维系信望于天下，是因为他拥戴汉室之名义。而曹操将王畿中枢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即明白置汉室于孤危之地。甚至异姓封侯一事，严格来说也违背了汉朝成法，今曹操即魏公之位，更新了汉制。因而若站在以汉室为中心的立场上，以上两件事无疑表明了曹操的不臣之迹。而从《三国志·魏书》可知，这一篡夺行径是以极美言辞与壮丽仪式来润饰的，且据裴松之注所引《魏书》《魏略》的详细记载，曹操一度在形式上表示辞让，而后表示难以阻止官僚们的一致劝进。其后，二十一年（216），曹操又为魏王。这本是预定的计划，故而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未记载献帝的诏书也是理所当然。曹操与帝位相去仅一级，即便如此，曹操还是避免了篡夺的污名，以王位终其身。赵翼认为，在这点上，曹操还留有名分的观念，而随着时代的更迭，篡夺之事愈加以美丽的形式露骨地实行。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其源头实来自曹操。

曹操成为魏王后三年，刘备也在群臣的劝进下即汉中王之位。其理由是：曹操欲篡夺汉室，与之相对，刘备倚赖汉朝宗室身份，欲以现有的四川地区作为王室的藩屏，即王位是权宜之计。这一主张有多

少诚意另当别论，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这种主张，刘备站在了与魏完全不能相容的立场上。与此相反，孙权则常依违于曹、刘之间，尤其据《魏略》记载，为偷袭关羽，他曾上表称臣于魏。王鸣盛就以这点攻击孙权之狡猾。总之，作为一个事实，孙权方面尚未在形式上对魏、蜀（刘备原以汉为国号，今称蜀者，从通名也）采取对立的形式。这点值得注意。

注 释

[\[1\]. 《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第1265页。](#)

[\[2\]. 此条史料不知作者所据。据《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议者咸曰：‘……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第1261页。](#)

[\[3\]. 参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38页。](#)

第七节 三国分立及其纷争（一）

汉延康元年（220）正月，魏王曹操卒于洛阳，同年十月，长子曹丕取代汉室，建立魏王朝，即如第一节所述。魏代汉，经过了怎样的程序呢？

《三国志·魏书》本纪记载当年三月黄龙出现于谯，且附记了太史令单飏的预言。梁章钜注意到《宋书·符瑞志》中关于这时黄龙出现于十三郡国的记载，以及《水经注》中将谯改名为龙谯国的事实，他认为“魏以龙见为受命之符”[\[1\]](#)。而至少从三月开始，以魏代汉的运动就发轫了，这在文献上可得证明。其后符瑞的出现屡见于史书，最终左中郎将李伏上表魏王曹丕，以为曹丕应登天位，这是既定的命数。也就是说，术师姜合所得的谶书《孔子玉版》中明确记载“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而子桓是曹丕的字。此劝进一旦试过一次，当时的名臣辛毗、刘晔之徒也就联名劝进，曹丕每每推让不许。其后太史丞许芝又以天文谶纬之说列举了数条魏当代汉的理由。其中，《春秋玉版谶》（钱大昕曰：此书即上文所言《孔子玉版》也）中有“代赤者，魏公子”的语句。所谓谶记，是孔子以其圣知洞察未来，秘其言，书之于玉版，时机到了自然显现于世。这称作内学，是术师的学问。以此说为根本，为了证明它，种种符瑞、天数等都被利用起来，借这种不可思议的幽冥之理支持天位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显著的倾向。

对于许芝的这一运动，曹丕以人心尚未完全归伏为由，表示了推让之意。但这时以御史府官僚司马懿为首的一群人，又具陈人心讴歌魏德的情形，至此汉的全部官僚一致劝进，汉室于是发出了禅让的诏书。不过，曹丕与汉室之间尚有几回形式上的应酬。主要是汉室方面对于禅让之后自身的位置心存危惧；又，魏方面也存在缺陷，即天下尚未统一就登上帝位，这在名义上并不完备。不过，就禅让的意义而言，原本不仅受之者有大福，授之者亦有余庆，故汉室的危惧容易调

停；但不管怎样，魏都难免缺乏继承帝位的资格。只是北方实际实行的是魏的政令，由此帝位的名义也交给魏而已。总之，经过几回形式上的推让之后，曹丕在群臣的劝进下，最终“不得已”代汉称帝。

如前所述，蜀明确地居于魏的对立面。魏夺汉室之时，汉后主为曹丕所害的消息盛传开来。因此这是汉宗室刘备为存续汉室而自立称帝的绝好时机。魏黄初二年（221年，蜀章武元年）三月，汉中王刘备为汉帝发丧举哀，并在群臣的劝进下登上帝位。显然，与魏一样，它在形式上所依据的也是讖记之文。当时蜀之名臣费诗却独排众议，上表说：“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2\]](#) 此说固然未被采用，不过蜀中人士并未失去费诗说理的要点，即视曹氏为汉贼的主张，而将刘备作为汉室继承者推上帝位时，他们与曹氏愈加势难两立了。

蜀先主刘备即位第二年，为报吴孙权杀害其旧臣关羽之仇，大举东征。这恐怕是刘备独断的行动。清朝史论家王夫之极力非难刘备的行动，认为刘备身负复兴汉室之大任，专为部下一人报仇，滥兴大军。并非后世才有此非难，当时就有谏止此举的人，吴、蜀都有。蜀勇将赵云认为应先灭魏；吴名臣诸葛瑾劝告说，现在汉帝遇害（可见传闻及于江南），舍汉帝而先为关羽报仇，没有道理。刘备皆不听，亲自率军越过三峡之险，出至湖北，又进湖南。此举原本就是险招，他又弃船登陆步战，蜀军自然水陆隔绝；吴之名将陆逊乘机四面猛击，蜀军大败，刘备仅以身免，逃入白帝城。

自吴将吕蒙与魏交通，暗中袭杀关羽以来，孙权常担心刘备报复，为此曾一时建都武昌，且入贡称藩于魏。这时魏朝新立，曹丕颇为高兴，册封孙权为吴王。然而关于此事，魏、吴两方面都有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在魏一方，反对意见认为，吴主动卑辞称藩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即吴恐惧刘备的复仇之战，希望魏保持善意的中立立场；因此站在魏的立场上考虑，可以采取的策略是：乘南方吴蜀相争之

际，一举讨灭吴。刘晔首倡此说。在吴一方，舆论普遍认为，若受魏册封，则历来坚持的以奉戴汉室为立足点的精神将会消亡。要之，大一统思想在舆论中尚保有浓厚色彩。但就事实而言，魏吴一时达成了盟约，吴举其全力，击溃了蜀军。

蜀先主刘备为吴所破，逃入白帝城后，身患重病。他把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叫来，以遗孤相托，并委以蜀政，最后病歿白帝城。这时蜀的人心似乎颇为动摇，南中（即云南、贵州一带）悉数叛蜀，其中还有与吴交通的。魏方面也发起了针对蜀国人士的劝降运动。《魏略》记载了魏名臣王朗给蜀许靖的信：

皇帝（魏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3\]](#)

当此难局，诸葛亮专心整顿内部，并以重温旧交、一致对魏为当务之急，使邓芝赴吴通和亲之意。

此前，吴为获得魏的好意，以卑屈之态向魏请求和亲时，来往于两国的通使经观察之后，得到了各种情报。约言之，魏以上国的优越权，必欲使吴屈于属国的位置，而对于魏使的这种态度，吴常群情愤慨。就事实而言，作为一种屈服的形式，魏方面要求吴以孙权之子孙登作为任子送至魏廷。魏人浩周来吴斡旋此事，孙权亲口答应了这一要求，但他并没有履行承诺的打算。于是魏廷舆论沸腾，据《魏略》记载，魏三公联名上奏，责难孙权。由此魏文帝最终下定决心，出动军队，要求孙权回答是否差送任子。面对这种威压，孙权决心依长江以抗魏军，并改年号为黄武，表示决不奉行魏的正朔。为此他甚至派使者去白帝城看望病重的刘备。这样，魏与吴之间开了战端，而魏军不利，全部退却。自此时起，吴国大臣劝孙权称帝的运动开始了。但

此时吴尚未决心与魏完全断绝和亲。要之，吴的态度是：不愿以臣下的形式屈服于魏，而又顾虑蜀的复仇，不愿与魏断绝关系。当此之际，蜀丞相诸葛亮公然派来了和亲的使者。孙权于是决心接见使者邓芝。结果，吴蜀盟誓，恢复了过往一致对魏的盟约。两国的这一交往完全基于对等的关系，若从长江流域的同盟对抗北方的这一形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外交上南北分立的状态已经形成。时为魏黄初四年（223）十一月，三年后孙权所下之令明白将魏称作“北虏”。

应该看到，吴拒绝魏的要求、自定年号，其独立在事实上已然完成；加之与蜀通和，其态度愈加鲜明。但不得不说，只要孙权还未即皇帝位，在形式上三国分立就还未完成。原本吴蜀通聘之时，两国各自以土产相互贡献（裴注所引《吴历》），在这点上似乎完全依据对等之礼。然而蜀既称帝号，在形式上，吴致蜀的文书大概不能用对等的辞令。今无表现这种形式的材料，不清楚实际情况如何；不过据记载，孙权刻了一枚自己的印章，放在当时坐镇荆州、常与蜀交涉的陆逊身边，孙权给汉主或诸葛亮书信时一定将书信给陆逊看，有不妥之处，让陆逊改定之后再加封印。因此不得不说在这点上，吴的独立尚不完全。魏太和三年（229），孙权始即皇帝位。其告天文昭告了曹氏的罪恶，并切言汉室已处于绝祀状态。因此在理论上，以汉室后继者自任的蜀国不可能承认吴的帝位，实际上，蜀的舆论也认为应该断绝对吴的盟好。不过，诸葛亮以魏为当面之敌，反而遣使庆贺孙权即位，并与吴重立盟约，公开发表盟约文辞。要之，确认魏为共同之敌，吴蜀如何分割魏之领土，两国间订立攻守同盟。如此，三国分立的形式已然完成。

注 释

[1]. 参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第59页。

[2]. 《三国志》卷四一《蜀书·费诗传》，第1016页。

[3]. 《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裴注，第968—969页。

第八节 三国分立及其纷争（二）

魏文帝曹丕即位以来，魏国的活力远弱于曹操时代。一般会列举曹丕疏离骨肉之事为其理由。陈寿在《魏书·武文世王公列传》中评曰：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1\]](#)

陈寿指出了魏封建之弊害：魏虽封建亲戚，但限定其权力，约束其自由，使其有名无实。当时的宗室受到怎样的束缚呢？为管中窥豹，兹列举裴注所引《袁子》一节：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2\]](#)

这种政策对魏王室的永续而言是下下策，这点笔者将在《外编》加以论证。以下主要论述的是，曹丕对其兄弟的阴险手段败坏了国家的活力。

曹彰、曹植二人是曹丕之弟。曹彰曾在河北北部击破乌丸部族并将其驱逐到今张家口市的桑干河流域，遂平定北方，被许以将帅之器。而继承了父亲曹操才略器识的实为曹植，曹操也特别钟爱曹植，曾有意传位于他。据《魏书·崔琰传》，魏国初建，立太子之议兴起，曹操以密函探寻朝臣意向时，崔琰呈上露板，公然主张以长子曹丕为太子。应该说这代表了一般朝臣的公论，曹丕总算被定为太子。但其后似乎一直有废弃曹丕、传位曹植的运动。据某些列传，曹丕常

小心谨慎，深作恭顺之状，以此获取曹操的欢心。曹操殁于洛阳时，曹植随父在洛阳，曹丕在邺。曹彰在长安接到父亲的召命后，正从长安赶往洛阳。因此曹彰到洛阳后，认为父亲召他来必是为了拥立曹植之事，于是以此询问曹植，曹植却矢口否认。即便如此，曹彰的想法无疑是拥立曹植，据记载，他曾问父亲的玺绶所在，但被大臣贾逵制止。不曾凝滞于这种家族内部的纠葛，曹操的灵柩送达邺城，曹丕以正当的顺序继承了王位。这时洛阳城似乎人心浮动，有人提议宿卫的军队全部用曹操故乡沛谯之故人；又，据说山东地区的青州军鼓噪而退出了洛阳城。曹丕在这种不完全安稳的气氛中继承王位，自然对诸弟严加监视。曹彰、曹植两人都不许留在京师而须到封国去。其中，曹彰在黄初四年（223）入朝，暴卒。有书记载，他是被毒杀的。又，与曹植关系紧密的一派在曹丕即位后不久，被一举扫除。曹植虽欲一试其雄略，屡次上表，却总受抑制。可见魏甚至不能充分驱使它同族的人才。

曹丕以法令禁绝宦官涉政，又防止外戚辅政。两者是东汉灭亡的祸根，是东汉末舆论攻击的目标。不过，以魏王室为中心的国家统制绝未因此而增强。关于此事，笔者将在《外编》再作展开，兹不赘述。下面我们看看曹丕对吴的态度。

当初曹丕继承父爵魏王之时，适逢蜀将孟达以新城（湖北房县）降魏。又，武都（甘肃成县附近）氐王杨仆也内附。曹丕将此事当作德化的证明，非常夸张地加以宣扬。《魏略》记载了他亲手写的令文：

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3\]](#)

曹丕即皇帝位时，吴孙权称藩纳贡。此事似乎进一步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不顾先朝重臣刘晔的谏言，封孙权为吴王。然而，当魏向吴要

求任子而遭孙权拒绝时，整个魏廷舆论哗然。曹丕于是欲诉诸武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他向前线将士下达动员令，并亲自南征，在故乡谯县“大飧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这一情形详见《隶释》闻人牟准的碑文（据《全三国文》）。[4] 这时魏军在长江中下游两道并进，曹丕亲自督战广陵（今江苏扬州）。魏宗室曹休负责此方面军事，意气风发，欲渡江作战。不过，先锋将领臧霸等久处富贵之位，不好战争，整个魏军暮气沉沉。因此两道都屡屡失利，曹丕于是下令召回全部军队。他在给魏朝三公的诏书中，直言南征的过失（《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注引《魏书》）。大概先朝旧臣贾诩、王朗等从一开始即反对南征。其后曹丕再度南征，至广陵检阅了军队；然而这时吴蜀联盟坚固，曹丕虽欲离间，但未成功（参照《吴录》）。他原本也没有讨伐的决心，其诗曰：

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

[5]

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就去世了，其子明帝曹叡袭位。关于曹叡的年纪，有不同的说法；但他即位时，确实正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丕特命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辅政。四人之中，曹休之名不见于其他人列传，[6] 《曹休传》中也没有他曾受遗命的记载。且据《晋书·宣帝纪》载，这时曹丕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7] 因而亲受遗命的无疑是三人，但曹休说不定也算其中之一。曹休、曹真皆是曹氏疏属，其受封爵在曹操的外舅夏侯氏一家夏侯惇、夏侯渊之后，作为军人派统领担当边防重任。又，陈群、司马懿皆为曹丕亲任，此二人加上朱铄、吴质，即文帝四友。这时钟繇、华歆、王朗等先朝宿望犹在，而曹丕特命三人辅政，则他心里不免以帝位为一家之私事。

曹叡为太子期间，不交接朝臣，读书于一室，世间完全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当时的大臣等暗自担忧。不过，据说曹叡万事独裁，

辅导大臣大抵被委以边防之任，中央的政治全由他自己掌控。曹叡即位之初，魏重臣之间党同伐异的弊害已然显著，陈群上疏论之，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8\]](#)

这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二人作为皇帝的近臣，逐渐掌握了朝政，在法制上应委之以天下之政的三公等，其事权逐渐变轻。此二人常探知天下之公论并汇报给曹叡，曹叡因之制御群下。不过，从官制层面来说，以帝王的亲近者掌权绝非适当。大臣蒋济因此强烈批评中书监令拥有实权。只是当时重臣之间已生朋党之弊害，站在曹叡的立场上看，以君权独裁的方式制御群下倒是适应时势的妙用。

曹叡的这种做法自然导致他对外的消极主义倾向。而规划对外整体方针的，实为中书令孙资。孙资认为：魏若要攻蜀，则经陕西斜谷道（陕西眉县西南有斜谷关）出汉中府，险恶至极。又，若要讨吴，则水军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就现状来说，二者都难有确实的胜算。若就防御来做计划，在兵数上三分之一就足够了，且兵粮也不难运转。自始至终，魏的行动似乎多基于孙资的这一规划。

而在蜀方面，丞相诸葛亮基本把持了内外之权。刘备败于吴，病死在白帝城时，蜀之人心虽一时有了动摇，但诸葛亮能够镇靖安抚，在完成内部的整顿后，用兵南中，亲渡泸水（长江上游），深入云南不毛之地，征服了这一地带。据说出征之初，马谡认为以武力强取是不行的，必须让南方蛮族心服，诸葛亮极为赞成，在征服之地广播恩信。如陈寿所评论，诸葛亮之素志在于进欲“苞括四海”，退欲“震荡宇内”。为此，他布法度，治戎旅，以至工械技巧之细，无不亲力亲为。推翻以上国自居的魏，尤其是他的首要目标。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蜀国虽在三国之中土地最狭，却在获得人和的活力上处于最卓越的位置。魏曹丕死，曹叡即位第二年，诸葛亮遂上《出师表》于后主刘禅，走上了北伐之路。

汉水上游汉中郡西今勉县（当时的沔阳）地区，实是诸葛亮大军驻扎过的地方。这时蜀之军略不统一。丞相司马魏延说道：今魏守长安的主帅是夏侯楙，他除了王室主婿的身份之外，并无其他才能。因而可从汉中直经斜谷道出郿县，循秦岭而东，直抵长安，若占据贮藏军粮的横门邸阁，则军粮也毫无问题。自己可为先锋，决行此计。不管怎样，魏的救援大部队赶到之前，尚有迁延，其间丞相的大军可自斜谷推进。如此可一举将关中之地纳入蜀的范围。不过，诸葛亮认为此计危险，没有采用。于是驻营沔阳，然后出至甘肃西部，以祁山为本营，企图自上游进入陕西。《蜀书·诸葛亮传》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甘肃陇西）、天水（甘肃甘谷）、安定（甘肃平凉东北）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9\]](#)

曹叡亲临长安，命勇将张郃防御蜀军；适逢蜀将马谡违背节度，在街亭（甘肃秦安县东）为张郃所破，诸葛亮不得已整顿全军，退还汉中。

笔者在上文详述魏延北伐之计，其理由在于：陈寿评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世学者多以诸葛亮不用魏延此计作为陈寿评论的依据。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也尝试列举可为诸葛亮辩护的种种依据。为免于繁冗，这里不一一介绍，简单地说，笔者认为陈寿所评很准确。在中国，原本就有“兵者，诡道也”之论，若有战争，必欲乘敌之隙而讨之，制胜于目前。而诸葛亮的做法与之不同：他先治理军政（大的方面，从全军士气的统一到军纪的肃正；小的方面，至于粮食搬运的技巧），在整体上形成浑然一体的组织，然后以正攻法[\[10\]](#)堂堂正正地进攻敌人，这是他的长处。但诸葛亮尽力避免偏于危险的行动，这有时会贻误战斗的胜机。而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失败之后立即整顿军容的那份镇定与从容。《汉晋春秋》云：

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11\]](#)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曾先后五次率军北伐。最后一次北伐在魏青龙二年（234）。蜀与吴联合，使吴进攻合肥新城，诸葛亮率领休养、调练了三年的精锐，取道斜谷，出至渭水南，驻屯郿县西的五丈原，并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这时魏对吴蜀两面都采用防守策略，尤其令防蜀统帅司马懿坚壁拒守，不许出战。而吴军先攻合肥新城，不得志。蜀军虽渴望野战，但魏军不出。诸葛亮赠妇人巾帼羞辱司马懿，魏将士之间时有动摇，为镇抚将士，司马懿特意向魏主请战。魏主明白其用意，特派辛毗传命，不许出战。就这样，两军相峙百余日后，诸葛亮罹病，薨于五丈原。据说魏军听到这消息后，仍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击之机，遂让蜀军结营而归。

蜀诸葛亮效法汉代传统精神，欲灭魏统一中国，由此魏蜀之间反复激战。其间，吴时常与魏上演小冲突，但大体上始终坚持安保一隅的方针。孙权领有的扬、荆、广、交四州之地受汉族文明的影响原本较浅，当孙权接替孙策割据江东之初，内部最大的问题实在于镇抚山越。据王鸣盛《商榷》，山越是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好伏处深山，不入城市，故名山越。[\[12\]](#) 湖南南部至广西自不用说，山越还广泛分布于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之地。浙东山地也是如此。这些被称作山越或山寇的少数民族往往与地方豪族相依附，是孙吴内部“祸乱”之源。原本汉族大抵沿大河流域的平地发展，平地与山岳相接之处所设县当时称作剧县，孙氏以勇将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其令长。这些武将多是北方人，孙氏凭借他们将华歆、王朗等汉末名士型郡守赶出江南，转而在其地实行武力政治。据《吴书·贺齐传》，贺齐为会稽剡县长官时，了解到县吏斯从有奸恶之行，欲诛杀之。当时，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13\]](#) 这表明山越与地方豪族之间的关系。贺齐先诛斯从，威震山越，再征服浙江、福建交界之地，最后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

区。于是在这一地区新设新都郡（浙江淳安县西），以黟歙之地设立四县。据《抱朴子》，此黟歙地区的“山贼”善用一种禁咒之术。而最有计划地处置山越的，是诸葛恪。针对山越蔓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数千里山谷之间的情形，诸葛恪命令各郡太守及其属县长吏将领内人民以军制的方式编为部伍，并把听从汉族法制的平民悉数聚集起来，屯田而居。之后，他向幽阻之地派遣军队，制作藩篱，不与山越交战，谷物成熟时纵兵收割谷物。山民即使袭击屯居的平民，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山民饥穷，渐有出降者。诸葛恪又下令：若山民乞求从化，则迁之外县，决不加害。于是山民老幼相携而出，数目达四万。诸葛恪将这些山民分给诸将，自领万人。于是，汉族的威令渐及江南山地。

孙权以武力统治境内的同时，也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之与北人一起担当朝政、军事大任。其下作为宰相而执掌大权的，是南人顾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宰相。据本传：“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14\]](#) 王夫之极赞赏他，认为在三国时代他最得大臣之体。又，在上游荆州很好地担当了吴之藩屏重任的陆逊，其宽宏政治当时无匹，他也是江南人。孙权能够重用南人并在三国鼎立之中实行宽松的政治，在于他搁置名分论，很能坚持其独特的立场。

注 释

[\[1\]. 《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591页。](#)

[\[2\]. 《三国志》卷二〇《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591—592页。](#)

[\[3\].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第60页。](#)

[\[4\]. 曹不大飧六军之情形见《大飧碑》，而据闻人牟准《魏敬侯卫觐碑阴文》，《大飧碑》为卫觐所作。参见《全三国文》卷二八。](#)

[\[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书》，第85页。](#)

[\[6\]. 应指其他三人的纪传。经查检，《三国志》曹真、陈群之传及《晋书·宣帝纪》在叙述受顾命辅政之时，均未提及曹休之名。](#)

[\[7\]. 《晋书》卷一《宣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4页。](#)

[\[8\].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第635页。](#)

[9].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22页。

[10]. 不用奇计，堂堂正正地进攻的方式。

[11].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23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山越”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13]. 《三国志》卷六〇《吴书·贺齐传》，第1377页。

[14].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第1226页。

第九节 魏室衰败，司马氏兴起

三国初期，统一思想尚强力涌动于一般舆论之中。毫无疑问，待分立形势固定下来时，这种议论在内容上实际已生变化。而蜀诸葛亮仍以此呼吁天下，甚至使得后世史家将正统之所在系于蜀。诸葛亮死后，天下不再主张汉室之正统，三国都安于偏安状态，同时王室权威逐渐失坠，强臣窃权于下，朋党渐繁。在这种时势之下，魏臣司马氏家族巧妙扶植了自己的势力。因此，以司马氏为中心来论述三国后期的历史，对事情的理解多有便利。

兴起司马家族的是司马懿，其后司马氏建立晋室，统一天下时，他被谥为宣帝，名列《晋书》帝纪。本纪记载：司马氏出自传说中的帝王高阳；秦灭而楚汉相争之际，司马卬与诸侯伐秦，被封为殷王，都于河内郡，子孙于是生息此地；司马氏自此成为河内郡温县豪族。司马氏出自古帝王高阳之说自然无人相信，其为楚汉之际司马卬子孙之说则一般得到采信。不过，在《三国志·魏书》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以及同族司马芝传中却未载此事。总之，司马氏为河内温县豪族是可以肯定的。考察其婚姻关系，则诸妇人皆聘自各郡名族，又司马懿仕魏之初以文学掾出身，因而应当具备作为名族的儒术教养。作为黄河津要，河内温县是汉代著名都会，在东汉末期的动乱中也就成了被掠夺的目的地，因此司马懿之兄司马朗曾率领整个家族逃到东方的黎阳。其后司马朗仕于魏武帝曹操，弟弟司马懿则不愿屈于魏。曹操召用他时，他辞以风痹之病。据说，家里曝书时恰好下暴雨，他慌忙收书，却被一个奴婢看见，其夫人张氏害怕装病之事泄漏，杀了该奴婢。又据说，曹操对于他的才干志趣始终怀有戒心，于是他在职任上一味装作恭谨，曹操也逐渐安下心来。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的论中评价他“情深阻而莫测”，指的就是他的这一面。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完全隐晦其才器，不过他与曹丕非常亲近，为曹丕四友之一，待

曹丕承继大统后，遂逐渐显露头角。文帝驾崩之际，司马懿以遗命担当辅佐明帝曹叡的大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对内万事独裁，而对吴蜀两国则专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马懿。然而，二曹的军事才能皆劣于司马懿，且早死，此后军事实权逐渐落入司马懿之手。其时蜀诸葛亮举其全力经营中原，攻击力非常锐利。司马懿把主要精力放在防御上，虽无赫赫功名，但总算将蜀军抵御在魏境之外。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的表现相当亮眼。首先是他在辽东地区的经营。

景初二年（238），在长安防备蜀军的司马懿被明帝曹叡召回，受命讨平辽东。这是因为辽东的公孙渊自称燕王，表现出独立的态势。原本两汉时期自今辽河以东、铁岭以南至朝鲜半岛北部，汉设了三个郡来统治，即辽东（郡治在辽阳西北）、玄菟（铁岭西北）、乐浪（平壤附近）。三郡之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当然是辽东郡；其属县辽队（辽阳附近）设置了盐铁官，又，沓氏（一曰沓浦，在大连金州附近）是山东与江浙两省海路交通的要所。东汉末动乱之际，公孙度崛起辽东，平定了三郡并跨海将山东东北部东莱收入囊中。随着曹操逐步统一北部中国，公孙度成为魏的附属，魏赐书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1\]](#)（裴注引《魏书》）公孙度死，其子公孙渊继后。[\[2\]](#)而与公孙氏交界之地的魏的地方大员如幽州刺史、东莱太守等不满公孙氏的独立姿态，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疏隔。面对曹魏恢复北部中国秩序的自然态势，公孙氏大概感到了压力，为保全独立，遂遣使到吴大帝孙权那里，与吴结盟。据《魏略》，孙权曾以舟百艘通商辽东，并求名马。公孙渊实无断然与魏敌对的决心，而当时幽州刺史毋丘俭对辽东采取威压政策，前者于是称燕王，表明了独立的态度。于是司马懿受命出征。公孙渊本非魏之敌手，在都城襄平被围攻三十天后，欲谈条件乞降而不得，公孙氏一门全部伏诛，其势力范围真正归属于魏。

魏的势力刚进入东北地区，不幸魏明帝曹叡病死了。司马懿从辽东凯旋，在幽州治所蓟城（北京）驻军时，天子传来诏书，令其再次赴长安。然而进至汲（河南卫辉）时，又有诏书催他快速进京（据《通鉴》）。从这前后相违的诏书中，司马懿察觉到宫中有变，急速赶赴洛阳。明帝于是委托重任，使司马懿与魏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辅佐嗣子齐王芳。事情的原委大致如下：

明帝无子，养有同族曹芳与另一人。关于曹芳的出身，《三国志·魏书》说：“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其后他被封为齐王，立为太子。[\[3\]](#) 但关于此，并没有看到相关权任大臣有过什么言辞。司马懿在辽东期间，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无援，绝对需要强有力的辅佐。起初，明帝在其特别亲近的同族燕王宇及其他同族人中考虑辅佐人选，并已发出命令。燕王宇不愿司马懿居内，建议使司马懿再镇长安，明帝同意了。然而，久侍于明帝而谋划政治万端的刘放、孙资与燕王宇关系不好，且认为燕王一派全无保存魏室的能力。于是他们以文帝的方针——决不让同族担当政治重任——为由，排斥燕王一派，在病床前逼明帝免燕王等官，代之以曹爽、司马懿二人。燕王一派流涕出宫。因此，将太子托付给司马懿并非明帝初心。而对于司马懿在明帝病床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写道：

时太子芳年八岁……帝执宣王（司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4\]](#)

又据《魏略》，这时明帝让太子芳抱司马懿的头。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改正了这些文字，做了稳当的叙述。但这些情景或许因其小说化的表现方式反而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只要其下没有担负责任的大臣，这种重大事件就绝不可能以正常手续运作。

对于明帝作为独裁君主的统治表现，史家孙盛极口称赞。不过相应地，其任性妄为、大兴土木、耽于游猎等缺点也受到当时大臣的严厉批评。举一个显著的例子，《魏略》载：

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明帝）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贯，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 [5]

明帝的失行确实为名流所指摘，加之齐王芳非正统出身，且以孤弱承继大统，因此魏室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

与司马懿一起辅佐幼帝的曹爽出自魏室疏族，其家族与夏侯氏一起世世占据军人派的栋梁位置。在明帝后半期，司马懿主要在军事上活动，今曹爽获重权，二者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关于曹爽的为人，陈寿评曰“德薄位尊，沉溺盈溢”，史书记载了曹爽很多违背当时形式性道德的行为，但当时的史料多成于晋时，它们到底包含多少真实性，难以遽信。与曹爽关系最亲密的何晏、邓飏等，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诸葛诞等，在当时的记载中被称为“浮华之士”。所谓“浮华”，可理解为专务理论、不重实行，大概主要是指不尊重形式性道德。当时常以容貌表现德行，而何晏被描述成一个极为柔弱的有贵公子风貌的人。《魏略》记载“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 [6]，裴注卜者管辌的别传甚至这样评价何晏、邓飏二人：“夫邓（飏）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晏）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 [7] 后者以观相预知成败，绝难采信。与前者傅白粉的记载相对，《世说新语》载，何晏容貌太美，以至魏明帝怀疑

他傅粉。刘孝标以《魏略》的记载质疑《世说》。但到底哪个正确？

《世说》直接记载明帝之言，而《魏略》是间接的后世记事。不管怎样，何、邓一派被形容为神识明澈的思想家型的人物，在这一点上，他们驰名当代。大概曹爽居中心，名流何、邓等居左右，并其下的策谋之士所形成的团体，谋求独占政权而给司马懿名义上的待遇，使之脱离实权。然而，这一团体急于进取，往往出台一些排斥前代遗老的举措，自然被当作秩序的破坏者而受人非难。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河南尹李胜属曹爽一派，《傅子》记载他的行事曰：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傅）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

[\[8\]](#)

之所以特意详述曹爽一派，是因为笔者认为，其后违背当时门阀的意向而出台进步方策之人往往背负失德的恶名，这种例子即发端于此时。司马懿暂时对曹爽党装出完全远离实权的样子，但魏嘉平元年（249），趁曹爽奉幼帝出洛阳，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强迫太后下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实权。这时先朝遗老蒋济等虽同意司马懿的行动，但其意本在排斥曹爽一派而将政治引向正当的道路而已。然而司马懿对曹爽一派的纠弹极其酷烈，《晋书·宣帝纪》载：

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9\]](#)

此后，司马氏的势力变得稳固，司马懿又受赐九锡之礼、郡公之爵，反对者逐渐被诛灭。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景帝）承继父亲的实权。此人与何晏、夏侯玄一样，也以思辨博得声誉，但在诛灭曹爽一派之际，他又是其父亲帷幄里面谋划最勤之人。他取得事权之初，天下名流各当其任，或制边境，或宰州郡，或掌选举，或参计谋，或预

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唐太宗论司马懿曰“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10\]](#)，恐怕司马师也有这一面。大概相比汉末以来的名分论，他欲应时势而善处之。这点说不定是司马氏家族的传统思想。《魏书·司马朗传》载：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11\]](#)

在统一倾向较盛的三国初期，司马朗提出了分离主义的统治策略，开其后西晋时期思路之先河。司马懿以宽容为时望所归，司马师继承其父遗德，巧妙地扩大了家门权势，为此他不惮于诉诸残酷手段，在这点上远超其父。以下举例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即在掌握实权第三年，司马师诛灭了被许为当世名望的李丰、夏侯玄等人。关于这一事件，陈寿的记载极为暧昧，反倒是《魏略》的记载更有条理：李丰此时为中书令，是齐王侧近之臣，常为齐王所召，参与密议。而司马师抱有疑心，就此事讯问李丰之时，李丰未据实回答，为司马师所杀。此事机密，不分明云云。[\[12\]](#) 恐怕确实不分明。企图谋杀司马师、推举夏侯玄之类的记事，应是其后廷尉公开罪状之际制造出来的。当时任廷尉的是钟毓，据说收李丰之尸时，钟毓拒绝审理此案，但被敕命强压，不得已而屈从。于是廷尉不得不作辞状，说李丰与夏侯玄一派勾结，图谋不轨。因此《世语》记载：当钟毓裁定夏侯玄之罪时，夏侯玄责怪他说，卿在公卿之位，却受公府之旨，像狱吏一样来责问我，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罪状随卿怎么写都可以。如此，狱期终了之时，钟毓制造罪状，使与事件相符合，并将它给夏侯玄看。此时钟毓流涕，夏侯玄只是默然颌首而已。[\[13\]](#) 《资治通鉴》采用了《世语》这一记事，而关于李丰则随《三国志·魏书》。若仔细阅读，前后明显有矛盾之处。作为当时名流，夏侯玄受人推重，他与曹爽、何晏亲善，是司马氏最害怕的对立者。

李丰事件之后不久，齐王芳为司马师所废。此事也不分明，但表面的程序是清楚的。司马师奉太后之命——齐王芳有很多背德之行，不可以承天绪——召集群臣，流涕告以不得不废立之情形。于是群臣皆表赞同，当时大吏联名公布了齐王的背德之行。全文载于《三国志·魏书》，要之齐王耽于女色，侮辱儒士，延小优于殿中裸袒游戏，言行蔑视礼法，等等。这一形式给其后的历史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它开了一个先例，使天子废立变得极为简单易行。

废齐王后，高贵乡公髦被拥立。正元二年（255），为防吴而镇守寿春城的勇将毋丘俭起来反抗司马氏。据其檄文，其时司马师主要将兵权集于中央，边境将士的给养很少，这是反抗的根本原因。此外，毋丘俭也揭露了司马师恣意废立君主却反将罪名归于君主的行径，努力唤起舆论。对此，司马师亲自出征，讨灭了毋丘俭等人。

平定毋丘俭的动乱后不久，司马师病死许昌。此时，其弟司马昭（文帝）总领六军于京师洛阳。因司马师之死，天子亲自下令，命司马昭移军许昌，以尚书傅嘏代之守备洛阳。然而中书侍郎钟会与傅嘏谋议，擅改此令，使司马昭与傅嘏一同回到了洛阳。如此，司马昭继承父兄的实权，事实上总揽了天下政令。可以想象，自此以后，魏室禅于司马氏的所谓禅让运动或许已萌生于司马氏一党之间。由诸葛诞之事可资证明。诸葛诞原本被视为曹爽、何晏的党徒，但其后他始终与司马氏步调一致，征讨毋丘俭并继其后，镇守寿春城。此人的态度颇受怀疑，因而司马氏策谋之士钟会、贾充等计划先将他讨灭。尤其《魏末传》记载：为暗探诸葛诞的行动，贾充亲赴寿春城，以禅让之说迂回试探诸葛诞的态度。对此，诸葛诞端正威仪，斥责了贾充，表明当报魏恩的心迹。[\[14\]](#)《晋书·贾充传》采用了这一记载。恐怕在洛阳名流之间，禅让之议已盛行。如此，司马氏一党盯上诸葛诞，以他在淮南收买人心、抱有不臣之心为由将他讨灭。天下已经没人能够反抗司马氏了。这时，突然发生了高贵乡公带有浪漫色彩的反抗事件。

废齐王后，司马师之所以迎立高贵乡公，完全是因为太后的恳请，而非其本心。高贵乡公才华横溢，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他在文集的自序中表明自己深蒙上天恩宠。他与裴秀、王沈、司马望等名流相互讲论文籍，对自己的才识很自信。因此对司马昭的压迫，他抱有特别强烈的反感，对近侍之臣王经、王沈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告之以讨伐司马昭的决心。二王皆是司马氏党徒，且实际上宿卫兵士极少，所以他们极力劝阻。但高贵乡公说以死相搏，并率僮仆数百，鼓噪出宫。二王立即将此事告知司马昭，高贵乡公惨烈败死。不久，太后下令，高贵乡公作为忿戾无道之君被废，且葬以庶民之礼。如此，从名义上抹杀了天子被杀的事实。

陈留王奂继立，司马昭受封十郡，被加以九锡之礼。景元四年（263），伐蜀之令发出，第二年蜀亡。经司马氏之手，天下有望再次走向统一，以下另起一节记述其事。

注 释

[1].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渊传》裴注引《魏书》，第258页。](#)

[2]. [公孙渊是公孙康之子，公孙度之孙。公孙度死后，子公孙康、公孙恭先后掌权。后来公孙渊逼公孙恭退位而掌权。](#)

[3]. [曹芳被立为太子，是在明帝临终前。](#)

[4].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第114页。](#)

[5].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注，第105页。](#)

[6]. [《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注引《魏略》，第292页。](#)

[7]. [《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管辂》裴注引《辂别传》，第820页。](#)

[8].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注引《傅子》，第624页。](#)

[9].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

[10].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1页。](#)

[11].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司马朗传》，第467页。](#)

[12]. [《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裴注引《魏略》，第301页。](#)

[13]. [《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裴注引《世语》，第302页。](#)

[14].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裴注引《魏末传》，第771页。](#)

第十节 西晋的统一

诸葛亮死后，蒋琬继之掌握蜀国文武大权。诸葛亮颇赏识他，遗命托以大任。他谨遵诸葛亮的规划，在汉中经营四方。汉中之地与蜀都相隔甚远，适于积极进取，不便消极守国。这时蜀都舆论似乎表现出消极守国的倾向，当费祎、姜维两人晓谕蜀都风旨时，蒋琬遂徙屯涪城（绵阳），在军事方面重用姜维，使之专任甘肃方面的守备。不久，蒋琬死，费祎继其任。这时曹爽用事于魏，欲大举伐蜀。一般认为，这是曹爽一派谋划的对内性的远征，即曹爽一派想谋得对司马懿更好的竞争位置。实际上这是一次轻率的远征，他们未与甘肃方面曾受司马懿恩顾的武将们取得充分联络。曹爽的远征对蜀而言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镇守汉中的蜀将之间产生了动摇，但首将王平处置得当，费祎之军接着自涪城进至汉中，魏军不得志而退却了。蒋琬、费祎相继掌握文武实权期间，虽身在涪城，但政治之万端须咨询他们而后施行，且对于屡欲进图甘肃地区的姜维，他们常加以抑制，仅提供一万兵而已；因此，国家的统制未曾有乱。然而费祎被魏之降人暗杀后，蜀国势力出现了转折。

姜维是渭水上游天水郡（甘肃甘谷县）人。渭水、汉水及洮水的上游地区本是羌族杂居之地，姜维善于获取这些羌人的信任，利用羌人势力经营甘肃一带以图中原，是其素志。费祎死后，姜维一旦掌权，就在此意图下树立了总体计划，蜀国自然由消极守国转向积极进取。举一个例子：自诸葛亮以来，防魏的根本在汉中，以此地为中心，西立汉城（汉中勉县），东立乐城（汉中城固县），其间汉水上游平原地区，诸围棋布，暗通联络。此前曹爽横切秦岭骆谷入侵之际，蜀军很快在汉中北方的兴势山挡住了魏军。然而姜维变更了策略，撤销诸围，专据汉、乐二城，使敌人自由进入平原。他的考虑是，即使平原地带被敌人夺取，只要坚守诸城，敌人就不得长期屯驻；伺其疲乏，再以上游关头城中的重兵一举屠灭敌人。原本魏蜀之

界大体在于西倾、秦岭之脉，魏在狄道、陇西、南安、祁山（甘肃礼县）设重兵严密防备。姜维专以狄道为进攻目标，集大军于西方，自然汉中的守备就失之疏略了。

费祎死于魏嘉平五年（253），此前一年，吴主孙权卒。诸葛恪新掌吴国军政之权，变更了吴国方针，一意热衷于北伐之计，于是劝诱姜维，以东西呼应而举事。姜维尽力于北伐，此为开端。此后姜维连年坚持这一计划，一时在洮水流域取得大胜。但不久为魏将邓艾之军所破，蜀人皆怨叹他出兵无谋，学者譙周作《仇国论》，陈述时势，明论北伐之非理。姜维由此在内政上逐渐失势，遂使军事与政治两分。然而，蜀后主刘禅是出了名的暗愚之主，宦官黄皓逐步弄权。吴使曾这样描述蜀国内政：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1\]](#)

司马懿诛灭曹爽一派之际，夏侯玄的兄弟夏侯霸[\[2\]](#)降蜀。姜维问魏是否有南征之意，他答道：司马氏忙于营立门户，无伐蜀之意；但钟会若得志，就一定会伐蜀。此语恐怕道出了魏国有权势者一侧的观察。司马氏一意张大家门权势，已如前节所述。不过，若因司马氏的这种做法而直接以为司马氏不受欢迎，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吴人张悌曾比较魏室曹氏和司马氏，说道：

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3\]](#)

此处对司马氏虽加以“奸计立矣”的道德非难，但可清楚看到：司马氏以宽裕的政术，安定了当时的民心。我们来看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后的善后处置：抚其党类，即便是司马氏对立者之子孙，只要他们乞

降，就可既往不咎得到重用。因而史家习凿齿极赞赏其文德，说：“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如果我们不将儒者原心诛罪之法适用于历史而专考察历史之迹本身，则可看到司马氏的治法足以使天下归心。

以上是司马氏政术之梗概。下面就其经营之迹作一论述。司马懿平定辽东，切实将东北纳入其势力之下，已如前述。此外，司马氏经营淮南的方法也不容忽视。《晋书·宣帝纪》记载：正始三年

（242），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二年，“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4\]](#) 参照《三国志·魏书》，则此政策的发议者是邓艾。邓艾以河南东部陈、项（陈，今河南淮阳；项，今安徽太和）至寿春城之间良田可耕者少，提议：开渠以尽地利，既大积军粮，又可通军事上的漕运之道，与此同时，实行屯田策，为经营南方打下坚实基础。屯田策，原先曹操在河南中部实行过；开渠通漕之事，此前也谋划于诸处，尤其作为对吴政策之一，贾逵已经实行过了。但大范围且详密地实行，是在司马懿接受邓艾的建议之时。于是淮水南北地区似乎切实归于司马氏的统治，其后诸葛诞在寿春反抗司马氏，军队的中枢主要由吴人构成。[\[5\]](#)

这样，司马氏在内以宽厚之政取得民心的归向，在外统一军权，确定了势力范围，北部中国大体显出统一的形势。因此当司马昭依据此势，且蜀政不振时，灭蜀的好时机到了。适逢钟会献计征蜀，司马昭于是决意出兵。

魏景元四年（263），司马昭令钟会率左翼自关中向汉中，诸葛绪率中军自祁山，镇抚甘肃的邓艾率右翼自狄道，分道进发，廷尉卫瓘持节监诸军。这时，蜀国姜维率领几乎全部精锐抵挡邓艾之军，汉中守备极虚弱，钟会乘机一气攻陷了汉中。姜维欲据剑阁之险，阻止北军入蜀，于是移大军于东方。自西方进军的名将邓艾不失此机，自阴

平（甘肃文县）由邪径直出蜀之绵竹。这是一个大胆的冒险，《三国志·魏书》载：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6\]](#)

为防备钟会，蜀大军已集于剑阁，今遭邓艾意外袭击，蜀必须急速防御，但其策不立，且蜀都舆论也不主张决战，蜀后主自往邓艾军门乞降。当时通过邓艾而上于魏的降书由谯周所作（或云郤正之作），其中论述了不得已偏安蜀土的理由，并说今当魏运隆盛，不可不顺天命而归降。邓艾报书说，黄河流经之地，乃帝王之居所，这是天之定数，古来反之者，没有不亡的。[\[7\]](#)于是，蜀灭亡了，时为263年。

此前，魏中军之将诸葛绪贻误军机被免职，钟会统其众，但不能破姜维军。两军对峙剑阁时，蜀亡，姜维进退两难，于是降于钟会。据当时的记载，姜维计划暂时降于钟会，使钟会讨邓艾，取蜀都，然后反过来斩钟会，以再兴蜀国。事实上，这时钟会、邓艾之间嫌隙大构，为此邓艾以谋反的口实被免职，而后遭杀害。大概邓艾认为平蜀之后，应乘机讨平吴国，为此必以收揽蜀国人心为至要；而他又专断处事。监军卫瓘以为这是受命之外的事，他仍不听。据说，钟会一派乘机向司马昭报告了此事，邓艾于是遭免职之厄。这时司马昭给钟会书信，告知钟会他亲率十万大军到长安，并使心腹贾充率大军进入汉中。表面上说是为了防备邓艾谋反，但邓艾一人，钟会的大军足以处置。因此这次出兵的原因很明显，即司马昭疑虑邓艾失势后钟会的态度。

据这一时期的史料，钟会从一开始就有谋反之志，为此种种类似小说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要之，钟、邓之类的韬略之士不被司马昭充分信赖，这一点是明白的。史家曾这样记载司马昭之言：“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8\]](#)这与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稍有缓急之差，但意思几乎一样；司马懿也

有过这种言论。这种所谓的同语例或许表现了三国以来北部中国统治者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握有征蜀军队全权且统辖了姜维部下蜀军降卒的钟会，是容易走上险路的。然而，钟会与姜维过于亲近，使得魏军对于新附的蜀军怀有极大的猜疑之心；这种嫌隙遂激发了叛乱，钟会、姜维皆死于乱军之中。善后处置由监军卫瓘完成。这样，蜀在司马氏之下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司马昭以平蜀之功被封晋王，第二年病死，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权位。这时，吴国南边交趾地区叛吴，遣使通魏，又，暗中请求归顺的吴臣也较多；平吴的时机已到来，舆论也倾向平吴。但司马氏为修饰帝业而一味炫其文德，对吴示以恩信安抚之态度，又在内部废除屯田，以示和平之意向，并下令拔擢贤能。《晋书》载：“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9\]](#) 魏帝曹奂于是让位司马炎，魏朝灭亡，西晋肇新。时为晋泰始元年（265）。

晋朝新立，司马炎忙于除魏苛政，建立一新之治。他恢复五等爵，施行封建制，诸王可在其领国选任长吏，废除前朝禁锢宗室的制度，且废除诸将出征戍边、长吏出仕州郡时纳质朝廷的习惯。在表面上，再次呈现了和平统一的治世。其间，吴国国内秩序紊乱，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以下述其梗概。

252年，吴大帝孙权卒。陈寿评其为人，赞美他有英雄之资后话锋一转：“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斃。”[\[10\]](#) 征之史实，他的专断行为从229年自武昌迁都建邺后就时时出现；到了老年，祸发后宫之内，溺于所爱，不听众议，以致破坏了国家体统。孙氏嫡长子孙登早死，其后孙和被定为太子。然而，其弟鲁王孙霸之母得宠并欲使孙霸取代孙和，引发了萧墙之祸。起初，孙和之母也曾得宠，孙权定孙和为太子时，以当时名流教导之，孙和也涵养文德，得到了名流的赞誉。然而，孙霸之母得宠后，孙权使孙霸与太子居于同一宫殿，礼秩也与太子相同。群臣以为这会扰乱统制，其后孙权乃命孙霸居于别宫，但未戒饬孙霸，因此兄

弟嫌隙加深，群臣也分为两党，相互争夺。虽然大众舆论都寄希望于太子和，当时的名臣陆逊屡向孙权进言，孙权却抑制太子一派，甚至加以诛戮。陆逊为此悲愤而卒。此后，孙霸一党露骨地排斥太子，孙权震怒，赐死孙霸，其党株连者颇多。同时废黜太子，以末子孙亮代为太子。对于这一计划，孙权族孙孙峻与有力焉。在孙氏一族中，孙峻曾祖父孙静特别尊重学问、优礼学者，从而博得了声誉。而孙峻自身则没有那种程度的名望。要守护孤弱无羽翼的孙亮，孙峻资历过轻。当时代陆逊镇武昌的，是诸葛恪，他颇受时人器重。于是孙权病重时，主要以诸葛恪辅佐幼主。孙权死后，诸葛恪万事独裁，起初他开诚布公，废止隐密监察之政，免除诸税以得民心，又对内抑制诸王权力，借陈寿之意，其行事与魏邓艾相似，有三国前期人物风貌。当此吴帝代立之际，魏乘机南征，而诸葛恪阻击于合肥，大胜。前节所述的毋丘俭对司马师的反抗实源于此时的大败。但对吴来说，这场大胜却成为诸葛恪转向积极对魏方针的契机，他远结蜀国姜维，专力推进北伐计划。他太过锐意进取，对外错估司马师的势力，对内疏于了解吴国实情。如邓艾所言，此时吴国名宗大族各拥部曲，蓄有兵杖，仅以一纸军令难以立即动员起来，因此舆论也颇反对北伐。结果北伐徒为魏军所沮，不久不得不退兵，由此非难之声高涨。尤其他在外期间还更选朝廷内部职官，这些不平促使孙峻设计诛杀诸葛恪。魏嘉平五年（253），孙峻使吴主布置酒宴，召诸葛恪入殿而杀之，孙峻代之取得了军政实权。孙峻在士流之中原本就没有声望，今又妄居重位，为保持其威权，迫害诸王，吴政遂乱。

孙峻死后，同族孙琳占据他的位置。孙峻执政以来，魏淮南将士对司马师反感不断，在寿春举事者多求援于吴，孙峻虽响应，但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功业不举。孙琳取代孙峻后，援助了最后一次反抗司马氏的诸葛诞，却损失了很多名将，由此受到舆论强烈非难。适逢天子至于盛年，亲览政事，对孙琳的处置多有不满，欲诛孙琳而反被废。这时群臣联名公布天子孙亮的恶德，恰如固定模式，惟“于宫中

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结合江南水乡的特点，有点新意。这也为后世南朝历史提供了先例。

孙亮废后，其兄孙休立。孙休即位之初，孙琳以拥立之功专恣至极，一门五侯，为吴开国以来所未有。孙休不满他的所为，与心腹张布、濮阳兴暗谋，诛灭了他。《世说》注所引《条列吴事》评论孙休“在位烝烝，无有遗事，唯射雉可讥”，他尤其博得了好学的令名。不过，他分别委任宫中、外政之事于张布、濮阳兴，自己埋头典籍，因而全体纲纪未张。在位期间，吴国灾异频仍，据《晋书》云，这皆因政治不得当。尤其交趾地区反抗吴的统治、暗通司马氏也发生在孙休末年。据《三国志·吴书》记载，交趾太守孙谡（《华阳国志》

“谡”作“靖”云）曾征发手工千余送建业，而察战又至，民众害怕被征发，以至反叛。所谓“察战”，指的是直接由朝廷派遣的使者来地方搜括征调，吴以宦官担当（参照《三国志旁证》）。孙谡在叛乱中被杀。然而正当司马昭讨平蜀国，其诸将之间征吴之议甚嚣尘上，吴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孙休病死了，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被拥立。

新立的孙皓被史书记载为一个败德少年：有敏捷之才，却全然用在放纵上。这种模式的天子其后屡屡出现在南朝历史中，孙皓可谓制造了这种模式的人，或者说，他是被人们制造的人物。以下论述其要点：孙皓即位之初，司马昭的使者带来了一纸劝降书。吴对此没有采取明确的拒绝态度，答之以稳健辞令。大概司马氏也没有立即动兵的想法，因而双方就以眼前的关系维持国交。然而自北方来的某国使，盛言北方的好处，触怒孙皓而被杀。[\[11\]](#) 其后，当北方司马昭死，司马炎继之并受魏禅而建立晋朝时，吴不听名臣陆凯的意见，妄图北伐，于是断绝了通好关系。孙皓亲率大军自建业城向西进发。据《江表传》，这是因为他当时听信术士图讖之说而欲实行北伐。但途中遇雪，道路堵塞，兵士百人推引一车。这时伴随天子的还有其母、其妃。兵士等受此苦役，颇多冻死者，自然在他们之间出现了“若遇敌便当倒戈”的流言，孙皓于是引还。这一记载很像有作伪痕迹，《三

《三国志·吴书》未采用。但据这则故事可知，孙皓断绝与北方的通好关系时并没有确定的方针。

孙皓行事古怪的一例，是他曾一时迁都武昌。这据说是听从了西陵（现今湖北宜昌）督步阐上表的意见，迁都理由不明。或许关乎北伐计划？但为此下游江浙地区的百姓不得不溯流供给武昌，这是极大的苦痛。于是陆凯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劝天子必须返回民心所在的建业。孙皓听从其言，不久返回建业。但同时他又修筑昭明宫，为此，命地方太守以下皆入山林，监督砍伐运输木材；又以苦役杂使江防兵士。[\[12\]](#) 这使军备松弛，详见贺邵及华覈的上表。更直接导致民心离叛的，是[\[13\]](#) 兵的设定与宫女的征发。民丁被编入兵籍，以国费养之，此即义兵。对于被征发的家庭，他们有一家离散之苦；对费用的负担者来说，他们困惫之至，卖子入税（《陆凯传》）。又，关于征发宫女一事，朝廷的使者奔走于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陆凯传》）。②此外，综观陆凯所列孙皓二十项过失，则当时吴国名流切直上表者非常之多。大概孙皓用左右近侍之言，独断专行，完全置名流舆论于不顾，他作为败德少年的形象就这样被史料鲜活地记录下来了。

据《江表传》载，会稽（浙江绍兴）及湘东（湖南衡阳）两太守曾反抗过孙皓的虐政，孙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又，某人因其暴乱之行，被孙皓处以车裂之刑。[\[14\]](#) 《三国志·吴书》载：“（孙皓）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从裴注中可见，这种记载难以信用，[\[15\]](#) 但不管这种记载是否属实，吴国全体名流已经抛弃了孙皓则是事实。若北方动兵，民众几乎是等着接受吴的灭亡。

如前所述，邓艾曾说吴之大族各蓄兵力，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这种情况在孙权时代已经萌芽，所谓吴之四姓（即朱、陆、顾、张）在吴的势力非常强大。在朱治的传中记载：

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朱）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孙）权答报过厚。[\[16\]](#)

据《世说·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其一族在朝之数，陆凯答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注所引《吴录》说道，陆凯屡向孙皓直谏却免于诛戮，是因为孙皓畏惧陆氏宗族之强盛。吴得以维系其命脉，受益陆氏正宗陆抗之处实多。

此时，西晋主要谋划南征的是名臣羊祜。此人深得晋武帝亲信，他向武帝谏言，灭吴必须在上游蜀地配备强有力的水军，为此推荐了名将王濬。适逢吴国西陵督步阐反叛降晋，羊祜欲乘机将西陵完全收入其手，但由于陆抗绵密的计划，羊祜未收其功。由此，羊祜一意等待王濬水军的经营，自己则在湖北整理荒芜之地，布恩信于吴人之间，以德绥抚敌人。对此，陆抗亦应之以德，严禁侵扰晋境。两者各守边界，陆抗送羊祜以酒，羊祜亦以药相酬，边境竟得相安无事。而陆抗死后，南征之期到来，羊祜即举杜预代己，自己则归朝鼓动武帝。[\[17\]](#)

浸染于司马氏历代宽柔之政，西晋王室腹心诸大臣多不赞成南征之计。羊祜归朝，求其同心之人，得中书令张华。他将意图详告张华，并使之劝谏武帝。大概他担心孙皓死后，立其他君主，晋将永远失去伐吴机会。[\[18\]](#)此时，杜预在襄阳，修缮甲兵，袭击吴西陵，取得大胜。西陵督张政因之被免职。张政是吴名将，他的去职为晋南征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杜预上表请求南征。此表到武帝手上时，恰好武帝与张华在下围棋。张华热心赞成之，武帝意乃决。

晋咸宁五年（279），讨吴之师终于出发。晋军共二十万，兵分诸路进发，中坚军队有：自四川东下的王濬军，自湖北襄阳欲屠江陵的杜预军，以及自安徽寿春城出和州、直指建业的王浑军。三军之中，就主帅官阶而言，王濬处于最下位。因而晋的最初计划规定，王濬军进至建平（重庆巫山）为止可独立行动，进入湖北后须受杜预节度，

进入下游江西后须受王浑节度。但杜预上表武帝，请求让王濬自由发挥他的手腕。[\[19\]](#) 王濬大喜，以长久经营的蜀之水军，所到之处皆破敌，取得武昌后大军压江东下。这时，为攻击已进至长江对岸的王浑之军，建业使张悌以精锐渡江，大败，建业兵力因之虚弱。王浑部将建议乘机直冲建业，但王浑认为这超出了中央政府的命令，就在他迟疑之际，王濬军攻陷了建业西北要所石头城。于是，孙皓上降表，王濬最先到建业城受降。据《江表传》，孙皓将败，与书其舅，平实地承认吴的灭亡完全是因为他一人的不德；又与书群臣，希望他们在晋的统一之下，各自效力晋朝。时为太康元年（280）五月。

注 释

- [\[1\].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1255页。](#)
- [\[2\]. 夏侯霸应为夏侯玄叔父。](#)
- [\[3\]. 《资治通鉴》卷七八元帝景元四年（263），中华书局，1959年，第2475页。](#)
- [\[4\].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4—15页。](#)
- [\[5\]. 诸葛诞反抗司马氏时曾向吴求援，军队的中枢非由吴人构成。](#)
- [\[6\].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第779页。](#)
- [\[7\]. 《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邓艾报书云：“……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第900页。](#)
- [\[8\].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第794页。](#)
- [\[9\]. 《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0页。](#)
- [\[10\].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第1149页。](#)
- [\[11\]. 据《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司马昭派吴降将徐绍等为使者使吴，徐绍回北方，“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安，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第1164页。](#)
- [\[12\].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贺邵传》：“（何）定间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第1457页。](#)
- [\[13\]. 兵及宫女事，见《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凯传》，第1402、1406页。](#)
- [\[14\]. 此两处《江表传》分别见于《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天玺元年（276）、天纪元年（277），第1171、1172页。会稽、湘东两太守“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孙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
- [\[15\].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第1173、1174页。裴注记载吴平后，晋侍中庾峻等问孙皓的侍中李仁有无剥面凿眼之事，李仁给了否定的回答。](#)
- [\[16\]. 《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治传》，第1305页。](#)

[17]. 据《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抗传》，陆抗死于吴凤皇三年（晋泰始十年，274年）秋。而据《晋书》卷三四《羊祜传》及《资治通鉴》卷八〇，咸宁二年（276）除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咸宁四年（278），“羊祜以疾病求入朝”，“羊祜疾笃，举杜预自代”，遂于该年去世。

[18]. 据《资治通鉴》卷八〇咸宁四年：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辇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陈伐吴之计，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数入，更遣张华就问筹策。祜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华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

[19]. 据《晋书》卷四二《王濬传》：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濬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预书。

第十一节 西晋的衰亡（一）

晋平吴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不过，对于征吴，晋国的舆论并未达成一致，存在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首领即开国功臣贾充。当时，贾氏一派盘踞朝廷要职，因此武帝司马炎任命贾充为征吴军总帅，欲以此显示国论一致。贾充辞退任命，武帝说“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只得受命，驻扎襄阳。然而，即便将军王濬已经攻陷武昌，贾充仍持非战论，亲自赴阙陈情，请求斩杀朝臣中唯一的主战论者张华。武帝说主战的计划是自己所立，张华只是赞同而已，由此抑制住了贾充。其间，王濬军已攻陷建业。自对岸安徽攻吴的王浑本是贾充一派，因愤于王濬在他按兵不动于和州地区时攻陷了建业，他弹劾王濬未按原计划服从自己的节度，擅自行动。于是王濬槛车被征，似乎要重蹈邓艾平蜀后的命运，幸而由于他的陈辩以及武帝的圣虑，得以无事。南征功臣照例得到重赏，反对南征的首领贾充自然名列其中。其后，贾充一派的旧臣依然独揽朝权，名臣杜预身处襄阳，常重赂他们，仅保其位；张华被疏远，赴镇幽州；王濬悠游，不关世事，明哲保身。据石崇的上表可知，南征功臣都处在不遇的境况。

一般认为，晋以宽裕之政博得了民心。《晋略》著者周济论曰：“晋之代魏也，忌才不忌德……是故夷才以靖祸，贵德以示宽大。”（列传二论）[\[1\]](#) 西晋开国之初，作为魏朝遗老受到殊礼的，是郑冲、王祥、何曾和荀勗。这几人在事务之外，作为一般风气的维持者而为王者所景仰。例如《郑冲传》曰：“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簞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对于何曾、荀勗，傅玄大加赞赏，曾论之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王祥的孝行故事近似小说，著闻天下已久。要之，此等人士即所谓清议的维持者。所谓清议，是为维持社会、家族道德而形成的舆论形式，它主要是为了树立家族道德的形式，但有时也广泛涉及社会道德的形式。例如，贾充曾设宴招待朝臣。当时庾纯最后到会，贾充

讥之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盖因庾纯的先祖曾做过排头兵（即当时的伍长）。庾纯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这是指贾充的先祖曾是管理市场的役吏（即市魁）。由此，贾、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庾纯为此自劾辞官，贾充也请求解职。这成为朝臣之间的一个问题，何曾、荀！偏袒贾充，于是罢免了庾纯。其理由在于：不管按礼论，还是按律论，庾纯的行为都不在违法之列，但他不愿行至孝之道，犯常人之过失，这一点值得付诸清议。也就是说，清议在礼、律的范围之外发挥其作用，甚至可使高官免职。要之，在司马氏所谓宽政之下，先朝以来高官之子孙取得了位置，万事由他们之间兴起的舆论而运转；反对南征的议论盛行于当时朝臣之间，或许即缘于这种时势的氛围。如前节所述，吴多有强宗大族，孙皓因为伤害其感情而灭亡；今考察晋政，在这点上，它与吴完全一样。大概风气之所伸张，绝不以长江一水为南北之限。

以先朝遗老为首的晋廷，其制度之万端自然不得不流于形式。吴灭之年，武帝下诏撤去天下州郡之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企图一扫汉末以来地方刺史领有兵民两权的弊害，恢复汉的全盛局面。交州牧陶璜论曰，南方边地在事实上不可遵行此诏；又，仆射山涛也论用兵之本，切陈不可撤销州郡武备。其论今不传。武帝虽称之为天下名言，却不采用其议；于是下一位皇帝惠帝永宁以后，“盗贼”群起，而州郡无备，不能擒制，以致天下大乱。[\[2\]](#) 此前后之相关情形，可见于《资治通鉴》，[\[3\]](#) 不过《晋书·武帝纪》却未载此撤兵之诏。是因为《晋书》著者并没有那么看重这一诏书吗？据《晋书·杜预传》，平吴后，他在襄阳锐意开发地力的同时，尤其致力于兵备。这显然与诏意矛盾。大概诏书所云本属一般形式之规定，未必期于彻底执行，且存在一点妙用，即中央大吏可消极性地通过这一措施来制御地方强臣；但或许如《通鉴》所记，混乱一旦发生，反而不可收拾（《通鉴》基于《晋书·山涛传》）。我们再举王沈的例子，看看当时地方官如何仅拘泥于表面形式。如前所述，王沈是这样一个人

人物：出卖魏高贵乡公，向贾充告密，遂使天子死于非命。为此，他受到朝臣们的非难，出为豫州刺史（治在河南许州）。至州，王沈发出教令：陈长吏得失者，与谷五百斛；言刺史宽猛者，与谷千斛。其主簿某认为这一教令完全没有道理，尤其设赏使人陈诉长吏得失的做法，十分有害，“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黷之人，将慕利而妄举”。即便如此，王沈仍然相信设赏使人面陈刺史（即自己）为政宽猛是极具恩威的做法，不过在主簿的强烈反对之下，他撤回了这一教令。这种不惜以滥赏的方式来取得民誉的做法，透露了当时为政者的心理。

贾充等反对讨吴之策，总的来说，代表了朝臣的一般舆论，其所举理由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显然，他惧怕外族势力逐渐强盛。《晋略》概述当时外族的情况：辽水东西皆鲜卑，自山西北部至黄河、汾水之间则有匈奴，自陕西北边至甘肃一带胡人、鲜卑、氐羌皆保塞杂居。特别是讨吴之论兴起时，甘肃一带的晋军屡为羌人所苦，羊祜为了说服朝臣，极力主张“吴平则胡自定”的观点。这一主张的意思并不十分清楚。平吴之后，郭钦倡导实边论，提议乘今兵威之盛，充实边备。当时的议论之中，这一派是存在的，只是舆论随势之所趋，流向了形式上的和平论，却是事实。

唐太宗评武帝司马炎曰：“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从重视舆论、听从众议的角度看，反可见武帝是一位发挥晋政之特长的君主。此时，全体朝臣之间奢侈之风盛行。对于这一风潮，武帝起初很反感，自奉质素之风，欲有所匡正。但清望首领，为一世所仰的何曾自身也以奢侈的生活作风闻名。据说，他在朝廷飧宴上，不吃太常官所做的食物，且“日食万钱”。为此，武帝也放弃了奖励质素之风的意志。于是奢侈之风渐长，石崇作为其代表人物而载诸史册。据其传：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4\]](#)

奢侈之风与淫虐之风相辅相成。《世说·汰侈》篇载，石崇每开宴会，必使客醉，若有不醉之客，则杀行酒之美人，且颜色不稍变。[\[5\]](#) 据其注，王敦[\[6\]](#) 也有同样的故事。要之，这是当时权势之家间容易发生的故事，而成为人们的谈资。另一方面，吝啬之风也与之互为表里。王戎拿着算盘彻夜算计，家有好李，可卖之获利，但为了不让他人得到种子，遂将李核钻掉，这类故事很有名。因此金钱的力量非常之大，南阳鲁褒《钱神论》曰：

（钱）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7\]](#)

东汉王符斥责当时洛阳权贵的吝啬之风，说他们可为妻妾犬马掷百金，却不肯为他人出一钱，[\[8\]](#) 其口吻中愤激之情犹很显著。而鲁褒此文，从头到尾极尽嘲笑与讥讽之能事，甚至对普遍的吝啬之风表现出轻微的兴趣。

如前所述，晋武帝未能贯彻其抑制奢侈之风的素志，反而陷入了朝臣竞相夸炫财宝的漩涡之中。据说平吴后，吴宫廷的财宝美女等大

量涌入晋廷，武帝完全沉溺于淫荡生活之中，耽于享乐，因而伤身，以至夭折。《胡贵嫔传》载其事曰：

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9\]](#)

于是武帝怠于政术，外戚专横之端逐渐显露，朝臣树党争权之芽在武帝晚年已经萌生。

武帝所立太子是惠帝司马衷。早在做太子时，他的暗愚就出了名，大家都认为他没有继承晋之大统的才能。而他无疑是正统的帝位继承人。因此关于太子，朝臣之间势必产生种种意见。始终维护太子的，是贾充一派。那是因为贾充之女是太子妃的缘故。武帝之弟司马攸极得父亲司马昭钟爱，据说司马昭还有意使之继承大统。其为人温良，亲文籍，为一般人士所归仰。因此朝臣中有一派认为太子暗愚，应废太子，代之以司马攸。又有一派不那么极端，认为应让司马攸辅佐太子，执掌实权。可以看到，后面一派代表了稳健的舆论。起初，武帝自身与司马攸感情极厚，但武帝的近臣，掌内部机要的荀勖、冯二人，是彻头彻尾的贾氏党，他们不愿司马攸拥有权力。武帝时，随着封建制的复兴，出现了一种意见，即可将帝室一族封于地方强臣之间，使之相互牵制。于是荀勖一派以实行这一意见为口实，劝武帝将诸王遣往各封国。起初武帝仅将司马攸留在京师，但最终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司马攸遣往其封国齐国。此时，平吴名将王浑等上表论此举之非，大意是说，外戚之祸将萌，应将宗室之望留内以赞皇朝。此论共鸣者颇多，但武帝终未采用。而齐王在前往任地的途中得病，第二年去世。[\[10\]](#) 武帝为之痛哭。就这样，宗室的柱石倒了，其后仅汝南王司马亮得留于京师，但他不是维系众望的人物。太熙元年（290），武帝病重，欲求足以托付太子的人物，而旧臣大多或物故，或远离内朝，不得已使外戚杨骏与汝南王亮辅政。然而乘武帝因病迷乱，皇后

杨氏排斥汝南王，使杨骏一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氏之家难以及围绕家难的朝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发端于此。

作为外戚，杨骏与两个弟弟自武帝在世时就颇滥用权势，以至时人谓之“三杨”。今杨骏担当辅佐之任，天子所出诏命都通过杨太后发出，自然他的意志就左右了政治。而他行事苛细，不合舆论，普遍认为他必将失败。而他失败的原动力实发自惠帝的贾皇后。

贾皇后是贾充之女，武帝在为太子求妃时，有人推荐她，武帝不太喜欢。因为贾氏家风好嫉妒，其容貌又丑，欠缺做太子妃的资格。然而武帝的皇后极力推荐贾氏，当时的近臣荀勖、冯”又是贾氏之党，武帝不得已同意了。贾氏成为太子妃后，果然表现出嫉妒之情，她曾亲手向孕妾掷戟，将其杀害。当时武帝考虑废除她，被杨氏一派谏止。大概外戚在很多地方欲依傍贾党势力。然而贾后虽容貌短黑，却颇有才气，她挟惠帝以排斥杨太后及杨骏，欲自取政权。当时，禁军将校之中不满杨骏行事者颇多，而杨骏却不自知。贾后一派暗通他们，又趁有人非难杨氏专横，欲鼓动宗室栋梁汝南王亮入朝而遭拒绝，于是谋划使胆大无谋的楚王玮入朝，以统禁军之一部。杨骏采用了此议。他恐怕未察觉贾党的密谋。楚王入朝不久，贾党之人暮夜启奏惠帝，使之下诏废杨骏；同时派禁兵往杨骏府，杀之，并以叛乱的名义，诛其三族。又使有司以惑乱社稷的罪名，废国母杨太后为庶人，剥夺她作为先帝皇后的资格。这恐怕是贾后的唆使。对于这一残酷的处置，朝臣中非难之声颇多。又，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

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11\]](#)

司马氏的宽政被丢弃，蹂躏礼教的酷虐手段上场。文饰之弊已到极尽之处。

代替杨骏而表面上担当辅政大任的，是汝南王亮和晋开国元老卫瓘。作为有德之士，卫瓘驰名当世，据说武帝原想以他的女儿做太子妃。因此他为贾后所憎。在这种家族间相互排挤与贾党阴谋独占政权的相互作用下，楚王玮被操纵，再次突然兴兵，诛灭了汝南王亮、卫瓘二人。下手人为楚王玮，贾后借此杀了楚王玮，至此贾党的天下暂且达成了。

贾后一族的贾谧，生活极豪奢，广交文学之士，亦通文籍，一时名流竞颂其德。他选了一些特别优秀的人物，号二十四友。贾谧以其声望成为贾党智囊，并举荐当时的人才张华、裴頠，委以大政，以图一变天下人心。张华如前所述，在武帝时为贾党所忌，久弃幽州，他治理该地的卓越手腕得到朝臣的充分认可。此时，他是惠帝太子司马遹的官属，久为时望所归，于是被委以大任。据其传，“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然而贾后在取得权力后，淫虐日益增长，她被记录为史上稀见的淫妇。其转载有如下故事：

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姬，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阁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12\]](#)

贾后淫虐之风评已为当世遍知。而她欲始终握有政权，暗中于宫中养贾谧一族之子，[\[13\]](#)排斥已定为太子的司马遹，谋将太子位传于养子。这是使晋室走向瓦解的第一步。

据说，惠帝太子司马遹少时有敏捷之才，武帝特别寄予厚望，武帝明知惠帝暗愚而不废之，乃是因为他完全信任皇太孙遹。因此武帝最关心他的教育，以有力人物为其师友，作其羽翼。惠帝即位，他被立为太子时，官属尽是当时名流。不过，自迁到东宫以后，他与势家子弟耽于游戏，逐渐远离学问。作为他败德的一例，据说他“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据说他“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这些故事包含多少事实，不得而知；总之，贾后一派将太子败德之事宣扬于中外。据《司马遹传》记，“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有一天，贾后诈称惠帝有病，召太子到宫中。太子既至，被置于别室，贾后使一下婢赐以酒枣，乘太子醉，使太子书写文士潘岳预先作好的祷神之词。其内容是诅咒惠帝与皇后。当时，太子被逼饮酒至昏迷，于是执笔写成一半，下婢从旁协助以成全文。以这一文书为证据，第二天惠帝召集群臣，下议赐死太子。大臣张华、裴頠对文书有疑，议至日暮，贾后恐有意外之变，进言免太子死而废为庶人，由此，事情有了决议。太子既废，被监禁于许昌。世间翕然同情太子，宗室中不满贾党专横者甚至欲为太子报仇。孙秀利用蔓延于洛阳权贵间的这股浑浊空气，恣意舞弄权术，于是引起了“八王之乱”，宗室诸王互相争斗，前后十五六年，在这内争之中，西晋王室完全陷入了衰亡的境地。

注 释

[1]. 该论在《晋略·列传二·裴秀传》后。

[2]. 见《晋书》卷四三《山涛传》。

[3]. 见《资治通鉴》卷八一武帝太康元年（280）。

[4]. 《晋书》卷三三《石崇传》，第1007页。

[5]. 脸色不变的应是不喝酒的大将军（王敦）。《世说新语·汰侈第三〇》：“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6]. 有相同故事的应是王君夫（王恺）。注载：《王丞相德音记》曰：“丞相素为诸父所重，王君夫问王敦：‘闻君从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与共来。’遂往。吹笛人

有小忘，君夫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丞相还，曰：‘恐此君处世，当有如此事。’”

[7].《晋书》卷九四《隐逸·鲁褒传》，第2437页。

[8].《潜夫论》卷三《忠贵》：“且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神惑其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

[9].《晋书》卷三一《后妃上·胡贵嫔传》，第962页。

[10]. 据《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资治通鉴》卷八一等，太康三年（282）十二月武帝下诏，以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之后，朝廷按旧制着手准备遣齐王攸之国的礼仪。第二年三月，“齐献王攸愤怨发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许，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攸疾转笃，帝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其无疾；辞出数日，呕血而薨。帝往临丧……”由此可见，齐王攸未启程去齐国就病死在洛阳了。

[11].《晋书》卷九四《隐逸·董养传》，第2434页。

[12].《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第964—965页。

[13]. 据相关史料，贾谧是贾午（贾充之女、贾后之妹）与韩寿之子，贾充无子，以外孙为嗣。贾后所养也是贾午与韩寿之子韩慰祖。

第十二节 西晋的衰亡（二）

如前节所述，以晋都洛阳为中心，贾氏一派依次排除异己，表面上，贾党似已实现了专制。但只要晋所实行的封建制不倒，贾氏一派就不可能完全除去宗室势力。晋的很多宗室也亲近贾氏，以利于自身地位。此等宗室多掌禁兵，作为武臣而分得洛阳政权的一杯羹。贾党大概为了表面应对天下舆论，重用张华、裴頠等名臣，使之居于台阁首领；因此所谓文臣一派尚在贾党、宗室圈外苟延残喘。但是他们所规划之处，与一般政治有何种程度的关系呢？此时，台阁之臣中，有王戎（王浑之子）及其从弟王衍二人，皆清谈之士，以不理世务而闻名。《王衍传》载：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1\]](#)

以清谈取人，荐之于朝。若朝臣皆以不关实务的思想家类型的人充当，则当淫虐之朝，他们似可免除自身祸患。要之，当时朝臣若要对一般政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反不免愚昧之讥。家族群之间以利欲为主的争斗逐渐露骨升级，谁又能阻止得了呢？

当洛阳的一些家族群埋头于权力争夺时，地方边境的胡族势力逐渐增长。胡汉关系的一般情形，笔者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此时，在甘肃一带得势的氐羌族中，氐族主帅齐万年公然自甘肃东北进入陕西之地。原本司马氏颇重视西北警备重地——陕西长安，并以宗室一人驻防此地，然而在任者善后处置失当，使氐帅窥视陕西腹地。宰相张华忧之，他发现时任京师禁卫的孟观颇有才器，于是举拔他，命其统

帅宿卫兵和陕西士卒征伐齐万年。结果，孟观斩齐万年，陕西地区幸得暂时维持原状。而同年太子洗马江统呈上所作《徙戎论》，主张将进入陕西的氐羌族迁回甘肃原地，他论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2\]](#)

不过，对于当时的洛阳当权者而言，边境之事只是琐碎的漠不关心的事而已。以下再次回到当时的重要事件，即权力争斗的叙述中。

贾后一党虽已废太子遹，但此前废除贾后的议论也充满洛中。文臣的首领裴颀曾持此议，又，督禁兵的武官之中也颇多同心者。因张华不同意，裴颀之说未得实行，由此禁军将校等欲通过宗室赵王伦举事。赵王伦在宗室中是最平庸之辈，曾镇长安，亲任幕下孙秀，为此边境经营失当，受地方大吏一致排斥。于是赵王被召回京师，孙秀因地方大吏的表请，险被斩杀，幸得代赵王来长安的梁王彤庇护，仅得免死。随赵王回京后，孙秀巧得贾党信任，尽力逐步提高其主赵王的地位。孙秀本是山东地方小吏出身，《晋书》记载他儿子孙会的容貌时，用了“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这种充满轻蔑色彩的语句。孙秀是赵王的智囊，因此禁军将校图谋排斥贾氏时，先将此意告知了他。然而孙秀不愿因排贾氏而增太子遹之势力，于是建议赵王，使贾氏先废太子，然后宣扬其罪，屠戮贾氏。[\[3\]](#) 果如他的计划，贾氏已废太子，于是孙秀使赵王与禁军将校以及一二侍奉殿中者合谋，诱出惠帝，先使惠帝下达斩杀贾派智囊贾谧的诏书，将贾谧斩于殿前，进而捕逮贾后，废之，并将贾氏亲党悉数收捕。此事朝廷大臣张华以下皆不得与闻。[\[4\]](#) 于是，孙秀为使赵王掌握实权，欲屠戮当时朝廷之人望。张华、裴颀首先成为牺牲者。据说，这大概缘于孙秀对他们的宿怨——孙秀曾向他们谋求官位而遭拒绝。其他自石崇以下，很多名臣

遭其毒手，洛阳由此完全陷入恐怖之境。一代豪奢石崇在被孙秀家奴收捕时说：“奴辈利吾财尔！”奴说：“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石崇不能答。

孙秀既诛名流，为保全其权威，于是使赵王收取文武大权，赵王府置兵二万，匹敌禁军；又为牵制此时镇邺的成都王颖、镇许昌的齐王冏、镇长安的河间王颙的势力，在地方安插孙秀一党；最后强使惠帝让位于赵王。然而，就官于此新天子之下的，都是超阶越次杂乱受命者。当时，奴卒也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一年，选举人才不用考试，天下之守令皆封侯，然而官府铸造不了那么多侯印，只得以白板封侯。由此有了“白板侯”的称谓，据《晋书》，“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5\]](#)。

赵王伦夺帝位后，首先谋划以兵力讨灭赵王伦的，是镇许昌的齐王冏。待其檄文发送四方，响应的有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常山（河北正定）的长沙王乂。[\[6\]](#) 三王亲率国兵进军洛阳。此时，很多地方大吏迷于向背，两党武力相争，到处皆然，此前以洛阳为中心的争斗于是席卷全国，天下乱离之征愈发明显。

赵王一派主要防备齐王冏，自北方而来的成都王颖之军却在河北大胜赵王军，孙秀知道洛阳已经不能停留，在他们商议逃脱计划时，禁卫一将校突然反叛，俘虏了赵王伦。赵王伦被迫写了复位惠帝的诏书。此时，惠帝被幽禁于金墉城（洛阳北），他再次回到了洛阳。成都王、齐王皆率兵入朝；镇长安的河间王颙以及新野公歆，起初态度暧昧，此时也皆入朝。诸王会于洛阳，各有其兵，其间存在爆发冲突的危险。“新野王歆将之镇，与（齐王）冏同乘謁陵，因说冏曰：‘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常山王乂与成都王颖俱拜陵，乂谓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闻其言者莫不忧惧。”[\[7\]](#) 幸而成都王幕下的卢

志建议成都王归国以收四海之心，王从之，由此，冲突的危险才得以消除。

齐王冏是齐王攸（武帝之弟，曾最有人望）之子，《晋书》本传说他“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今在洛阳取得大权，却沉湎酒色，对于多难的局面没有任何举措。朝臣中有人上合理建言，他也没有采用其言的勇气。但对于惠帝皇太子之位空缺的情况，齐王冏请立清河王覃为皇太子，这是预先的以防后患的安排——据说，成都王颖将来有可能继承皇位。此时，成都王颖的民誉非常高。他既有破赵王伦的大功，又让其位于齐王冏，赢得了人望。此外，对于河南地区因战乱而穷困的百姓，他从河北仓库出米十五万斛以赈之，又为八千战死者造棺下葬等，更是博取民心的举措。为此，优秀人物多集于成都王幕下，所镇邺城的繁荣似超过当时的洛阳。与之相对，齐王冏之下的朝臣则战战兢兢。吴人张翰在秋风起时，思念江南的土产菰米、莼羹、鲈鱼鲙，即时辞官南归；处士庾袞恐祸乱将兴，率妻儿逃至山中。

河间王颙幕下的李含，当时在洛阳，是禁军将校的一员；他与齐王冏府将校意见不合，逃归长安，称受惠帝密诏，劝河间王废齐王冏，立成都王颖。河间王采纳他的意见，给武人张方十万兵，使之向洛阳进发，并送檄文于诸王，劝废齐王。成都王颖在外、长沙王乂在内一起响应，但河间、成都、长沙三王之间在感情上并不一致。据《长沙王传》，河间王希望齐王冏杀长沙王，而后以之为口实屠杀齐王，而成都王也曾遣刺客袭击长沙王。[\[8\]](#) 可见内争愈加险恶。

长沙王乂是诸王中最勇决之人。洛阳军将都心服于他，因此当齐王怀疑并企图杀他时，他亲率左右闯入宫廷，斩齐王，并夷灭其族。由此，洛阳的军权事实上已落入长沙王之手，但政治上的大事，长沙王每每遣使去邺征询成都王的意见。大概长沙王、成都王皆武帝之子，有协力辅佐王室的真意。但此时围绕长安、邺、洛阳三个中心的群臣间利害关系太过复杂，尤其当河间王颙的谋臣李含为长沙王一派

所害后，河间王就以长沙王为仇敌，再次举兵，谋诛长沙王。成都王对此的态度为天下所注目，其谋臣卢志劝他此际留邺自重，但成都王最终为河间王所动，与之一一起征讨长沙王。河间王的武将张方已过函谷关，逼近洛阳。成都王屯朝歌（河南淇县），吴人陆机率其前锋。然而陆机先被击破，张方接着被击退。朝廷乘机和解长沙、成都二王，长沙王也致书成都王，欲与之协力，但成都王的要求过于苛刻，长沙王的苦心遂成泡影。这时，河间王之将张方决溃环绕洛阳城的千金竭，以困城中。千金竭是魏时利用流经洛阳东的谷水而开的运河，两岸排着水碓，以舂洛阳城中之谷，当时的贵族拥有这些水碓，并以此获利。千金竭被决溃后，朝廷只得征发王公奴婢为军队以手舂谷；又，为补充兵力的缺乏，一品以下免于力役或男子十三岁以上者，全部随军服役，奴隶也被免奴籍，站上前线。洛阳与外部的通商断绝，石米万钱，天子命令所及，只在一城之内。

长沙王处在这种困境，却屡败成都王军，又对惠帝一意恭顺，因此城中未有离心者。但是，禁卫以及大将军府的将校常处祸乱的中心，其中疲于战争者暗中拥戴宗室东海王越，幽禁长沙王。由此洛阳城混乱至极，东海王越引入张方军，诛杀长沙王。

长沙王垮台后，成都王入都，他授兵于部将，使之镇抚洛阳，自己则还邺，总揽万事。成都王起初声誉很盛，史书却称他“形美而神昏”，待大权在握，其缺点暴露无遗。于是在洛阳的东海王将成都王的部将驱逐出城，并奉天子击邺。但此举彻底失败，东海王自洛阳逃归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成都王将天子迎至邺，一度以此地为帝都。

幽州刺史王浚在诸王反复争斗时，总是态度暧昧。当时成都王势力强大，他感到了威胁，于是结交幽州边境的乌丸以及东海王越弟东嬴公腾（时为并州刺史）。东嬴公也想借山西边外鲜卑族之力，以图成都王。对此，成都王则与山西境内的匈奴族相结。胡族之力为中央政争所用始于此。王浚、司马腾军逼邺，匈奴酋长刘渊请求为成都王

拒之，但成都王惧于乌丸、鲜卑之势，弃邺逃至洛阳。因此王浚之兵以及胡族大掠邺城。

与天子一起回到洛阳后，成都王已丧失了旧时的权威。当时，张方还在洛阳，而洛阳城内已被张方之兵剽掠殆尽，士兵们无意久留洛阳。为众议所动，张方也欲奉惠帝及成都王奔长安。天子及朝臣无力拒之，天子只得亲至张方营垒，任其处置。于是，张方为天子备车，载上一部分宫人宝物，其余任军人掳掠。“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张方又焚宫殿宗庙，以绝天子及群臣顾返之心。[\[9\]](#)

此前逃回封国东海的司马越，被其兄弟及同族在山东、河北地区任刺史者以及幽州刺史王浚等推举，以迎惠帝回旧都洛阳之名举兵征讨河间王。这时，张方在长安太过专横，河间王声望扫地，已经连陕西一带也无力控制。洛阳不久落入东海王之手，河间王斩张方，欲与东海王和解，未成。敌军逼近长安，河间王一时逃入长安南面的太白山。东海王于是奉帝归洛阳。其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皆为东海王同党诛灭。不久，惠帝也病死了，曾为河间王所立的太子司马炽（怀帝）即位。东海王依然独揽政权，但此时天下四分五裂，帝都洛阳已等同废墟。以下转而略述地方上的乱离之状。

如前所述，当贾氏专制时，甘肃氏族齐万年扰乱甘肃、陕西一带。除这次骚动之外，此地又连年饥馑，因而地方流民一边乞食，一边成群南下。在渭水上游今甘肃省秦安县地区（当时被称作略阳县）有氏族的一支——賸部，其酋长李氏自三国以来就定居于此。这时酋长李特护送北方流民到达汉中之地。于是，李特上书朝廷，请求让这些流民定居四川沃野。朝廷不许，但当时汉中大吏贪取贿赂，答应了李特的要求。[\[10\]](#) 就这样，他过了剑阁之险，得以沿嘉陵江到达保宁[\[11\]](#) 的大平原；看着这悠阔的山川，李特叹息道：“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他所率领的賸人及北方流民进入蜀地后，与土著居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如朝廷曾有徙戎的讨论一样，这里也

有人要求将賸人赶出蜀境。然而，当时在成都的益州刺史赵廞原是贾氏姻亲，当贾氏败亡之际，有在成都自立之意，于是借李特武力以自重。其后，赵廞败死，朝廷派罗尚作为刺史进驻成都。当时，与中原的混乱一样，蜀地诸势力极其纷繁交错。蜀人一般都欲驱除新来的北方流民，但毫无统一的力量来强力实行；因此流民反而紧紧追随賸部李氏，这种团结之力，让刺史的权威也无可奈何。于是，李氏势力逐渐为蜀人承认，且李氏对蜀人只征马，没有其他的侵掠，因此蜀人反而对李氏抱有好感。适逢李特被罗尚袭杀，而其子李雄将罗尚逐出成都，且为蜀人所推，登上帝位，国号大成。蜀于是处在李氏的统辖下。时为晋光熙元年（306），恰好是惠帝死去的那年。

李特护送甘陕流民南下之际，“义阳（河南省信阳市）蛮”张昌独自暗中逃至湖北。途中夺得官军幢麾，招募土人，自称台遣（即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以乱官军之目。这时，朝廷以壬午诏书，特别命令荆州（即湖北地区）发兵入川以镇李氏之乱。然而民众不乐远戍，当局强制调发时，他们往往屯聚而为劫掠。又，此时湖北一带罕见地大丰收，北方流人就食者数千口。张昌乘机巧作谣言称：“当有圣人，出为民主。”（据《通鉴》）他将诸流民及躲避戍役者引为同党，攻掠郡县。其后，张昌推立县吏沈丘，称之为“圣人”，更其名为刘尼，宣称刘尼是汉之子孙，有天子之命，自己则是刘尼的宰相。于是，“于石岩中作宫殿，又于岩上织竹为鸟形，衣以五彩，聚肉于其傍，众鸟群集，诈云凤皇降”，以此巧妙收揽了江夏地区的民心。

“众至三万，皆着绛帽，以马尾作髯”，又舞刀走戟，或为击刺之势，或为击敌之状（据《通鉴》及胡注）。张昌组织了一支异样的军队，于是自湖北闯入湖南，又另派部下石冰冲击安徽、江苏的北部地区。石冰大肆残掠此地后，闯入江苏省的扬州。[\[12\]](#) 当时身处寿春城且在都督刘准之下负责南北漕运的陈敏，以漕运之兵击败石冰的土兵，于是极受东海王越重用。尽管如此，陈敏仍在安徽和州自立，以此为根据地，恣意残掠江南。

由以上的简述来看，东海王越掌握实权时，整个长江流域都处在动乱中。张昌此后虽被名将刘弘讨平，但山简接替刘弘后，在北方的宛（河南南阳）、湖南零陵又分别兴起了王如、杜弢之乱，可谓一波万波，无有止境。而给西晋最后一击的仍是北方少数民族。

起初，匈奴酋长刘渊在山西为成都王颖抵挡以鲜卑、乌丸为主体的王浚、司马腾之军。成都王垮台后，刘渊转而在离石的左国城（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东北）独立，建立了汉国。据说他意在绍继汉室刘氏，统辖北方胡人，进而君临晋人。时为永兴元年（304）（《通鉴纪》），恰好是张方拥惠帝入长安之年。此后，刘渊击破司马腾，将之逐出并州，又将羯族石勒及其他扰乱中原的王弥、刘灵等收归帐下；他逐渐派兵南下，夺取河南地区的邙城，又使石勒攻略山东地区。如此，河南、山东之间，刘渊势力纵横。东海王越于是戎服朝见怀帝，请求率军讨平胡族。他悉率洛阳名将劲卒，张阵营于项。结果，“宫省无复守卫，荒瑾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这时，周馥上表，建议自洛阳迁都寿春。其中一节曰：

伏思大计，……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
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

[\[13\]](#)

可知，仅东南有几分和平。然而东海王看到此表后，非常愤怒。这是因为周馥未经其手而直接上表。当时怀帝与东海王之间感情甚为疏隔。而东海王出屯项后，不仅在征讨胡族上没有任何计划，连洛阳城内的反对党也不能镇压，与怀帝构生嫌隙后，忧愤成疾，于永嘉五年（311）去世。然而，洛阳已无人能代替东海王而处权任位置，时望王衍等也以奉丧返东海为借口，欲躲避责任。途中为石勒军所袭，十万将士几乎都被俘虏或虐杀。此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在位，他遣部将大举进攻洛阳。正当洛阳迁都之议起，众人忙于准备之时，几乎没有任何抵抗，洛阳城就陷落了。惠帝皇后羊氏为刘渊族子刘曜所妻

略，怀帝及其国玺被迁于当时刘聪的都城——山西平阳。西晋王室基本灭亡了。秦汉以来，久被视为天下中心的黄河流域，中夏之地，开始由所谓的“五胡”占据主角位置；三国以来渐次瓦解的北部中国的统制，至此已达极点。

注 释

[1]. [《晋书》四三《王衍传》，第1236页。](#)

[2].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31—1532页。](#)

[3]. [据《晋书》卷三一《惠贾皇后传》、《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资治通鉴》卷八三惠帝永康元年（300）等：太子被废后，太子曾经的官属司马雅、许超和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划废除贾后，使太子复位。于是说服孙秀言于赵王伦，赵王伦采纳。但孙秀又对赵王伦说，他们党于贾后，路人皆知，即便使太子复位，未必得到太子的感激，甚至不免被诛杀，若等贾后杀害太子后再废贾后，为太子报仇，则可免祸得志。之后事态的进展确实如此。总之，据史料记载，贾后废太子之前，裴頠等确有废后之议，但禁中将领欲废后，恐怕是在废太子之后，且孙秀建议赵王先使贾后杀害已经被废的太子，然后宣扬其罪，屠戮贾氏。](#)

[4]. [据《晋书》卷三六《张华传》：“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第1074页。](#)

[5].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第1602页。](#)

[6]. [据《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举义三王为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又据同卷《长沙王乂传》，此时乂因楚王玮被诛，被贬为常山王，率国兵以应三王义举，复本国。](#)

[7]. [见《资治通鉴》卷八四惠帝永宁元年（301）。](#)

[8]. [据《晋书》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成都王遣刺客图谋长沙王，在长沙王诛齐王后，当时河间王、成都王共攻长沙王。](#)

[9]. [焚宫殿宗庙之事，被卢志谏止。见《晋书》卷四四《卢志传》，《资治通鉴》卷八五惠帝永兴元年（304）。](#)

[10]. [《资治通鉴》卷八二惠帝元康八年（298）载：“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流民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民赂，表言……朝廷从之。”](#)

[11]. [据《清史稿》卷六九：“保宁府……领州二，县七，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巴州、通江、南江、剑州。”](#)

[12]. [非指今江苏省扬州市。石冰进入了当时扬州治所建业。](#)

[13].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第1664页。](#)

第二章 东晋五胡时代

第一节 秦汉以来胡汉关系概述

为方便起见，对于西晋时代中国的自然地形，可分北、中、南三部分加以说明。自甘肃省西部向东走的西倾山脉与岷冢山相连，将汉水与渭水的上游分开，又往东，为桐柏山，是淮水的上源，至安徽省，为霍山山脉，直至江苏，这一带山脉以北、万里长城以南，是为北部中国；这一中央山脉与南岭之间，为中部中国；南岭以南，为南部中国。（跨云南、贵州两省的苗岭向东北延绵，为仙霞岭，至浙江没于海，南岭是全部这些山脉的总称。）在中国文明的黎明期——殷商时代，中华民族多少对自己的文明开始有些自觉，其历史舞台实在于北部中国平原的中心——黄河下游地区。周替殷后，实行封建制度，武力作为统一的要素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于是所谓汉族文明变得更加明了，同时涉及范围也更广。春秋时代，汉族文明渐显于中国北、中两部分，即黄河、长江流域，而自这时起，汉族逐渐强烈意识到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区别（即所谓华夷之别）。通常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所作，传《春秋》之学的学者认为孔子有意通过此书明确内外之别（即华夷区别）。其后，四裔之说为孔子学徒所倡导。《礼记·王制》对四裔分别取不同的名称，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分类法以五行思想为根据，将汉族置于中央，再置不同名称于四方少数民族。按注释《王制》的人的解释，四裔的名称皆含贬义，例如“夷”有简而无礼之意，“蛮”有执心违邪之意，“戎”有强恶之意，“狄”有辟易无别之意。这种繁琐的解释果真是《王制》的真意与否，暂且不论；总之，《王制》已明显含有这种思想，即把汉族置于中央，其文明比四裔更卓越。而以贬义来解释“蛮”名的是汉代人，所以应该认识到，到了汉代，汉文明中心思想愈加高涨。

通观中国全部的历史，可以看到，汉族受“蛮夷”的入侵一般来自西方和北方，相反在南方，汉文明有逐渐扩张的倾向。秦汉帝国建立时，帝国的运营者主要是北部中国的人士，因此王室（这些支配者一侧的代表）的大方针是：对西方及北方胡族采取牢固的防御政策以防其侵入，同时，逐渐布汉族文明于南方。此节将简述汉代对西方和北方胡族所采取的方针。

通常都说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今日认为：战国时代，七国割据，各自筑长城于国境上，其中主要与北边胡族相接的秦、赵、燕三国的长城由秦始皇连接起来，是为万里长城。长城的连接，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同时另一方面也含有明确胡汉界线的意味。实际上，秦始皇设定的对胡族的第一防御线远在长城以北的北方。《汉书》以下记载值得注意：

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
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
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1\]](#)

此文应分三段来解。“至云阳”止为一段。所谓河南之地，是今日称作河套或鄂尔多斯的地区。也就是说，黄河流经甘肃省，犹向东北流入沙漠中，在陕西省外一度形成了一个三角洲。黄河在陕西、山西交界的北边骤然南折，由此河幅狭窄，水流湍急，恰如瀑布一样南下而去。黄河的这一屈曲所包裹的陕西边外地区即河南之地。秦将居住于此地的胡族赶走，临河建筑都市，并将犯罪者迁去那里，以充防备；同时，自九原（即黄河南折之处）（内蒙古涇阳乌拉特旗）到云阳（即陕西同州）之间，铺设了气派的军用道路。秦的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市东北窑店附近）其实当时在渭水北岸，涇阳即秦之云阳也同样在渭水北岸。云阳与咸阳之间原本就有平坦的道路，因此军用道路自首都咸阳一直延伸到九原。又，引文中的阳山山脉位于在沙漠中形成的黄河三角洲之北，这一山脉与黄河之间称作北假。因此秦防御北方

胡族的第一线在阴山山脉，完全将黄河收入囊中，万里长城远在它的内侧；秦采取了以万里长城作为胡汉界线，使汉族安居长城以内的方针。随着秦的灭亡，这一方针有一些松动，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他设定了更大规模的方针。

今据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来记述武帝以前西汉初期的胡汉对立之状。汉初，蒙古高原全部由匈奴族统辖，匈奴将这一广大地域分为三部分，左部大体统辖今克尔伦（Külren）流域的牧地及今内蒙古三市一盟的牧地，右部似乎统辖色楞格河（Selenga）（注入贝加尔湖）以西自科布多至新疆的部落。但是，左、右部的王庭所在地不明。而在中央，色楞格河的支流鄂尔浑河（Orkhon）上游，三面由杭爱山及其支脉所围绕的丰饶牧地上，有匈奴大单于的王庭——龙城。汉方面对匈奴左部的防备（即东部方面的防备）中心在上谷郡（河北宣化）；对右部（即西部方面）的防备地在上郡（陕西榆林）；对中央的防备地在代（山西大同）、云中（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以一般政情考之，则汉初王室的主导政策是对外国始终待之以和平政策。为此，汉不仅屡受匈奴侵寇，且常招致匈奴的侮蔑；因此当时年少之士多主张强硬对外，逐渐鼓动起舆论，至武帝时期，汉与匈奴之间爆发了战争。结果，对一时为匈奴夺去的河南之地，汉恢复了对它的统治。又，在东方，汉切实保有了战国时代燕所筑长城一带，即阴山山脉东部，上谷、右北平（河北遵化一带）、辽西（辽宁锦州）、辽东（辽阳地区）地区；且在这一地域设置了郡县。在西方，汉在甘肃北部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诸郡；且将势力延及新疆地区，在这里设置都护，实行屯田策，对所谓城郭诸国采取了抚绥的方法。至此，在内蒙古，匈奴王庭一个都没有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

可以说，始于汉武帝，最完备于汉宣帝的中国对北边策，其后大体持续到东汉盛期。而受汉压迫的匈奴，其部属之势力逐渐衰落，其中一部请降于汉廷，对于这一部匈奴的首长，汉以其替汉室防备外族

为条件，给予庇护。东汉光武帝时，匈奴一部更是乞求徙于陕西边地，同样，汉以防御外族为条件，答应了它的请求。这一部作为南匈奴而载诸史册。由此，汉室与匈奴关系愈加密切，两者结合足以压制外族。

由于西汉武帝以来对外族实行强硬政策，汉族发展显著，在边境少数民族之中逐渐占有势力，胡汉杂居所致种种利害关系自然不免出现。东汉光武帝时，班彪上言，提出以下意见：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2]

可知，凉州（甘肃）、益州（四川）、幽州（河北北部）分别有羌、氏、乌桓等部族，他们与汉人杂居，处境有种种困难；应各为其设置统率者，以汉人担当，维护胡人的正当利益，示以抚慰之意。光武帝采用了这一意见。东汉原本标榜德治，自然对胡人的政策也显示出浓厚的德治意味，与西汉因激愤于匈奴而树立起来的政策相较，旨趣完全不同。不过，东汉盛时汉族得以以其优势位置保护胡汉，而当汉室内部显出瓦解之兆时，胡族反而得势。

东汉永初四年（110），陇西、金城地区的羌族大举内侵。陇西治今甘肃临洮，位于渭水上游；金城即今甘肃兰州，临黄河支流大通河，与青海接壤。此时羌族自何路以何方法内侵，已不清楚，总之，自山西、河北、陕西，以至京师洛阳所在的河南地区，皆受其侵掠。王符《潜夫论》述其侵掠之状：受羌族侵寇的地方，百姓慌忙割取谷物，空其居室，流离分散，或死于道路，或舍弃老弱，或为人仆妾，人口减半。[3] 而羌族始叛之时，并没有特定的计划，其党徒也算不上多，至于兵器，或持竹木之枝，或空手纠集徒党，所到之处，不张阵营，更无都督统帅全部；但它能侵入到内地，完全是因为地方武备松弛，士气荒废。[4] 总之，羌族入侵对东汉而言是大事件；当时朝

廷舆论对于以何种方针应对羌族似乎相当迷惘，大致可分为软硬两派。软派认为汉还是放弃甘肃，任羌族自由出入甘肃为好。事实上，汉后撤了金城郡，将它迁到陇西郡的属县襄武，又将上郡自陕西北边的榆林迁到了左冯翊（陕西大荔），将安定郡（宁夏固原）迁到了扶风（陕西凤翔）。也就是说，大体上西北防御的第一线已经撤退了。其后，在桓帝时期（146—167），鲜卑族檀石槐占领了辽西的棘城（辽宁省义县附近），由此，汉与朝鲜的联络受到了威胁。要之，在东汉末，汉族逐渐受到胡族自西北及东北两方面的压迫。

汉代边境之地胡汉杂居的状况固然因汉族向胡族势力内发展而引起，但这与汉代为政者所故意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例如，东汉名将马援征讨甘肃边境的氐羌族后，将其一部深深地向内迁到陕西中部地区，企图以此分散氐羌族的势力。氐羌族原本是居住在山地的民族，可以想象，被迁徙到陕西腹地的这一部，由于处境孤弱，恐怕受到了汉族的虐使。总之，汉室尚有势力时，这种政策似乎不会带来大的普遍性的祸患；而当东汉末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割据于北部中国的诸雄进而借助胡族之力，将其强力部族引入长城以内时，北部中国内部的胡族势力显著增强。载于《文选》的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以曹操谋臣荀彧之名发布，其文中有：

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震奋席卷，自寿春而南。

从中可见陈琳以胡族军队夸耀曹操势力并以此压服敌人的用意。当然，有中国学者认为这篇文章并非出自陈琳之手，是晋代的伪作；笔者也赞同其说。不过，即使三国时代还没有夸耀胡族势力的想法，但察看魏、蜀所采取的政策就可确切知道：事实上三国时代不得不依靠胡族的势力。因此，自东汉末以来，胡族逐步在北部中国确立势力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新倾向。

胡族在中国内部拥有势力，换言之，即汉族承认胡族之势力。这一事实明白地出现在史书上，始于西晋之时。例如，晋名臣张华评价

慕容廆“命世之器也”。慕容廆曾谒见东夷校尉何龛，以士大夫礼，巾衣诣门，但何龛严兵引见。慕容廆说：“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于是改戎服相见。又，匈奴刘渊亲就汉人崔游读书，而晋之各族多赞美其为人，与之订交。名将王浑曾向晋武帝举荐他，只是当时朝臣以其非汉族，反对采用。但总之，胡族酋帅显然受到了汉人名族的赏识。这种事情也许未必肇端于晋时，但在文献上正可以晋划分其时期；要之，这是对胡族一般性的认识在文献上的反映。

胡族势力既为汉族所承认，与此同时，汉族有了更深的对于胡族的畏怖、警戒意识。第一章已著其一端，下面再来看以郭钦、江统观点为代表的徙戎论之梗概。

郭钦之论，《晋书·匈奴传》中有部分引用，他主要认为应将匈奴自山西境内迁到边外；其文简略，难以充分了解其意。江统之论见于《晋书》本传，为《通典·边防·氏》所引用，主要针对氐羌族而言，不过，他对匈奴及句丽族也有同等甚或更高的警戒意识。如前章所述，对胡族因汉族的虐使而生出的复仇之心、怨恨之心，江统文中抱有很强的危惧感。据其论，氐族充满陕西，占人口之半；羌族蔓延于甘肃；山西之匈奴以其统制力、户口数而言，决然优于诸胡；又，在河南荥阳一带，三国时期自辽东塞外迁来的句丽族逐渐滋衍人口，不久或将成为危险的祸根。据《晋书》载，江统之论提出后，“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不过，《晋书》编纂者评论道：“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也就是说，若江统徙戎的建议得到实施，灾祸反而会更快发生，揣摩当时的形势，胡族不可移徙。为什么呢？当时鲜卑慕容氏已经教民农桑，又采用了中原的法制，以此推之，可以说汉族之中普遍有一种强烈倾向，即在胡人武力的庇护下营生。而当晋室爆发“八王之乱”，整个北部中国渐次牵动于这争斗的漩涡之中时，秩序崩坏到极点，浮民流徙四方，其遭遇之惨恐怕甚于

东汉末期。这实是致使胡族活跃于中原的一个机缘，如前章所述，最先冒头的是匈奴酋长刘渊。

注 释

[1]. 此是冈崎氏的标点。《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标点为：“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8页。

[2].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78页。

[3]. 《潜夫论》卷五《实边第二四》。

[4]. 《潜夫论》卷五《边议第二三》。

第二节 北部中国匈奴兴亡始末

如前章末节所述，匈奴刘渊始立国于左国城，国号汉，以图纠合胡族于麾下，正是在永兴元年（304）；永嘉二年（308），刘渊称帝；其后，其子刘聪改晋永嘉四年（310），自立年号，[\[1\]](#) 次年取洛阳，一时灭了晋室。此即通常所称的永嘉之乱，它开启了胡族统治北部中国的序幕，对中国史而言确实是划时代的事件。

刘渊通常被视为匈奴酋长。不过确切来说，与整个汉代北胡中最荣耀的匈奴大单于相较，两者相差甚远。据《汉书》，匈奴单于姓挛鞮氏，而东汉初被允许居住在陕西边地、西河、河套之间的南匈奴，其单于也有虚连题之姓，中国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词。且西汉宣帝时，请求汉廷保护的单于称号为呼韩邪，东汉初，南匈奴单于也称呼韩邪。因此南匈奴单于本是出自匈奴一系的单于。相对南匈奴，居于蒙古高原匈奴根据地者称为北匈奴。据《通典》，自东汉初期起，称为鲜卑的部族逐渐在蒙古高原东部取得优势，章帝元和年间（84—87），鲜卑侵入北匈奴东部，北廷陷于大混乱之中。南匈奴单于有志于乘机合并北匈奴，于是向汉室请求援助。当时章帝已死，和帝在位，外戚窦宪接受了南匈奴的请求，远征漠北。此次远征汉军获胜，有名的班固《封燕然山铭》作于此时，其中一节曰：

陵高阙，下鸡鹿，经磧卤，绝大漠……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蹶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高阙指自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跨过阴山，其与阳山之间的溪谷，从这里沿阳山至黄河之北的鸡鹿塞北行，穿过含细石、盐分的沙地（即磧卤），进入戈壁沙漠，遂出至金山支脉尼赤金山。这里是蒙古的南端，涿邪即指此。再往北，遂出至翁金河。此河流经涿邪山脉与杭爱山脉之间的旷野，沿河越过杭爱山，遂出至蒙古的中心鄂尔浑（Orkhon）流域。这相当于安侯。再自杭爱山往北，出至龙庭（从丁

谦说)。由此看来，不得不说班固描写得极精确。窦宪远征之后，北匈奴越过阿尔泰山，远遁康居（Sogdiana）。在汉室自身，窦宪远征原本是为了显示外戚窦氏一家之威势而发起，一般舆论对此未必表示赞同。因此，后来蒙古地区的状况，除了其西部的部分地区，几乎不见诸中国史料的记载。这大概也表明汉威不及于此地区。另一方面，南匈奴虽借汉室之力讨伐北匈奴，但它本无力量统制蒙古高原北部，反而它在内蒙古一带的势力圈屡为鲜卑侵犯，只得每每请求汉室保护。即便如此，直到东汉安帝时，南单于的谱系仍可追溯到匈奴大单于的血统。其后称单于者是否果真属于匈奴王室谱系，则完全不明了。例如灵帝时有称羌渠单于者。据《晋书·北狄传》，羌渠是匈奴内的部属之名。而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即为羌渠单于之曾孙。然而《晋书·北狄传》记载，匈奴部属之中，屠各种势力最强，故而得为单于，统领其他诸种。据前节所引陈琳檄文，匈奴与屠各分开列举。如此，刘渊是否原本即属屠各呢？又，《晋书》列举匈奴大姓呼延等四姓，其中不见汉代匈奴王室之姓挛鞮氏。因此，综合而论，至东汉末年，南匈奴正统的王室是否已经消灭了呢？三国时期，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各在山西内地指定其居住地，使之选帅统领各部，且置汉人司马，从外部监督之。至此，匈奴似完全隶属于汉族，即使单于的称号仍然沿用，但应该这样理解，即单于称号在汉族的认可下给予匈奴十九种部族中最有势力部族的酋长。到了晋代，匈奴部族乞求移居北部中国者日益增多，晋武帝常应允他们的乞求，因而据说山西一省几乎没有一处无匈奴。《晋书·北狄·匈奴传》史臣曰：

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鞮，充郊掩旬。既而沸唇成俗，鸣镝为群，振鸱响而挺灾，恣狼心而逞暴。[\[2\]](#)

可以清楚看到，晋采取的抚绥匈奴政策反而助长了胡汉内部之争，即便是琐细小事，胡族也结成团体，表现出反抗的态度。有此内患的晋，在“八王之乱”中，完全丧失了朝廷的统制。埋头争斗者利用胡

族势力已如前述，而在胡族之中，刘渊遂有了自立的行动。劝刘渊谋反的刘宣说道：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3\]](#)

大概刘渊在成都王一边，成都王的反对者则牵鲜卑、乌桓为援，刘宣指出刘渊对抗鲜卑、乌桓的过失，认为应结好胡族，对抗汉族。

刘渊（匈奴称刘姓，始于渊之父豹）终于决心自立，号汉王并纠合徒党，石勒、王弥二人先归伏麾下。石勒是匈奴部落所领羯部的小帅。据《晋书》载，石勒与刘渊一样，是羌渠之后，这有点奇怪。而且羯部也不见于匈奴十九种之中。据本传，石勒少时行贩于首都洛阳，又曾被转卖于山东。可见他曾是汉人的奴隶。后投于群盗，为其魁首，开始了掠夺的生活。其后归从乐平（山西和顺）胡族部大，并说服部大归从刘渊。不过，乐平地区还有属乌桓的一支胡族，他们不愿归从刘渊。石勒降于此乌桓，巧妙煽动部众斩其酋长，以乌桓之众归附刘渊。再来说王弥。他本是汉族名家之子，晋末成为盗贼，残掠山东地区，一时攻掠河南郡县，迫近洛阳而被晋军击退，于是渡黄河北归刘渊麾下。刘渊迁居山西平阳，一面纠合所在匈奴族，一面命王弥、石勒等经营河南、山东地区。这时，自山西边境至河北北部，鲜卑势力颇强，在这些地方匈奴军屡屡失利，刘渊于是专将其势力延伸至中原地区。当时，中原一片混乱。在王弥军进攻河南中部、南部地区时，此地颇多自他乡流徙而来的人民，他们皆为土著居民所苦，因而好走险途，焚烧城邑、杀害地方长官等事频发；王弥军来后，皆归王弥麾下。

永嘉四年（310），刘渊死，刘聪继后。第二年，以刘曜、王弥二人率兵攻洛阳。此时，洛阳正忙于迁都的计划，对敌人没有任何抵抗力。刘、王二将于是占领了洛阳城。汉族王弥军大肆掠夺，这恐怕是因为他们先进入洛阳的缘故。总之，坟墓被挖掘，宫室被焚烧，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人。而刘曜下令禁止掠夺，并斩杀了违令的王弥之

一将，二人遂生嫌隙。据说，王弥向刘曜论述迁都洛阳之说，刘曜不听，王弥骂道：“屠各子，岂有帝王意邪！”露骨地表现出胡汉感情上的不合。

洛阳陷落，晋怀帝被送到平阳。刘曜似乎满载宝货而凯旋，王弥则在洛阳东面的项县张其阵营，欲在根据地山东地区自立，暗中使部下准备实施这一计划。此时石勒转战河南方面，如前章所述，他在途中消灭了王衍军。而王弥又与石勒联络，欲利用石勒共同经营山东并阴谋除之，不料被石勒看破，石勒遂先下手袭杀王弥。于是刘聪命石勒收编王弥军。石勒乃南进屯扎葛陂（河南新蔡），经营江汉地区。

当时，汉主刘聪的势力并不稳固。也就是说，自陕西至甘肃，为匈奴力所不及，非但如此，山西北部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区还有晋将刘琨，他联合拓跋鲜卑（在山西北边至归化城地区有其势力），欲袭刘聪首都平阳；又，王浚以河北北京地区为根据地，借助段氏鲜卑之力，有自立的野心。而石勒虽能乘势席卷河南一带，却尚无稳定的根据地。正当石勒屯葛陂之际，刘琨与书石勒，欲与之结盟，对抗刘聪。其中一节曰：

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4\]](#)

也就是说，以刘聪之名，即便取得土地，也不能保有，因而应当拥立汉族正统之晋室。对此，石勒回复道：当务之急是平定祸难，这是他的重要职责；对晋室尽忠，则是汉族大臣刘琨的职责。据说，此回复或出自石勒幕下汉族名臣张宾之手（参照《通鉴》胡注）。张宾实是最先企图正当利用胡族之力并在其下建立北部中国秩序的人。然而石勒屯葛陂的第二年，这一带发了大洪水，似乎对石勒全军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石勒幕下的汉人股肱中，有人认为应当降于此际坐镇江南的晋宗室司马睿，而胡族将军等则认为应当进至寿春，攻略江南。两

者都近于空论，于是石勒听从张宾之说，确立了经营河北，在河北打下稳固地盘的计划。因此石勒走上了更加自立的道路，但他仍十分重视与刘聪的联系。就这样，他整军北上，据襄国（河北邢台）为根据地，由此开始接触盘踞北京地区以图自立的王浚。

王浚是晋室开国勋臣王沈之子。“八王之乱”时，他作为幽州刺史在北京，很早就有自立之志；他嫁女于徒河（辽宁锦州）段氏鲜卑酋长，与之牢固联结。石勒据襄国后，王浚命段氏讨伐石勒。总体而言，此战王浚方面获胜，而段氏族人却被石勒生擒。石勒郑重将其送还段氏，借此机缘，段氏寄心石勒者颇多；段氏一派萌生异见，对王浚势力是一大打击。其后，石勒的势力逐渐扩张到河北一带，王浚仅保易水。石勒欲一举灭亡王浚，但接纳幕下张宾之说，反而敦请王浚登皇帝位。在劝进信中，石勒自称小胡，以王浚为“州乡贵望，四海所宗”，极尽殷勤。王浚听信部下自古不曾有胡族做帝王之言，对石勒的忠诚毫不怀疑。石勒见其计奏效，于建兴二年（314）袭杀了王浚。

汉主刘聪任由石勒经营河北的同时，又使同族心腹刘曜专掌陕西以及山西北部之事。刘曜是刘渊族子，少孤，见养于刘渊。他曾在洛阳犯事当诛，逃亡朝鲜，改换姓名，当了一名县卒。刘聪时，刘曜与王弥一起攻下洛阳，又直入陕西征服了首府长安。不过，当时在陕西西部的汉族大吏联合起事，将匈奴势力扫出陕西，拥立了晋武帝之孙司马邺。幽禁在刘聪处的晋怀帝，其后因司马邺的拥立而被杀；司马邺自然被当作晋室的继承者，后来谥为愍帝。不过，据如下记载，可知他的势力之微弱：

是时（即位之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通鉴》建兴元年四月）

建兴三年（315），刘曜再入陕西。他主要从陕西北边侵入，直逼长安北渭水北岸地区。这时，自陕西西部至甘肃，汉族大吏、土豪盘踞各

地，在长安的愍帝为了取得他们的欢心，滥授爵位，甚至村坞小帅之微者都给予银青将军等显位。但天子恩威不及于下，诸将骄恣，士卒离怨。因此刘曜一来，各地势力归于瓦解，第二年十一月，愍帝遂降于刘曜军门。至此，西晋在名义上已彻底灭亡。匈奴的统治及于陕西台地了。

王浚灭亡、愍帝投降后，北部中国仅剩刘琨一人尚在山西北边。刘琨之家与晋宗室有婚姻关系，他自然也陷于“八王之乱”的漩涡中。永嘉元年（307），刘琨初任并州刺史，赴任晋阳（山西太原）。他在于赴任途中上于朝廷的文章里，极鲜明地述及当时山西南部的情形：

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5\]](#)

这主要说的是自河南安阳至山西黎城县（当时称作壶口关）地区，以及长治附近即壶关地区的情形，这一带距离首都洛阳不算太远。刘琨到达晋阳时，“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6\]](#)。在这种时势下，流民习惯聚集在武力者身边，因此人民逐渐迁移到刘琨处。不过，刘琨本是晋代豪家子弟，生活奢侈，好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他又结援拓跋鲜卑，以其力犯幽州之境，王浚怒而侵之，刘琨大败，声望渐失。故而并州汉族大吏寄心刘聪者颇多，刘聪于是遣其子刘粲袭击晋阳。刘琨借拓跋氏之力败之，但晋阳因此为拓跋氏戍兵所镇守，他自身则徙居南面的阳邑（太谷区）。他实欲取得抗击匈奴族的名义，却因此使得拓跋氏在内地树立了势力。其后，石勒据襄国，灭王浚，刘琨所依赖的拓跋氏又发生了内讧，他的

处境愈加困难。刘琨与石勒战，大败，并州遂不能守，往依鲜卑段匹！（王浚死后，段匹！在北京地区取代王浚）。段氏内部党于石勒者颇多，唯独段匹！始终志于对抗匈奴，但刘琨一派与一部分段氏人情不协，使得段匹！杀了刘琨。时为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至此，北部中国值得注意的汉族势力都灭亡了。

318年，即刘琨被杀的那一年，汉主刘聪卒。刘聪通晓汉族学艺，又能任用刘曜、石勒等，可见是有才略的人。不过，他沉湎于酒，残暴之行颇多。举一个例子，他曾欲为一后妃建宫殿，汉族大臣谏之，他怒道：“吾为万机主，将营一殿，岂问汝鼠子乎！……将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梟东市，使群鼠共穴。”总之，在刘聪一代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天变，在历史上留下了阴影。在他死后不久，内乱发生了。结果，他的一个儿子刘粲即位不久，就被一位部落长靳准杀死。于是刘曜自长安进至皮氏（山西河津），收用仕于刘聪的诸官，被推举称帝。石勒也自襄国进至襄陵（山西临汾东南），斩杀了靳准。然而，石勒不愿居刘曜下，焚毁首都平阳后，归于襄国。刘曜也引兵回长安，纳群臣之请，改国号为赵。而石勒也在襄国即赵王位。刘曜的赵国先灭亡，史家称之为前赵，石勒之国称为后赵。匈奴势力因之二分。

两赵对立，各自谋求势力的扩张。刘曜主要先往北方及西方扩展势力。原本刘曜杀晋愍帝，坐镇长安后，势力所及仅限陕西的渭水流域而已。陕西是氐羌族繁衍之地。以地形而言，渭水流域南北是险峻的山脉。当然，北边与其说是山脉，倒不如将它看作被侵蚀了的黄土塬，而其南部号称四千英尺；《魏书》往往将这一带称作北岭。这一地区似乎聚居着强大的氐羌族。刘曜曾对巴氐的一个酋长课以残酷的刑罚，由此围绕渭水平原的四山氐羌一齐反抗，长安城门昼闭。这时，被推立为渠帅的似为据于阴密（甘肃省灵台县西）的句氏。不过，这一族似不如属北狄的匈奴、鲜卑勇猛，其叛乱的动机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因罪而被收为奴隶，因此当刘曜对他们采取温和的方式

后，归伏者鱼贯而出，其间继续抵抗的部落被轻易讨平了。由此，刘曜的威势及于甘肃，他降服了自立于南安（甘肃陇西）的汉族，且一度击破了称王于岷冢山麓仇池的氐酋杨氏。不过，他的行动远远迟钝于后赵石勒。

石勒以河北为根据地，还统治了山西的大部分。不过，北方及东方都是强劲的鲜卑部族，他们确实是匈奴族可怕的对手。而在南方河南、山东一带的中原地区，汉族各个势力分散地存在着，此时复活于江南的东晋朝廷利用这些势力对抗胡族，但它仍忙于内部的整理，尤其这些割据的汉族绝非团结一致奉戴东晋。因此，石勒的势力逐渐向南方延伸。特别是，最用心经营黄河以南的东晋名将祖逖一死，较忠实地为东晋防守于第一线的晋将就渐次退往后方了。例如，郗鉴放弃邹山（山东邹城）退于安徽合肥，祖约自豫州（河南驻马店及洛阳地区）退于寿春，卞敦自徐州退于安徽盱眙。曾扶助刘琨的鲜卑段匹！也为石勒所俘，山东的杂军多被平定，后赵的威势完全延伸到广固（山东青州）地区。而当石勒向河南洛阳地区扩展他的势力时，就与同样企图进入这一地区的刘曜发生了大冲突。

自西晋末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似乎极其荒废，吃人成为公开的行为。据说洛阳东北成皋地区（河南荥阳）贼帅侯都略人而食之，该地大吏的部下多成为牺牲品。而在这一地区，为众人推立的李矩完全以孤军持续抵御胡族。然而，后赵乘讨平山东之势涌至河南，李矩之军屡被击破，一时降于刘曜。刘曜乘机先遣军入山西，击破后赵猛将石虎之军于蒲坂，渡黄河南下，围攻洛阳，[\[7\]](#) 当地军士纷纷归降刘曜，襄国大震。于是，石勒亲立阵前，命石虎之军自山西南下，共围洛阳。这一军事行动极为敏捷，刘曜不知，未做任何准备，且沉醉于酒，于是一战而遭生擒。石勒乘胜使石虎进攻长安。这样，刘曜太子最后据守的上邽（甘肃天水）也陷落了，氐羌各酋长都归附后赵。石勒于是正式即天子位。时为东晋咸和五年（330），北部中国中原之地暂时归伏于一王之下。

咸和八年（333），石勒死。太子继位，但实权完全落入石虎之手。石虎作为猛将，闻名古今，石勒的成功有一半倚赖其力。当他拥太子而统实权时，石氏一派中有人强烈反对，各地干戈兴起；石虎平定了他们，后赵的势力没有丝毫的动摇。对此，在江南的东晋也很是明了，这从蔡谟的言论中可清楚看到。石虎握有实权后，树立了征讨四方的计划，首先与鲜卑慕容部起了冲突。在今辽宁义县至朝阳一带，慕容部有牢固地盘。慕容部之南，辽西地区即今锦州至北京以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是段氏鲜卑的势力范围。慕容、段氏二部常起纷争。适逢慕容氏为牵制段氏而求援石虎，石虎乘机派出大军，出征辽西。他自立本营于金台（河北省涿州附近），另治水军于漂渝津（天津附近）以为声援，其先锋长驱而进，占领了燕郡（治今北京）。当时，段氏酋长段辽自令支（河北迁安）单骑北逃，段氏领土全部归于石虎。然而石虎以慕容部在此战中未与后赵一同行动为由，立即使部下自锦州地区直冲棘城（义县）。为此，慕容的都城今朝阳城内非常恐慌，但酋长慕容皝抵挡住了进攻，大战的结果，石虎军一败涂地，段氏故地脱离后赵，归于慕容。当然，石虎立即树立了再讨慕容氏的计划，但事实上，慕容的势力其后延伸到了河北保定地区，石虎在此方面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石虎还树立了针对江南东晋的南征计划，这虽极大地刺激了东晋的舆论，但事不果行。最后，他欲灭亡北部中国唯一的汉族势力——独立于甘肃凉州（武威）的张氏，也遭大败。后赵的威势逐渐衰亡，永和五年（349），石虎病死，内乱兴起，北部中国再次陷入极大的混乱。在叙述这一混乱之前，先看看石勒、石虎为政。

石勒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而被载诸中国历史的。起初，他在河北南部征讨汉族杂军，却不与被汉族视为秩序破坏者的王弥军作战，这时杂军中的一人对他说：

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

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8\]](#)

大概一般汉族所愿，在于生活的安定，为此并不顾名义如何。例如谋臣张宾推举曾仕晋室且有清望的赵彭，而此人以名义为由，推辞事赵。石勒对他不满。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故如赵彭者，是最贤者。变节是常态，始终守节者，朝廷以禄养之，以遂其志，王者之传统存焉。而石勒就是这样实行的。

石勒顺从汉族传统进行统治，他保护汉族，尤其收用衣冠人物，以之为时望的中心。他组织了所谓君子营，转战四方之际，似常以为顾问。当根据地已确立时，他树立官制，门臣祭酒主要以胡人任之，以主胡人辞讼；门生主书以汉人任之，司典胡人出入，使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混合胡族与北部汉人豪族的政治方针由此确立，这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强烈影响。与此同时，他又使人编纂了《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等。今无从了解其内容，但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石勒已成为汉族乐于奉戴的君主了。特别是他还以中原礼仪变易胡族风俗，即严禁以嫂为妻以及丧中结婚。但火葬仍随其本俗，不在禁例之中。

石勒政治的一般情形大体如上所述。当然，同处一个朝廷之下的胡汉之间，遇有机会，总不免出现风波。胡族与饮酒，二者几乎如影随形，曾有一胡人，醉后乘马突入禁门。守门的汉人被问失职时，答曰：“胡醉甚，不可与语。”这是醉胡不理睬汉人之言的一个例子。因此石勒禁止酿酒。又，某汉族大吏衣冠敝坏，石勒问其理由，答曰：“顷遭羯贼，是以荡然。”[\[9\]](#)这种不经意之言或许反而显示出了汉族对于羯族的反感。

石勒与汉族学者的问答之中，最脍炙人口的，是他嘲笑曹操、司马懿等欺孤儿寡妇而取天下，推崇汉高祖，又自比东汉光武，以为优劣难定，而后放言：“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而他曾想营建宫殿于邺，为廷臣谏止，叹息道：

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

石勒能够博得汉人的赞誉，实在于他忠于汉人传统这一点。

然而，石虎的行事方式与石勒完全相反。据说，在石勒晚年，石勒一派企图排斥石虎，石虎于是夜遣部下侵入主谋者之宅，奸其妻女，掠夺衣物而去。掌握实权后，石虎发挥了他无可比拟的暴君作派。大兴各种土木工事，并为此虐使人民，自不用说；他的所为还破坏了社会秩序。详情可参见《外编》，其淫虐之行尤其令人侧目。例如：

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褻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10\]](#)

可以说，石虎之淫虐到了极点。这只是宫廷内的私事，他还骚扰民众：宫中、东宫及诸公侯七十余国皆置女官，“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

他又挖掘历代王侯的坟墓，悉取其珍宝。另一方面，他又被书写成一个极具孩童性格的人。例如为了田猎，他建天子旌旗，以十六军十八万戎卒先发，自己登上陵霄观目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他的爱子石韬被另一子石宣杀死。石虎知道后震怒，“幽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颌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颌，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季龙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11\]](#)。

石虎建宫殿于邺，襄国则为陪都。在他晚年，家庭内部之争引起了一场自暴自弃式的叛乱。太子石世成为家庭骚动的牺牲品而死去，其高力[12]即服杂役者等万余人谪戍凉州。他们到达雍城（陕西凤翔）时，那里的刺史夺其所乘之马，令他们徒步推鹿车往士兵的驻屯所运粮。高力首领汉人梁犊因众高力之怨，煽动他们，不久唆使驻屯的军队，反而向东开始掠夺。他们很强大，一时残掠至洛阳附近。当然，不久他们就被讨平了。原本胡人成为统治者后，若破敌，则将其部族迁于内地，编为军队。这军队的统帅自然是朝廷信任的武官。其中也有军队为部落酋长所率领，并作为稳固的一团驻屯于要害都城，它们保有了团体的威力。不过，降卒屯戍者本是不安分子的集合，因此往往成为叛乱的基础。另外，在梁犊叛乱中，石虎的得力军将等屡遭大败，在这大败与石氏家庭内部争乱的合力下，后赵已显露出瓦解之兆；石虎死后，冉闵之乱突发，羯族势力在北部中国彻底灭亡。

冉闵，始以石闵之名行世。他本是汉人，石虎爱其勇猛，养为孙。在石虎晚年家庭内部争乱中，冉闵推立石遵，使之即帝位。当时，石遵许诺以他为太子，却未兑现承诺，于是他企图谋叛石氏一族。他知道羯人不为己用，因此利用汉族对胡族的反感，下令虐杀胡族。于是，邺都发生了无比惨烈的虐杀，冉闵亲率汉人诛杀诸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影响波及四方，“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13] 动乱的结果，河北边境的鲜卑慕容部终于得到进出中原的机会。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先转而叙述使晋政权复活于江南的东晋的历史。

注 释

[1]. 刘渊立国、称帝时均改年号，不待此时改晋年号。

[2]. 《晋书》卷九七《匈奴传》，第2550—2551页。

[3].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4].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5页。

[5].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第1680页。

[6].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第1681页。

[7]. 据《资治通鉴》卷九三、九四及《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李矩降刘曜在325年。此年，刘曜没有争得洛阳，败归长安，李矩众散。328年，石虎自轹关西进，刘曜帅兵大破石虎于蒲坂，南下围洛阳。

[8].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第2714页。

[9]. 以上两例之引文，见《晋略》国传三。

[10].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6页。

[11]. 《晋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下》，第2784页。

[12]. 《资治通鉴》胡注曰：“石宣简多力之士以卫东宫，号曰高力，置督将以领之。”石宣死后，石世被立为太子，石虎死后一度即位。这里的“高力”隶属故太子石宣，故被谪戍凉州。

[13]. 《晋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第2795页。

第三节 东晋——晋政权复活于江南

“八王之乱”已近阑珊的一个月明之夜，司马氏一族的司马睿独自逃离洛阳，[\[1\]](#) 回到了他的封国山东琅邪。琅邪有一个在整个晋代皆称第一流的名族——王氏。王导即出自这一族，与司马睿相熟。据说，司马睿是在王导的劝说下离开洛阳的。司马睿后来以东海王越之命，镇江苏下邳，王导同行。其后，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始受晋帝之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即今南京）（参照《通鉴考异》）。当时长江下游三吴平原地区状况如何呢？

如前章所述，氏族豪部酋帅李特率流民进入四川时，其一部将“义阳蛮”张昌独自逃至湖北，煽动流民，组织了一支异样的军队。其党石冰往东扰乱安徽至江苏的江北地区。安徽庐江人陈敏督江淮运船，运粮去北方，他以运兵讨灭石冰，保全了东南地区的秩序。然而，陈敏见北方晋室已不可扶救，于安徽和州自立，其后镇建康城，欲再续三国孙吴之业。他秘密结托的是孙吴勇将甘宁之后甘卓。

此前，曾仕孙吴的三吴名族在晋统一后仕于北方朝廷者颇多，有名的陆机被诛以来，他们都无意于北方朝廷，纷纷返回故乡。此等名族所希望的，原在于东南秩序的安定。今陈敏欲据建康图霸，首先就必须得到东南名族的支持，因而他尽力优待东南名族。不过，他的出身非常卑下，自矜家门的东南名族对他并不心服。于是，他转而欲诛灭诸名族。此时，被许为东南名族首领的顾荣认为有必要先维持其地位，于是接受陈敏官爵，由此谏止了陈敏将行的暴举：

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江南虽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将军怀神武之略，有孙吴之能，功勋效于已著，勇略冠于当世，带甲数万，舳舻山积，上方虽有数州，亦可传檄而定也。[\[2\]](#)

从这些言论来看，顾荣认为陈敏可得而辅之，对拥护陈敏未有踌躇。然而庐江内史华谭攻击顾荣受陈敏官爵，飞檄远近，以责其罪。其中说“陈敏仓部令史，六品下才”，到底不堪大任，这恐怕是东南名士共同的想法。于是，吴兴豪强周玘率先起兵讨伐陈敏。此时，顾荣失望地看到陈敏难以有成，于是诱导陈敏最信任的甘卓一起讨伐并诛杀了陈敏。至此，陈敏的叛乱被平定了。司马睿与王导一起渡江镇守建康，恰好是在陈敏之乱平定以后。

诛杀陈敏的顾荣等人被北方晋室赏以高官，踏上了北上的路途。行至徐州，看到晋室之乱太甚，不可扶救，又欲南归。此时晋室执政者东海王越欲以军礼强行征召他们，于是他们各自丢弃牛车，解船，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回到了扬州。这时，在建康的王导劝司马睿收揽这些东南名望。关于此事，《晋书·王导传》载有如下故事：

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司马睿）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王敦）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覩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况天下丧乱，……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3\]](#)

这一故事与《王敦传》等所载存在矛盾的地方。《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个故事，删去了不一致的部分；周济《晋略》则完全不予采用。对追求精确性的史家而言，完全置之不顾也未尝不可，但这一故事无疑是江左人所传，笔者相信据此或可想象当时之情况。

司马睿已得到了江南人士的归伏。其后，北方政情每况愈下，在首都洛阳，朝臣之心已为迁都寿春之说所动，当此天下扰乱之际，秩序仅存之处只有长江下游三吴平原之地而已。因此北方名族及庶民避

乱江东者非常多，王导使司马睿选用此中贤俊之士。桓彝，谯国（安徽怀远）名族，也渡江而来，见司马睿势单力弱，深感失望，与王导讨论世事后，信赖王导之为人，才安下心来。大概对于收用、安定各种北人，王导之雅量居功至伟。据说，当时北来诸名士曾会于建康西南江渚之新亭，以慰旅情。众人见风土之异，皆流涕，独王导安慰众人，勉之以克复神州的大义。总之，司马睿在王导的扶助下，渐次稳固了基础，因此在北方抵御胡族的诸晋将中已有使司马睿承继大统的倾向，尤其洛阳为匈奴刘聪所陷，怀帝被俘之后，这种议论愈加高涨，当被拥立于长安的愍帝死后，司马睿于是称帝。在形式上，司马睿主要由北方诸将的推戴而称帝，其中也可见鲜卑段氏、慕容氏之名。时为建武元年（317），史家称之为东晋，司马睿即元帝。

司马睿称帝之前，江西地区已归于其势力之下。由北方晋室派到此地的华轶统治有方，此地受晋末动乱影响最小；但他寄心于北方，轻视司马睿的命令，遂被讨灭。江西，论地理之书多以之为“吴头楚尾”。今若以湖北、湖南之地作为长江中游地区，则江西即长江下游之开始，元帝实以长江下游地区为其根基。

湖北、湖南之地是长江流域的腹部，不久又成为九州的腹部。建康的势力如何扩张到此地呢？此前，“义阳蛮”张昌进入此地，诱使北来流民起而叛乱，幸而北方晋室所派刘弘平定了这一叛乱。刘弘曾为乌丸校尉，以勇敢驰名幽朔之地，来到湖北后，又表现出优秀统治者的才干。他将军事委托给江南人陶侃，讨平了张昌之党，然后拔擢有力的地方人士，以当实务。受拔擢者之中有一牙门将皮初，当他一跃而拟选为襄阳太守时，朝廷有司以其资望不足为由，命刘弘撤回这一拟选，改而任命他的女婿为襄阳太守。刘弘上表拒之，指出以姻戚关系任官的弊害，朝廷最终听从了他拟选皮初的主张。又，当时湖北首府襄阳的南面有岷、方二山，其间水泽历来受封禁，刘弘悉令开放，听民捕鱼。在与邻交往的策略上，刘弘以湖南零陵的米谷供给当时的益州刺史罗尚，巩固与他的联防；他还常亲自写信给地方守相，

联络感情，维持其所镇守的天下四达之地的和平。然而，刘弘死后，后任山简及王澄辈虽皆以清谈驰名于世，但在实务上乏善可陈。而细细考察此地区之内情，则处处潜藏祸机。

王如原是陕西地区一武吏，其后流移到河南南部的宛（南阳）。当时山简以朝廷之命将流民遣还本乡，王如也当北归，但他知道陕西地区之荒残，不愿北归。当山简强制流民归乡时，王如起而反抗。自北方流移而来的各种团体都响应他，起事之众忽焉聚至五万。此时，北方胡将石勒的兵锋已达河南南部，王如与之结好，于是掠夺汉水流域，围攻山简所在的襄阳。襄阳守备坚固，不能拔，王如军中起了纷争，其势力也随之瓦解。其间，王澄以荆州刺史镇于江陵（《通鉴》胡注）。而四川流民再次发生叛乱。

此前因竇部李特之乱，四川人士四五万家流寓在湖北、湖南之间。其中杜弢以其才略被任为醴陵令。不过，新来的四川流民屡为湖北、湖南的土著人虐使，他们有时起而叛乱。一开始杜弢作为县令镇压了这些叛乱，但其后王澄部下残酷对待四川流民，流民等一齐反叛，并推州里名望杜弢为主。杜弢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兵势甚盛，王澄全无防御之力。当时建康势力已及于江西，司马睿之下被主要委以军权的王导同族王敦，起用名将陶侃、周访、甘卓等讨伐杜弢，平定了这一叛乱。杜弢写信给某人，述其苦衷，其中一节曰：

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不谓乐乡起变出于不意，时与足下思散疑结，求擒其党帅，惟患算不经远，力不陷坚耳。及在湘中，惧死求生，遂相结聚，欲守善自卫，天下小定，然后输诚盟府。[\[4\]](#)

从中最可见他的心迹。而《晋书》将他列入叛臣传，盖有拘泥史裁形式之弊。

实际上，讨平杜弢之乱的功臣是陶侃、周访二将，尤以陶侃功劳最大。不过，两人都受建康军阀头目王敦节制。王敦不愿南人势力支配广湖[5]之地，故先斥陶侃为广州刺史，使居广东。适逢河南人杜曾自立于襄阳地区，与此时北方长安愍帝派来的一军将结援，以图反抗王敦。王敦以腹心讨之，反被击破，借周访之力，才得平定杜曾。周访也是南人，且与陶侃有姻戚关系。起初，王敦约定破杜曾后给周访荆州，但王敦食言，使周访以梁州刺史镇襄阳。大概因为这些善后措施完全出自王敦的独断，地方军将自然对王敦有所嫌怨，又，建康政府内部反对王氏一族的气氛也浓厚起来。长江中游王敦的势力过大，时人甚至说“王与马，共天下”，这使得以王室为中心的人们不快。当时祖逖的声望可与王敦匹敌，他抵抗了来自黄河下游的北方压力。祖逖的存在使王敦不能自专于军界。

祖逖原是河北范阳的豪族，见洛阳大乱，率亲党数百家，迁于淮泗之间。途中，祖逖将他的车马给老弱者，躬自徒步，与众共享药物、衣粮等，自然被推为行主。至泗口（江苏省淮安市西南），为建康所召，于是定居京口（江苏镇江）。他幕下的宾客、义从之辈都是北来的暴桀勇士。适逢长江下游发生大饥馑，此辈往往出为盗贼，攻剽富室，建康政府对祖逖时有非难，而祖逖常庇护他们。他常怀恢复北方中原的大志，并以此劝谏元帝，但元帝忙于经营江南，仅给他豫州刺史的名义，以及一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而已。祖逖率原来流徙而来的百余家部曲，踏上北伐之路，在江阴（恐非地名，是否江北之意？）兴锻冶之业，得到兵器后整装出发。当时淮泗之间遭石勒兵锋，全无秩序，各村落筑坞（即土堡），推土豪为坞主以自卫。决定这些坞主向背的，本不在匈奴石勒、晋司马氏谁具有正统的名义。不过，祖逖以其恩威，获得了这些坞主的支持，屡破石勒之兵，“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他的居处主要在雍丘（河南杞县），他曾宴请此地父老，耆老流涕而歌曰：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
何以咏恩歌且舞。[\[6\]](#)

然而，建康政府似不知充分利用他的才能，又命吴人广陵戴渊为豫州都督，加之晋室与王敦之间的祸难正要萌发，祖逖感到素志难行，在忧闷中病死。

此前，刘隗、刁协二人受元帝宠任。他们都以提高东晋权威为目的，屡抑强族之权，尤其压制王氏势力。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等也因此被朝廷疏远。王敦当时镇守湖北武昌，不满刘、刁这一处置，或上表元帝，或遗书刘隗，谏止其抑制强族的方针，但他们未纳其言。王敦在北方以清谈博得名望，兼富机略，巧致名流之士于幕下，同时又颇具军事手腕。祖逖死后，他相信无人能与自己匹敌，今刘、刁辈的侮辱恐不是他所能忍受的。于是他萌生了问鼎东晋之志。而刘、刁的做法又多遭名族忌恨，因此王敦宣扬二人之罪，以讨刘、刁为名举兵逼近建康。他此时所发檄文尤其归罪于刘隗，其中一节曰：

（刘隗）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乃以黄散
（田夫之义与？[\[7\]](#)）为参军，晋魏已来，未有此比。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廩，今便割配，皆充隗军。臣前求迎诸将妻息，圣恩听许，而隗绝之，使三军之士莫不怨愤。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身欲北渡[\[8\]](#)

.....

据引文来看，大量流移而来的北方流民容易被权力者利用，其中蕴藏着建康内部的疾患。而刘隗听到王敦反叛，一开始意气骄慢，欲诛杀在建康的王导以下王氏一门，以振帝室之威，但遭朝臣一致反对，元

帝也不听从，由此可见上下对刘隗的不信任，胜败之数已定。因此王敦由姑孰（安徽当涂）屯地进至石头时，元帝手书王敦，请求讲和：

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

刘隗逃奔，刁协被抓，元帝将江西地区的军权交给王敦，暂时讲和。

王敦以讨灭刘隗为名的军事行动暂时获得了成功，原本使王敦有此行动的主要是他部下的军将们，自然他们横暴愈甚。建康朝廷重望周!、戴渊等被杀，吴兴豪族周氏一门也被诛灭，他们的行动改变了王导所代表的建康宽治之风，带给东南民众的恐怖感恐怕胜过刘、刁之徒。又，此前王敦进逼石头时，他赖以根基的湖北平原受到站在建康一边的人的威胁，因此他回武昌后，斩杀了这些反对派的首领——甘卓（袭周访后，镇于襄阳），巩固了他的地盘，他也因此更加专权。

在建康，元帝死后，明帝立。明帝为太子时，有勇决之名，本为王敦一派所恶。因此王敦再次移镇姑孰，监视朝廷，同时将部下军将安插在京师腹地江苏平原，以巩固其势力。对此，王敦幕下名流谢鲲等极力谏止，王敦不纳。建康内部的朝臣，理所当然，人人皆欲反王氏。而关于王敦身边军将们的恣意妄为，《晋书·王敦传》载曰：

（沈）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9\]](#)

当西晋末之大乱，得以保持秩序的东南平原，正因王敦部下的横暴而陷入祸乱中。这时，王导再次担当辅政大任，他惧怕王敦的恶评祸及王氏一门，寄信给王敦亲任的同族，苦心劝诫，却不被听从。另一方面，建康朝臣这时做好了一致对抗王敦的准备。据本传，王敦自身此时得病，颇有回武昌以保家门之念；但他的军将们劝他夺取建康，王敦不能裁制。对此，朝廷决定征召固守北方淮水流域的军将——祖逖

弟祖约及苏峻等，以当建康之警备。于是战争开始了，其间王敦病死，王敦一派被悉数诛杀，战局遂定。时为太宁二年（324）。

王敦构乱期间，北方石勒的势力逐渐南进。在山东泰山地区为大量流民所支持并成为东晋藩屏的郗鉴，不堪孤军奋战而南归。为讨王敦，郗鉴请明帝将祖约、苏峻等势力引入建康，[\[10\]](#) 为此祖逖的经营完全被破坏，石勒的势力及于河淮之间。不仅如此，平定王敦后，祖约受命镇寿春，苏峻镇寿春南面的历阳（安徽和县），而这些北方勇将常猜疑建康政府，大乱再次爆发。

明帝在位三年卒，成帝立。这时，明帝外戚庾亮专制朝政。庾亮为人方严，为一世所推，正因如此，有任法独裁之风，与王导的宽和之政不同。王导也嫌他不富雅怀，建康内部对他的评价普遍不高。起初王敦之乱后，建康朝廷颇亲信苏峻，他逐渐狎恩，收用亡命，且不知节制，又每每向朝廷讨求军费，军粮漕运日夜相继。庾亮欲制之，解其军权，征为朝臣，以其弟作为其后任，对苏峻而言，这一处置未必不当。然而他一味怀疑庾亮欲害己，突然起兵攻打建康城。当时祖约也含怨于庾亮，于是与苏峻一同行动。东晋的祸难于是起于江北安徽之地。

苏峻之变急遽而起，在庾亮未作防备之间，其兵渡江，自安徽马鞍山市及芜湖地区直逼建康，放火烧台城，陷宫城，纵兵大掠。暴民式的苏峻部下甚至捶挞朝廷高官，令其往本营蒋山搬运东西；又裸剥士女，士女皆以坏席苦草自掩其身，无草者以土掩身，哀号之声震动内外。这时官库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数亿，苏峻消费殆尽。

苏峻之兵进入建康后，庾亮仅得逃入镇于江西的温峤营。起初温峤见庾亮压制苏峻手段过激，忧之，甚至提出亲赴建康防备苏峻；但当时庾亮几乎未措意于粗暴的苏峻，而惧怕荆州刺史陶侃。陶侃在王敦败后，代居荆州，一开始就对庾亮有疑心，庾亮倚赖温峤以抑制陶侃的势力。然而，苏峻之乱突发，温峤感到有必要先借助陶侃之力，屡次催促他起兵。由此陶侃率军沿江而下，庾亮亲造其营。庾亮态度

极温雅，陶侃释然解怨，与之共讨苏峻。义军自上游连续不断向建康进发，同时，三吴地区的豪族都起而防止北人进入三吴，又，镇下邳的徐州刺史郗鉴也南下。东晋军势逐渐振作。至此，苏峻几乎鱼死网破地决战，屡破义军，但最终势穷，为陶侃部将所杀，叛乱得以平定。时为咸和四年（329）。

因苏峻之乱，建康宫室宗庙皆为灰烬，迁都之议盛起，温峤欲迁都江西豫章（南昌），三吴豪族欲迁都会稽（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因而没有迁都。战后如何行赏并不明了，总之诸将各回任地，长江流域恢复了和平。诸将之中，陶侃始镇江陵，后迁武昌，他行事详密，曾造船，竹头、木屑之类皆收官库保管，在后来桓温伐蜀之际，它们得到了使用。又，湖北地区的官吏好樗蒲，且当时谈论老庄思想之风流行，陶侃严厉取缔此等风尚，曰：

樗蒲者，牧！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掇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11\]](#)

荆州秩序定于陶侃之手，东晋西藩因此安稳下来。但在北方，此时石勒势力延伸到陕西高台之地，石勒死后，石虎专政，后赵游骑南出，至于历阳，建康一时戒严。而历来在名义上始终奉戴东晋的鲜卑慕容氏也独立称燕王了。可知南北逐渐二分，此为大势。

342年，成帝死，康帝立，康帝在位二年后，为穆帝的治世。此前，陶侃死，庾亮代镇武昌，这时在建康，王导再次成为政治的中心人物，其方针极宽纵，南北豪族表现出恣意招揽游食之徒以谋私家利益的态势，心在朝廷者往往对此加以非难。庾亮也企图排斥王导。总之，树立东晋的权威，在其下创造一个有节制的国度的想法，常在一部分南迁北人心中酝酿；同时，北伐——从胡族手中恢复中原之地的希望也一直存在。因此，庾亮自武昌再入朝廷后，一度树立了北伐计划，但未完全付诸行动以前，其军已尝小败，朝廷异议众多，最终北

伐半途而废。王导死后，朝政重任在庾亮弟庾冰身上，庾冰以雅素之风为世所推重，不喜王导的宽纵，稍用威刑。有人谏之，他答道：

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12\]](#)

在当时，这是罕见的儒家式的言语。庾冰弟庾翼也颇有大志。成、康二帝之际，未有与庾氏一族权势并驾齐驱者。穆帝初年，[\[13\]](#) 庾翼镇武昌，屡与辽东慕容氏以及独立于甘肃凉州、向东晋遥执藩臣之礼的汉族张氏互派使节，共商夺取四川、恢复中原之策。为此他徙镇襄阳，却在计划实施之前死去，其遗策由桓温继承，但当时若以东晋王室为中心而考察之，则它正进入衰亡期。进入这个话题前，为方便起见，我们再来看看北方的形势。

注 释

[\[1\]. 据《晋书》卷六《元帝纪》及《资治通鉴》卷八五惠帝永兴元年（304），司马睿以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后，与惠帝一起被押在邺，司马睿惧及祸，在月明之夜逃往洛阳，迎太妃俱归国。](#)

[\[2\]. 《晋书》卷六八《顾荣传》，第1812页。](#)

[\[3\].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1745—1746页。](#)

[\[4\]. 《晋书》卷一〇〇《杜弢传》，第2621页。](#)

[\[5\]. 是否应作“两湖”？](#)

[\[6\].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第1696—1697页。](#)

[\[7\]. 《汉语大词典》有“黄散”一词：“指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两者同为门下省官员，晋以后，共掌尚书奏事，故合称黄散。”](#)

[\[8\]. 冈崎氏以“身欲北渡”从上，意为百姓哀怨，欲北渡。译文依《晋书》点校本，从下，作“身欲北渡，以远朝廷为名，而密知机要，潜行险慝，进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则“身欲北渡”者为刘隗。当时，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参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58页。](#)

[\[9\].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2560页。](#)

[\[10\]. 《资治通鉴》卷九三明帝太宁二年（324）：“帝将讨敦……（郗鉴）请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同讨敦。召征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

[\[11\]. 《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第1774页。](#)

[\[12\]. 《晋书》卷七三《庾冰传》，第1928页。](#)

[\[13\]. 成帝咸康六年（340），荆州刺史庾翼镇武昌，领豫州。](#)

第四节 前燕、前秦始末及北部中国诸国

后赵石勒、石虎大体统一了北部中国。石虎死后，冉闵乘后赵内部分乱，利用汉族的反胡情绪，无比惨烈地虐杀羯族。他实施暴行时，开放石虎所据邺城乃至各地的仓库，招诱汉族无赖，并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与羯族势力下的氐羌等族相战。战斗几乎没有间歇，据说北部中国的中心——河南地区的田野，因纷乱而“无复农者”。而平定冉闵的，实为鲜卑慕容族，今简单记述一下鲜卑族在中国史上大张旗鼓的因缘。

鲜卑作为一个族名，在正史中的出现始于《后汉书》。《后汉书》记录了这样一条鲜卑风俗：

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1\]](#)

一般认为这一记载基于王沈《魏书》，《魏书》载“嫁女娶妇，髡头饮宴”，这似比“婚姻先髡头”意义更明了。又，“饶乐水”，《魏书》作“作乐水”，一般认为是今日的老哈河；在这河边举行季春的部族大会合，则此部族的根据地也就清楚了。乌丸常与鲜卑并称，据史书记载，二者风俗几乎相同，只是在结婚风俗上有差别。《后汉书·乌桓传》载乌丸风俗曰：

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簪步摇。[\[2\]](#)

也就是说，不同于鲜卑在旷野中男女自由配合，乌丸已有娉币的仪式。又，南北朝时南人嘲笑鲜卑人为索头，所谓髡头即此意，应指辮发的风俗。即便如此，乌丸妇人到婚期时，仍蓄发结髻，修饰一番，这看上去总像是濡染了汉风。《魏书》《后汉书》都说此二族是东胡（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史料）余裔。汉初东胡为匈奴所破，其一部据于

乌丸山，因以乌丸为号。乌丸之名已见于《汉书·匈奴传》中，而乌丸山，据丁谦之说，今日称作乌辽或乌兰山，是内蒙古东部阿鲁科尔沁旗与乌珠穆沁旗交界的兴安岭中的最高峰。其说与《汉书·匈奴传》有关乌丸的记载相对照，甚吻合，因而乌丸部族的根据地大概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又，《魏书》《后汉书》都说东胡别支保于鲜卑山，因以鲜卑为号，惠栋引《隋图经》曰鲜卑山在柳城东南二百里（据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所引）。然而，据白鸟库吉博士及王国维的研究，“鲜卑”一语早就广泛使用于中国全土，战国时代指称战士服饰带钩，汉代则指称文官的冠名；可知那时中原人即使实际不了解“鲜卑”这一民族，也间接流传着其名。若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东胡”一语是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汉人对其东边胡族的称呼，那么可推测：这“东胡”是否实际为鲜卑之一部呢？而据其后在中国史上扮演最大角色的鲜卑拓跋部的传说——只要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传说由其他民族移植而来——则其移动所经地域颇广，不能将鲜卑之名仅限于在老哈河流域的一部族。因此鲜卑之名是一个包含各部族的大名。当然，笔者本身完全没有足以证实它的研究。关于乌丸山、鲜卑山等名称，与其说因为它们而有乌丸、鲜卑族之名，倒不如反过来理解更妥。

乌丸部族在西汉时代已为中原所知，西汉末王莽对匈奴采取高压政策时，将此部族迁移至山西内地，以抵御匈奴；东汉光武帝将这些乌桓渠帅分别安插到山西、河北、东北等边地，给其衣食，使之与汉人杂居，并在上谷宁县（河北万全）设置护乌丸校尉监管他们。乌丸内徙后，其外边的鲜卑族似随着匈奴族的衰弱，以迅猛之势繁衍于蒙古高原。在东汉明帝永平中，已扩展到甘肃西北的敦煌、酒泉地区。按规定，他们皆在辽东（辽阳西北）向汉朝贡（《魏书》本传）。其后鲜卑势力日益强大，至东汉末桓帝时，老哈河地区的鲜卑一部落出了个称号为檀石槐的酋长，他似乎最先将广布的鲜卑各部族统一为一个有节制的团体。据《魏书》，他据于河北北部，后又据于辽西的棘

城（义县）。据称，当时他的势力几乎及于整个蒙古高原，北接丁零族（贝加尔湖以西），东连扶余族（吉林附近），西自天山北路进击过伊犁附近的乌孙。其广大领土分为三部，右北平（河北遵化一带）至扶余为东部，右北平至上谷（河北宣化）为中部，上谷至敦煌为西部，各置大人以统括之。檀石槐死后，鲜卑又陷入分裂，其中迁移至檀石槐故庭棘城的是慕容部，这一部族逐渐向中原伸张势力。

慕容部开始定居棘城，是在晋惠帝元康四年（294）。此前，这部族在三国时代曾随司马懿征伐辽东，因而为中原所知。其后它迁居辽河东西，至慕容廆时，遂定居棘城。当时，棘城之南的昌黎（即锦州地区）有段氏鲜卑的势力，又棘城东北有宇文部，慕容氏与此二部族反复激战；另一方面，其则努力引入汉人势力及其文化，显著增强了它的势力。适逢西晋灭亡，匈奴势力支配中原，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地区的流民大量涌出山海关，来到辽西地区。酋长慕容廆将这些流民按其出身地分作一个个团体，使其定居，并设侨郡统括之。例如，河北冀州人统属于冀阳郡，河南豫州人统属于成周郡，山东青州人统属于营丘郡，山西并州人统属于唐国郡，等等。与此同时，慕容廆广纳北部中国之人才，通过这些入完全实行中原式的礼制，又远奉东晋为正统，对匈奴始终持抗争态度。当时，东晋刚刚平定王敦、苏峻的内乱。慕容廆寄书给陶侃，劝其共灭羯族。东晋朝议否决了北伐，但为北地名望所围绕的胡族酋长对北伐的怂恿，恐怕较多地刺激了东晋的北伐论。

慕容廆死，慕容皝立。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慕容皝假借石虎的势力灭亡了仇敌段氏，在受石虎攻击时又击败了石虎，此后慕容部势力渐及河北平原。于是慕容皝寄书给东晋执政庾冰以示决绝之意，自称燕王，徙都龙城（辽宁朝阳）。至其子慕容儁时，中原爆发冉闵之乱，慕容部乘机大举自河北挺进河南平原。关于此次出兵，《晋书·慕容儁载记》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冉闵起初欲引慕容部为援，遣使于慕容部，盛言冉闵系天命所在。这时，慕容儁说道：“闻闵铸金为己

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3\]](#) 以金人卜成败，盛行于鲜卑族，赵翼在《札记》中搜集了不少事例。大概它是通行于鲜卑的一种风俗，或者更广泛地实行于胡族之间也未可知。总之，慕容儁斩冉闵，攻取冉闵所据的邺城，在河北中山（定州）即帝位。是为前燕，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其后前燕迁都邺城，君临中原。

穆帝永和八年，苻健——中国史料称之为氏族酋长——自立于长安，称皇帝之号。是为前秦。故而后赵亡后，北部中国又两分为燕、秦，如果算上独立于甘肃凉州（即当时的姑臧）的汉族张氏的前凉国，则北部中国恰是三国鼎立之势。总之，氏族这时在中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下叙述氏族以及与氏族在族属上有亲密关系的羌族的一般情形。

氏羌族可能是中国史上最古老的部族之一。然而《汉书》为蛮夷立传时，并没有特意为氏羌分立一卷。《西域传》载有位于今青海西北柴达木地区的婁民国，其国人恐怕是羌族的一种，但它为《西域传》所载乃是因为它位于中亚与汉的交通道路上。又，《西南夷传》也仅述及武都（治今甘肃西和县西南）的氏族而已。不过，汉与氏羌族的关系匪浅。例如，汉在大通河流域及甘肃西北边设立郡县，完全是为了使匈奴控制的羌族归伏于汉的威势下。又，在四川——在文化及经济上对汉至为重要——的经营上，免不了与氏族发生关系。因此《汉书》之所以未有氏羌之传，可能是因为这些部属没有建立一个像样的国家。然而东汉末发生了羌族的大“叛乱”，故《后汉书》立

《西羌传》详述羌族之事，并兼及氏族。《三国志》无氏羌之传，但王沈《魏书》有氏羌之记载。一般而言，氏羌自古基本以连称为常，但准确来说，氏羌的根据地有差别。大体上，氏族主要散居在甘肃南部（即长江支流汉水及汶水上游）至四川北境的山地，羌族散布在青海至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洮水流域。考之《后汉书》，包含了氏族的所谓西羌种族是山地住民，各部族相互独立，容易为武力所兼并。也就是说，它作为卑弱一族常为汉族或北方草原民族所役使。然

而氐羌族以其卑弱之故，反而广泛蔓延于内地。江统《徙戎论》认为氐羌族蔓延内地完全是武将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东汉初马援将羌族迁于陕西内地，三国时魏又将氐族迁于秦川（甘肃秦岭以北关中平原），至晋，陕西、甘肃之地布满了氐羌族。故而在晋的全盛期，识者对氐羌族的后患深感忧虑。江统所谓三国时被迁于秦川的氐族，史书未有详细记载。不过，此前自三国初期起，略阳（天水东北）已成为氐族的根据地，巴氏賸部酋长李特乘晋内乱进入四川平原，而后其子李雄建立成汉，已如前章所述。其后，氐族杨氏或扰乱汉水流域且有时进入湖北之境，或进入四川受成汉李氏保护，后自立于汉水上游的仇池（武都故郡）。其详情当在别的章节论述。建立前秦的苻氏也是作为略阳氐酋而载诸史册的。当然，苻氏为氐族主帅一事固然毋庸置疑，而法国学者一致认为，苻氏的家系恐怕出自蒙古系的鲜卑族。若认可此说，则苻氏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就极容易理解，但这是否有确证，笔者尚不能详知。

据《晋书·苻洪载记》，略阳氐人蒲洪，其家池中生有蒲草，是一奇瑞，时人皆谓之“蒲家”，由是以蒲为氏，又因生于洪水之时，故以“洪”为名。永嘉之乱时，蒲洪被推为盟主，其后附于前赵刘曜，再又降于后赵石虎。据说，石虎迁陕西地区豪杰及羌戎于都城邺，是由于蒲洪的献策。其后，他受石虎之命，监管流民于河南枋头（淇县南）。石虎死，冉闵之乱爆发，蒲洪于是自称三秦王，改蒲氏为苻氏，不久，他欲西进长安而为部下所杀。其子苻健继承父亲遗志，进入陕西，强制汉族上尊号于己，苻健称前秦皇帝。

此前在冉闵之乱时，陕西地区有一个有力的汉人，他利用其势力，以远奉东晋的名义纠合了各种势力，东晋的威势自然伸张于陕西地区。东晋北伐之议乘机再起。但东晋内部不统一，在北伐之议尚未全面实行前，苻健已进入长安，打倒反对者，建立了前秦。但建国之初，其势力尚微弱，仅得制御渭水流域的一小部分而已。此时东晋桓温势力逐渐坐大，于是强使朝廷实施北伐。他以湖北襄阳为根据地，

北上长驱直逼秦都长安，苻健成功防守，桓温之志不遂。由此，自南方而来的压迫得以免除，苻健于是专心巩固内部势力，勉力试行笼络汉族人心的各种措施。他又“于丰阳县（陕西山阳）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记载简略，事情原委不甚分明。不过，国家重视商业似乎是苻秦一代政策上的一个总体特色。

苻健之后，苻生立，年仅二十。而史书淋漓尽致地记载了他的残暴言行。他不分汉族大臣或氐羌渠帅，肆意杀戮，故而对他的怨望之声高涨。当时他下诏曰：

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嗣统已来，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刑虐。行者比肩，未足为稀。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4\]](#)

在这种暴君之下，妖祥自生。潼关至长安的大道上，虎狼为暴，不食六畜，专务食人。群臣劝苻生禳除此妖，苻生则曰：

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且天岂不爱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杀之耳！[\[5\]](#)

这无疑都是暴言，尤其前者以诏敕的形式发布，因此大概可以说当时朝臣是故意将苻生之罪宣扬于中外的。苻生最终为同族苻坚所杀，秦的势力在苻坚时达到顶峰。

苻生在世时，苻坚已受秦宿将们信任，且富有汉文化修养，最得汉族名望支持。即位后，苻坚能顺从汉族传统治世方针，尤其辅佐他、为他担当政治要冲之任的是王猛这号人物，在这点上王猛可和辅佐石勒的张宾相较，而其功业之显赫则远胜张宾。首先，他屡屡劝说苻坚以武威管束凌辱汉族的胡族渠帅。其法治严整，氐族权豪皆抱不平。氐豪樊世对王猛说：“吾辈耕之，君食之邪？”然而王猛答道：“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樊世大怒，欲杀王猛，苻坚反而诛杀樊世，[\[6\]](#) 亲任王猛。由是苻坚整理内政，确立法制，抑制工商

者而奖励田地的开垦，又铺筑首都长安至各地的道路，植树于道路两侧，以便行旅，故而前秦境内一时出现路不拾遗的治世。举一个抑制商人的例子：当时赵掇等豪商“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苻）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二卿”，这遭到汉族大臣的非议——损害传统政治、败坏风俗，苻坚于是降了诸公的爵位。[\[7\]](#)

苻坚锐意整顿内政之际，或有西方甘肃渭水上游自称苻氏的氏族的叛乱，或有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的汉人武将不奉秦命。苻坚东西出兵，以图树立威势，皆取得成功。尤其对于东方河南西部，主要以王猛经营之，由此开了一个先例，即汉族名将统率胡族进行军事活动，且相当成功。

随着势力延至东方，苻秦不免与以邺为根据地的慕容燕发生冲突。其时燕主为慕容暉，因其年少，慕容氏一族起了内讧，已显示出从内部瓦解的征候。在南方的东晋，桓温再次北伐，此时军事上的策源地是建康，主力因之自江苏北上。慕容燕成为当面之敌，于是慕容氏遣使于苻坚，提议协力抗晋，为此以洛阳东方的虎牢（《晋书·苻坚载记》作武牢，今随《晋略》而改焉）为燕、秦之界。苻坚纳之，遣大兵于燕，遂破晋军。然而事平之后，燕拒绝割虎牢于秦。这成为秦讨伐燕的导火索。

此前，慕容一族的猛将慕容垂感到在年少的慕容暉下位置不安全，于是逃难，率部人降于苻坚。因此讨燕之令发出时，全军统帅王猛似胸有成竹，在出兵之前就已向苻坚提出了对将来归降鲜卑的处置方法。果然，王猛自山西出兵，一鼓而屠邺城，降服了慕容暉。于是，慕容氏一时被赶出中原之地，一部分去往旧根据地辽西，或者与慕容暉一起降秦而去往长安。攻陷邺城的王猛立即着手战后的经营，他向苻坚上疏曰：

臣以甲子之日，大歼丑类。顺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8\]](#)

大概王猛在制御胡族、安定汉族的方针下，已将万事安排妥当。前燕亡于东晋太和五年（370）。

秦威加之东方，灭了燕，其后又延伸于西北，灭了前凉。前凉是汉族张氏所立之国。张氏原是安定乌氏（甘肃平凉东北）的豪族，西晋犹盛时，张轨以其人望拔于朝臣之列；时至“八王之乱”，洛阳混杂至极，他于是自求凉州刺史，镇于姑臧。姑臧城在西汉武帝以前原是匈奴王族的居所，武帝赶走匈奴后置武威郡，又为凉州治所。晋以来以“姑臧”之名称之，或云“姑臧”由匈奴语“盖臧”转讹而来

（据《读史方輿纪要》）。城南有天梯山，二水流经城东西，合于城北，向北流入沙漠中。此地是自汉以来的牧马供应地，又，若据之控制甘肃西北部，则通向西域的交通就自由通畅。张轨将此地作为自立的根据地，另一面又奉西晋正朔，始终为王室做出若干效力。西晋灭亡后，前赵刘曜的势力延及甘肃地区时，在姑臧继承父祖遗业的张骏曾迫于刘曜的压力向前赵称藩。但他始终通使于建康东晋朝廷，奉其正朔。至刘曜、石勒相争，张骏乘机向南北扩展领土，前凉之势达于极点。此时张骏南取黄河以南之地，在洮水流域设置武街（渭源县西）、石门（狄道南）、侯和（洮州）、强川（洮州卫南）、甘松（洮州卫西南）（参照《读史方輿纪要》）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并一时使独立于仇池的杨氏承认他的威势；又北讨新疆地区的龟兹、鄯善，使西域诸国朝贡于他；又在内扩建姑臧城，推行汉族政化。当北部中国一带胡族互相攻击之际，他作为汉族文明的维持者而独立。张骏之后，张重华立，这时石虎势力逐渐延及洮水流域，前凉领土在此方面逐渐被蚕食。但对于石虎的强压，前凉也给予了足够的反抗。当时前凉名将谢艾与石虎之将麻秋的战斗情形反映了胡汉军容，饶有兴味：

（谢艾）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艾乘轺车，冠白帽，鸣鼓徐行。（麻）秋望见，怒曰：“书生年少，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骑，渡河驰击之。艾左战帅李伟

劝艾乘马，艾不从，更下车踞胡床，坐指麾处分。赵人疑有伏，迁延顾望。艾别将张瑁自左南缘河，向赵军后，赵军遽引还……秋单马奔大夏。（据《晋略》）

但前凉的威势在张重华时到了临界点，其后张氏内部不统一，渐显衰运。随着以长安为根据地的苻秦势力延及甘肃，前凉不堪压迫，于是执藩臣礼。但东晋桓温北伐时，当时的前凉主张天赐与之同盟，共抗苻秦，苻秦与张氏于是结仇，势不两立。苻坚遣大兵压境，以此武力为后盾，遣使劝降，张天赐不应，战而力尽，只得投降。时为东晋太元元年（376）。

苻坚势力已及于甘肃全土，甚至一时延及当时东晋的势力范围四川。苻坚的幸运使他空想讨灭东晋，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而他的失败引发了北部中国全土达于极点的纷乱。

苻坚原本以一部分氏族建立他的霸业基础，然而为了扩张势力，他不分鲜卑、汉族，抑或羌族，都委以军权而不疑。尤其对前燕慕容一族，苻坚极为信任。例如，他给前燕叛将慕容垂以重权，又，前燕降主慕容暉弟慕容冲及其姐皆以殊色得宠，长安于是流行“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的谣言；同时对久与苻氏敌对的羌族主帅姚氏之主姚萇，苻坚也予以重用，等等。这些异类的各首领都统率其部人，盘踞在首都长安，故而苻氏一族的重望苻融，奉戴苻氏的汉族首领王猛等，都对内部形势抱有忧虑，他们重视内部的统一，极力谏止征伐东晋的计划。其间王猛去世，再无人能抑制苻坚的骄心，苻坚的措施逐渐染上空想的色彩。例如，他将当时在长安逐渐繁衍的氏族广泛分散于河南、山东地区，以苻氏一族统之，建立恰如古时封建制的组织，试图以之维持中原的统一。堪任兵事的氏族壮丁成为此空想性措施的牺牲者，不得不悉数与父兄告别，赶赴东方。这使氏族全体非常不满，在为赴任壮丁举行的饯别会上，赵整在苻坚面前援琴而歌曰：

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

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9\]](#)

大概氐人对于离弃爱戴的王室，却将它托给敌视它的鲜卑保护，抱有无限的危惧。当然，我们推想，苻坚可能相信他率慕容垂、姚萇等猛将，以九十七万胡汉之兵，可轻易讨灭江南；而欲实现他的愿望，利用鲜卑之力是必要的。总之，苻坚不听氐族重望苻融及他所信赖的释道安的谏止，于东晋太元八年（383）分两道南下。主力很快攻陷安徽寿阳，苻坚留在此地指挥全军，然而先锋在淝水大败于东晋名将谢玄后，全军的统制忽乱，混杂之间，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马逃遁于淮水之北。在这乱军之中，惟有鲜卑慕容垂保全了军容，因而苻坚投慕容垂之军，一起北上，进入了陕西。[\[10\]](#) 此时慕容垂已有自立之志，他托言巡河北、山东之地，参祖先墓，得到苻坚许可，遂还东方。接着，慕容冲叛于山西平阳，西进，据陕西华阴；姚萇也叛于长安北方的北地（陕西耀州）。苻坚被历来所依赖的异族强劲军将抛弃，仅保长安城而已，由此，原在他势力下的各种胡族皆依利害而各自行动，整个北部中国陷入空前的混乱，各处重复着没有名义的屠杀。以下对于其间较为像样的中心势力，试作一简单叙述。

在护送苻坚回长安途中单骑[\[11\]](#) 东归的慕容垂，先赴燕旧都邺城拜了他的宗庙。当时苻坚子苻丕坐镇邺城，适逢丁零族翟氏叛乱，洛阳告急，苻丕乘慕容垂之来，给他二千兵，使之救洛阳。苻氏一族猜疑慕容垂者颇多，有人谏止苻丕，苻丕皆不纳，仅派苻氏一族的将军监视慕容军而已。然而，及渡黄河，慕容垂斩杀监视者，立即发令宣布独立。进攻洛阳的丁零族翟氏提议奉戴慕容垂为盟主，但慕容垂至洛阳，以其四面受敌，不是常安之所，于是派遣同族子弟于河北地区纠合散在各地的胡族势力。他们各聚徒党，与苻丕部下诸胡将到处战斗，大势逐渐有利于慕容氏，慕容垂于是在河北中山（河北定州）立国，是为后燕。他正式即帝位，在东晋太元十一年（386）。

慕容垂护送苻坚回陕西之际，同族中有人劝他乘机斩杀苻坚。对此，慕容垂答曰：

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12\]](#)

大概在黄河下游的北部中国大平原地区，汉人豪族厌祸乱而自持重者多，与陕甘二省高台地区胡族势焰汹汹相较，此地更适于图霸。事实上，以慕容垂为中心而聚结的慕容之一部，先降服丁零翟氏，又压迫苻丕使之逃往山西晋阳（太原），大体上将北部中国大平原统辖于其手。慕容垂又使其子慕容农经营河北北边至辽河东西一带。这一带是慕容族的旧根据地，前燕亡后，被高句丽及一汉人骚扰。慕容农至龙城（辽宁朝阳），讨灭骚扰者，又立法制、省赋役，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前后数万口。这时，河北平原地区因胡族间的斗争，人民仅得食桑椹维持性命，故在慕容氏之下，河北北边之地再次成为流民的乐土。又，大量流民远徙高句丽族中，慕容氏为招抚他们，特意以汉人有力者为辽东太守，使其尽力于民事（据《通鉴》）。

苻坚势力瓦解后，北部中国建立的最大国家是后燕。又，慕容一族慕容冲别立西燕。如前所述，慕容冲作为美男子受苻坚宠爱。苻坚败退长安后，慕容冲在山西平阳举起叛旗，进击长安。当时前燕降主慕容暉仍在长安，暗中声援慕容冲，为苻坚所杀，于是作为弟弟的慕容冲自以为燕之正统而称帝。这是慕容垂即帝位的前一年，史家称此国为西燕。苻坚对慕容冲军做了长久的英勇抵抗，奈何长安城内与四方交通断绝，粮食匮乏，饥人相食，据说诸将吃人肉，归而吐肉以饲妻儿。长安城中尚且如此，附近一带的惨状更不用说，《通鉴》载：

（西燕主慕容）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多为西燕所杀。[\[13\]](#)

大概各村落隐藏于堡壁之中，犹念苻坚往日恩德，相与输送兵粮于苻坚。但这些兵粮大多为慕容军夺走，苻坚于是逃出长安，欲往甘肃以图再举，却在途中为姚萇军所俘。慕容冲代而进入长安，成为西燕之主。这时黄河下游已入慕容垂版图，因此慕容冲不能东归依据慕容部

的旧根据地，除留滞长安外别无他法。但他的部下都不愿留在长安，于是杀了慕容冲，推立同族慕容永，退出长安，一度据于山西南部的闻喜，其后割据于长子（山西长治）。

被慕容冲逼出长安的苻坚为姚萇所俘，且被要求拿出传国玉玺，苻坚用下面的话语拒绝了这个要求：

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14\]](#)

苻坚最终不堪受辱，自杀。果如苻坚所云，羌族在胡族中尤被贱视吗？《通鉴》认为苻坚谩骂姚萇的言辞完全出自苻坚的激愤之情——姚萇无视平常苻坚对他的恩顾（卷一〇六）。恐怕确是如此。原本羌族主帅姚氏自姚萇之父姚弋仲才显于史乘。姚弋仲受后赵石虎器重，这点与苻氏祖先蒲洪是完全一样的：蒲洪镇河南枋头的同时，姚弋仲镇清河（河北枣强）的潞头，同为后赵南藩。梁犊之乱，后赵名将屡屡败北，而平定其乱，有赖姚弋仲之力实多（参照第二节）。他死后，子姚襄代之，当时石氏亡于冉闵之乱，姚襄一度降于东晋。他似濡染了汉族的教养，因之驰名东晋，且有勇武之名，抚绥得法，深得人心，因此东晋的权力者颇畏忌他。姚襄于是率部众北上，尽管途中屡为晋军所破，却有非常多的百姓舍弃妻儿随他移徙。他在这些流民的簇拥下，远至山西边境，欲自此攻入陕西，却为苻坚所杀。姚萇是姚襄之弟，其兄战死后率部众降苻坚，渐受重用。然而苻坚败退长安后，姚萇在陕西北部自立。当慕容冲进击长安时，姚萇未与之争长安，而是一味苦心平定陕西北部至甘肃泾水、渭水流域，建立自己稳固的地盘，其计划逐渐收到成效。适逢苻坚逃出长安，被捕自杀，姚萇于是即帝位，建立后秦，时为太元十一年（386），正是后燕建立之年。后秦姚氏的势力范围固然微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军队建立起了某种统制。当时，各种系统的军队各结营散在各地，属于姚萇的军队称为大营，有力的军将们将其子弟留于长安，守备大营。因此大营所属之人享有特殊待遇，以下文字可资证明：

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15\]](#)

苻坚自杀时，太子苻丕尚在山西晋阳，其后为西燕慕容永所逼，败死。不过，苻氏同族苻登尚在甘肃狄道，并为其地氐族推戴，心中燃烧着向姚氏复仇的怒火。他离开狄道，来到上邽（甘肃天水），“（此地）岁旱众饥，道瑾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指挥着这种军队，苻登屡屡挑战姚萇，激战在各处上演。特别有趣的是，他欲战之时必立苻坚之神主并将其计划诉诸神主。其言曰：

昔五将（五将，山名，苻坚被捕之所）之难，贼羌肆虐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众余五万……即日星言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16\]](#)

由这种感情所支配的苻登军，兵锋极锐，姚萇军屡遭大败。于是姚萇也立苻坚神主于军中，向它祈祷。其一节曰：

陛下虽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邪！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17\]](#)

姚萇死后，苻登为其子姚兴所杀，时为东晋太元十九年（394），苻秦遗类至此已尽。

苻氏亡后，姚氏势力逐步向甘肃地区发展，不过直接或间接推戴苻氏的各种势力仍散在于甘肃境内，继续相互独立地存在着。其中，拥有相对像样势力的国家，是后凉吕光。他原是苻坚部将，受苻坚之命远征西域，降服了龟兹、焉耆国，听到苻坚之难，于是东归。据《晋书》记载，吕氏原是山东沛人，但西汉时迁甘肃略阳（天水东北），自此世为氐族主帅。吕光在东归途中击败各种反对势力，进入

曾为前凉张氏所据的姑臧，将甘肃西北部收入手中；苻登亡后，吕光即帝位，称凉国，即史书所称后凉。时为太元二十一年（396）。

在甘肃地区拥有独立势力的，还有鲜卑乞伏氏、秃发氏二部。据《晋书》载，在昔有如弗斯（今本《十六国春秋》作“如弗斯引”，又有“斯引某”，见于《晋书》，故似当作“如弗斯引”焉[\[18\]](#)）、出连、叱卢三部，远自漠北之地南迁，至大阴山，遇一巨虫，祭之，被授以一小儿。时又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长大后，勇武超众，四部遂推为统主，乞伏部可汗就这样诞生了。西晋时乞伏部始迁于高平川牵屯山。据杨守敬《水经注图》，高平川指在今宁夏中宁附近与黄河合流的清水河。因此牵屯山无疑是清水河流域的一山。其后乞伏部讨伐居于苑川的鲜卑莫侯部，破之，于是定居苑川。苑川又称子城川，是在今甘肃中心兰州东注入黄河的小河流。其后或迁度坚山（甘肃东部，长城北），或迁麦田（麦田川，北流注于黄河），为苻坚所用。其部族定居苑川，酋长乞伏国仁在长安，随从征伐江南；但苻坚败后，他就以苑川独立，又建西苑城以居之。原本此等新来的部属似尚未染汉族之风，常迁徙于山谷溪流之间。此种情况，从部人鞠勿崧谏止秃发利鹿孤称帝的话语中可得而知：

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19\]](#)

可见他们似据于山城，而使城郭汉民伏属他们。乞伏国仁死，其子乞伏乾归移于金城允吾（大通河与黄河合流之处），他击破武都仇池之氏族杨氏，其势力似及于渭水上游，由是始称秦王。时为太元十九年（394）。史家称其国为西秦。

鲜卑秃发氏称为河西鲜卑，其迁移过程史书不传。钱大昕认为，秃发与不久将承担统一北部中国使命的北魏拓跋氏是同一语的异译，故北魏人忌讳秃发之事，不书其事，于是使秃发迁移之史迹湮灭。秃

发氏其后亡于乞伏氏，而乞伏炽磐有妻吐蕃氏（《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拓跋、秃发、吐蕃或许是同一语的转讹。秃发部族自西晋之初起，屡“跋扈”于凉州地区，成为西北边的“祸患”。当吕光据姑臧建立后凉国时，秃发酋长乌孤在今大通河支流湟水之北、青海民和的东方谷地之中筑廉川堡，都之，后据青海西宁，称西平王。史家通常称之为南凉。

黄河自甘肃东部向北流入内蒙古，其西一带称为河西，而当时河西地区的中心是凉州姑臧。据于此地的后凉始祖吕光歿后，国势衰退，沮渠蒙逊于是自立于张掖。沮渠氏据称是匈奴之一部，沮渠即匈奴官名。沮渠氏世居临松。临松是张掖南方与青海接壤的山谷之地。如此，河西地区东有乞伏氏，西有秃发氏，北有沮渠氏，它们相互攻战，姑臧尤其成为三部族的目标，而沮渠氏最终据于此地。史家称其国为北凉。

河西三国之中，南凉秃发先为乞伏所灭。又，匈奴赫连氏表现出自鄂尔多斯向西南延伸势力的形势。其间，不久将承担统一整个北部中国之使命的拓跋鲜卑在山西北边逐步筑起牢固的地盘，故而此等群小各国之始末将在第四章加以叙述。当然，其中一二小国被东晋末期出现的英杰刘裕消灭，其事述于下节。

注 释

[1]. [《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第2985页。](#)

[2].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第2979页。](#)

[3]. [《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第2832页。准确来说，是慕容儁使记室封裕诘问使者。](#)

[4]. [《晋书》一一二《苻生载记》，第2877页。](#)

[5]. [《晋书》一一二《苻生载记》，第2877页。](#)

[6]. [《资治通鉴》卷一〇〇穆帝升平二年（358）。](#)

[7].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88—2889页。](#)

[8]. [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海西公太和五年（370）。但据《资治通鉴》上下文，王猛上疏时只是围邽，尚未攻陷，苻坚回复说他将亲率六军赴邽，然后取之。](#)

[9].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孝武帝太元五年（380）。](#)

[10]. [据《资治通鉴》卷一〇五孝武帝太元八年（383），苻坚先至洛阳，然后西回长安，但慕容垂行至河南浍池，请还于东方，因而恐未进入陕西。](#)

[11]. 据《资治通鉴》卷一〇五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坚遣将军李蛮等率众三千送慕容垂；权翼密遣壮士邀慕容垂于河桥时，慕容垂自凉马台结草筏渡河而使典军衣己衣与僮仆趣河桥；慕容垂至安阳，遣参军田山修笈于苻丕。故而慕容垂应该不是“单骑东归”。

[12]. 《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第3080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〇六孝武帝太元十年（385）。

[14]. 见《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28页。

[15]. 《晋书》卷一一六《姚萇载记》，第2972页。

[16]. 见《晋书》卷一一五《苻登载记》，第2949页。

[17]. 见《晋书》卷一一五《苻登载记》，第2950—2951页。

[18].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校勘记一以为：“此处原文当作‘在昔有如弗与斯引、出连、叱卢三部’，脱去‘与’‘引’二字。”

[19]. 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二安帝隆安五年（401）。

第五节 东晋的衰亡

由于三庾的声望，成、康二帝之际的东晋大体上维持了内外的统一，且政治上显示出几分治平之象。但穆帝初年庾翼死后，东晋王室周围的北来诸强族之间渐生暗斗。这时，何充位于建康朝廷官僚之首。此人原本受王导荐举，据说这背后多少有牵制庾氏专权之意，总之，何充继承了王氏体系，代表和平主义。他出身淮南庐江，不是纯粹的北人，且为人相对公允，少党派之心，故而得以适当调和感情上易起冲突的诸强族。但何充死后，王室一族的会稽王昱总揽朝政，建康城内颇反感于当时在湖北地区尾大不掉的桓温，于是渐次放弃了和平方针，于是长江中游与下游两地区产生分歧，抗争的气氛愈加浓厚。

桓温是北方强族桓彝（见前）之子，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杀，对于下手人之江氏一族，桓温成功复仇，由此驰名诸强族间。他与庾翼似乎尤其亲密，庾翼死后，桓温代之镇江陵，统辖湖北一带，继承庾氏遗志，等待恢复中原的时机。适逢上游四川地区氏族豪部李氏建立的成汉大乱，桓温先乘机讨平了此地。

李氏成汉，如前所述，李雄始建立其国基。扶助李雄成其霸业的，是汉人范长生。大概范长生代表了巴蜀豪族的利益，巧用李氏朴素之质，成功推行了最简易的政治。因此《晋书》记载当时的政治情形，特别指出它政刑宽简，年岁丰饶，赋调轻减。然而至李寿一代，他与李雄的系谱不同，将国号成改为汉，濡染汉风，与此同时，他又刚愎自用，屠杀劝谏的汉人。其后听到石虎好任刑立威，李寿又效仿之，由是他在一般汉人心中的信望扫地无存。至其子李势继立，居住在巴蜀山地的“獠蛮”骚动，侵犯平地的汉族，而李势不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汉人豪族自然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此时桓温督统湖北军事，正窥视上游形势，于是大举入蜀，一鼓作气灭亡了成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

桓温平蜀后，长江流域完全归入东晋版图，对于建康朝廷来说，这一成功无疑是大事件。然而《晋书·桓温传》对此功业的记载极为疏略，其中缘由不明。总之，我们可以推想，桓温的声望由此及于建康内部。然而，在桓温平蜀之年，当时总揽朝政的宗室会稽王昱拔擢殷浩为扬州刺史，使之掌握建康军权。殷浩长于清谈，因之在北来诸强族中博得重望，当时名流信赖他，甚至说“深源（殷浩之字）不起，当如苍生何”。司马昱起用殷浩无疑是出于抑制桓温的考虑，时人恐怕也普遍明了这一点。据说桓温看到朝廷出此措施，始对建康政府抱有疑贰之心。据《殷浩传》，桓温与殷浩为竹马之友，互有很强的争竞心，皆不服对方。“温语人曰：‘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1\]](#)大概殷浩被刚愎自用的桓温看轻了。适逢石虎死，中原陷入极大的混乱，后赵胡汉诸将乞求归顺东晋者颇多。东晋实行北伐的最好时机到来了。桓温立即上疏请求北伐，同时使部将自湖北安陆出兵。建康朝廷得到此报，遣司马昱一派的褚裒自江苏进军北伐。这一行动恐怕出于如何应对桓温的内政问题上的考虑，并无缜密的计划。故而富有军事经验的蔡谟（接替东晋初期名将郗鉴而镇京口，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等极论北伐之非。果如其言，北伐的所有军队大败而归。而朝廷不以之为戒，第二年再度北伐，殷浩当其重任。他以安徽寿阳为根据地，援引新从后赵归降的羌族主帅姚襄以张其势力。但殷浩未能充分利用姚襄的勇武，反而出现了汉族脱离东晋推戴姚襄的现象。殷浩讨姚襄，却遭丧败。于是声望全然失坠，其北伐计划成为众矢之的。桓温自江陵下武昌，以雄厚军力为后盾，要求建康剥夺殷浩的军权。由此整个长江流域的军权统于桓温，他于是率步骑四万，自湖北襄阳北上，经河南南部由武关进入陕西之地，别遣一军自汉水上游进入陕西。主力军一路击破前秦苻健之军，桓温自身也驻营在长安城东南的霸上。《晋书》记载此时的光景：“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2\]](#)汉人王猛（其后扶助苻坚统一北

部中国）会见桓温也在此时。而在王猛眼中，桓温对统一中原抱有多少热情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桓温徒然持重灞上而不进攻，令此地汉人豪族不满，其中有孤军冒进而罹苻秦兵祸者。其间北伐军粮尽，桓温遂改变方针，收整大军，东入洛阳。与此时北指洛阳而来的羌族主帅姚襄之军决战，破之，又修复洛阳园陵，留驻屯兵，而后堂堂地凯旋，回到根据地湖北。[\[3\]](#) 时为永和十二年（356）。

桓温一时取得洛阳，对注重名义的东晋朝廷而言，无疑是最显赫的成功。不过，大军去后，洛阳一带立即为慕容燕的势力所侵占，东晋守备屡陷危殆之境。于是，桓温上书朝廷，提出迁都洛阳之议。其中一节曰：

夫先王经始，玄圣宅心，画为九州，制为九服，贵中区而内诸夏，诚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万国，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狽失据，权幸扬越，螻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以俟风云之期，盖屯圯所钟，非理胜而然也。而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4\]](#)

以上引文给人一种直接的感受：桓温所谓迁都是出于正当的道理，而非出于对胡族强烈的复仇之情。那么，桓温自身又有多少实行迁都的意志呢？我们来看反对此迁都之议的孙绰上表中的一节，以作对照：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5\]](#)

迁都实行之难原本显而易见，但建康政府实力不足，难用这显而易见的理由压制桓温的迁都之议。当时穆帝已死，哀帝在位。朝廷向桓温表示迁都之议难以遽从的同时，又委任桓温以经营中原之全权，使他都督中外诸军事。由此桓温的势力渗透建康政界，于是提出针对内政改革的七条建议，进入了建康城。[\[6\]](#) 所谓七条改革，其中包含抑制朋党、淘汰冗官等内容，但晋史记载极疏略，故难知其实际所指。而结合哀帝兴宁二年（364）实行的有名的庚戌土断来看，可以想象：桓温对王导以来东晋的宽纵政治实行了相当大胆的改革，但详情全不分明。总之，内政已有整顿。建康势家竞托子弟于桓氏之门，桓温的声望非常高。这时，前燕慕容暉在位。前燕内难之征兆恐怕已闻于江左。桓温遂起而第二次北伐，以前燕为进军目标。桓温自江苏北上进入山东南部，穿过巨野之泽，进至枋头（见前）。然而燕主慕容暉与秦主苻坚结盟，破晋军于枋头。桓温一败，仅得退还徐州。其后，燕、秦的武力反而南进，桓温退至广陵（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上），仅得止住北军的进击。由此桓温声望遽减。

东晋哀帝卒，史称海西公的司马奕即位。此人原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缺点，然而当时北伐失败后居于姑孰的桓温，声望渐衰，幕下郗超劝他废司马奕以重振威权。为此，他们在民间散布流言：司马奕有先天性疾病，所生之子实非其子。然后，桓温突然召集百官，提出废立之议。这场谋划好的戏剧照剧本演出，会稽王司马昱被拥立，是为简文帝。如前所述，简文帝原本处在桓温的敌对位置，但即位时已完全没有制约桓温的力量，桓温遂专擅建康之政。原本桓温之所以拥立简文帝，就是为了使简文帝禅位于己。简文帝得病后，桓温幕下之士逐渐露骨地发起禅位运动。这时，谢安在朝廷，以其明识在势族间博得声望。桓温深爱其才，尽力荐举，但谢安决不赞成桓氏的禅位计划。他与建康名门王坦之一起，巧妙斡旋于晋室与桓氏之间，简文帝死时，遗诏不禅位桓氏而传位其子孝武帝。桓温震怒，入京，欲强行禅位。不过，此时桓温已患重病，尽管有流言称桓温将有诛灭王、谢二

族的暴举，谢安等还是故意迁延禅代之时日，其间桓温死去。时为宁康元年（373）。

桓温死后，谢安代之总揽建康政治。他以风流之游乐驰誉当时，且如前述殷浩一样，被寄予重望——“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但在处事缜密这点上，谢安远优于殷浩。桓氏的根据地湖北地区的军权虽交给桓温弟桓冲，但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完全收在朝廷手中。此时在北部中国，秦主苻坚的势力正达顶峰，其军队在长江上游向着四川平原，在下游越过淮水，都侵入了东晋疆域内。在建康朝廷看来，当务之急是牢固防御淮水流域。由此有必要拔擢统辖江淮淮南军事的有力军将，谢安举同族谢玄以当之。谢玄原为桓温所器重，以其将才在桓温幕府中受到赏识，因此据说不满谢氏的桓氏一党也少有人非难谢安登用同族。果然，谢玄不负世人的期待，罗致居住京口及周围一带的北来诸强族刘牢之、何谦之徒于幕下，谢玄幕府（即北府）的军队，以其劲勇著闻于世。这些军队在淮水下游屡破苻秦军将，《晋略》的著者记述道，这是促使苻坚大举南征的有力刺激。如前节所述，苻坚的南征在淝水之战中彻底失败，兹不赘述。总之，建康政府以谢安为执政首领，谢玄为江淮军事主帅，凭借二谢之力成功挫败了北方的强压，且东晋势力一时越过淮水北上，但这原本只是北方统一势力瓦解所导致的现象而已。

谢安是与东晋开国勋臣王导并称的人物，也一贯以宽治为其方针。谢安在长江中游树立桓氏势力，不曾采取与之相争的政策，对于朝廷又不好行一己之威权，因而达成一代之治世。不过，这自然为孝武帝身边的权力者所忌恨，谢安于是假托北伐，率其全体一族迁于江北广陵，病死。[\[7\]](#) 谢安死后，孝武帝万事亲政，渐溺于逸乐的生活，朝政全部委任宗室琅邪王司马道子，而道子也耽于酒色，由此东晋愈显灭亡之兆。

其实，东晋王室自开基建康以来，原本就不曾有过独裁的权势，东晋王室作为北来强族与江南土豪相联结的折中代表而起作用。东晋

一流政治家王导、谢安等深谙此间情事，始终行之以宽治方针。而孝武帝末年是道子专权的时代，他们以王室的威势为自己的权势乃至逸乐服务，故而建康人心涣散。今据晋史的记载，归纳道子失政之迹，有以下几点：（一）不用名族有声望者，专用阿附于己者，不仅如此，还进而拔擢寒族之士以当要路。举例来说，王国宝最受道子信任，而其家门虽高，却因无节操而受王氏一族排斥。又，倡优出身的赵牙、在钱唐（治今杭州市灵隐山麓）做过捕贼吏的茹千秋等皆为道子所用，他们主要在建康腹地江苏地区征发人民，课以重税，等等，恣意滥用权力，以此使道子大兴土木，极尽奢侈，享受逸乐生活。

（二）地方长官多任之以内阁及各府局吏、直卫武官、仆隶、婢儿等原本在乡邑无品第者。（三）在任用寒门的同时，流行于一般世俗间的“卑秽”佛教也进入朝廷内部，因此淫乱与骄奢之风竞起，等等。建康政权这种不好的声望，在内招致了势族的反感，在外引发了孙恩的社会性“叛乱”。

396年，东晋孝武帝死，安帝立。道子一派依旧专横。此时，领北府兵的是王恭，他在建康强族间有重望，对道子的专横屡加抑制。道子所信任的王国宝逐渐掌握建康的军权后，王恭欲挫败其权，与当时代桓氏镇江陵的殷仲堪相谋，以武力胁迫朝廷，使道子杀了王国宝。不过，由此建康朝廷周围的一群人与王恭一派互难融合，生出嫌隙，琅邪王道子（时为会稽王）的世子司马元显年少气锐，欲攻击王恭，于是利用皇权树其党于要路。于是，王恭之党劝王恭排斥道子，殷仲堪及桓温子桓玄以长江中游响应。然而，王恭最倚赖的北府主帅刘牢之不满王恭，反而与道子之子元显通款，王恭败死，殷仲堪及桓玄狼狈回到其根据地。

王恭虽已败死，但随他举事的湖北方面的殷仲堪及桓玄愈与代表建康的道子一派对立。桓玄作为桓温之子，有慷慨之风，又富文学之才，当时有名的文士多至其幕下、颂扬其德，由此桓玄的名望非常高。表面上，统辖湖北地区军事的是殷仲堪，此人在文学、德行上也

有重望，但与桓氏累代之资望相较，本不足道。因此殷仲堪党于王恭，进攻建康，主谋者本是桓玄。王恭败死后，湖北、湖南方面的大吏为自保而新立盟约时，被推为盟主的，并非殷仲堪，而是桓玄。由此，桓玄的势力变得牢固，并灭亡殷仲堪及其一党，把整个长江中游收入其手，建康道子一派无可奈何，反而给他统辖四川及河南地区军务的名义。建康还不得不支付桓玄以这名义而要求的大额军费。

道子一派就这样树立了一个西方的强大对立者，却仍然只管扩张自己的权势。为此他们放免江苏腹地的奴隶，将之迁至建康，号为乐属，以充兵役，等等。此地人民本已为搜刮财利的小臣的苛政所苦，因此对建康朝廷愈感不满。孙恩之乱乘机爆发。

孙恩原是自山东琅邪逃至浙江会稽（绍兴）的孙泰之侄。孙泰一族世奉道教之一派——五斗米道，孙泰当时受幻术于钱唐杜子恭，以五斗米道及幻术得到了百姓的信仰。信教者皆被要求进奉所有财产及子女，以祈福庆。因煽动人民，孙泰被流于广东，但朝廷内部也有很多人信仰他的幻术，实际上道子之子元显就是其中一人。故孙泰不久即自广东被召回。然而，在朝廷，他看出其内部杂乱至极，晋祚将终，于是赴任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西）太守后，又私集徒众，遂因此罪被杀。其侄孙恩逃亡海中。孙泰的信徒们不信孙泰已死，认为他一定是蝉蜕登仙了，因而为海中的孙恩供给大量资财。孙恩于是再聚徒党。适逢江浙地区人心浮动，人们普遍欲叛离建康朝廷，孙恩于是开始自海上进犯浙江东部的郡县。他们相互自称“长生人”，若有伙伴病死，则将之置入囊中，祝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8\]](#) 据说因为有这种信仰，他的徒党不惧于死。

孙恩于是攻略浙东的中心——会稽，进而进入江苏。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当地强族在暗中声援孙恩。与此同时，江苏地区承平日久，武备松弛，故而孙军所到之处几无抵抗而被掠夺。晋廷拔擢北府强将刘牢之，讨伐孙恩。听到刘军南下，孙恩知道难以抵挡，再次逃往海

中。而刘牢之完全错失了追击孙恩的机会。《晋书》记载其中缘由如下：

（孙恩）惧官军之蹶，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9\]](#)

其后孙恩再次从海上攻扰江苏地区，进而溯长江，威胁京口，进逼建康城。

孙恩进逼建康，使雄视湖北的桓玄有了举兵的借口。桓玄以救援建康之名东下，而实际上孙恩在向建康进发的途中，就已受刘牢之部下刘裕邀击，败退而去。桓玄本有异志，因而继续东下。于是，建康方面决心以元显指挥全军，抵御桓玄。而元显最倚赖的是刘牢之的军队。刘牢之部下英杰刘裕这时力劝刘牢之站在建康一方，与桓玄交战；刘牢之不纳。由此建康完全没有军队能够阻止桓玄，桓玄几乎未受抵抗而进入建康城。于是司马道子一派悉被排斥，桓玄以己党支配政治之万端。当时，建康强族等对道子一派的做法早已失望，故而多少有些期待桓玄的新政，然而这期待完全落空了。桓玄只任用自己的党与，这是最重要的缘由。勇将刘牢之等被桓玄压迫，以至愤死。加之桓玄徒有大志，他的所为说明他只不过是一个贵族浪荡子而已。东晋末以来，贵族间流行建筑豪奢庭宅、舟游等风习。会稽王道子（琅邪王）的传中载：

（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道子使官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10\]](#)

《桓玄传》载：

（桓玄）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百姓佳果美竹无复遗余。[\[11\]](#)

此外，《桓玄传》详载了桓玄作为任性贵族子弟的恶德，这些成为东晋末年以后整个南朝史传记载的一种形式性的表现方式，因而完全不能判断它们有多大的可信度。要之，舆论显然将桓玄看作一个不适当的统治者。然而，他为其党所推，于是废东晋安帝而即位，国号楚。时为安帝元兴二年（403）。安帝被流放到江西地区。

刘牢之的部下——英杰刘裕，祖先本籍是徐州，曾祖父始迁京口。祖父、父并为郡太守、郡功曹，因此他的家门并未到卑贱的程度。不过，其家境极贫乏，而刘裕自身作为不在乎钱财的英雄型人物而为人所知。他很早就投身军界，在刘牢之手下屡与孙恩之徒血战，犯险立功，作为军人崭露头角。刘牢之为桓玄所迫而愤死后，刘裕暂时雌伏桓玄之下，仍然尽力于军事。据说，桓玄一派中有人忌惮刘裕的为人，劝桓玄早图刘裕，桓玄却大言道：“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12\]](#) 然而，刘裕不满桓玄，找个借口回到了京口，[\[13\]](#) 并与居在此地的北方武将等暗谋讨灭桓玄。一日，他们突然起兵，追讨在此地的桓玄部将，并进逼建康城。其行动迅速，桓玄无暇防备，立即舍弃建康城，远逃至根据地湖北。若此时留给桓玄喘息之机，则他有可能再次挽回势力，故刘裕急速追击，桓玄于是向四川逃亡，被杀于乱军之中。讨灭了桓玄的刘裕立即返回建康，[\[14\]](#) 拥立一时为桓玄所废的安帝，再兴晋室。时为安帝义熙元年（405）。

此时在北部中国，鲜卑拓跋部势力兴起，将后燕慕容部逐出中原。不过，慕容一族的慕容德在今山东青州西北尧王山南（当时称广固城）建立了南燕国，苟延残喘；正当桓玄之乱，他试着往南延伸其势力。慕容德死，慕容超立，又屡侵淮南，捕略吴人。刘裕于是在建康立议北伐，在春水涨起时，溯淮入泗，至下邳后，舍舰步进，自山东东部笔直北上。慕容部论者多认为：应据大岬山（山东临朐县东南）之要隘，以讨南军，另外由海路出至今海州（江苏北部）威胁南军粮道；若不然，则应坚壁清野，以疲远来客军。可能慕容超久在后秦，惯于甘肃地区的作战方式而不知悉南军状况，因此不用这些献

策，任由南军过大岷，自己则专据广固及其南面的临朐，防御南军。这实是刘裕最希望的，军过大岷时，他大喜，举手指天，叫道：“吾事济矣！”刘裕用他擅长的强袭法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之市。然而，卢循（孙恩死后，同党卢循代而统其徒众）趁刘裕北伐之虚，自广东入侵江西。其声势非常浩大，建康城内很快就有了迁都的议论。这时刘裕自山东南还，在下邳正计划西进收复两京，建康危急之报至，刘裕立即率腹心数十人驰归京口，遂至建康。聚集在建康的诸将都高估了卢循的势力，而刘裕独持决战之议，很多人心生不满。不过，战争的结果是卢循大败。刘裕担心卢循再据广东以张势力，于是别遣军队由海路直捣卢循在广东的根据地。卢循欲取道江西还归广东，到处受刘军的紧追，好不容易到达广东，而刘裕势力已及于其地，卢循一派悉数伏诛，多年内乱的老巢大体被捣毁了。

刘裕以显赫武功逐步增强了他在建康的势力。而原来与他一同起事诛灭桓玄的刘毅，也被时人许为英雄。刘毅用钱毫不吝啬，生活作派极豪奢，好优遇当时的文人，故而部分评价反在刘裕之上。与之相反，刘裕是个注重实际的人，舆马之类不饰珠玉，又平生不听音乐，以示简易。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两人曾赌博争胜，互相竭尽气力，结果刘裕取胜。总之，二人无疑是一对好敌手，他们逐渐发生了势力之争，结果刘毅败亡，东晋已经无人可以对抗刘裕了。

起初刘裕讨慕容超时，慕容部求援于长安的后秦主姚兴。当时姚兴不可能发兵出关，但仍遣使威吓刘裕，要求退兵。实际上，当时姚兴正受匈奴赫连勃勃侵扰，而刘裕也已树立了讨灭姚兴的计划。今内部已达成统一，刘裕于是大举北伐。这时姚兴已死，其子姚泓当国，国势已走向衰弱，不能抵御势如破竹的刘裕军。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姚泓死，后秦至此彻底灭亡。

刘裕就这样达成了桓温未竟的功业。他在长安期间，被安帝封为宋王，第二年义熙十四年（418），安帝死，恭帝立，两年后禅位于刘

裕。[\[15\]](#) 东晋至此灭亡，宋朝兴立，拉开了南北朝的序幕。时为420年。

注 释

[\[1\]. 见《晋书》卷七七《殷浩传》，第2047页。](#)

[\[2\]. 见《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1页。](#)

[\[3\]. 据《资治通鉴》卷九九，桓温永和九年（353）二月发江陵，六月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九月还自伐秦，穆帝遣使慰劳桓温于襄阳。又据《资治通鉴》卷一〇〇，永和十二年（356），“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章十余上；不许。拜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五月，姚襄攻洛阳；七月，桓温自江陵北伐；八月，桓温至伊水，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桓温，败而西走；桓温修复园陵，留兵驻守洛阳而归。总之，桓温伐秦后并未进入洛阳，而是直接南归，且在两年后再度北伐，击破围攻洛阳的姚襄。](#)

[\[4\]. 《晋书》卷九八《桓温传》，第2573页。东晋哀帝隆和初（362），寇逼河南，桓温又有迁都之议。参考前注，桓温在永和十二年讨姚襄时已有迁都之议。](#)

[\[5\]. 《晋书》卷五六《孙绰传》，第1545页。](#)

[\[6\]. 据《晋书》卷九八《桓温传》，朝廷虽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至赭圻，止之，遂城赭圻居之，后又移镇姑孰。](#)

[\[7\]. 据《晋书》七九《谢安传》，谢安在广陵病重，还建康而死。](#)

[\[8\]. 《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籩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第2633页。](#)

[\[9\]. 《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第2633页。](#)

[\[10\]. 《晋书》卷六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第1734页。](#)

[\[11\].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第2594页。](#)

[\[12\].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5页。](#)

[\[13\].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桓休入朝，高祖从至京邑……至是桓休还京，高祖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何）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第5—6页。刘裕从桓休入朝，后又从桓休还京口，借口不能步从，而与何无忌同船共还。回京口似不需借口。](#)

[\[14\]. 据相关史料，追讨桓玄的是刘毅、何无忌等人，而刘裕镇建康。](#)

[\[15\]. 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七、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刘裕“讽朝廷求九锡”，十二月诏封刘裕为宋公，刘裕不受；义熙十三年十月，刘裕在长安，诏进爵宋王，刘裕不受；义熙十四年六月，刘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恭帝元熙元年（419）正月，进爵为王，刘裕不受；同年七月，刘裕受进爵宋王之命。元熙二年，宋受禅。](#)

第三章 南北朝时代（南朝篇）

第一节 刘宋的全盛期

唐初史家李延寿著《南北史》，《南史》记载宋永初元年（420）至陈祯明三年（589），即宋、齐、梁、陈四代170年间的史实；《北史》记载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即北魏、西魏、北周、隋及东魏、北齐233年间（据《自序》，年表则别有同异）的史实。李延寿继承父志，不满当时已有的各朝历史如《魏书》《宋书》等互以本朝为正统，而视对方为夷狄，认为应在事实上承认南北两朝廷，于是撰写了《南北史》。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统的大帝国建立，在它熏陶下的中国精神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信条，即中国全土必须在一王的统治之下。但东汉亡后，事实上中国发生了魏蜀吴三国的分立。晋陈寿著《三国志》时，原本承认这一事实，将三国天子都视为正当的天子。当时三国各朝都由汉族的王室所统治，因此陈寿的这一处理未引起大问题。但西晋统一不久，异族匈奴人公然称帝于山西，后又灭西晋，接着五胡交替称帝于中原；其间，东晋仅保江淮之间与之对抗而已。奉戴东晋的汉族，其内心希望不久将胡族赶出中原，而事实上，北方如前秦苻坚的统治时代，胡族势力反而压迫南方。此时，东晋学者习凿齿以东晋势力之微弱为忧，主张不管事实上晋王室如何衰弱，理论上它始终是正当的王室，并为此制造了一种独断论。其内容是：中国虽曾三国分立，但其中必有正统王室的存在。它即是蜀。因为蜀的始祖刘备是汉宗室，所以从血统关系上看，蜀王室即汉的延续。而晋灭了蜀。蜀灭时，汉在事实上灭亡了，就这一点而言，晋直接接续了统一天下多年的汉王室。此堂堂之晋王室绝不会轻易灭亡。就势力范围而言，蜀是三国之中最狭小的。而习凿齿不顾蜀的实际势力，将它认作正统，完全是因为它谱系正当。若以谱系为标准，则兴起于北部中国的五胡政权就不可能被认作正当的朝廷。当然，在

五胡“扰乱”中原的时代，诸胡族朝廷的存在时间原本极短暂，因而事实上也不必将它们认作正统的朝廷。不过，其后北部中国在拓跋鲜卑北魏的统治下逐渐走向牢固的统一，又，在南方，东晋灭亡，宋取而代之，事实上已形成了南北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精神仍始终坚持一王主义，故在形式上，北称南为岛夷，南称北为索虏，其国内所下发的文书中若需明确表示对方，则例以蛮夷互称。为此，反映在史乘上，自然不免有偏颇的记载。而李延寿欲着眼事实，打破偏见，公平叙述，于是著《南北史》。笔者也循其例，将东晋灭亡以后至隋统一之间的历史定为南北朝对立的时代。只是李延寿《南北史》把隋包括在内，本书则从省。这大概是因为在隋至唐初之间，存在贯穿于历史事象之中的主流，这时期可与南北对立期截然分开。而在南北对立期，南北双方的历史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因此以下对于南北朝历史，与其按年代先后一起叙述，倒不如分章别述。我们先述南朝，再及北朝。

如前章所述，刘裕灭桓玄，平卢循，[\[1\]](#) 又讨南燕，取得山东地区，进而擒姚泓于长安，送之建康。尤其克复长安之举，功劳远凌驾桓温之上，奉戴晋室的汉族以此为荣，自不待言。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九月，刘裕在长安大宴群臣，安帝得此报后，立即封刘裕为宋王。诏书之一节曰：

公命世抚运，阐曜威灵，内研诸侯之虑，外致上天之罚。故能仓兕甫训，则许、郑风偃，钺钺未指，则瀍、洛雾披。俾旧阙之阳，复集万国之轸，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俾朕负宸高拱，而保大洪烈。[\[2\]](#)

以功业论，刘裕或足以受封王爵，但作为人臣而受封王爵，则照常例，不久将以禅让的形式而被授以帝位。据《通鉴》，使安帝出此诏书的，是东晋以来一流名门出身的王弘，而他是体会刘裕之意，由战场回建康处理此事的。[\[3\]](#) 当时，刘裕的心腹大臣刘穆之留守建康，却不关知此事，反为刘裕所迫，忧愤而歿。而据《南史》，刘裕因刘

穆之之死，于是托其子义真守卫长安，急遽南归。据其微辞之间，可推测刘裕南归意在篡夺。当时，刘裕虽克复长安，但在甘肃北部有称为匈奴的沮渠蒙逊，在陕西北部有赫连勃勃，又，在山西、河北，拓跋鲜卑正筑起牢固的地盘。这些胡族的君主们对刘裕取得长安后的行动，互为警戒，及刘裕南归，他们都推测：刘裕无经营天下的远志，只以篡夺东晋为目的。刘裕或夺东晋，原本早为江南人所料。为刘裕所杀的将军司马休之曾上表安帝，其中就有“（刘裕）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的言辞。已获得克复长安之功的刘裕不久将受东晋的禅让，可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过，这时发生了一件对刘裕功业造成一点污损的事情。刘义真驻守长安，辅佐他的军将之间起了内讧，赫连勃勃乘机进攻长安，晋军大败，刘义真仅以身免，长安很快被异族夺取。据说，刘裕听到此报，欲即日北伐，但为幕下之士谏止。而据谏者郑鲜之所言，当时建康腹地三吴平原因北伐而疲敝至极，若再次北伐，这一恃赖之地将有发生叛乱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刘裕不得已放弃长安。然而，借用《宋书》著者沈约之言，刘裕虽有此失败，但既登王位，就不可能再降为臣下之列。适逢安帝死，恭帝立，大臣傅亮提出禅让之议，恭帝亦欣然取笔作文，且对左右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4\]](#) 沈约认为：禅让之事始于三国魏夺汉室，继而晋以禅让代魏，二者只不过在美名之下行篡夺之实而已；但宋承继东晋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禅让之实。

永初元年（420），刘裕即位，大赦天下，是为宋武帝。作为军将，他建立了赫赫功业，在这点上，可承受东晋以后整个南朝各代的最高名誉；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他可以说建立了整个南朝各代的稳固基础。《南史》有以下一节：

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

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唐（《宋书》作“虞”，可随焉）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帝诛亮。[\[5\]](#)

大概李延寿以为，东晋之患在于权门不服统制，滥用势力；桓玄虽以改革者形象示人，但未能充分实施改革。笔者认为，往前追溯，桓温七条改革意见是桓玄改革的先驱，但现存的史料不能说清两桓的事迹。毋庸置疑，天下輿情不满东晋的宽纵方针，认为有必要做一些改革。而在以武力为背景确立统制的一般性政治行动以外，作为充实中央财政、保全地方安宁的政策，土断法的实行值得注意。土断法发源于桓温，桓温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三月庚戌实行了土断，是为庚戌土断；刘裕推行土断时，也言及了庚戌土断，说朝廷财政因之而丰裕。不过，除此之外，没有留下关于桓温土断法的更多史料，以下主要叙述刘裕的土断法。

东晋末，学者范宁陈述了一些关于时政的意见，要点如下：[\[6\]](#)

（意译）（一）北部中国纷乱，大量人口移徙江南，他们犹有适时回归故土的想法，为此虽居于江南，却仍持本郡户籍。然而就实际来看，移居江南已历数代，今坟墓累累。故理应作为江南人而受现居地官吏的支配。但至今犹未实行，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北来者的私利私欲作祟而已。他们之中那些多少有些势力，处于使役他人地位的人，总是以思念故乡的人情为由，拒做江南人，但实际上，这是他们的利己心作祟而已，他们不愿做江南人而受治理其地的官吏的管理。另外，就普通的北来者而言，他们若做江南人，则必定要承受一定的赋役，故而他们也反对土断。不过，若从国家的大层面来考虑，则以上的反对理由绝不成立。故而应当实行土断，征课租税，并治闻伍之法，犯罪连坐。

（二）从北方以团体的形式移徙而来的民众，以其本郡或本县之名，作为团体而生活于江南。不过，他们仅统一在侨郡县的名义下，事实上则零星群居于千里或数百里的广大地区。而为这些移居者特别设置的官吏相对较少，且这些官

吏还不得不对移居者所散布的广大地区进行治理，又其治所等，也只得借荒屋办公，有所不便。故而移居者难以统治，一旦征发兵役，他们自然逃避，结果变为盗贼，成为地方祸乱之源。故而人口少的郡县必须合并。

（三）北方人在江南别立侨郡县，结果自然使得地方统制不立。故而户籍也不完备，有势之家任意使役人民，使之筑造他们的邸宅，耕作他们的田土。另外，有势之家移徙住地之际，又任意以其私有兵民随行。极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范宁认为应该实行土断，将移居江南的北人重新编入他们所定居之地的户籍内，同时省并名义上的北方郡县，且对有势之家滥用民力加以限制。最后一点意见无疑因刘裕确立中央统制而得到了部分解决，在诏书中也可见与之相关的改革之一端；相较而言，土断法及郡县的省并可能取得了大的成功。据《宋书》本纪，东晋义熙九年（413），刘裕上表实行土断，且以州为界，将境内的移居者编入州的户籍，省并了大量郡县。不过，据《宋书·谢晦传》，义熙八年谢晦已对扬、豫的民户进行了土断。二者相差一年，应以何者为准呢？其后，刘裕即帝位之年，北方人中仅家门与户籍正确者才听为北方人，[\[7\]](#) 故而容忍北方贵族集团，土断法有所缓和；这却树立了南朝重视氏族特色（参照《外编》）。此外，刘裕确立王室权威也不容忽视，在必要时我们再予以追述。

最被视为宋武帝美德的，是他以简易朴素的生活使东晋末期的奢侈之风为之一变。有一个有趣的插话：“（武帝孙）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8\]](#) 宋王室之衰始于孝武，此插话恰好说明了王室的盛衰。

武帝死，长子刘义符袭位，第二年即被废，同时武帝爱子刘义真也被赐自尽。这阴谋的谋划者是徐羨之、傅亮二人，曾得武帝信任的一二名臣也予以辅助。其表面的理由是刘义符在父丧之中，有与左右昵近者游戏之类的乱行，又如在被废前一日，“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隤，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渊池，即龙舟而寝”[\[9\]](#)。刘义真专与当时有名的文人谢灵运、颜延之等追求享乐生活，刘义符之后，按照次序当然是他继承大统，于是使这种享乐主义者自杀，以保全王室。废刘义符之时，皇太后的诏书曰：

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戚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官，腆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太皇太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紼歌呼，推排梓宫，扑掌笑谑，殿省备闻……居帝王之位，好阜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10\]](#)

这种因行为违背家族道德而被废黜的天子，整个南朝颇多。大概这已成为一种程式了。《宋略》著者裴子野特别论及宋王室内教育不足，曰：

（意译）古者王室为教育皇太子及诸子，例以优秀人格者为师傅，教之言辞礼节。宋王室的教育方法全然与之不同。皇太子在内仅与仆妾相接，出外仅伴有趋走。故太子之师傅，只是台皂、召使之类。比较谨直者劝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虽有师友及文学，具位而已。又诸子自年幼时起，就作为藩镇赴任各州，其下长史往往专恣，又典签为害地方。此等为宋室声望失坠之原因，降及太宗，宋室命运危殆。[\[11\]](#)

据此，则宋王室具备产生背德皇子的要件，刘义符可看作最初的牺牲者。但即便如此，刘义真被牵连乃至被迫自杀的原因仍不分明。

原本宋室以武将而崛起，在以家门自矜的当时，算是卑贱出身。司马休之曾上表弹劾武帝，说道“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与（司马）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12\]](#)，斥责他以寒微之身而通婚王室。宋室好采取与王、谢等高门通婚以抬高王室身价的政策，正因如此，刘家武将的出身才被得到认可。然而，徐羨之、傅亮等权势者因武帝而显达，且据《徐羨之传》，徐羨之是个沉默寡言的实干家。与之相对，刘义真是一个才气焕发的人，所交往的谢灵运等人以文事与风流冠绝一时，且出自东晋以来第一名门。因此刘义真被逼自杀显然是由于徐、傅之徒的私心。实际上，刘义符、刘义真只是十九、十八岁的少年而已。

刘义符被废后，武帝第三子刘义隆被迎立，是为文帝。文帝即位后，论徐、傅二人之罪，诛灭了他们。据诏书，文帝认为刘义真被逼自杀是他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宋书·徐羨之传》）。总之，徐、傅之徒以及武帝以来的实干派倒台，名门子弟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代之活跃于政治前台，文治之风被于一世，出现了所谓的“元嘉之治”。

宋文帝的为人特别表现在他对诸弟的亲切上。其弟刘义恭赴任荆州刺史时，文帝手书的一节曰：

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园池堂观，略所谙究，计当无须改作……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13\]](#)

又，其弟刘义季离任荆州刺史后，文帝遣刘义宣就职，当时特发如下诏书：

师护（义季）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于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在

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物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14\]](#)

在前引文中，文帝劝说刘义恭，小到日常生活费用，大到不可“矜独断之明”；在后引文中，文帝说道，以刘义宣代刘义季并非朝廷的决定，完全出于自己的私情，希望刘义宣深自戒飭，不失声誉。以诏书之体而言，这般溢于私情的文辞恐怕少见。文帝的这种性格自然也反映在政治上。《通鉴》元嘉三年（426）条曰：

（王）华以王弘辅政，王昙首为上所亲任，与己相埒，自谓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俱为侍中，风力局干，冠冕一时。上尝与四人于合殿宴饮，甚悦。既罢出，上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也！”

这里所提到的人物，皆名门子弟，享誉当时。虽王华感叹“宰相顿有数人”，但元嘉之治不正在于以时望协力而施行政治吗？

庙堂上，群贤和衷协同；地方上，守宰以六年任期为常例，天下太平，没有必要更动守宰。《宋书·良吏传》序曰：

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15\]](#)

政治既上下和洽，风教之事，必当润饰之。《南史》本纪元嘉十五年（438）载，文帝先建儒学馆于北郊，召处士雷次宗居之，第二年又建玄学、史学、文学三学，分别使何尚之、何承天、谢元居之；听其聚集学徒，就学者颇多。接着《南史》赞叹道：“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可能有人必欲将儒学立于独尊地位，责难四学之并立，紊乱体统；但若换一视角，以学为陶冶个人性情之具，则四学相辅相成，各治一端，完全没有问题。《南史》在建立四学后赞叹江左政化之美，辞简而理愈明。《建康实录》同样记载此事，其文意似为《通鉴》所采用，而笔致冗漫，未得良史之体。

文帝在内政上是卓越的政治家，但在外交上有着完全失败的历史。如前所述，宋武帝一度占领长安，不久为赫连勃勃所夺。废帝刘义符时，洛阳又为拓跋鲜卑所夺，其后北魏势力渐及黄河以南。文帝时，北魏恰好为英主拓跋焘（太武帝）在位，他正着手讨灭割据北部中国的各胡族，以统一北部中国。文帝即位之初，黄河南部地区已为北魏所夺，宋一直有恢复这一地区的议论。于是，元嘉七年（430），文帝着手北伐，先给太武帝书信，表明河南原是宋的旧土，理应属宋，对于黄河以北，文帝无任何野心。对此，太武帝回信道，自“我”（太武帝）出生落地以来，河南即是“我”北魏的领土。[\[16\]](#)当时宋的北伐军统帅刘义欣堂堂发表宣战布告，劝河南人民归顺；文辞虽伟丽，行动却极缓慢。北魏方面，起初太武帝欲对宋出动大军，但最后听从崔浩的谏言，将主力用在讨灭赫连勃勃上，对南军仅作防备。即便如此，南军仍屡为魏军所破，统帅刘义欣于是引军回到根据地寿阳。

如上所述，文帝的北伐失败了，但为此刘宋也有间接获利之处。例如，刘义欣退至寿阳后，尽全力经营此地。据《通鉴》，当时寿阳地区土荒民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刘义欣努力经营寿阳，且治理寿阳之南的芍陂，以之灌溉田地，寿阳因之成为宋室的有力藩屏。又，何承天提议，对于江苏北部地区全无秩序的状态，与其放任不

管，不如向此地大规模移民，建筑城壁，耕作田地，并提供人民兵器，以维持此地秩序。这一提议实行与否，史无明文；总之，宋确实意识到充分经营江淮之间的必要性。其后，宋与北魏之间久无战事。恰逢北方盖吴以佛教之名反叛北魏，向宋上表称臣，请求援兵；以宋暗中声援盖吴的事实为理由，北魏太武帝在讨灭盖吴后率兵侵略宋的领土。这时太武帝给文帝书信，其中一节曰：

顷关中盖吴反逆，扇动陇右氐、羌，彼（指文帝）复使人就而诱劝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谄诌取赂，岂有远相顺从。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賁引诱我边民。[\[17\]](#)

其后又长篇累牍威吓刘宋。不知此书信是否为直接原因，总之文帝似有意再度北伐。当时王华、王昙首等已死，徐湛之、江湛等代而受文帝亲信，这些文治派一个个都赞成文帝北伐，反倒是掌握实际兵力、镇守一方的沈庆之等极力主张不可北伐。其间，北魏又给文帝手书，其中有言：

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18\]](#)

这是露骨的挑战书。元嘉二十七年（450），文帝对北魏宣战。宋竭尽所能募集军队，不幸的是，北伐军所到之处皆败；太武帝亲自南下，到达建康城对岸的瓜步，伐苇为筏，表现出将横渡长江的气势。建康城高度戒备，沿长江六七百里之间，舳舻相列。有人提议就以这些舳舻讨伐北军，但谁都不赞同，满城陷于危惧之中。然而第二年正月，太武帝自瓜步撤退北归。今不详其理由。据说，在归途中，北军恣意掠夺、杀人，“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19\]](#)。此种记载，后世描写胡族暴行时常常用到。此战对北方似乎也有不小的打击，而南朝因之邑里萧条，元嘉之政遂衰。沈约评价文帝，认为他无军政之能，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军事行动一仰中央之旨而不委任

大将。文帝自己也承认他未倾听一般舆论而执意北伐，招致了重大失败。文帝与江、徐等文治派谋划大事无疑是他失败的原因。

注 释

[1]. 按“平卢循”在“讨南燕”之后。

[2].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3页。

[3]. 据相关史料，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十二月朝廷封刘裕宋公。十三年八月，刘裕克复长安，十月封宋王。《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安帝义熙十二年：“（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由是愧惧发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诏以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辞不受。”

[4].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6页。

[5]. 《南史》卷一《宋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2页。

[6]. 参考《晋书》卷七五《范宁传》，第1986—1987页：“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挾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狱愈滋。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长吏，牵置无常，或兼台职，或带府官。夫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如令互相领帖，则是下官反为上司，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

[7].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寓立于南者，听以南为号。”第55页。

[8].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60页。

[9]. 《宋书》卷四《少帝纪》，第66页。

[10]. 《宋书》卷四《少帝纪》，第65页。

[11].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二〇文帝元嘉元年（424）所引“裴子野论”：“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宋之教诲，雅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帅，有侍，是二职者，皆台皂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则，导达臧否，

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虽有师傅，多以耆艾大夫为之；虽有友及文学，多以膏粱年少为之；具位而已，亦弗与游。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继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也。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

[12].《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第32页。

[13].《宋书》卷六一《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1641—1642页。

[14].《宋书》卷六八《南郡王义宣传》，第1798—1799页。

[15].《宋书》卷九二《良吏传》，第2261页。

[16].《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第2331—2332页。

[17].《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第2346页。

[18].《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

[19].《资治通鉴》卷一二六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

第二节 宋的衰运

如上所述，宋文帝在末年外交上有过失败，但仍是声誉颇高的君主。然而他最终死于长子刘劭的凶刃下，且次子刘濬也在京城参与刘劭的逆谋，这无疑是宋室家门之耻。故沈约《宋书》以此二人为“二凶”，置《二凶传》于诸蛮夷传后，为列传的最后一篇，以彰褒贬之义。二凶之中，刘劭尤被视为元凶，他出生时，文帝恰在谅闇之中，据说自古以来在这种禁忌之际降生的太子，仅殷纣王而已。大概刘劭的暴虐之性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不过，就才能而言，刘劭足以统帅军事，刘濬博通文籍，结交当代名流，皆为文帝所钟爱。他们一同反逆，大概难以用常情来推测。

赵翼在《札记》中说道，宋崛起于武门，无暇于闺房之教。[\[1\]](#)这不单指宫闱内淫风盛行，可以说，淫风之外，耽于世俗迷信也是无闺房之教的一方面。东阳公主（文帝之女，太子刘劭姐）婢女王鸚鵡将巫师严道育引入宫中，以这巫师为中心，刘劭、刘濬及其他公主、婢女聚为一团，淫风时闻，遂欲以巫蛊之术咒杀文帝。此事一度泄漏，文帝宽大处置，但刘劭一伙犹庇护严道育，事不可掩时，刘劭于是与守台城的军士相谋，做出了弑杀文帝的暴行。这时，文帝第三子刘骏因讨伐长江沿江的“蛮族”，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对岸（当时的西阳郡）。听到此报，立即东向建康，与刘劭血战，破之，并受诸王、诸将推戴，入继大统，是为孝武帝。

《通鉴》载：“上（孝武）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2\]](#)又，《南史》载，孝武帝不管如何沉醉于酒，一旦需要会见，则容仪肃然不可犯。沈约评价他有周公之才美。有此才器而祸害了宋王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始祖武帝以其异于常人的英气赢得了帝王之位，守成之时，保障东晋末年以来已经形成的江南名族的地位，树立了社会统制。但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武帝无疑采取了在境内普遍行使君主权威的方针。尤其为抑

制荆州即江陵军府之权（它过去常是东晋的威胁），或对军府人员加以限制，或规定必以王室近亲镇此地，乃至直接征发当地现户为政府的军队等，皆其一端。中央集权的政策与保障名族地位的政策相互协调推行，恐非易事。文帝通过实行以名族为中心的政治而达成了一代之善治。孝武欲将权力移归中央，于是造成了宋室倾覆的机缘。他的政策之一，是割荆、扬二州管辖区域之一部，各立新州。也就是说，历来扬州统辖江苏、浙江之大部分，荆州统辖以湖北为中心包含湖南、四川各一部在内的区域；而今新置东扬州（治所会稽山阴），统浙江东部，又置郢州（治所汝南县，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统湖北东部至湖南之一部。扬州是中央财政的本源之地，而荆州是防备北方及南方少数民族的王室藩屏。因此名臣何尚之等对分割荆、扬提出了异议，但未被采纳。州的区域逐渐狭小，以至等同古郡，这正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生的现象，孝武这一政策的是非本在议论范围之外，但总之它无疑是中央统一方针之一端。又，地方长官任期六年是文帝地方制度的根本，孝武则改作三年。同时，对于地方政治，中央每加干涉。于是，相对于元嘉美风的受人讴歌，孝武政治确实不得不让人觉得繁琐而扰民之甚。

《宋书·良吏传》载孝武之奢侈，说他增筑诸殿，极土木之盛，内多女宠，总之，“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终绣”。至此，宋之俭德为之一变。中央集权的倾向结合此种奢侈心的萌动，使宋政走向糜烂。大概当时的大臣多为名家子弟，孝武政治偏离轨道时，他们常谏止之，孝武颇不满，不任大臣而专任寒族卑贱之士。《宋书·恩幸传》所列戴法兴、巢尚之、徐爰之徒因之显达。戴法兴原本出身于会稽山阴贩纆之家，巢尚之被时人轻侮为“人士之末”，徐爰家门不低，却是个无所守的人物。此类人一意迎合孝武，以聚敛为事，弊害所及，地方政治为之混浊。《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曰：

宋世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3\]](#)

子良描述南齐台使之弊害极详，下节再述，而这弊害显然源自孝武。不过可以推测，由于孝武的政策，中央财政恐怕变得丰厚了。沈约著《宋书·州郡志》，户口资料即基于孝武时代的调查。因此就这点而言，孝武一代可谓宋室的全盛期。

孝武的独断方针，无疑受到以世族为中心的全体官僚的反感，尤其其他恣意愚弄朝臣的癖好最为名流所厌恶。孝武与群臣宴会之际，好嘲谑。江智渊生平性行恬雅，无戏谑之言。然而孝武命他说王彧父亲的坏话，以戏弄在旁的王彧。江智渊劝谏道，凡帝王者不宜有此戏。孝武听后说道：“江僧安（江智渊父）痴人，痴人自相惜。”江智渊听到此语，伏席流涕。据胡三省说，过去为人子者听到他人呼父名，会感到极大的侮辱，只有君主才可呼父名，但江智渊也不堪忍受孝武当面骂其父。[\[4\]](#) 此后江智渊失宠，或至于自杀。孝武还喜欢给群臣取绰号。老将王玄谟因是江北人而被称作“老伧”，大臣颜师伯被号为“齕”（露齿）。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孝武故意多所赐与，看他起拜之状，以为欢笑。又，孝武不高兴时，常杖击群臣，甚至当时一流元老柳元景也受过此辱。当然，由于始祖武帝以来的传统，孝武在形式上尊重当时的名族。王、谢两族还是被授以高官。不过，谢庄尽管为时人许以为宰相之器，却常常回避就任要职。实际上，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用。与消极处世的谢庄相反，进求其位的王僧达遭到自亡之厄。毫无疑问，《宋书》及《南史》都认为王僧达的失败有相当的缘由，不过，在向孝武诉说衷肠的表奏中，王僧达反复说他在生活中如何谨小慎微，绝无非分之想，而表奏中所含的不平之气触怒了孝武，于是被处极刑。要之，南朝势族因孝武的独断完全丧失其安定，宋室的危机即在于此点。

孝武死，其子刘子业继承大统，是为前废帝。孝武临终，以叔父刘义恭及柳元景、颜师伯三人辅佐刘子业。孝武生时，这三人在职任上常提心吊胆，孝武一死，便都放宽了心，饮酒奏乐，不舍昼夜。刘子业听到此事后，先杀死刘义恭。据史料载：“断析义恭支体，分裂

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5\]](#)接着，柳、颜二人也被杀。在此残虐君主下，宫廷淫风更甚。刘子业姊山阴公主，何戢妻，曾对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駙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刘子业乃为公主选定美貌者三十人。[\[6\]](#)这恐怕是事实。总之，刘子业肆无忌惮的行事，在宫城内外都遭嫌忌。“先是，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随群巫捉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事毕，将奏靡靡之声”[\[7\]](#)，当此之际，侍卫的将校们怀刀直入，刺杀了他，时年十七。刘彧代立，是为明帝。

使刘子业遭暗杀的，是明帝。或者这样说可能更近于真相：刘子业遭暗杀，是盘踞在台城，暗中贪求权势的阮佃夫、王道隆等卑贱出身者为推戴明帝以获得自身权势而演出的一场戏。刘子业有弟弟晋安王子勋。原本刘子业担忧刘子勋是继承皇位的有力候补，于是公然赐死刘子勋。[\[8\]](#)但刘子勋一派无视此令。尤其有力大臣袁粲！感到在刘子业之下有生命危险，于是从建康逃至寻阳，劝刘子勋谋反自立，且飞檄四方，邀其同伙。这样，江南江北到处都有军将推戴刘子勋。其间，刘子业被杀，明帝即位；而刘子勋一派既推戴刘子勋，就不可能再认可明帝的即位。明帝本是文帝之子，孝武之弟；因此官僚势族对于明帝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颇多质疑。但出于对孝武的反感，很多人在感情上并不觉得一定要把帝位给孝武诸子。据最尽力于明帝的名臣蔡兴宗的意见，若论两者之间皇位继承上的当与不当，则谁处于有利位置并不能断言。[\[9\]](#)要之，对当时的贵族而言，这像是宋室一家之事，他们可能并没有把它当作国家的问题而予以重视。总之，寻阳一派与建康一派的对立是实际存在的。据《通鉴》，此时刘子勋声望极高，四方上于朝廷的贡物、赋税之类，皆集于寻阳，建康朝廷所保，

仅在南京附近及淮水以南，而其中尚有通款寻阳者。[\[10\]](#) 然而，在扶助明帝的蔡兴宗看来，建康方面以孝武以来精心集结的建康军队、精锐器甲，破敌并不困难，最应担忧的是人心不安；因此他劝明帝作出了声明：推戴刘子勋的一派，其罪仅限其人，决不连及一族。这一政策实行后，建康人心颇安定，在财政上，米价也稳定，不仅如此，往来南京的人反比平时有所增加。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建康军大胜，内乱平定了。但是，在此乱中支持寻阳一派的军人薛安都（曾在江北徐州抵御北魏入侵），乱后乞降于明帝时，明帝试着变更他的地位，于是他以武力反宋，以他的管辖地投降了北魏。由此，淮水以北的重险之地归于北魏势力之下，这是宋的重大损失。

与子勋相争时，明帝听从名流蔡兴宗等，获得了宽治的声誉。但他原本被以建康城内为根本的权势之徒推立，且自身没有孝武的才器，因此内乱平定后，对孝武以来的苛政并未加以控制而渐显暴乱之政。孝武诸子诛灭殆尽，与之亲近的势家也多受迫害。据《通鉴》，刘子业时，名族子弟多离开京师，流播远方，经过明帝时的内乱，更是散于四方，百不存一。这无疑表明内乱后明帝处置的苛刻，这方针长久持续，东晋以来的贵族势力在政治上也逐渐衰弱了。名流首领王彧，对细小事件也谨小慎微，仰明帝指令以避嫌疑，可详见《宋书·王景文传》。相反，寒微出身者以及武将的权势非常显眼。《宋书·恩幸传》记载阮佃夫一派的权势，认为其权亚于人主，孝武时代的巢、戴之徒不足与之相比，且述其奢侈之状曰：

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朝士贵贱，莫不自结。[\[11\]](#)

《南史》本纪记载，明帝特别耽于迷信，“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为祝策，如大祭飨”。忌讳随之增多，言语文章中若使用了有关祸败凶丧等应避讳的词语，其人立即被戮；以“駟”字似“祸”字之故，改“駟”为“駟”等，即是显例。这种癖性又伴之以残忍行径，因而“禁中懔懔若践刀剑”。加之，若有北魏边境之士乞求宋的援助，明帝即不考虑其事成否，立即动兵，府藏因之空竭，甚至内外百官的俸禄也断了。朝廷掌事者，皆市井佣贩之子。当时士流皆抛弃宋室，显然，宋之灭亡已不可挽救。

注 释

[1]. 见《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世闺门无礼”条。

[2].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孝武帝大明七年（463）。

[3]. 《南齐书》卷四〇《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92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孝武帝大明七年（463）。

[5]. 《宋书》卷六一《江夏文献王义恭传》，第1651页。

[6]. 《宋书》卷七《前废帝纪》，第147—148页。

[7]. 《南史》卷二《前废帝纪》，第70页。

[8]. 《资治通鉴》卷一三〇明帝泰始元年（465）载：“（前废）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故恶之，因何迈之谋，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

[9]. 《宋书》卷五七《蔡兴宗传》：“太宗谓兴宗曰：‘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而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第1582页。蔡兴宗或许以为太宗（即明帝）即位并非名正言顺。

[10]. 《资治通鉴》卷一三一明帝泰始二年（466）。不过，《通鉴》载“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冈崎氏所说的“淮水以南”范围似大于“淮南郡”。

[11]. 《宋书》卷九四《恩幸传》，第2314页。

第三节 南齐的兴亡

明帝死后，刘昱继承大统，但实权不久即移于武将萧道成。刘昱被废杀，萧道成拥立顺帝，不久即受宋之禅让，建立南齐。为方便起见，以下以齐为主线来展开历史叙述。

萧道成的世系详载《南齐书》本纪，但不足信。《南史》仅说他祖先是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今山东枣庄市东南）人。因五胡“扰乱”北部中国，其家移徙江南，与宋的先祖一样，定居镇江附近。作为军人，萧氏代代都有相当的功劳；萧道成的父亲在今陕西省南部汉中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作战，屡建大功，其家始受宋王室相当的待遇。萧道成逢明帝时内乱，为明帝尽力，转战江北江南；不过，他并未受到明帝特别的亲信。例如关于他在江南作战的情形，《南齐书》这样写道：

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军容寡阙，乃编椶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1\]](#)

大概萧道成拥有的是一支简朴的军队，而他以此破敌，在军队中有了信望。总之，他以战功逐步得到了晋升。不过，明帝死时，受遗诏辅佐太子的五人中没有萧道成。但五人当中的褚渊深结萧道成，由于他的荐举，萧道成得以置喙政治大事。刘昱立为天子时，其叔父刘休范在寻阳谋反。明帝曾评价他道：“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2\]](#) 而刘休范以平庸之故，躲开了祸患，保存了他的地位。明帝死后，寒门出身者获得重权，刘休范虽处在宗室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却不能就宰辅之位，自然感到危险，于是起而争夺帝位。据《宋书》本传所载，他似乎早就准备好了谋反计划，但这可能只是表现了一般的推想而已，事实上，刘休范似在仓促之间举兵。他征发民船，做些简单的装置，二三日间即做好准备，急向建康城进发。此时，他在给朝廷顾命之臣的书信中说，宋室衰

微，权势正落入他族，要求他们秉持忠义之心行事，同时揭露阮佃夫、王道隆等群小之无状。他所言本足以引起一般的同情，建康城内也有人与他暗通声气；但萧道成最坚定地倡导主战论。战况一度有利于休范，他的一军还闯入了建康城；但休范的主力军被萧道成击败，他自身也被杀，战乱于是平定。此战建康方面获胜，完全是萧道成的功劳，因此南京地区人心都归于萧道成。他凯旋时，城内百姓缘道聚观，赞赏道：“全国家者此公也。”

《宋书·后废帝（刘昱）纪》鲜活地描写了刘昱残虐的本性。今摘录其中残虐最甚的部分：

（刘昱）好出游行……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从者并执铍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先是民间讹言，谓太宗不男，陈太妃本李道儿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儿子也。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李统，或自号李将军。[\[3\]](#)

这种小说化的记事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刘昱开始大肆出游时只不过十二三岁。负此残忍之名的少年天子与萧道成之间交恶的情形，《南史》有详细记载，其中一节曰：

休范平后，苍梧王（刘昱）渐行凶暴，屡欲害帝，尝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时暑热，帝（萧道成）昼卧裸袒，苍梧立帝于室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帝神色不变，敛板曰：“老臣无罪。”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领军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火箭射之。”乃取火箭，一发即中帝脐。苍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4\]](#)

与此前的南朝童昏天子相较，后废帝相关的故事尤其表现了他的残忍本性。若就事实作考察，则当时萧道成所镇守的西州城，兵力明显强大，且与旧台城的禁卫军之间似反复发生斗争，牺牲者时时见诸史乘。而台城的禁卫似又逐渐附和萧道成的势力，齐的元勋王敬则就是主要的一人。因此，实际上南京的势力渐在萧道成掌握之中。据大臣虞玩之的上奏，当时守王城的禁卫军队减少，王室仓库缺乏武器及其他贮积，租税不入，只得变卖朝廷御物以供诸经费。如此，为左右少数无赖军人所拥护的天子刘昱身上笼罩着浓重的残忍影子也是有理由的，同时在军府裸身昼寝的萧道成相关故事，对于萧道成也非名誉之事。总之，萧道成最终唆使台城的禁军将校暗杀了刘昱。第二天早晨，顾命大臣袁粲、褚渊之辈开会善后，没有人自担责任。当时暗杀刘昱的首勋王敬则拔刀示众曰：

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

[\[5\]](#)

在恫吓的同时，他发议拥立萧道成，而道成则以拥立顺帝收场。这本是为日后的篡夺作铺垫而已，而《南史·顺帝本纪》犹描写顺帝的容貌云：“帝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

萧道成的势力已在建康城内确立起来，但在长江中游湖北江陵尚有宋的宿将沈攸之。又，明帝顾命大臣袁粲常寄心王室。袁粲先灭，沈攸之又平，已没有抑制萧道成势力之人，萧道成依惯例，先为齐王，随之篡夺宋室，即帝位。宋亡，南齐代之，改元建元。时为479年。至于特意选择此年的理由，《南史》曰：

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终六受，六，亢位也。[\[6\]](#)

以禅让的形式夺取帝位，始于三国魏，而最简易的一次，恐怕要数南齐的篡夺。禅让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授位君主到受位国王的玺绶传递，常选定天下重望以当之，使之作为舆论的代表。宋齐禅让之际，拟以南朝第一名流谢朓当之，却遭拒绝，不得已褚渊当其任。褚渊虽受宋明帝顾命，且是宋室姻戚，却常结托萧道成。他担当玺绶传递之任后，遂成为当时名流的众矢之的，尤其其子褚贲对于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一生不仕齐室。大概舆论虽已抛弃宋室，但无疑萧道成的资望尚不足以维系人心。萧道成在这种处境中，处事方法似乎得当，在朝之所施为，最以切实为宗旨，他说过一句名言：“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7\]](#)

齐高帝萧道成在位三年后卒，其子萧赜（即武帝）继承大统。此二代之间被视为南朝的小康时期，今考其措施，似对宋孝武以后的恶政多有改革，并欲以文帝元嘉之治为标准。试述其要如下。

宋孝武以来，最使地方受苦的，是中央直接派使者检课地方。当时的课税主要是租（即一定的谷类）与调（即一定的绢布）的上纳（租调多以金钱折变，其详则著诸《外编》焉），并有固定的上纳期限。原则上征税之事专任地方官，但朝廷不时增额，又，地方官催征缓慢，自然出现租调的滞纳。孝武以来，为了严格催征滞纳的租调，且使每年的租调快速上缴，朝廷不直接委任地方官，而是遣使检查征税之事。然而此事之所以会扰乱地方政治，与其说是制度之罪，倒不如说是朝廷使者似与地方官敌对，过度用权。当时，建康腹地三吴平原上的地方长官多由贵族子弟担任，因此这种台使的派遣可能含有宫廷内部的权力者、寒门出身者与贵族子弟争斗的意味。这种社会性的解释暂且不论，关于台使派遣的弊害如何之大，详见齐武帝之子竟陵王子良的上疏：

凡此辈使人，既非详慎勤顺，或贪险崎岖，要求此役。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铍槩微具，顾眄左右，叱咤自专。摘宗断族，排轻斥

重，胁遏津逮，恐喝传邮。破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过己船。浙江风猛，公私畏渡，脱舫在前，驱令俱发。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变无穷。既瞻郭望境，便飞下严符，但称行台，未显所督。先诃强寺，却摄群曹，开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征村切里，俄刻十催。四乡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狱。或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或诳应质作尚方，寄系东冶，万姓骇迫，人不自固。遂漂衣败力，竞致兼浆。值今夕酒谐肉饫，即许附申赦格；明日礼轻货薄，便复不入恩科……及其"蒜转积，鹅栗渐盈，远则分鬻他境，近则托贸吏民。反请郡邑，助民申缓，回刺言台，推信在所。如闻顷者令长守牧，离此每实，非复近岁。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凡预衣冠，荷恩盛世，多以暗缓贻愆，少为欺猾入罪。[8]

此意见被采用，与之相关连的地方长官的任期也有所调整。宋孝武改变元嘉之制，以三年为任期，而实际上减去交接前后所需时日，任期约为两年半。今严格限定任期须满三年，多少安定了地方长官的位置。要之，以上改革的要旨在于：以元嘉之制为标准，多少仿效其意。

其次，户籍的整理成为齐武帝时期面临的一大问题。其详情在别的著作中再作展开，若述其大要，则一言以蔽之：整理户籍是为了防止士庶的混淆。所谓士，是指法规上具有某种爵位的官吏以及准官吏，一般免除租税力役。南朝实行贵族制，家门与官阶之间有较紧密的关系，士庶之别主要以家门为标准而设定；因此如果在户籍上明确注录士庶之别，则朝廷的收入及社会的安定皆有常规。宋元嘉时代，这一措施得到了最详密的施行；而文帝末年，宋与北魏发生战争，需要征发人民以担军务，又孝武以来，租税增征及力役过重的情况更严重，及至朝廷直接派遣官吏收税、征用民力，人民的苦痛剧烈。检课之事已如前述，此外力役的征发也颇使人民受苦。于是作为逃避力役

的方法，有资力者通过运作，将户籍改为士流。这使得原本明晰的士庶之别产生混淆。朝廷虽热心敛财于中央，而租税的负担者却有变少的倾向，这又相应增加了人民的苦痛。加之过重的力役使得一家流亡，有的人则好投身军役，舍弃生业。为了矫正这些弊害，毋庸置疑，废止台使的派遣也是一种改革，但从法制上根本性地明确区别士庶，定其范围，则被视为增加朝廷收入、保持地方安宁的最好方法。齐的初代、二代期间，可看到这一方法的实行，据说其标准以元嘉之籍为本，稍加改定。

此外，租税的改定也值得注意，可详见《外编》。总之，齐高帝、武帝以刘宋元嘉政治为标准，赢得了小康。不过，要恢复元嘉政治，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必须充分保存贵族特权。对于这一点，有迹象表明，齐的初代、二代给予了充分的留意。例如，自宋齐禅代以来，尽力于齐室的南朝名门王氏之子孙王俭，深受齐高帝信任，高帝曾对王俭说“我今日以青溪为鸿沟”[\[9\]](#)；又，武帝许王俭以家为府，王俭所选用的士流，奏无不可。然而，王俭却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10\]](#)“茹公”即茹法亮，列于《南齐书·幸臣传》。显然，宋孝武以来，盘踞台城中的权吏之威势未曾衰减。尤其自第二代武帝时起，寒门出身的典签等权力激增，实权有被这些寒门出身者掌握的倾向。据《南齐书·幸臣传》萧子显的总论：齐在官制上，上阶之官皆由名门占据，而他们既然不伏奏天子，不为天子执掌事务，那么天子为实行其政策就需要别的机构，寒门出身者于是乎有了权力。[\[11\]](#)也就是说，名门出身者不劳而享有政治社会上的特权，而实权却移于在官制上没有什么权力的寒门出身者。如前引裴子野

《宋略》所述，诸王子镇守地方时，典签、主帅之徒掌握实权，而在萧子显看来，自齐武帝以来，他们尤其拥有巨大的权力。原本典签只是书记之吏，当地方诸王子府中有重要会议等时，典签司掌议事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典签处，于是在重视成例的官僚社会，典签自然掌握了权力。加之齐武帝采取阴险的政策——使典签监视诸王子或地方大

员的行动，这是典签权力增大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武帝在表面上装出尊重贵族的样子，而内心明白当时贵族之辈不足为用。他曾说：

“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12\]](#) 《南史·武帝本纪》赞美武帝的政治，文虽简洁，而评价甚高；又如《南齐书·良政传》序，读其文，则武帝一代似显示出与刘宋元嘉之治相仿佛的气象。然而，此时北部中国正当英主孝文帝的治世，制度之美，粲然生光。北朝派往南朝的使者宋弁曾评价南朝政治曰：

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无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

[\[13\]](#)

由此可知，南齐盛时之政治绝非《南史》或《南齐书》所说的那般善美。

齐经过前两代十五年间的小康后不久，内乱频发，其残酷景象远超刘宋末年。武帝临终之际，以太孙萧昭业尚幼弱，发遗诏，极恳切地将萧昭业委托给辅佐之臣。从其中“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的言辞来看，武帝对昭业有所瞩望。然而在史乘中，昭业又被描写为一个无德少年。要之，除了说他是个任性的少年外，其他的恶事不足道，但史乘特别突出记载了他滥用金钱财物。据《南史》载，祖父武帝时，上库（即贮藏国家经费之库）藏钱五亿万，又斋库（即贮藏人主私用物之库）备有现钱三亿万，金银布帛之类不可胜计；昭业即位不到一年，这些钱物滥赐于人，消耗已过半。王夫之认为这一记载并非事实，说道：于理而言，一个少年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巨额财物自由消费殆尽，要之，这不过是一种捏造而已——废除昭业的萧鸾一派的名族为掩饰过错，而使昭业背负恶名。[\[14\]](#) 原本受委托辅佐昭业的人之中，宗室有竟陵王子良、萧鸾二人；而实际上朝政全由萧鸾掌管。萧鸾是齐王室的疏族，高帝极宠爱他，待之如子。有一件关于他的逸事：萧鸾曾为侍中要职，“王子侯旧乘缠帷车，高宗（萧鸾）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公事混挠，贩食人担火误烧牛鼻”[\[15\]](#)。大概这则故事记其俭德的同时，也表明他不娴于仪礼。不过可以看

到，辅佐昭业时，萧鸾之为政，手腕绝非平庸。昭业即位之年，照例发出了免除租税之诏。这种诏书基本上是象征性地发布一下，多无事实，实际上督责租税如故。然而唯独萧鸾严格执行此诏，天下欣然，以望苏息。与萧鸾一起辅政的萧子良，结交当时有名的文人，声誉之高，在南朝皇族中几无匹敌。幕下王融——在家门及文辞才略上是当时重望——趁武帝疾笃，发起推戴子良绍继大统的运动，失败被杀。此事继而祸及子良，尽管子良在武帝遗诏辅政的名单中，但他还是将建康朝政一委萧鸾，自退藩邸，不久忧死。

史家记载，子良死，昭业甚喜；但事实上喜见其死者是昭业还是萧鸾，并不清楚。总之，子良死后，昭业一派与萧鸾一派之间争斗日甚一日，最终萧鸾废昭业，立其弟昭文，不久又废昭文，自即皇帝之位。昭业称郁林王，昭文称海陵王。萧鸾即明帝。

总而言之，在宋、齐两朝，天子之废立最易实行，且同族相屠之风极盛。史家多归罪于王室家庭教育不足。不管怎样，毫无顾忌地残杀同族，尤其在萧鸾（即明帝）这里达到极致。据《南齐书·萧子岳传》，明帝废郁林王，立海陵王，后又废杀之而即帝位，当时明帝以为他的子孙皆幼弱，相反齐高帝及武帝子孙日渐长大，于是计划将高、武子孙悉数诛杀。[\[16\]](#) 此计划得以实行，且做法极阴险，大抵半夜遣兵袭击王之私宅，乃至破门墙而入。赵翼在《札记》中说道：齐高帝夺宋后，曾戒其长子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衰敝”，武帝遵守教诲，武帝一代，诸兄弟得以保全。不过，希望一族和睦的齐高帝自身却对宋的遗族采取了十分残酷的处置。因此武帝子萧子伦被害时说：“先朝杀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这诚然是齐“理数固然”的命运，但明帝的残忍不可不深加咎责。[\[17\]](#)

关于明帝对高、武子孙所采取的政策，当时的舆论如何？帮助明帝废郁林王的，实是作为南朝名流、朝臣首班而武帝恳切将太孙托之辅佐的徐孝嗣、王宴之徒。明帝将废郁林的流言早已普遍暗中流传，有人告诫徐孝嗣道，昔宋之褚渊助齐夺宋，舆论对他攻击甚酷，这应

予以足够的重视。徐孝嗣心中以为很有道理，却助明帝为逆。然而，当王、徐二人助明帝以行废立的消息传到谢朓那里时，谢朓正与客下围棋，听到此报后，卧于书斋，已不欲过问朝廷之事。虞棕以废立为“岂有此理”之事；江敦恰在去朝廷的途中得到此报，于是借口在家所服之药发，呕吐车中而归。其后，见明帝的行为渐趋惨酷，有名的谢朓送其弟酒数斛，且传言告诫：“可力饮此，勿豫人事。”这些人都在名教的立场上极嫌恶明帝，然而也没有始终尽忠节于齐室的想法。相反，以身殉君主的，时见寒门出身者。王夫之论其事曰：明帝屠杀高、武子孙时，“大臣谈笑于酒弈之间自若也”。然而武帝之子萧子懋被杀，部下董僧慧处理好子懋死后之事，而后从容就死；又，陆超之，有人劝他逃亡，却端坐以待囚。此等皆武吏，没有学问，但与以学问、教养自负的名族相较，到底谁优？[\[18\]](#) 今不从道德上评定二者价值的差等，但寒门出身者中出现忠义之士的事实，不久似催生了在正史中立“忠义列传”之名目的必要性。现今的《晋书》编纂于唐，已立“忠义列传”之目。虽说它可能出于唐代史臣的裁断，但可以说，其事实已出现在此时。

明帝在位五年后卒，继位天子东昏侯萧宝卷作为古今罕有的恶德之主而出现在历史上。今作为一个类型，试述其为人。

据《南齐书》本纪，摘其大要：[\[19\]](#)

东昏侯在东宫，不喜学问，耽于游戏。其父明帝不以皇太子而教育之，全然以家人之子宠爱之，使三日一朝。自然在家娇生惯养。他尝夜中捕鼠，以为笑乐。

明帝临崩，告诫曰：“作事不可在人后！郁林王过于磨磨蹭蹭，我遂废之。”东昏侯闻之，与近侍者相图，肆意诛戮大臣。受高宗顾命之大臣六人，[\[20\]](#) 分别被诛于东昏侯即位第二年，诛之者，为左右御刀、应敕等武人。自六大臣诛后，其暴行愈显。

日日与亲侍者唱歌狂舞，彻夜行乐。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阁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此事见于《南史》）。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匆遽而罢。

宿将陈显达不堪朝廷压迫，起而谋反。陈显达事平，渐出游走，所经道路，屏逐居民，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人。受扰者不惟市民，官高之士族境遇亦同。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又长秋卿王儼病笃，不听停家，死于路边。

其宠妃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下扬州、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多有隳废。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繁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三年夏，于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褻之像。种好树美竹，天时盛暑，未及经日，便就萎枯。于是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撤墙屋以移致之。

又于苑中立市，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

助其为虐者，茹法珍、梅虫儿等寒门出身者也。此辈以左右武人为恃，舞弄朝政，苟见富人，以种种名义没收其财产。

若对东昏的行为进行铺陈描述，恐怕就会像《南齐书》这般记载。不过，顾命六大臣被东昏诛杀，却是他们咎由自取。顾命六臣中被仰为首领的，是曾助明帝篡夺帝位的徐孝嗣。若以梁武帝对他的评价而言，徐孝嗣是“听人穿鼻”的善人，缺乏统制重臣以仕一帝的手腕及忠诚。由于明帝的做法，人心去齐久矣。此时又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东昏，若顾命六臣不疏通其间的利害及感情，则六臣中可能有人会通过废立来谋求安身，这是普遍的政治现象。最终，六臣相互排挤，为东昏近侍之臣所趁。唯独宿将陈显达谋反之事引起了史家的同情，其详情省略不述。最后，武将崔慧景起而叛乱。对于此叛乱的讨平，武将萧懿与有力焉，但乱后却为东昏所杀，久已旁观形势的萧衍以其兄萧懿有功被杀，乘机举兵。檄文一节曰：

骋肆淫放，驱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涂炭。行产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虏，以日继夜。昼伏宵游，曾无休息。淫酗鬻肆，酣歌垆邸。[\[21\]](#)

参照《南齐书》的记事，檄文所说与之吻合。然而，与陈显达谋反时的檄文相较，则其铺陈之处很不相同。陈显达檄文之一节曰：

琴横由席，绣积麻筵，淫犯先宫，秽兴闺闼，皇陞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战之门。任非华尚，宠必寒厮。[\[22\]](#)

陈显达的檄文以违背家族道德、轻蔑势族为言，不过是南朝历来的形式性的表现方式而已；而萧衍主要着眼于东昏侯加害一般士民之点，立意自然与之有别。

注 释

- [1].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第5页。
- [2]. 《宋书》卷七九《桂阳王休范传》，第2046页。
- [3].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8—189页。
- [4]. 《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101页。
- [5]. 《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102页。
- [6]. 《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108页。
- [7]. 《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113页。
- [8]. 《南齐书》卷四〇《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第692—693页。
- [9]. 《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434页。
- [10]. 《南史》卷七七《恩幸·茹法亮传》，第1929页。
- [11]. 《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史臣曰”，第979页。
- [12]. 《南史》卷七七《恩幸·刘系宗传》，第1927页。
- [13]. 《资治通鉴》卷一三七齐武帝永明十年（492）。
- [14].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六。
- [15]. 《南齐书》卷六《明帝纪》，第83页。
- [16]. 《南齐书》卷四〇《临贺王子岳传》：“临贺王子岳，字云峤，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诛世祖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后，世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第713页。由此可知，萧鸾先诛杀高、武子孙年长者，萧子岳及弟七人年少，在萧鸾临死前（永泰元年，498年）被诛杀。
- [17].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齐明帝杀高武子孙”条。
- [18].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六“明帝”第一条。该条载“僧慧则请大斂子懋而就死，业已无杀之者，而视子懋幼子讯父之书，一恸而卒”。
- [19]. 参见《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南史》卷五《齐本纪下》。《南齐书》引文多有剪裁拼接之处。下划线为译者所加，下划线表示的语句是冈崎氏概括性或解释性的语句，以区别于原书引文。浪线表示的语句是《南史》原书引文。
- [20]. 据《南齐书》卷六《明帝纪》，遗诏中出现的人名有徐孝嗣、江祐、江祀、刘暄、萧遥光、萧坦之、沈文季、陈显达、刘俊、萧惠休、崔慧景等十一人。据《资治通鉴》卷一四二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前六人“更直内省，分日帖敕”，号为“六贵”。又据《资治通鉴》，东昏侯即位第二年，上述十一人中，江祐、江祀、萧遥光、萧坦之、刘暄、徐孝嗣、沈文季、陈显达等八人先后死去。
- [21]. 《梁书》卷一《武帝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6页。
- [22]. 《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第492页。

第四节 梁武帝之治

梁四代五十六年（502—557）而亡，但实际上，梁的兴亡历史尽在武帝一代四十八年间（502—549）。故而对于梁的历史，叙述武帝一人之政象足矣。

王鸣盛在《商榷》中说道：梁武萧衍之家与齐始祖萧道成之家皆出自同一祖先，至萧衍，犹与齐王室有亲属关系。此点虽不明于《梁书》，但《南史》有清楚的记载。因此欲知齐与梁的关系，可查《南史》。据《南史》，萧衍之父萧顺之曾辅佐齐高帝，有大功，深受高帝信任。然而，第二代的武帝嫌于萧顺之，武帝曾怀疑自己的一个儿子谋反，派萧顺之讨灭之，此事招致舆论的恶评，武帝却归罪萧顺之，遂致萧顺之忧死。武帝的这一做法，使年轻的萧衍十分怨恨。明帝萧鸾诛灭齐武子孙时，萧衍常为谋主。又，萧衍对东昏侯举兵的动机之一，在于其兄萧懿有功而被杀。总之，萧衍的行动完全发私自怨。[\[1\]](#) 此说恐怕说出了部分事实。就此观点而言，萧衍夺齐一事，与齐之疏族明帝萧鸾诛灭武帝子孙而将大统传于自己的子孙，是完全相同的，因之王鸣盛似将梁看作齐的延长。不过，事实上萧衍废齐国号而新立梁朝，故可推测他有通过革命而一变人心的意图。如果像王鸣盛所认为的那样，《梁书》抹杀了萧衍对齐室有私怨的相关内容，是梁武在位时故意所为，则愈可知梁武的革命意图。

萧衍年轻时，为齐武之子竟陵王子良所友爱，同子良幕下的文学者们声名与共。如赵翼所说，齐之皇族普遍爱好文学，而萧衍恐是其中最杰出者。[\[2\]](#) 而明帝诛灭齐武子孙时，萧衍辅助明帝，其政治地位似变得稳固，于是以雍州刺史坐镇襄阳。襄阳与北魏接境，其军队自然强大，此外，萧衍还暗中制作军械，沉竹木于檀溪，以备他日之用。据说，萧衍见东昏即位后，顾命六臣互相焦虑于争权，早预想到齐室必定灭亡。而当东昏的压迫逐渐及于边境之地时，同样防守在边境的齐将裴叔业遣使于萧衍，劝他一起去齐降魏。萧衍答曰：齐王室

势力微弱，未足道，我等足以自立；今若降魏，魏别遣大将相代，我等只不过在魏朝廷得闲散一职而已，此等屈辱不可忍。[\[3\]](#) 及东昏杀其兄萧懿，萧衍遂起而讨击齐室。

永元三年（501），萧衍飞檄四方，举兵东征。一名部下劝他拥立时在江陵的东昏之弟南康王，萧衍斥之曰：事若成，则不立南康王，天下亦皆附己。[\[4\]](#) 其军所到之处，皆破敌，进入江陵后，[\[5\]](#) 南康王部下各齐将进而约以萧衍总督全军，由此拥立南康王，使之发诏，遥废东昏。此后萧衍堂堂部署诸军，进攻建康；其年冬十月，建康陷落，东昏降后被杀，[\[6\]](#) 南康王被拥立为和帝。不过，和帝在位仅数月而已，萧衍受禅登帝位，改年号为天监，国号梁。他在即位告天之文中说道：

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齐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长，肆厥奸回暴乱，以播虐于我有邦。[\[7\]](#)

萧衍革命的主要谋划者是沈约、范云二人。这二人都曾在竟陵王子良之下，与萧衍一样以文学著称，是萧衍的友人。他们游说萧衍道：今夺取齐室，名分不可谓正；但人心厌齐，皆愿在萧衍之下得到安定，故应于此际顺应大势。且沈约还劝萧衍杀了和帝。王鸣盛引用沈约《佛前忏悔文》，嘲笑沈约在文中陈述自己诸如夏暑之日亲手扑杀蚊蚤无数，壮年血气盛时屡淫僮女等罪恶，而对自己劝萧衍夺齐乃至杀和帝却没有丝毫忏悔。[\[8\]](#) 不过，这可解释为：当时名流对于政治上的行为没有深切的关心——这近于客观事实。就萧衍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关于他杀掉和帝及其一族，舆论未有过多责难，而他对明帝萧鸾系统以外的齐王室所采取的宽大处置却博得了普遍赞赏。萧子恪，齐高帝子孙，曾入朝谒见梁武；梁武对子恪说道：当我进入建康时，世人皆劝我杀君等，我拒绝了。南朝每当革命之际，必定相互杀伐，有伤天地和气，国运不长。尤其我与齐室关系很深，绝不疏略君等。且我自明帝之家夺得其位，并不自君等之家夺得天下。[\[9\]](#) 由这些话看来，王室一族被杀的界限十分明了。

可以说，梁武帝萧衍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他在和帝之下执政的数月间，发布诏书，极力分定氏族，建立社会统制。一方面，这是南朝的传统政策；但帝王成为中心，并使濒于崩坏的氏族地位得到安定。从另一方面看，使氏族有赖于帝王的保障，这一政策是由北魏英主孝文帝所树立的。因此帝王承认氏族的地位，同时又以国家所定礼制来约束彼等，建立儒学之统，涵养彼等之德性，由此维持国家之体统。为此，礼制的统一先行一步。在南朝，统一礼制之说在齐武帝时已由学者伏曼容所倡导，但当时君主热心不足，没有取得成绩。梁武的宰相徐勉再次提出此议，武帝纳之，此事才得成功。此即所谓五礼的修订。学者分吉、凶、军、宾、嘉各部门进行研究，议论不合时，梁武亲自裁定。接着，建设了国学，并任命了五经博士。国学的建设在宋、齐二代也有所实行，但李延寿在《南史·儒林传》序中说道，宋、齐国学暂开又止，实际上儒学的复兴始于梁。当然，有学者认为，梁武虽复兴了久已废绝的汉家一统的治体，但当时儒学与道、佛二教相混杂，显然欠缺纯粹性，因而到底没有汉家的治效。据说梁武原本就是撷取佛理来发挥《中庸》新义的人。客观而言，儒学通过吸收佛、道的教理，不反将其道扩大了吗？儒学纯不纯之说，学者各执所见，未有定论。要之，应以士人所遵循的标准确立与否，来讨论治体。

梁天监十七年（518），对于流民的安置及其他，朝廷发出诏书，大意说：

（意译）今日，有很多失去生业离开故乡的流民。他们必须遣回故乡。对于此际回到本土的人，免除其三年租税。若不愿返乡，则须编入现居地户籍，并照旧课课税。若愿返乡，而本土又无住宅，村司三老及其旧亲戚到县衙申请，则听许给予其村内的官地官宅。又，若因作为市场或税关职员弄虚作假而财产被没官者，则因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官。商贾富室不得顿相兼并。为免力役而逃亡者，听

自首，不问罪。若已课某种力役而中途逃亡者，则须完成所课力役。[\[10\]](#)

在以上诏书中，对于流民安置的宽大处理；对于市场及税关吏员的犯罪，从民生主义的立场保障他们的生活资料；逃避力役的犯罪者只要自首即给予一般平民的权利，同时不给权力者、富人可乘之机：这些措施表现了王者仁慈之治统。而这些政策与梁武的性格若合符节。《南史》记载梁武的私生活曰：

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11\]](#)

而且据说梁武日常生活极朴素。受亲信的周舍、徐勉二人也都因俭素生活与高洁人格，被许为有梁一代的模范。《梁书·徐勉传》即详述了其清雅的生活。

然而，天监改元普通（520）以后，梁的政治似逐渐流于放纵。梁武对其一族的管束过于散漫，其弊害逐渐显于史乘。今举一例，记述临川王宏与梁武之间的故事：

（意译）临川王为梁武之弟。他曾作为对北魏之战的全军统帅，出兵淮水流域。其时，梁军之军器、军容皆齐整，几乎是百数十年来所未有。且顶尖的优秀军将也麇集于麾下。而临川王未有进击，恰在军队被魏军攻击、诸将防战的紧要关头，舍弃全军，仓皇返回建康城。由此，梁军大败。尽管如此，梁武不问其罪，仍然重用他。但是，此番大败使得临川王声名受损，他由此心中常怀不安。临川王原本以其贪婪无度而为人所知，附属其邸宅的库屋有百间，世间流言以为其间必定藏有兵器，以备谋反之用。流言传入梁武耳中，而梁武对兄弟富于友爱，某日，他仅带随从一人，突然造访临川王。在酒席上，梁武对临川王提出看看后房的要求。但后房贮有临川王大量财物，故而对于梁武的这一要求，临川王浮现出疑惧之色。梁武见此，心生疑窦，遂开始

逐屋检视，发现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据梁武计算，全部的现钱达三亿余万。其他屋子皆堆满布、绢、丝、绵、漆、蜜、纰、蜡等杂货。但梁武在哪儿都没有看到流言中的兵器，因而安心地对临川王说道：“阿六，汝生活大可。”并愉快地痛饮。[\[12\]](#)

另外，“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迄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13\]](#)。不管怎样，声名不好的临川王仍然受到重用。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梁武之子邵陵王纶，为了给自己的夫人制作器服，遣部下在建康城内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商人皆知他会赖账，于是闭户不出。当时朝廷正派人出来购买同样的物品，而商店皆闭。官吏何智通将此事详细汇报给梁武，于是梁武命令邵陵王还第自省。然而邵陵王恨极何智通，暗中命部下刺杀何智通于街头。何智通认得下手之人，垂死之际，将“邵陵”字写于墙壁。事情因之败露，梁武将邵陵王及下手之人逮捕。此时，何智通之子将一个下手人用火烤熟，拌以盐、蒜，悬赏百姓将其肉一点点吃掉了。总之，邵陵王因此事件被贬为庶人，但这仅是暂时的，他很快又照旧得到重用。

以上二例都表现出梁武行事的放纵，而他尤其受中国学者攻击的是过于沉湎佛教。梁名臣江革曾被俘北魏，魏将元延明千方百计，必欲使江革降魏，但江革严词拒绝。适逢北魏内乱，江革因之得返于梁。梁武得知江革因其贞烈性格在魏差点被杀，故赐诗江革，劝其皈依佛教。诗句中有：

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同时，他还赐书信于诸贵族，说道：

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14\]](#)

由此可知，梁武每因事劝当时贵族信仰佛教。劝个人信仰佛教，并非不可，但梁武将佛教信仰应用于朝廷仪礼，就不能不引起朝论的批

评。

以中国的习惯，朝廷最重视的宗庙祭祀上必供奉牺牲。然而梁武认为这有害冥道，下令以面代之。对此，朝野沸腾，以为不奉牺牲，子孙绝难永续。不过，梁武意志坚定，朝臣合议，暂时达成了折中的意见——以脯即干肉代替牺牲；其后梁武仍不满足，于是以大饼代脯，兼用蔬果。又，梁有“大通”年号。王鸣盛认为，大通门建于同泰寺对面，于是有“大通”年号。当时流行一种叫“反语”的文字游戏，“同泰”的反语即“泰同”，“泰”与“大”同，“同”与“通”意思一样，故而“大通”是取自佛教语言的年号。[\[15\]](#) 又，梁武曾铸造钱货，名之为“足佰钱”。大概以法定的价格强行在市场上流通，当时的诏书曰：

佰减则物贵，佰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

[\[16\]](#)

对于纯粹的经济问题，梁武用了“心有颠倒”等佛教语言，这只能用滑稽来形容。最终梁武舍身同泰寺，佛家弟子的帝王出现了，这的确是中国史上的异数。

梁武的政治渐流于放纵，又渐将佛教的主旨混入政道。即使他自信如何认真努力于政治，但事实上，他不可避免地招来了普遍的不安。贺琛曾上表梁武，直言时弊：（一）人民流亡现象突出。宋末以来，似成惯例的由朝廷直接遣使诛求租税的现象愈演愈烈，即使朝廷屡屡以恩诏免除租税，但皆属空文，实际上人口减少愈发严重。

（二）风俗渐流于奢侈。当时设宴待客之风在贵族及势力阶层间盛行，耗费极大。他们又流行蓄养女妓，尽管身为官吏有足够的收入，但储蓄都耗尽在宴会和蓄妓上，于是不得不做非正当的诛求。（三）在官者皆小人。今在官而有势力的皆门第不高者。其所勉力，在以深酷之法诛求于民。（四）诸事所费过多。京师的诸治署、邸肆、国容、戎器，四方的诸屯传、邸治等，多可减裁。总之，改年号为“普通”以来二十年，其间刑役频起，民力凋敝。今幸而与魏和亲，应于

此际休养民力。[\[17\]](#) 然而此上表使梁武非常愤怒。他亲自反驳道：自己平生过着朴素的生活，宗庙不用牺牲，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至于供佛，所用的也是园中所植瓜菜。且若有营造，必定一一付费，不白用一人之劳力。尤其自己久不近妇人，不饮酒，不好乐。故而自己没有理由被攻击为奢侈。所谓小人在官，指的是谁？什么事项上应减裁费用？要之，事实全不明了。[\[18\]](#) 不过，尽管梁武有此反驳，史家仍记载当时情形如下：

（意译）因对官吏的制御不行，州郡牧守多侵渔百姓，朝廷派遣的官吏侵扰郡县，又大肆虚报造塔庙的费用。尤其梁武信佛教，以致刑狱颇疏略，奸吏弄法贪贿，为此罹冤罪者反而很多。二岁刑以上者，岁至五千人。又，王侯子弟乘管制之宽，白昼杀人于都城之内，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匿者，一步跨入王侯之家，有司不敢搜捕。[\[19\]](#)

要之，显而易见，梁武的政治招来了普遍的不安。适逢北魏发生动乱，勇将侯景降梁，但他最终又叛梁，从而导致了梁室的灭亡。以下叙述侯景之乱，同时论述南齐以来南朝与北朝交涉的一般情形。

注 释

[\[1\]. 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五“萧氏世系”“梁武纪事《南史》较详”等条。](#)

[\[2\].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

[\[3\]. 《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裴叔业犹豫是否降北魏，“遣亲人马文范以自安之计访之于宝卷雍州刺史萧衍曰：‘天下之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立理。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范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多遣人相代，力所不办；少遣人，又于事不足。意计回惑，自无所成。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复可得？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6页。](#)

[\[4\]. 据《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及《资治通鉴》卷一四三东昏侯永元二年（500）等史料，永元二年十一月，荆州方面的萧颖胄送刘山阳首于萧衍，并“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萧衍即上表劝南康王称尊号，南康王不许。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游说萧衍，劝他迎南康王都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萧衍不从。王茂私下对张弘策说，南康王在荆州之人手中，萧衍行动恐受制；张弘策言之萧衍，萧衍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

功业克建，威誓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待至石城，当面晓王茂、曹景宗也。”

[5]. 荆雍举事，雍州军自襄阳出发，经竟陵向郢州，故而萧衍军似未进入江陵。

[6]. 据《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及《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和帝中兴元年（501）等史料，中兴元年十月，东昏失守建康城外，萧衍命诸军攻六门，“东昏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士民，悉入宫城，闭门自守”。至十二月，东昏才遭内部的王国珍、张稷等人谋杀。

[7].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33页。

[8]. 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五“沈约劝杀巴陵王”条。

[9]. 参见《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第508页。

[10].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畴。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518）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减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第57—58页。

[11]. 《南史》卷七《梁武帝纪下》，第224页。

[12]. 《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临川王宏传》：“（天监）四年（505），武帝诏宏都督诸军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之。军次洛口，前军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六年，迁司徒……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贯之……宏以介弟之贵，无佗量能，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武帝于友于甚厚，殊不悦。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佗日送盛饌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唯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丘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便呼后（與）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颜色怖惧。上意弥信是仗，屋屋检视。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纈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情方更敦睦。”第1275—1278页。

[13]. 《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临川王宏传》，第1278页。

[14]. 《梁书》卷三六《江革传》：“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第524页。

[15]. 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五“号取寺名诏用佛语”条。

[16]. 《南史》卷七《梁本纪中·武帝下》，第218页。

[17]. 《梁书》卷三八《贺琛传》。

[18]. 《梁书》卷三八《贺琛传》。

[19].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着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怪；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

第五节 北魏与齐梁的交涉以及侯景之乱

东晋至宋初的北部中国，五胡纷乱，宋武帝活动于北方时，正是纷乱到达顶峰的时候。因此武帝能够一度攻陷长安，并常将黄河以南全域（几乎包括今河南、山东的全部）保全在宋的势力下。然而鲜卑拓跋焘（太武帝）当政后，逐步以武力完成了北部中国的统一，不久又将势力向黄河以南扩张。而在宋方面，文帝即位后，争夺河南之地失败，已如前述。但文帝一代犹将山东全境置于势力之下。其后，与北魏内部逐渐整治并得到北地汉族的信赖相反，宋王室不断内讧，孝武帝出于他热衷的集权主义，也曾对北魏展开攻势，但随着明帝时薛安都以徐州降魏，山东以及江苏北部之地已完全归入北魏版图。自此以后，中央山脉大体成为南北界线，明帝在晚年与北魏缔结和约，两国互通使者，确定国境，并设置税关，打开通商之途。

宋齐相代。南朝的革命历来能给北朝带来征讨南朝的机会。一方面，守边之臣因革命而感到不安，向北朝求援；另一方面，对篡夺他人之国者，王者必正其罪，这是汉族的传统思维。齐代宋时，适逢北魏英主孝文帝在位，他夙奉汉族文明，注意大义名分之论，因此立即命诸将讨齐。至于交战的胜负，《魏书》《南齐书》都仅记各自的胜利，真实情况不明。不过，齐主要致力防御，同时又遣车僧朗往魏交涉讲和，因此齐显然是被动方。不管怎样，和平得以恢复，其后齐武帝遵从高帝遗制，尽力修好于北魏，由此两国边境罕见地相安无事多年。

南北两朝结好，屡屡交换使节。两国都非常留意使节的挑选，必有文辞、巧辩者当之。在文章、学问上，南朝原本远胜于北朝；故南朝使者一入北朝，北朝朝野欢待。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下来：北魏孝文帝赞赏当时齐武帝派来的两位使者的应接，曾对他们说：“江南多好臣。”旁边魏的某臣讽刺道：“江南多好臣，岁易一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此臣受到孝文帝的斥责。[\[1\]](#) 然而，齐的两使

节受孝文帝欢待时，南北两朝间有了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的猜疑。此前，齐武帝在建康西北白下筑起一城，引发了一个流言，即武帝筑城是因他藏有北伐收复山东地区的用心。这流言盛传于江南地区，并波及北方，一时引起不安。孝文帝于是向齐的两使核实事情真伪，经两使辩明后，得以无事。[\[2\]](#) 其后不久，北魏孝文帝自山西旧都迁都洛阳。这是北魏的重大事件，对于此事，鲜卑部族几乎全体持反对意见。因此孝文帝以大举南征为借口，率鲜卑部族至洛阳，并在此地突然表明迁都之事。不过，关于南征的宣战布告文已堂堂地发布出来了，南朝颇惊骇，征发民丁以作防备；而实际上，孝文帝对南朝仅有一些示威行动而已。不久，齐武帝去世，乘邻国之丧而加兵，非礼，孝文帝以此为由停止了军事行动，专心于迁都事业。

齐武帝一代，有时战云高涨，但南北两朝大体保持了和平。不过，孝文帝迁都洛阳，使得两朝政治中心距离缩短，北魏的威力相应更容易加于南方。尤其齐明帝夺取武帝子孙之位后，孝文帝再次获得了南征的口实。当时，孝文帝亲自出马，直逼寿阳，威仪盛大之景况详见于《南齐书·魏虏传》。孝文帝别遣大军从河南出至湖北，也就是说，在南北国境全线向齐展开攻击。这时，北魏因国内的某些事情撤兵。《南齐书》认为孝文帝的南征乃出于显示迁都威力的需要而发起。此举恐怕部分含有这种意味。其后明帝每诛杀武帝子孙，都受到魏的征讨。总的来说，《南齐书·魏虏传》的史论对明帝一代的南北形势作了概括，翻译其大意如下：

（意译）明帝初立，魏的势力即向今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地区强逼而来。守卫这一地区的武将筑高城墙，蓄养士卒，却不敢与魏交战，任由胡马踩踏淮水、淝水流域，听任魏兵肆意掠夺。又，魏迁都洛阳后，魏都大大接近两国国境线，一日可得往还。由此，魏主将其开拓领土的野心付诸行动，齐的边将毫无防御之术，河南南部遂皆没入敌手。在东面，安徽北部也逐渐被蚕食。而为此国内租税负担加重，人民不能安生。虽说国之盛衰，系于天命，但也是因为齐之将

率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让，以及朝廷号令不明。[\[3\]](#)

要之，显而易见，在齐的末年，因北朝英主孝文帝之故，南朝受到极大的压迫。

齐亡梁立，在北朝孝文帝死后三年。梁初，魏南进之势仍在持续，当齐梁革命之际，魏宗室中山王英以此为口实，发起南征。原本在划分南北的中央山脉北侧，南朝一直以来的防御要地是西边的义阳（河南县信阳）和东边的寿阳（安徽寿县）；但此时寿阳已被魏夺取，中山王英又攻击义阳，将它从南朝那里夺了过来。在这种形势下，北魏勇将邢峦上表魏主世宗（宣武帝），提出平蜀的意见。其大意为：蜀地距南朝首都建康悬远，若攻蜀，南朝难以输送援兵。而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已在孝文帝时从南朝夺得，故而以此地为起点进军取蜀，易如反掌。蜀地物资丰富，又户数十万以上，比之攻取义阳或寿阳，其利三倍有余。[\[4\]](#) 平蜀之计由此确立，同时中山王夺取义阳后，以寿阳为根据地，以谋南进。当然，《魏书》称中山王之所以发起此行动，是因为梁发兵欲夺回寿阳；事实果真如此吗？总之，梁在合肥、钟离（安徽蚌埠）一线阻止了魏军南侵。战争自天监五年

（506）持续到六年，是南北战史上相当醒目的一场激战。南军将领韦叡在防守上留下了辉煌战绩。于是梁阻止了魏军南进；其后梁军在西部义阳方面大败，于是梁提出和议。然而魏主世宗拒绝了和议。《魏书》述其理由：梁所送书信未执藩礼，魏认为梁并没有恭顺之意。不过简单来说，拒绝和议的真实原因大概在于此时魏廷主战气氛浓厚。于是，魏从各方面继续南进，尤其向蜀的进击，步伐坚实，四川北部大部分已归于魏势力下。但这时魏诸将内讧，引发了一件稀奇的事情。经过如下：

起初，谋划平蜀之计的邢峦在汉中逐步将势力伸向蜀地，部将王足甚至一度夺得涪城（治今绵阳市三台县西北）。然而，邢峦又受命移向东方战线，与他一同入蜀的魏诸将内讧，王足于是降于在蜀的梁

将。为此，魏夺取的新领土大部分重归于梁，因之魏又派出了大规模的征蜀军。魏降将王足为了牵制这一平蜀计划，向梁武献策，建议在东方填堰淮水，水攻魏寿阳城。梁武大喜，派遣土木技师及工部人员视察地势，他们一致报告此事绝无可能。大概淮水一带沙土松散，易被冲刷，无法堰止淮水。但梁武不听，在今江苏省北部地区每二十户征发五丁，尽力在盱眙县西方夹淮而峙的浮山与嶓石山之间筑堰，堵塞水流。为此，保护淮水的军队及役于工事的人民共达二十万之多。堰由两侧相向而筑，在中流即将合龙之时，淮水暴涨，堰溃。于是流言盛行，说淮水之中多蛟，乘风雨坏崖岸。而蛟原本是忌铁的，故需用铁器来推进工事；朝廷将铸铁局中各种铁器运去使用，但还是未有成效。于是用树木做井干，填以石、土，以之用于工事，勉强筑堰成功。不过，近处淮水一带丘陵地区的木石因此都被耗尽了。这工事起于天监十三年（514），止于天监十五年，堰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堰两旁筑堤，其上栽柳杞，以便军人列垒驻扎。因为此堰，魏军确实颇受苦；但梁百姓之苦也很惨烈。因此，梁开湫向东泄流一部分河水。魏军也效仿之。但所堰之水水量非比寻常，开湫泄水，全无效果，故而地势低的寿阳地区魏军渐受堰水之苦，他们曾出兵妨碍工事，但未成功，堰成之后，又有进攻，但再次败退。然而，天监十五年八月，淮水暴涨，堰因之崩溃。当时，响声如雷，三百里间皆可闻。据说，水中怪物与水一起急流而下，杀居民数万。[\[5\]](#)

由上述可知，梁常处在受北魏压迫的形势中。然而仔细分析当时北魏的攻击力，它并没有那么强悍。大概魏历来所夸耀的军队统制非常紊乱，即便是以鲜卑族属及其关系亲近的胡族为中心所组成的禁卫军也不堪实战，且魏军还滥贪给养；又，鲜卑与汉人混合而成的地方屯戍兵也都为获恩赏才到战场上，实际上不能与敌交战。孝文帝死后，北魏之所以屡屡南征，主要是为了军将的利益，南征绝不是国家自主树立的计划。且中山王英等勇将既歿，世宗亦死，肃宗（孝明

帝）即位后，魏朝廷内部醉心佛教，尤其随之而来的弊害——与南朝异趣——是堕于极淫荡之风。唯独在内蒙古边境防备外族的军队，不再有昔日丰厚的供给，渐被闲置而生出空乏之感，因此叛乱自此地爆发，不久波及北部中国内部，魏的南部战线也自然受到影响，为此南朝一时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梁普通六年（525），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于是徐州不战而归梁所有。继而寿阳守将李宪也降梁。梁命陈庆之守寿阳，恰好魏宗室北海王颢因魏王室内讧也来降。武帝命陈庆之以兵力护送北海王还北。陈庆之立即北上，以魏睢阳城（河南商丘）为目标开始进攻，在魏轻视南方军队、未有充分防御前，陈庆之迅速攻陷睢阳城，并西向洛阳。在这种情势下，魏狼狈不堪，急忙召集四方军队，在荥阳做好防战准备。这时陈庆之麾下之兵仅七千，而魏军总数号三十万，南军士卒深怀恐惧。陈庆之大力勉谕，采取避免野战、全力取城而据之的策略，巧妙避开北军的先锋，突然侵入荥阳城，杀其守将。当时来救荥阳的魏主力军也为陈庆之所破，于是陈庆之乘势冲击洛阳。对于南军如此迅疾的行动，魏无暇防备，魏主敬宗（孝庄帝）仓皇逃出洛阳。陈庆之乃奉北海王颢进入洛阳。他从兴军到进入洛阳，取城三十二，四十七战皆克。

陈庆之所推戴的北海王颢，是魏室近亲，处于相当高的位置。故他一入洛阳，由其继承帝位的议论自然兴起。但他的成功完全是凭借南军之力，而他将南军引入北方，并不能取悦魏人。于是陈庆之的处境自然险恶，为此他谋划释放曾被北军俘虏的在洛阳[\[6\]](#)的南方人，并将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但北海王不许。陈庆之军中有人劝他于此际杀北海王，据洛阳，果断号令北部中国；但他没有采纳此建议的勇气。在这种反感的漩涡中，此前逃出洛阳的魏主敬宗在尔朱荣——此人在山西拥有最强大的军队——的扶助下南下。洛阳防不住这大军，北海王逃出洛阳，陈庆之在败亡之余，仅得削发伪装成沙门，逃归于梁。

陈庆之的远征不过是一种冒险而已。梁武没有给予他任何声援，反而沉浸佛教，享受着太平治世。而且梁武岿然不动，其声望也足以牵引北部中国的汉族。大概由于北部中国普遍性的混乱与魏室内讧频仍，梁中大通六年（534），东西两魏并立。东魏以邺为都城，汉将高欢据山西太原拥戴之；西魏都陕西长安，鲜卑宇文泰掌握了它的实权。由于这一对立，战云又重新笼罩北地，鲜卑旧族多走西魏，东魏的高欢主要纠合鲜卑武人与汉族豪族之力以抗西魏。而中原汉族遥寄心于梁武者颇多，高欢揣得其情，对南朝持以恭顺态度，采取和平方针，而尽全力压迫西魏。又，西魏起初在河南省东南部占有势力，自然与梁在河南、湖北方面接境；其后，此地区被东魏攻占，因而守其地的西魏勇将贺拔胜、杨忠等不得已皆一度降梁。梁武给予二人极高的优待，且在他们请求北归时，以宽坦之怀许其自由，他们深感其恩。据说贺拔胜终身不射南飞之雁，以寄追慕梁武之念。总之，两魏分立初期，南朝不参与北地的争乱，得以享其和平。

然而高欢死，其子高澄掌握了东魏实权。当时，侯景为东魏掌控黄河以南，高欢在世时，他曾说道，若高欢死，“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大概高澄之母原是山西北部胡族出身。因此高澄继立后，侯景劝诱黄河以南的东魏各将降梁，以抵抗高澄，同时，又一面求援西魏，以图保全自己的位置。侯景的请降书至梁之际，对于许降与否，朝论沸腾，多数人倾向于拒降。其理由在于：侯景是东魏叛将，若许降，则会破坏与东魏此前的亲善关系。但梁武欲许降，权臣朱异迎合帝意而助成之，侯景遂为梁臣，重新从梁武这里得到了统帅黄河以南全军的名义。适逢东魏举大军征讨侯景，侯景求救于梁，又求救于西魏。西魏立即派出一军，但从侯景的态度中看出诈伪之处，中途退兵。[\[7\]](#) 侯景害怕受援西魏之事有碍梁武的感情，于是送信梁武作了辨明；由于这封信，梁武深信侯景，命诸将极力援助他。这样，与东魏的亲善关系完全断绝了。

东魏首先攻击侯景于河南省东南部。此战，侯景及梁的援军大败。东魏势力直接及于湖北北部。侯景因此退至淮水，计划在安徽北部打败东魏势力，梁又给予大力声援，但侯景再次大败于东魏。此战开始之前，东魏寄给梁一封书信，揭露梁的不守信义。译其大意如下：

（意译）我东魏自屈，与梁和睦，梁实获益。然侯景自生猜贰，西与西魏相宇文泰结兄弟之约，南与梁定君臣之义，遂以干戈向东魏。而战败后，以建康城为逋逃之藪，甘辞卑礼，以图容身。梁主不查其实际，反欲利用，以之服务于自己野心，遂灭失邻好大义，由是，其结果之不良，是明白的。大凡得一人而失一国，智者所不为，而今正是梁改变其方策之时。侯景降梁之真意在于：见南朝不振，有衰亡之征，彼存取代之野心。侯景虽是不足言之人物，但久习军旅，其部下之兵远胜南朝。此后，江南人士盖将悉数倒于其马蹄之下。今梁主已老，政治淆乱。而彼又自以为施行清静之治，但可预见其领内之人心必生变乱。若侯景乘此机扰乱梁，我东魏讨之，则南朝之存活不可期。故及今梁诸将及梁一族归降我朝，我乐于款待。[\[8\]](#)

此檄文成于杜弼之手，从中可详细了解梁的状况，它大概反映了：听许侯景投降之事，为一般南朝人士所深忧。

侯景为东魏所破，于是渡淮水南入寿阳城。一入城，他立即以自己的部下把守城门，梁的朝臣愈加危惧。据说此时梁武犹亲信侯景，但其后侯景在寿阳城将城中人民悉数征为军士，并不断向建康要求配给他们衣服、兵器，梁武也逐渐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适逢守卫徐州方面的梁将为东魏所破，东魏乘机向梁提议恢复昔日友好关系，梁武许之。侯景对自己的立场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企图谋反。

太清二年（548），侯景以讨梁武权臣朱异及其他二人为名举兵。他离开根据地寿阳，巧妙避免与梁大军交锋，间道进至长江北岸。从长江下游渡江，大凡有三路。东自广陵（扬州）南瓜洲津至丹徒（镇

江），中央自秦州（江苏六合西北）瓜步或胡墅（浦口）直入建康，西自历阳（安徽和县）南的采石矶至姑孰（当涂）。侯景向防守最薄弱的历阳进击而来。守此地的是梁宗室丰城侯泰，[\[9\]](#) 此人毫无声望。他曾经为使人担负行列所用的舆、扇、伞等，甚至征发有身份的人，若有人耻为之而不应征，则恣加杖责，从其人处得到若干财物后，才放免之。由于他的此等暴行，城中士民反而迎接侯景之军，丰城侯泰因之被擒。侯景既入历阳，建康朝廷犹未重视此乱，且建康守备委任宗室临贺王正德也是重大的失策。大概正德在乱行方面，是梁王室中最突出的，故数次被武帝免职。加之，他与侯景已暗通声气，侯景能轻易渡江完全是由于正德的引导。

侯景渡江，一路东进，与正德军合，开始进攻建康。于是断然以梁武为敌，发布如下檄文：

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仆所以赶赴阙庭，指诛权佞，非倾社稷。[\[10\]](#)

侯景围建康之报传出，诸方援军赶来，集于南京台地。然而其首领（即梁室一族）间相互猜疑，没有统制，甚至有暗通侯景者，建康危急，援军不能为用。梁室仅以建康城内的兵力对抗侯景，约维持了半年之久。起初，梁为了防止敌人闯入，将城门锁住，城中男女十余万人，有兵器者二万人之多。被围半年后，人多身肿气急，为此死者颇多，堪战者遂不满四千，且皆羸喘。又横尸满路，烂汁满沟。又，闭城时，为恩赏将士，贮藏了钱帛以及一般粮食，米四十万斛，钱帛五十亿万；但薪刍鱼盐的储蓄相对较少。因此城中先毁尚书省的建筑，以取薪材，撤除所敷荐席，以当马粮。军士无鱼肉，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遂屠马，杂以人肉而食之。另一方面，侯景起初以为可轻取建康，为讨人民欢心，严令部下禁止掠夺；但建康防守意外坚固，于是听许部下杀掠，或富家子女妻妾悉取予军士，又为攻城，

堆起土山，其工役不论贵贱，昼夜毆捶驱使。因此建康附近的百姓全无分文之贮。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无可掠夺，侯景本营东府城中仅有一年粮食而已。若持续对战，援军到来，局势恐怕不利，于是侯景向梁武请求和议。其条件是将江右即安徽省长江以北地区给予侯景。梁武起初不听和议，由于太子热心劝说，于是将此事任由太子处置，和议遂成。而侯景不履行自己提出的条件，听从部将王伟之说，不回江北之地，欲在建康掌握实权。于是梁武与侯景之间嫌隙日深，梁武屡嘲弄侯景，又轻视他的部将，不与他们官位。侯景也酬之以暴，梁武遂忧死，太子袭后，是为简文帝。

侯景挟简文帝，据台城，但命令所行的范围极狭小。尤其乱后的南京附近，交通断绝，物资不通，饿死者多，虽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稻，或填委沟壑，不计其数。于是侯景解放曾在江南为奴隶的北人，使之从军，图谋借此进攻三吴平原地区以伸张势力。其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通鉴》载：

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11\]](#)

侯景张势力于三吴平原，然后向西拓展。这时，在湖北江陵有湘东王绎；在其南，湖南长沙有河东王誉；在其北，湖北襄阳有岳阳王詵；在其西，四川成都有武陵王纪，诸王互相猜疑，祸乱已生。湘东王绎进攻长沙，杀河东王，才将湖南收入其手，而侯景西进，袭武昌城。湘东王拔擢名将王僧辩，委任他抗击侯景军，而王僧辩巧以水军破敌，侯景于是向建康败退。这一战实使侯景命运为之一变，此后王僧辩沿江而下，至湓口（即江西九江）之际，与自广东方面北上讨击侯景的陈霸先之军会合，两者立誓协力讨灭侯景。水军直逼建康城西石头城下。侯景本北人，擅长陆战。然而，陈霸先所率新锐南军与侯景战，屡屡得胜，侯景不能挽其颓势，遂舍弃建康，向东逃去。不过，

三吴地区反侯景各军已经群起，侯景试图自沪渎（上海）之地逃往海上，被捕杀。

起初，侯景败于王僧辩军，回到建康时，意识到形势不妙，于是杀简文帝，自称天子。侯景灭亡后，帝位自然传于王僧辩奉戴的湘东王绎，是为元帝。不过，侯景之乱所摧残的建康城及三吴平原被认为不足以供养皇帝的官属，元帝于是不来建康，在江陵承继大统。然而，帝位的后盾王僧辩军远在建康，在成都早有争帝位之野心的武陵王纪借讨灭侯景之名大举东下，与元帝争位。这一远征无谋之至，在其北边久窥成都的西魏将尉迟迥不失时机地夺取了成都，元帝之军又邀击武陵王于其东下途中，武陵王于是身死人手，其地徒然为西魏所有。

元帝虽暂时抵挡住了来自西方的压迫，但在其北方襄阳的岳阳王督降于西魏，在西魏勇将杨忠的援助下，向江陵进击而来。元帝来不及召回王僧辩军，江陵就被攻取，元帝被杀，岳阳王被西魏封为梁王，暂且割据湖北。于是梁室又中绝了，王僧辩欲拥立元帝之子萧方智，也已得到了陈霸先的同意。然而，此前侯景尚未谋反时，梁派宗室萧渊明作为使节，与东魏进行和平交涉。当时东魏政权已为高欢之子高洋所夺，北齐朝廷建立，北齐主高洋提议王僧辩以萧渊明继承帝位。王僧辩屈从这一要求。陈霸先以此为借口，突然发兵进入建康，杀死僧辩，拥立萧方智，是为敬帝。但此后建康的实权完全落入陈霸先之手，不久他受梁之禅，建立了陈朝。

注 释

[\[1\]. 参见《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据该传，“江南多好臣”是孝文帝对其臣下所言，受臣下的反驳后，孝文帝“大惭”。](#)

[\[2\]. 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孝文帝说“江南多好臣”，是萧琛、范云于永明十年（492）时；又永明八年（490），使者颜幼明、刘思敦因齐武帝治白下等事被北魏南部尚书李思冲责问。](#)

[\[3\].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建武初运，獯雄南逼，豫、徐强镇，婴高城，蓄士卒，不敢与之校武。胡马蹈藉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兼以穹庐华徙，即礼旧都，雍、司北部，亲近许、洛，平涂数百，通驿车轨，汉世驰道，直抵章陵，镢案所鹜，晨往暮返。虏怀兼弱之威，挟广地之计，强兵大众，亲自凌](#)

殄，旂鼓弥年，矢石不息。朝规懦弱，莫能救御，故南阳覆垒，新野颓隍，民户垦田，皆为狄保。虽分遣将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涡阳之败。征赋内尽，民命外殫，比屋骚然，不聊生矣。夫休否之数，诚有天机，得失之迹，各归人事。岂不由将率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让？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第1000—1001页。

[4].《魏书》卷六五《邢峦传》，第1440—1441页。邢峦的上表认为蜀地有五“可图”，未提及孝文帝夺得汉中。据《资治通鉴》，邢峦于天监四年（505）克汉中，此表也系于此年。

[5].《南史》卷五五《康绚传》，第1374—1375页。《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武帝天监十五年：“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6].《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第462页。

[7].据《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武帝太清元年（547），侯景被围于颍川，求救西魏后，西魏荆州刺史以荆州步骑万余向阳翟，宇文泰遣李弼、赵贵将兵一万赴颍川，于是东魏军引兵还邺。之后，“侯景欲因会执弼与贵，夺其军；贵疑之，不往……弼引兵还长安”。

[8].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六〇梁武帝太清元年（547）：“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统，光配彼天，唯彼吴、越，独阻声教。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命，遂解繁南冠，喻以好睦。虽嘉谋长算，爰自我始，罢战息民，彼获其利。侯景竖子，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俄而易虑，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辞卑礼，进孰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连结奸恶，断绝邻好，征兵保境，纵盗侵国。……曲直既殊，强弱不等，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今见南风不竞，天亡有征，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推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计其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陈，曾习军旅，岂同剽轻之师，不比危脆之众。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余，终恐尾大于身，踵粗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衅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彼梁主者，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射雀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骏骑追风，精甲辉日，四七并列，百万为群，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当使钟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骠骑之号。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9].此时，丰城侯泰为谯州刺史，侯景声趋合肥，实袭谯州。陷谯城后，侯景攻历阳太守庄铁，铁以城降。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

[10].《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围建康，朱异遗书侯景，为陈祸福，侯景报书，并布告城中士民。

[11].《资治通鉴》卷一六三简文帝大宝元年（550）。

第六节 陈的兴亡

起初，王僧辩、陈霸先二人在湓口立誓讨伐侯景时，全军的主帅是王僧辩。据《南史·王僧辩传》，随他而来的军队，在肆意掠夺方面甚至胜过侯景军，而他不能管束，江南人反而念慕侯景。又，他既与诸将约立元帝子萧方智，却不堪北齐的压力，拥立了后者所要求的萧渊明，于是招致陈霸先的激愤而被杀。从这种书写方式来看，王僧辩的垮台有充分的理由，但王鸣盛为王僧辩作了辩护。其大意是：当时湖北地区既为西魏所夺，建康危殆。梁此前派往北齐的萧渊明之下，有著名文士徐陵。徐陵在北齐听到侯景之叛，谋划倚赖北齐有力者讨平侯景，未果。其后又听到西魏陷江陵，灭了元帝，他感到对抗西魏必须借助北齐之力，于是与北齐约立萧渊明，且作为两国亲和的标志，使北齐答应将其侵占的淮南之地归还梁国。以此为条件，徐陵劝王僧辩拥立萧渊明。王僧辩既与诸将约立萧方智，故一度拒绝了徐陵的要求。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西魏已占有长江中上游地区，若再忤逆北齐，则很难维持江南的势力。有鉴于此，王僧辩才拥立萧渊明，同时立萧方智为皇太子，以调停众议。因此，他的做法完全忠于梁室。然而，陈霸先本是王僧辩的副将，应听从王僧辩的命令，却突然袭杀王僧辩，这完全是出于一己之野心，绝非忠于梁室。故而他不久就篡夺梁室而即帝位。尽管禅让文实出徐陵之手，但贬损王僧辩的言辞充斥其中。若以梁室为中心来论王僧辩忠诚与否，则诚如王氏所言。但这也不能抹杀《南史》关于王僧辩军在建康风纪弛废的记事。大乱之后，循规蹈矩的官僚的善后之策往往为新锐英雄的行动所压倒，这大概是难逃的运数。

陈霸先出生在吴兴长城（浙江长兴东），是纯粹的江南人。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中，北来贵族历来居于主位，江南人常处其下。尤其陈氏的家门在江南人中也不高。陈霸先成为一名军人，在广东地区以军功崭露头角。侯景之乱爆发，他与党徒都离开广东，指建康而北

上；这时，时常提携他的萧勃极力晓谕他此行的无谋，阻止他北上，但他没有听从。据《南史》本纪，陈霸先述其决心：“君辱臣死，谁敢爱命。”他勇于义的冒险气质大概吸引了他的部下。他临战的勇猛也引人注目。陈霸先拥立敬帝萧方智，握有建康实权，已如前述。

当陈霸先袭杀王僧辩时，建康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四川至湖北江陵一带已为西魏占有，这不用多说。如今拒绝北齐的要求，断绝了与它的亲和关系，又袭杀了王僧辩，使得建康对岸江北之地的旧梁诸将借北齐之援，进逼建康；又，在建康腹地三吴平原的吴兴，王僧辩部下骁将杜龢正欲进击建康。陈霸先必须首先谋求腹心的安全，于是他亲自出马讨击杜龢，勉强将其平定。北齐主高洋（显祖）又大举南下，十万之兵在历阳西南的栅口牵船下江，直接在石头登陆。陈霸先得知此报，急忙从吴兴北归，[\[1\]](#)在建康北郊幕府山下大战北齐军。最终陈军大胜，陈霸先的地位因之初步稳定。其后，他的势力逐步在江西以及广东地区确立，永定元年（557）遂受敬帝之让，建立陈国。

历来，每当南朝革命换代之时，当时的名望家必声援新王室，以增加它的声誉。但陈的革命没有这种现象，不仅如此，若通览《陈书》列传，我们会发现，其中除了出使北齐的徐陵一人外，多是武将出身的人物。事实上在侯景之乱中，南朝第一名族王氏一族似乎完全消亡，其他名族大多窜遁他乡；可以推想，建康名族的衰亡使王朝革命变得极其容易了。且此时西魏也被宇文氏所夺，北周代立，在国际关系上形成了北周、北齐、陈三国的对立；又，陈在内政上已出现名族的衰亡，因而可以说，南北朝的历史已失去它的特色，它不久将作为隋唐统一期的序幕，处在大势转折的命运中。

陈国新立。这时，今湖北省内的势力关系复杂。北周势力自汉水上游延及江陵地区，已如前述；其东南以郢州（湖北武昌）为中心，有王僧辩部下一一骁将王琳。他对陈霸先有复仇之心，于是以陈霸先篡夺梁室的名义，大举东征。当时，北齐浮水船于安徽中部的巢湖，旗帜鲜明地声援王琳，并互相联络，进逼建康。这时陈武帝霸先已

死，文帝陈蒨在位，他在安徽芜湖击败了王琳军。王琳逃往北齐，郢州于是归于陈的统治，北齐的南进计划也因之受挫。

陈取得郢州后，势力直接与北周接境。王琳东征时，北周乘机出兵，欲取郢州，但孙瑒将其击退。又，湖南地区也想借北周之援反陈，但也逐步被讨平。其后，经过若干争斗，陈与北周之间达成和约，陈确认四川全域及汉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北周势力范围。与北周和亲使陈对北齐挺直腰杆，此后北齐对陈反而处于守势。

陈与北周和亲，在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北齐高演（孝昭帝）在位，他在石鳖（江苏宝应）大规模屯田，固守淮南以备陈。就当时的一般形势而论，三国之中，兵力、财力最强的是北齐，且北齐主高演也被视为优秀统治者，其志在于先稳固对陈的防御，其间讨灭北周。《北史》评论高演道“自朝及野，群心属望”，但他不幸早死，其后三国间相互没有主动讨击他国的计划，天下暂处安稳状态。其间，陈值文帝之治，后经废帝陈伯宗，至于宣帝陈顼的治世。

史载陈文帝是个特别细心临政的人。例如：“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2\]](#)他用心过细，以致有害健康而早死。至宣帝时，陈国内部秩序逐步整顿，但当时在湖南长沙的湘州刺史华皎借北周之力对抗陈朝。宣帝立即以吴明彻为将，灭华皎，击败当时向陈之郢州进发的北周军；凭其余威，太建二年（570），陈又进攻北周在湖北的根据地江陵城。此战虽然没有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军已转为攻势了。

曾号称三国之中最为富强的北齐，此时后主高纬在位，内部已显示出瓦解的征兆；故而刚在湖南立功的陈将吴明彻请求乘机果断北伐。对此，陈内部有种种不同意见，宣帝最终裁可，太建五年

（573），以吴明彻为将的陈军渡过长江北伐。当时江北全境都在北齐势力下，以寿阳为中心，东边秦州（江苏六合）、西边历阳都屯有重兵。陈军先向秦州进击，北齐防御于石梁（安徽天长西北）。北齐的

这支军队，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者排在前列，又配之以苍头、犀角、大力等各队，皆以骁勇闻名。尤其中亚胡人所指挥的一军，[\[3\]](#)善射，陈军极惮惧。然而，吴明彻麾下的勇将萧摩诃投掷铍，击倒胡人，又斩大力队中数十人，于是北齐军全线溃败。北齐大惊，起用曾自梁来降的王琳，使之防守寿阳城。大概是考虑到他在淮南有人望，起用他可抑制陈军。王琳确实有声望，足以获得部下信赖，但北齐的对策甚为疏慢，他完全孤立于寿阳城，于是被吴明彻攻擒。《通鉴》有趣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对于身为俘虏的王琳，部下皆为之请命，吴明彻恐生变，斩王琳。其时恸哭之声如雷，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流涕。然而，北齐主高纬听到此报，毫无憾意，近侍之臣认为淮南原是南朝所有，被取也不足惜，高纬于是摆开酒宴，酣饮鼓舞。陈取寿阳，吴明彻自寿阳凯旋时，宣帝对他予以异常的优待。

陈北伐的前一年即陈太建四年（572），北周明君宇文邕诛杀宰相宇文护，独揽朝政，是为北周武帝。他即位以来，锐意采用富国强兵之策，静候讨击北齐之机。北周名将韦孝宽上表，建议兴兵讨北齐，其中说道，力量最弱的陈夺取了以土地富有而闻名的淮南，而北齐不能将其夺回，则其衰弱是显而易见的。陈太建七年（575），北周武帝终于决定东伐，至太建九年（577）正月，完全讨灭北齐。

北周灭北齐后，天下统一的机运已然成熟。此前，陈利用周齐交战之机，欲进攻徐州地区，吴明彻作为将领，一时势力大振。但北周的救兵赶到后，陈军大败，吴明彻被生擒。陈得此报，大惊，布重兵于边境，以备北周。适逢北周武帝死，北方的南进暂时表现出中止的态势。

北周武帝去世后，外戚杨坚之势渐强。陈太建十二年（580）末，杨坚封隋王，第二年受北周之禅，建立了隋朝。时为581年，是为隋文帝。文帝即位之初即定立讨平江南之策，东以广陵、西以庐江（合肥）为策源地，使勇将贺若弼、韩擒虎二人分别屯驻其地。太建十四年（582），陈宣帝死，太子陈叔宝继位。据《南史》，太建末年，隋

虽计划大举伐陈，但适逢宣帝之死，杨坚不仅撤军，而且派特使吊丧。他在此时寄送的文书之末，用了“杨坚顿首”之语，充分表现了对邻邦的交谊。然而，陈的返书中有“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之句。见其文辞无礼，隋之朝臣物议四起，广陵将贺若弼等请求立即渡江攻陈。[\[4\]](#)但文帝于此际犹隐忍自重，表面上两国仍然维持着和平关系。但天下輿情已感受到统一的气运，在这种时局下，文帝的行动并不粗疏。例如，他新开了自淮水下游连通扬州广陵的运河，物资得以运输自由；且为使陈财力枯竭，他在前线弄了种种术谋。相比北地，南土的农作物收获更早。隋军伺其农忙，表现出大举南袭的气势。南人惊惧，立即配大军于长江沿岸。此举年年重复，在重要的农忙期，南人人心浮动不安。又，南方的屋室多用茅竹建造，家里没有北方那样的地窖，少有储藏谷物的习惯。隋遣间谍，于民屋放火。这也是陈最受苦之处。陈被隋前线之军的小计如此耍弄，据此可以想象其内部的不统一。确实，在后主即位后，即使是陈人，也似了解它必亡的命运。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散见于史乘，例如自建康至荆州之间，长江之水红如血；或者一夜突然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青黄杂色，隆隆若雷声，诸如此类。尽管险象迭现，后主陈叔宝却只管追求享乐的生活。《通鉴》载曰：

上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皆以沈、檀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

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有宠，迭游其上。以官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士十余人，侍上游宴后

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以此为常。

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为龚贵嫔侍儿，上见而悦之，得幸，生太子深。贵妃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性敏慧，有神彩，进止详华，每瞻视眄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颜色，引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贵妃亦多出己见，左右圣裁，宫中之权遂移于贵妃之党。一大臣见之，慨陈必亡，上表论之，赐死。[\[5\]](#)

陈祯明二年（588），隋终于下诏伐陈。诏书主要描述了后主昏虐之状，隋散布三十万纸于江南，以谕民心。于是隋以文帝子晋王杨广统辖五十万大军，从长江上、下游两方面攻击陈。陈后主与其狎客们似皆置若罔闻，史乘未记载他曾讲求过防御之手段。次年正月，建康城大雾。乘此机会，在广陵的隋将贺若弼先渡江，同时在庐江的韩擒虎也自采石登陆。此报至陈，后主立即下诏对建康严加警备。其中有“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之句，辞气虽壮，但即便是陈的宿卫武将也没有战意。例如总帅任忠，起初劝后主闭守建康，以待援军之来，而他的意见不被采纳，不得已奉后主之命出城进击，一战而为韩擒虎所败，力尽降隋，其后已无人再与隋交战。[\[6\]](#) 隋军遂逼城下，宫中诸官早已逃亡，独袁宪在殿中。后主对他说道：“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7\]](#) 说完这话，后主欲逃往某处。袁宪谏道：此时与其逃匿，不如像梁武见侯景那样端坐正殿；北人绝不会害及陛下之身。但后主最终在景阳殿后蔽身井中。闯入宫中的隋军未搜见后主。不久，军人来到井侧，向内呼唤而未有应答。

投石后，听到叫声。下绳引之，却特别重。原来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于是，建康陷没，隋又平定散在各州的陈的军将。不久，隋军将后主与陈之一族、高官，以及大量战利品载于车中，北上回朝。据说这一行之长，五百里连续不断。陈之一族为隋文帝所爱护，后主也得全其天年。而建康城内居民及大量财货，全都被带往北方，建筑物悉遭破坏。建康长期以来作为南朝首都，是南朝的文化中心，由此一朝荒废。以武力为背景的北方式统一政治就此开始了。

注 释

[1]. 据《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十月，杜龁据吴兴拒陈霸先，义兴太守韦载以郡应之。陈霸先使周文育攻义兴，军不利，陈霸先亲自东讨。但以州入北齐的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趁陈霸先东讨，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将精兵五千袭建康，并据石头城。陈霸先劝降了韦载后，卷甲还建康。第二年（太平元年）一月，陈蒨、周文育合军攻杀杜龁。三月，北齐遣仪同三司萧轨等与任约、徐嗣徽合兵十万，出栅口向梁山，被逆击后，退保芜湖。

[2]. 《陈书》卷三《世祖纪》，中华书局，1972年，第61页。

[3]. 此“中亚胡人所指挥的一军”，应指《陈书》卷三一《萧摩诃传》中的“西域胡”，根据该传前后文，应指一人。

[4]. 《南史》卷十《陈本纪下》。

[5]. 下划线表示的语句是冈崎氏概括性或解释性的语句，以区别于原书引文。后文同。《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584）。“一大臣”概指傅縡，他被陷狱中，上书陈述时弊，并说“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遂赐死狱中。见同卷至德三年。

[6]. 后主召萧摩诃以下于内殿议军事，任忠建议固守，但后主仍命萧摩诃、任忠等出战，被贺若弼击败。任忠回到台城，后主又使他募人出战，这回他欺骗后主说奉后主逃亡上游，却出降韩擒虎。参见《陈书》卷三一萧摩诃及任忠传。

[7].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第四章 南北朝时代（北朝篇）

第一节 鲜卑拓跋部的迁移

自东汉起，鲜卑族的活动始见于中国史书，其中慕容部先入中原建立燕国的始末，已详述于第二章。相比于慕容部，在中国史上扮演了更重要角色的，实是拓跋部。此部族的历史详见《魏书》及《北史》，但二书后世所加文饰较多，以下有所取舍，以述拓跋部之梗概。

《魏书》《北史》都称拓跋部本无记录，于是据口耳相传而书其历史，但哪些是口传的部分并不清楚。拓跋部国号“魏”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他在当时追谥了先祖二十八帝。其帝王庙号、名讳及谱系今皆载于史书，其中有二字名者，有一字名者。王鸣盛认为一字名者是虚构的存在，二字名者才包含史实。今据此说。首先，早期有位宣帝推寅。关于他的记事说道：

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

接着，有位一字名的献帝邻。其记事曰：

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

献帝年已老，不足以实行神的启示，因而使其子圣武帝诘汾去实行。其记事曰：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1\]](#)

然而《北史》载：迁移之策出于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推寅即专研之义。据此，则推寅为号，大概是专研之人即贤人之类的意思。在本纪中，它分作宣帝推寅、献帝邻二人，且其间隔了几代。这应视为本纪之误。实际上，分别系于宣、献二帝的迁移故事无

疑本是同一个故事。若如此，则这一迁移传说果真是拓跋部族所固有的，还是广泛流传于鲜卑族的，难以断言。

据称诘汾彷徨于深山大泽，终于出至匈奴故地。关于他，有如下传说：

尝田于山泽，歎见輜辂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自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周时复会于此，言终而别。及期，帝至先田处，果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2\]](#)

此天女与诘汾所生男即神元皇帝力微，从此拓跋部开始出现于中国史书，且通常拓跋部的纪年也始于此人。大概诘汾的传说是拓跋部有力酋长力微的本生谭，不过，其内容只是广泛流传于北方的民族传说的一个变形而已。

关于拓跋部酋长力微，《魏书》《北史》皆载“元年岁在庚子”。这表明拓跋部纪年之始。钱大昕定庚子年为魏文帝受汉禅的黄初元年（220）。大概拓跋氏以“魏”为国号，于是将纪年之始系于三国曹魏受命之年。“元年岁在庚子”本是后世的追记。

据《晋书·卫瓘传》，晋武帝时卫瓘为幽州刺史，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共为边害；卫瓘离间二虏，使相争，于是务桓降，力微忧死。参照《北史》本纪，则《晋书》的务桓即《北史》的乌桓王库贤，库贤受卫瓘之货，害力微。根据这些记载，我们仅可清楚知道：在北京的东方[\[3\]](#)有拓跋部酋长力微，因晋的压迫遂至于死。

力微死后，据《北史》，拓跋部大致分为三部分。力微之子禄官据上谷之北、濡源之西，可能是今河北北边独石口外的东部地区。禄官之侄猗”（）据参合陂之北（山西大同东北阳高县）。猗”之弟猗卢据盛乐故城（内蒙古托克托西北）。这时，西晋“八王之乱”正酣，匈奴刘渊公然起而纠合胡族，试图成为中原的帝王。晋司马腾在山西太原，深为匈奴所苦，于是向在参合陂的拓跋猗”求援。此前，卫瓘部将卫操率其一族十数人往依拓跋部，游说猗”、猗卢招抚汉人，

汉人托身拓跋部者逐渐增多；这些人开始劝猗“匡助晋室，抗击匈奴。因此当司马腾求救时，猗”立即响应，进入晋阳城。此事详见《魏书·卫操传》所载大邗城南之碑（大邗城似谓盛乐）。猗”因功被晋赐予大单于金印。其后，猗”死，猗卢统一三部。这时，匈奴刘渊进攻晋阳，猗卢帮助受困的晋名将刘琨，作为补偿，猗卢向刘琨要求今山西内外长城中间的土地，即大同、朔州等地区。刘琨答应了，猗卢于是迁其部族十万家于其中，并修筑大同，定为南都，盛乐为北都，以二部大人统领。对外，猗卢又击败匈奴，并被当时仅残存于长安的晋室封为代王。这样，猗卢采用汉文明，颇立法度节制部下，因而极受汉族信赖；相反，部人却似有怨恨，内乱于是爆发。

猗卢为其子六修所杀。这一内乱似乎相当严重，据《卫操传》，旧拓跋部人与新附的汉族、乌桓人猜嫌很深，互相诛戮；新附之民不能安生，在卫操子卫雄的率领下撤出大同者数万家，他们都归属晋将刘琨。刘琨得其势力，与匈奴战，反致败亡之祸。于是拓跋部与匈奴势力相接，并为后赵石勒的勇将石虎所攻，拓跋部防之于雁门，大败，结果拓跋部似不得已撤出了大同地区。当时，拓跋部酋长纥那徙于部族旧根据地——张家口边的大宁，不久遣使于石勒，似完全附属后赵。

猗卢一度在大同统一部族，稍立法制，开始缔造统一国家，但死于内乱，其部族也各归旧地。其后，代表其部的酋长，或在大宁，或在东木根山（《读史方輿纪要》云大同府北），或在盛乐。其间，在中原地区，后赵灭亡，前燕慕容氏得势，拓跋部又常送质于前燕以表服从之意。拓跋什翼犍（昭成帝）曾在慕容燕做人质，娶慕容之女，后为国人所迎，据于盛乐，成为部族的代表者。他曾讨击据于匈奴故地鄂尔浑河上游的高车族，受到部人相当的信赖。这时前秦苻坚在中原的势力剧增，且灭慕容燕，不久将锋镝指向与燕关系深厚的什翼犍。什翼犍抵抗前秦军，大败，率国人逃遁阴山之北。这时高车杂部一齐反叛，攻击拓跋部，恰逢苻坚军撤退，什翼犍乘机回到盛乐根据

地。此时，拓跋部命悬一线，因汉人燕凤居中巧妙调停，苻坚才决意保存拓跋部。不过，苻坚始终采取抑制拓跋部势力的方针，以被视为匈奴部类的酋长铁弗刘卫辰为西部大人，使之统率黄河在沙漠中南折之地以西诸部族；以刘库仁为东部大人，使之居代（即大同），统率黄河以东山西、河北北边诸部族。刘库仁，《资治通鉴》以之为匈奴族，恐怕有误，还是应当将其视为鲜卑族属独孤部的酋长。铁弗部常与拓跋部相争，反之，独孤部则与拓跋部友好。又，苻坚抚育什翼犍长子窟咄于身边，施恩于他，打算其后推立他为酋长。然而，苻坚征伐江南之东晋败北后，国内的统一崩溃，势力已经达不到山西北边。于是东部大人刘库仁与拓跋部人相谋，推立拓跋珪为部族代表。拓跋部取得势力，正是始于此人。

注 释

[\[1\]. 以上引文见《北史》卷一《魏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2页。宣帝推寅与献帝邻之间还有元帝俟、和帝肆、定帝机、僖帝盖、威皇帝佺，此五帝只有世系，无详细记载。](#)

[\[2\]. 《北史》卷一《魏本纪一》，第2页。](#)

[\[3\]. 《晋书》卷三六《卫瓘传》载“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北史》卷一《魏本纪一》载“（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拓跋部或在北京西方。](#)

第二节 北魏的兴隆

据说，拓跋珪为以刘库仁为主的鲜卑部人所迎，据于大同，被推举为诸部属之王，始立国号为魏，定年号为登国。时为386年。不过，立国号之记载果是事实与否，值得怀疑。然而，这一年拓跋珪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原委如下：

前秦苻坚南征失败后，势力完全瓦解，一时被苻坚灭亡而蛰伏其下的鲜卑慕容部复活。慕容垂在河北西部中山独立，建立了后燕；又，慕容永在山西长子建立了西燕。慕容永为苻坚所抚养，他诱导同在苻坚之下的拓跋什翼犍长子窟咄，欲推立窟咄，以张其势力于山西北方。适逢刘库仁（他最支持北魏拓跋珪）之子刘显违背亡父遗志，借慕容永之援，以抗拓跋珪。为形势所逼，拓跋珪遂逃于阴山北，借此地鲜卑诸族之力以抗敌；同时向与慕容永对立的慕容垂求援。据说，此时很多归附北魏的诸部族酋长已舍弃北魏，越黄河而寻求西面刘卫辰的保护。北魏面临生死关头。拓跋珪自阴山北大约今日内蒙古西部茂明安旗出发，沿阴山北麓向东潜行，出至牛川之地。据《魏书》本纪，牛川在于延水之南，它无疑位于今日桑干河支流东洋河（昭哈河）流域，与山西阳高县之北的参合陂一样，都是部族屡次会合的地点。拓跋珪自牛川南下，至于高柳（阳高县），在这里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于是破窟咄，迫使他逃亡于刘卫辰，其后窟咄被杀。第二年，拓跋珪击败刘显，危急情状暂时好转。此后，拓跋珪主要忙于平定东西内蒙古诸部。他东幸宁川、赤城、濡源，遂围松漠，讨库莫奚，渡弱落水。宁川，杨守敬《水经注图》以之为流经今河北北边张家口市万全区的东洋河的一支流。赤城，在河北独石口南。濡源，即滦河上游上都河之源。松漠应在多伦诺尔、巴林之间，弱落是饶乐即辽河的支流老哈河。又，向西，拓跋珪讨击大约在内蒙古西部乌拉特旗地区的解如部、叱突邻部等，并征高车族，达于鹿浑海。据丁谦之说，鹿浑海是科布多西南的博洛泉托海（布伦托海）。拓跋珪

或许还破蠕蠕于大碛之南、床山之下。张穆《蒙古游牧记》将此山视为乌拉特旗西北一百八十里的席勒山。然而，随着势力逐渐向东西内蒙古延伸，北魏于是与黄河以西陕甘边外占有势力的匈奴刘卫辰大起冲突。

刘卫辰的根据地在悦跋城，在今日陕西北部榆林塞外的河套之地。刘卫辰据之统辖着黄河与阴山、阳山之间的各胡族；随着北魏势力向西北延伸，冲突遂起。当时，在兵力上，刘卫辰似还占优。结果却是北魏军大胜，拓跋珪渡黄河，横跨河套，直捣悦跋城，灭了卫辰。不过胜利之后不久，北魏又与强大的慕容垂军作战了。

起初，拓跋珪与慕容垂同盟以抗慕容永；其后，北魏势力向东西内蒙古延伸的同时，在慕容垂势力范围的河北北部，双方已上演了小冲突。刘卫辰灭亡时，其子赫连勃勃逃出悦跋城，投身于今日宁夏地区的匈奴部属之中，他纠合这些势力反抗北魏；这时，慕容垂讨平慕容永，取得山西，欲乘势讨灭北魏。

395年，慕容垂遣第四子慕容宝自山西直逼魏。当时，魏不用邀击之策，却纠集全部部落、畜产，退于河套之地。慕容宝追击，迂回黄河之北，欲渡河进入河套，盛理战具；但内部不够统一，多有主张退军者，慕容宝遂同意其要求。然而当时燕军轻敌，未充分备战，因而为魏军所袭，大败于参合陂。慕容垂听到此报大怒，自率大军，以图复仇。他间道直捣平城（大同），袭杀魏守将；拓跋珪非常恐惧，再次遁于阴山之北。幸运的是，慕容垂年老罹病，死于军中，燕军内部的不统一立即暴露，各方面都被魏军击破，攻守易势。此后魏军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进攻中国内地。同时，仕魏的汉人许谦等上书，劝拓跋珪就天子位。据说魏建天子旌旗，始于此时。次年，[\[1\]](#) 为讨击慕容垂的后继者——在中山的慕容宝，拓跋珪大举南下，一鼓作气拔取太原，再兵分两路：一军直接南下河北平原，另一军进攻蓟城（即北京）。对于南下的主力军，慕容宝防守于巨鹿（河北晋州）柏肆坞，失利，慕容宝死于乱军之中。[\[2\]](#) 于是拓跋珪进入中山，巡

邺，置行台于此，在初步完成战后处置后回到平城。这时，仕于后燕的汉族名流张袞、崔宏等辅佐拓跋珪参划大政，开始经营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重新定国号为魏。北魏在名与实上君临中原，实始于此。时为天兴元年（398）。其后，北魏忙于都城的经营，且对于内蒙古东部，拓跋珪年年巡狩，绥抚该地部帅，西北的尉迟部等又归属于魏，北魏的势力似逐渐固定下来。

天赐六年（409），拓跋珪去世，庙号为太祖，谥道武帝。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继后。明元帝新修筑了大规模的长城，大约东起河北边外的独石口北，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这样，北魏作为汉族的统治者，对蒙古高原的胡族设定了清晰的界线。这时，北部中国总体形势到底如何呢？

北部中国诸省之中，山西、河北大部已归服北魏。北魏周边，在东北，河北北边和龙城（朝阳市）中尚有后燕的势力，其后汉人冯跋夺之，建立了北燕。在东南，慕容垂的同族慕容德在山东广固建立了南燕。[\[3\]](#) 又，在西方，陕西渭水流域有后秦姚萇子姚兴，赫连勃勃则雄视其北。赫连勃勃曾受北魏进攻，当时主要靠姚兴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他的势力；其后，他却反叛姚兴，屡进寇陕西内部，逐渐侵犯后秦北部。不仅如此，赫连勃勃还向东北伸张势力，夺回被北魏攻取的祖先根据地悦跋城，并在此地修筑了统万城。原本扰乱北部中国的五胡之中，匈奴与羯被视为“最无人性”者，而赫连勃勃尤其发挥了这一特长。《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详细记录了修筑统万城的情形：叱干阿利担当工事，蒸土筑城，若土软，锥入一寸，则立杀此工人，被杀工人即混入土中，用以筑城。又造各种武器，其实物例如矢，若射甲不入，则杀弓人，若射穿甲，则杀铠匠。又造百炼钢刀，铭之，称“大夏龙雀”。[\[4\]](#) 大夏即赫连勃勃所立国号。尤其统万城以坚固著称，《魏书》记载如下：

（赫连勃勃）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

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5\]](#)

赫连氏确实是北魏的劲敌。然而改变北部中国形势的一起事件在南方突然发生了。宋高祖刘裕毅然北伐，一气灭了据于山东广固的南燕，又进入陕西，生擒后秦姚兴子姚泓，灭后秦。当时北魏太宗及赫连勃勃都避免与南军正面交锋；不过，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镇将间不久发生内讧，赫连勃勃于是攻取长安，北魏进至洛阳。这样，北部中国出现了北魏与夏两大势力的对立。其间，太宗拓跋嗣卒，世祖拓跋焘立。他就是有名的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时，南朝正是宋文帝元嘉的太平时代。北魏与南朝的交涉已如前章所述。但站在北魏的立场上看，拓跋焘谋主崔浩的方针在于努力修好南朝，而专以统一北部中国为北魏的使命。战争的首个对象是赫连氏。当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夏王位；但内部发生叛乱，陕西一带因此非常混乱。世祖乘机亲自攻打统万城，并别遣部将袭击长安。世祖的先锋先在统万城附近获得了胜利，于是世祖率兵三万一气迫抵统万城下。他采用一种奇袭的战法，舍用攻城器具及步军，专以突骑进攻，部下军将多以之为忧。世祖诱敌城外，决战郊野，此计非常成功，赫连昌大败，逃于渭水上游上邽（甘肃天水）。世祖追击，擒灭赫连昌。魏攻取统万城，时在始光四年（427）。

赫连昌被擒后，其弟赫连定一度继续反抗魏，最终为吐谷浑酋长慕璜所杀。据称，吐谷浑本与鲜卑慕容部从同一系统分化而来。通常认为，前者的祖先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庶兄，率部落七百余户自辽河上游越过兴安岭，沿阴山山脉向西再向西一直行进，最终定居甘肃省西南临夏（当时称作枹罕）之地；他们在黄河支流洮水流域过着逐水草、迁庐帐，以肉酪为粮的生活，西北诸族称之为阿柴虏。在酋长慕璜时，魏的势力逐渐加于甘肃北部，慕璜遂与之交通，擒获在甘肃东部平凉（甘肃华亭）的赫连定，献之于魏。不过，愤于魏没有给予与他功劳相称的待遇，慕璜及其弟慕利延常对魏采取反抗态度。原本洮水

流域与西方青海相连，境内有广袤的黄沙，是氐羌族的住地。据说这些部族质性平懦，吐谷浑统治着这些部族，若为强力外国所攻，则立即越过黄沙西遁，因而征讨吐谷浑并非易事。慕利延一度为太武帝所攻，但他逃至西北天山南路的于阗，避开了魏军的追击；其后重返故土，或向南朝或向北朝通款，得以长期保持他的地位。

魏灭亡赫连氏后，将兵锋指向东北，下一步要讨灭以和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跋弟冯弘在位，仍然统治着辽河东西，并与高句丽保持密切关系。魏自太宗时就已征讨过北燕，如今以世祖之势力逐渐强压此国，因此冯弘部下多有人劝他于此际附属魏，以保其位。尽管如此，冯弘还是不从，于是为魏所迫，亡命高句丽。当时高句丽首都平壤发生了奇异的现象：“先是，其国有狼夜绕城群嗥，如是终岁；又有鼠集于城西，阗满数里，西行至水，则在前者衔马矢，迭相啮尾而渡。”[\[6\]](#) 总之，冯弘虽逃至高句丽，但不久高句丽应魏的要求，将他杀死。和龙陷落于太延二年（436）。

和龙陷落后，北部中国残存的国家仅剩据于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如前章所述，河西（即甘肃北部）的中心凉州姑臧在吕氏亡后，迭为秃发氏、乞伏氏所据，沮渠蒙逊兼并之，建立了北凉国。关于姑臧，前秦苻坚曾从一商人那里听闻它的富强，于是欲占有其地，以至派出猛将吕光，由此可见姑臧的富强。不过北魏未必了解它的情况。当和龙陷落时，北凉蒙逊已死，其子牧犍在位；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北魏朝廷之中存在一些议论。据《魏书·崔浩传》，当时居尚书之位的古弼、李顺以及武将奚斤等都认为不应讨伐沮渠。理由是：自平城进击姑臧，必须渡过温圉水（无定河）——该河流经赫连氏曾据守的统万城边，注入黄河——而西进，道路艰险。加之姑臧南有高山——天梯山，冬有积雪丈余，春夏之时，雪融成川，住民引以灌溉。若闻大军到，他们必定阻截水渠。如此，全军立即渴死。又，去姑臧百里许，土地枯干，无一草木，非大军驻扎之地。[\[7\]](#) 然而崔浩据《汉书》的记事反驳了这种意见。他说道，《汉书》称“凉州之畜，为天下

饶”，又汉在此地置郡县，若无水草，如何立郡县？且在汉代，此地灌溉数百万顷田地，仅靠雪融之水，不足以浇灌如此广大的田地，必定有洋洋大河无疑。世祖听从崔浩，讨伐沮渠氏。北凉主牧犍降，其一族逃于天山北路的高昌，后为蠕蠕所灭。世祖取姑臧之后，送信于自己的太子说道：“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8\]](#) 总之，北魏取得姑臧，完全统一了北部中国。五胡“扰乱”的余波至此结束，时为太延五年（439）。

如上所述，世祖太武帝完成了北部中国的统一。到世祖为止，魏对北狄蒙古高原所采取的措施如何？以下对此作一概述，以结束本节。

如第二章所述，东汉时鲜卑族曾一度取得匈奴故地鄂尔浑、土拉河流域；又，前述拓跋部的传说对此事也有明示。鲜卑在何种程度上领有其地并不清楚，但至少我们知道，在拓跋部始见于中国历史时，蒙古高原的中心鄂尔浑、土拉河流域是被高车族占有的。高车被认为是“丁零”“狄历”“敕勒”等文字所示民族中的一部族；据称，因它使用的车轮尤其高大，辐数至多，故被命名为高车。此部族流传着狼的传说。据《魏书》，原本匈奴某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容甚美，部人皆以为是神。单于不欲嫁此二女于人，而欲与之上天，遂在北方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祈祷天之使者来迎之。经三年，其母欲接回二女，单于不许。其后一年，一匹老狼守台嗥呼，遂于台下掘穴不走。妹妹见此，认为此狼恐是神物，将下台赴之。姐姐劝止，妹妹却不听，遂为狼妻而产子，其后子孙繁衍，高车部由此而来。[\[9\]](#)

（此后突厥以及建立元朝的蒙古族都有狼的传说，高车的传说盖是其古老者。）被视为与这一部族同种的丁零，其名见于东汉，在匈奴西北。三国魏时，出现“北丁令”“西丁令”之名。要之，我们可将其视作广泛分布于阿尔泰山北方，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东南部至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民族。唐杜佑《通典》将高车归为北狄，丁零归为西戎。这应该是沿用了《魏书》将高车族归为北狄

的分类法，事实上，阿尔泰山北方的民族或分为西戎，或分为北狄，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就地势而论，自阿尔泰山北麓发源的水流，一为色楞格河，注入贝加尔湖，一为额尔齐斯河，又为叶尼塞河，向北流经西伯利亚，因而可视之为北方；将其与注入咸海的天山北路诸水之系统区分开来，似较妥当。总之，遍布阿尔泰山北方的高车族不知何时跟随着匈奴、鲜卑的脚步，占据了围绕杭爱山的蒙古高原之中心地。他们屡屡攻击散布在阴山山脉的鲜卑各部族，拓跋部因此常与之交战。拓跋什翼犍为高车族所苦之事，已如前述。太祖道武帝曾前后两次大规模远征高车。第一次如前所述，追击高车族至鹿浑海。第二次远征在天兴二年（399），规模尤其宏大。当时，魏大军悉数取道东北多伦诺尔地区，向西北沿阴山前进，征服沿途之民族，其一队遂越过漠，袭击高车根据地。“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之众筑起广大的鹿苑。[\[10\]](#) 这次远征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其后高车多归附魏，势力渐衰。而代之得势于漠北的是柔然。

柔然（蠕蠕、芮芮），西方学者将其视为见于西方史料记载的阿瓦尔族，但其部属之系统仍不清晰。据《魏书》的说法：起初，拓跋部始祖力微掠得一奴隶，他被穆帝猗卢免除奴隶身份，后亡匿于广漠溪谷，于是收合无赖之徒，始坐大势力。其后，其子车鹿会自称“柔然”。此前，他们名为“郁久闾”或“木骨闾”，“木骨闾”意为“首秃”。[\[11\]](#) 笔者不太清楚首秃（即无发之头）有何种意味，恐是贱称。改称“柔然”，则“柔然”似含有尊贵的意味；不过，据说北魏世祖太武帝认为这一部族无知，其状类于虫，故将其写作“蠕蠕”，以嘲贬之。要之，它的部族系统不正，在胡族中也似受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对于匈奴，石勒所代表的羯族也受轻视，柔然的处境可能相当于羯族。这一部族一般迁徙无常，冬居漠南，夏居漠北，大体服属拓跋部。其后，部族二分，其一居西方，寻求刘卫辰保护，太祖怒而攻之于大磧南床山。太祖部将又追击

其余众，至于涿邪山（蒙古额德伦金山）。北魏与柔然的抗争始于此。然而，这时柔然酋长社崙，远遁于北，依于高车斛律部；[\[12\]](#)其后他侵犯高车，遂徙于弱洛水，始以军法统合部族。弱洛水应是土拉川，大概柔然取代高车，占据了匈奴故地鄂尔浑、土拉河流域。于是，社崙自称豆代可汗。豆代是驾驭开张之意。北魏太祖曾谓崔宏曰：“社崙学中国，立法，置战阵，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13\]](#)由此言可知，至社崙时，柔然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敌手。

北魏世祖太武帝之时，柔然酋长大檀也颇为边患。此前，太祖末年以及太宗一代对柔然采取防御方针，世祖则转而积极征伐柔然，为此北魏进行了前后数次大远征。其中，神䴥二年（429）的远征尤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有传言说南朝宋正欲大举北伐，故对于征伐柔然一事，北魏内部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世祖皆不听，遣大军由白漠（东道，今由呼和浩特北行至乌兰巴托驿路）、黑漠（西道，今由乌拉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驿路。据丁谦说）两道横绝大漠，至栗水（翁金河），大破柔然军。大檀震怖，率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此败之后，柔然部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祖缘栗水西行，至菟园水（丁谦云推河），高车诸部杀大檀部众，前后归附者三十余万。[\[14\]](#)其后柔然寇边之事犹史不绝书，但这一大胜使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告一段落。自此，北魏确立其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寇。

注 释

[\[1\]. 据《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慕容垂死、魏建天子旌旗、拓跋珪大举南下，皆在396年。](#)

[\[2\]. 据《资治通鉴》卷一一〇，397年二月，慕容宝败于柏肆，引还中山。魏军围中山。三月，慕容宝弃中山，逃奔龙城。十月中山才被攻破。慕容宝一度南返，其后再次逃往龙城，但被兰汗杀于龙城外邸，时为398年。](#)

[\[3\]. 慕容德死于405年，后继者慕容超也于410年失国。](#)

[\[4\]. 《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第3205—3206页。](#)

[\[5\].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屈孑子昌传》，第2059页。](#)

[6].《魏书》卷九七《冯文通传》，第2128页。这些异事或许发生在北燕，而非高丽平壤。

[7].《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822—823页。“阻截水渠”，原文作“决此渠口”。

[8].《魏书》卷四下《世祖纪附恭宗纪》，第108页。

[9].《魏书》卷一〇三《高车》。

[10].《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第2308页。

[11].《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12].《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社崙与数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监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袭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崙凶狡有权变，月余，乃释匹候跋，归其诸子，欲聚而歼之。密举兵袭匹候跋，杀匹候跋。子启拔、吴颉等十五人归于太祖。”第2290页。据此，“亡依高车斛律部”的应是匹候跋诸子，非社崙。

[13].《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14].《北史》卷九八《蠕蠕传》。

第三节 北魏的全盛

世祖之后，经高宗拓跋濬（文成帝）、显祖拓跋弘（献文帝）至高祖拓跋宏（孝文帝）的约五十年间，可视为北魏的全盛期。其间，北魏完全维持了世祖所开拓的疆域，同时，又逐渐吸取汉族文明，高祖孝文帝于是迁都洛阳，魏在形式上也完全表明它是汉族的统治者。以下主要就这两点展开论述。

魏世祖统一北部中国，对高车、柔然大加压迫，使其威力向北狄伸张；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北边的防备，似设立了六镇。所谓六镇，即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御夷，[\[1\]](#) 若考之以杨守敬《水经注图》，则它们大体散布在今日内蒙古东部、河北西北部阴山山脉的要所。拓跋氏自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以来，就在此区域占有势力，这里可说是拓跋部的根据地。其中，怀朔、武川两镇似对北魏最为重要。大概拓跋部尚未建都平城以前，呼和浩特以南的盛乐是其最主要的根据地，也是太祖拓跋珪的发祥地。酈道元《水经注》中载有以盛乐为中心的种种宫殿，它们都被认为与太祖有关；且太祖以来，历代天子屡巡幸此地，示威北边。在盛乐西方，正当黄河南折之处，是怀朔镇；又其北方，越过当时所称的白道岭，是武川镇，此两镇相望，形成拱卫盛乐城之势。又，在东方，魏历代天子屡御幸濡源。濡源的精确位置不太清楚，当在上都河之源，独石口东边。以此为中心，魏设置了柔玄、御夷二镇，此二镇与怀朔、武川中间，有抚冥、怀荒二镇，由此大体可以想象魏的北边防线。不过，六镇的设立时间并无明确记录。如前所述，世祖的前一代太宗之时，北魏始在北边修筑长城，因此似可推想，自那时起，这些要害之地开始配置驻屯军。可以看到，世祖初期征伐柔然，降者大多迁于六镇之间，因而大概可以认为当时已经存在六镇了。据说，其后世祖从内地征发十万人夫，费时两年，使其在此地区筑作塞围。这恐怕是六镇外貌整备之始？六镇的设立本是为了防备外敌。防备的逐渐完成，一方面表明北魏由积极攻

击转向消极防备；与此同时，可想到的是，北魏诸帝对北边的巡狩逐渐减少。例如，太祖至世祖诸帝几乎无年不巡狩。每回巡狩必举行盛大的狩猎，诸部酋长也都参加。其中最盛大的，似是世祖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御幸盛乐城北广德殿时的那一回。当然详细的记载未流传于今，但有名的宰相崔浩所写碑文的一节为《水经注》所引用：

肃清帝道，振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2\]](#)

大概北边各酋长都在世祖面前行稽颡礼了吧？然而，世祖死后，高宗、显祖、高祖各代巡狩逐渐变少，反之，对汉族的各种措施则增加了。且在北魏的特长——武力上，北魏不得不借用汉人力量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起来。

今为阐明情况，我们对比一下全盛期汉朝的守备情况：其北边防御的第一线稳固保守了远自甘肃西北部的敦煌、张掖地区（随汉时名称，则为积石、祁连山脉）至黄河流域的贺兰山、阴山山脉一带。此范围大体也在北魏势力范围内。不过，就北魏的防备体系而言，六镇是其中心；与之联络的西方沙碛之地仅限于内蒙古黄河之北延及贺兰山内侧的一线上；自凉州姑臧向西北延伸，则不过设立了若干镇戍而已，防备似颇薄弱。例如，世祖灭沮渠部而夺得姑臧时，宰相崔浩提议：这般远隔之地，仅置镇戍之兵是不能防备的，必须将汉族的豪族和人民迁来，以开拓此地。其意本在于效仿汉家之政策。不过，此议未被采用。但在姑臧以东的薄骨律镇，开垦计划得到了实行。此镇被视为宁夏黄河内侧的灵州，沿黄河往下走，在河套的沙漠中有一称作“沃野”的镇戍地。世祖末期，薄骨律镇守将刁雍引黄河水，筑沟渠，兴良田，又造运船，计划将物资运往沃野镇。而据《水经注》可知，沃野镇也引黄河水灌溉田地。因此这一带显然逐渐有汉族农民进入并从事农业。又，关于六镇的防备，高宗以源贺之策，征发北部中国各地罪犯，使之担当边防。毫无疑问，他们主要配备于六镇之间。

有学者认为，用罪犯担当边防是中国兵士素质恶化的最初源头，但不管怎样，汉人加入了北边的防备是一个事实。其后，北魏征发内地汉人三万，主要配在怀朔、武川两镇。这时，北魏始在此二镇之间筑城，且使新来戍边的兵士在此地从事垦殖。此地实行了所谓的屯田策。高祖对这些因犯罪而从事边备的人屡加特别恩惠。又据高闾的意见，昔日太宗时曾计划的修筑长城之说再次提出，六镇全体都建设了种种防御工事，北边防备逐步完成。通过上文的叙述可知，随着防备的完成，汉人愈加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魏室与汉族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汉族，主要指北部中国的豪族（即权力所有者）。原本拓跋部与北部中国发生重大关系始于太祖灭亡慕容部并夺得中山之时。河北、河南平原在此前“五胡之乱”的时代，各族相继兴亡，故而作为保存自己权力的手段，此地汉人豪族仕于各个胡族政权下。辅佐太祖的崔宏，其祖父仕于石虎，其父仕于慕容部。不过，虽说是出仕，我们却不能认为他们是有统制的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即使是北魏，直至显祖时，官吏都没有俸禄。张白泽上疏的一节曰：

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贵仕，而服勤无报，岂所谓祖袭尧舜，宪章文武者乎？[\[3\]](#)

因此北地豪族以胡人为君主，恐怕是为了保全社会地位。从地方情势来看，因为北地的动乱持续时间非常久，地方秩序完全由豪族维持，胡族为了在地方得势，还是不能无视豪族的力量，大概胡族的酋长与汉人的豪族在利害关系上有着相互依赖的一面。而北地豪族因在长时期的动乱中维持了权力，自然成为社会上层阶级，并通过相互联姻稳固地位。其中，有名的门阀，在河北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在河南有荥阳郑氏，在山西有河东柳氏、太原郭氏，等等。这些强族眼中未必重视胡人君王。例如，太祖向幕下张袞询问河北地区人物时，张袞推荐了范阳卢溥、清河崔逞，但他们起初并未允诺仕魏。太祖攻慕容氏于中山，颇穷于粮食，命崔逞制定征发粮食的方略。崔逞答道：

“取椹可以助粮”，“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这显然是侮慢胡族之语，太祖非常愤怒。其后，晋司马德宗为羌族姚兴所攻，求救于太祖。太祖命崔逞写书信，其中有“贤兄虎步中原”之语，太祖以为不合君臣之体，使其改写，崔逞改“贤兄”为“贵主”。太祖怒而斩之。[\[4\]](#) 此事件一方面显示出豪族对胡王的态度，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表明魏太祖对豪族采取了断然威压的方针。以下从后一方面作一番史实考察。

据传，太祖好读法家的《韩非子》，其子太宗也爱读《韩非子连珠》[\[5\]](#) 《太公兵法》之类，因而魏的刑罚苛酷。曾有魏同族者被杀于某地，魏找到下手之人，诛其五族。赵翼引用此类事例，以证明北魏刑罚之暴。不过，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的长处。据《魏书·刑罚志》，太祖无疑采用了当时已实行的严罚主义，但一般而言，太祖除去了各种酷刑，且对大臣等权力者毫不宽假，“持法不舍”。大概魏在法的公平上有所发挥。敏于拥戴此种独裁王室、顺应新时势的汉族，因之倾向建造一个新的国家。世祖宰相崔浩说道，魏以漠北之淳朴进入中原，变风易俗，化洽四海。崔浩确立了使世祖统一北部中国的大方针，当远征姑臧及征伐柔然等时，甚至胡族出身的大臣都有所踌躇，而崔浩独持强硬之议，以图使世祖在名实上成为中原统一的君主。然而，如此受信赖的崔浩却被世祖诛杀。

《资治通鉴》认为崔浩被诛杀的原因是：（一）崔浩恃才，强行以自己推荐的人物作为地方大吏，受到当时诸大臣非难。（二）崔浩撰魏一代之历史，并听从部下的意见，刊之于石，立石于郊坛。然而书中对魏先祖秉笔直书，魏的部族之人非常愤怒，相与诬陷崔浩于世祖，世祖因之诛杀崔浩。

此时，不仅崔浩被诛杀，清河崔氏一门以及与之有姻戚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并遭族诛之祸。当时，大臣高允也在族诛之列，仅以皇太子之师而得免。世祖曾对高允说，若无太子，又当有数千户不免于死。高氏一门有数千户之死，则与崔氏一起被诛灭

的人数大概非常之多。[\[6\]](#) 一般来说，中国史家以《通鉴》所举的第二个原因作为崔浩败亡的主因，因之还有人说道，若崔浩所撰历史流传至今，则魏先世的事情会更明白。不过，这种想象恐怕不合事实。

《通鉴》列举崔浩过于任用党与之事作为首要原因，堪称卓识。崔浩实为北部中国名族的首领，并欲荐用人物于中央，以当政治改革之任。据《魏书·卢玄传》，“（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崔浩恐怕想建立当时南朝宋以姓族为中心的那种政治制度。不过，卢玄冷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凡立事皆有时机，今欲立即实现汉族中心的文明，赞成者又有几人？宜三思。又，崔浩欲使其一派的名族为地方大吏时，高允批评此事说：“崔公其不免乎！”魏广泛起用汉人，但魏皇室始终是中心。太祖曾发出如下诏书：

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企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7\]](#)

这一诏书痛斥汉族徒求虚荣之名，并说臣子在人主的意志下认真守其职务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法家色彩。这一方针持续至世祖时，与之相对，崔浩过于主张汉族中心，干犯了人主权威，这是崔浩失败的真正原因。恰好魏的国史问题成为一个导火索，崔浩于是不免败亡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北部中国的豪族名门经过五胡之乱，实际维持了家门与势力。不管皇室如何励行统一主义，事实上胡族权威者好与汉族名家通婚，虽皇室也不免如此。又，从法规上看，汉族名家子弟与胡族有力者子弟共担禁卫重任（参照《外编》）。因此，一面承认这一事实，一面实现统一，似为魏室所当采用的贤明政策。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魏以皇室权力确定氏族之高下，如此，与氏族之高下相应，氏族在社会上的位置得到认可，自然在政治上也获得有利位置。

与此同时，若有政策保障一般人民的生活利益，则两者相辅相成，由此形式上的统一政治就显现出来了。魏在全盛期即高祖时期实行了三长制及均田之法，又实行了氏族分定。关于三长制及均田之法，笔者将在《外编》从别的角度予以论述。以下在论述氏族分定之前，对高祖迁都洛阳这一大事件作一叙述。

迁都之事，《资治通鉴》记载最详。据《通鉴》，魏高祖孝文帝常以都城平城（大同）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欲迁都洛阳。但他知道群臣中反对者多，于是表面宣称征伐南齐，与群臣商议南征之可否。当时皇族中地位最高的任城王澄极论南征之不可，高祖变色痛斥道：“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任城王道：“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于是高祖解颜，使各言其志。结果表明，南征不合輿情。不久，高祖密召任城王，说明心中所想：平城之都乃用武之地，非文治之都；今移风易俗之时，欲迁都中原。此时高祖似有非常大的决心，以至说出“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之类的话。[\[8\]](#)任城王表示赞成，并将镇压北人（即非汉族之人）的反对引为己任。不过，因为表面上终归是南征，所以汉族一方的大臣也上谏言表示反对。太和十七年（493），高祖最终率三十万兵骑发平城，到达了洛阳。当时霖雨不止，高祖如其声明的那样，将南征齐国，并自乘马。群臣都表示反对，列于马前。汉族一方的大臣李冲先谏阻南征，高祖不听。接着，代表皇族的安定王休等泣谏。高祖于是谕群臣：自己已至洛阳，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满不在乎地回去。自己原有迁都洛阳之意，若不南征，则须迁都此地。赞成迁都的排在左边，不赞成者排在右边。安定王休等排在右边。但同为皇族的某人站出来，对迁都表示赞成，因而群臣皆呼万岁。当时旧北人不愿迁都者虽多，但他们不愿南征，因而没有人反对迁都，迁都之议遂定。于是，高祖派任城王去平城传达迁都之事，并压制不平者。其间，高祖巡视黄河沿边的都市，又加紧经营洛阳；第二年，太和十八年

（494），高祖遂下迁都之诏，向天下公布迁都的理由，但其文不传于今。

根据以上的概述，迁都计划完全出于高祖的独裁，事前高祖仅告知了任城王澄一人而已。其后，高祖回到旧都平城，与累世旧臣议论迁都之可否，说道，平城的地理位置偏在北方，非帝王之都。而高祖的专断遭到平城旧臣的极大反对是一个事实；尤其伴随迁都所实行的各种改革，似更增加了他们对高祖的不平。重要的改革如下：

第一，迁代人于河南。魏宗室广川王妃死而葬于平城。其夫广川王现随从高祖在洛阳。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广川王死后，是与其妃共葬代都平城，还是葬在他现在居住的洛阳。对此，高祖决定：代人迁洛者必须葬在郊外的邙山；只有夫死代都，妻迁洛阳的情况下，妻可随夫葬代都。高祖于是下诏民众，规定迁洛之民必须葬在河南，不听北还；因而随高祖一起南迁者皆为河南洛阳人。

第二，禁胡俗胡语。高祖严禁北人着鲜卑之服，又不许使用鲜卑语。禁用鲜卑语无疑是一个重大问题。据现存史料，这一改革也出自高祖的独断，汉族的有力者们也未必对此表示赞成。总之，除了三十岁以上惯用鲜卑语者，三十岁以下欲仕朝廷者则必须改变语言。高祖下诏规定，在朝廷而操北语者免官。

以上高祖的改革，完全使北人改旧俗，以从汉族风习，因此很多北方旧臣反对也在情理之中。太子拓跋恂苦于河南之地的暑热，常欲返回代都，且常穿胡服，不遵高祖之诏。又，有些有力的旧臣因高祖迁都以后主要任用汉族而心存嫉妒。这些人勾结谋反，但不久为任城王所镇压。乱平之后，高祖至平城与旧臣会面。当时旧臣皆改穿汉风服装，朱衣满座。唯独新兴公丕，身为国家元勋，却穿胡服，因而他被剥夺所有爵位，成为一介平民。[\[9\]](#) 由此，高祖的改革得到了充分的实行。

赵翼在《札记》中将迁都洛阳作为魏衰亡的重大原因，说道：高祖“徒欲兴文治”，自然武备弛废。太祖时，曾有部人使于长安，由

于他模仿汉风容仪，太祖杀之。又，太宗企图迁都于邺，崔浩谏道，魏部属不多，如进入中原，势力分散，很难制御汉族。魏应以其武力与团结力，将北方作为根据地。[\[10\]](#) 在某种意义上，此论大概是正确的。不过，与其说北魏固有的风气因迁都而衰颓，似不如说固有风气既衰，高祖因之决意迁都。此点犹待考察。最尽心力于迁都计划的任城王，在高祖死后，上疏提议为魏一族设立特别的学校，实施教育。其中一节曰：

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11\]](#)

在他眼中，魏一族正走向衰弱。他绝不像当时汉族那样，以礼为治国之本。据其传，任城王明白地说道：

江外尚阻，车书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12\]](#)

高祖有心变革旧习，深喜任城王所言，高祖说道：

朕方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13\]](#)

推考其中意味，他们两人间或许有变革旧习以树立朝威的谋划。能令拓跋一族中特别杰出的两人从事这一大改革，可见当时汉文明的同化力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又，据《魏书·成淹传》，高祖幸徐州，欲浮泗水，入黄河，溯流返洛阳；宿军于碣磬城（今山东聊城茌平西南古黄河东岸）。成淹以为黄河水急危险，谏止此行，高祖曰：

朕以恒代以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14\]](#)

平城无漕运之便，为了给从各地向王廷进贡的胡族提供诸种供给，迁都也似有必要。当然，漕运与伴随迁都而实行的各种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迁都及伴随迁都的诸改革，完全出自高祖的独断。汉族名流在这独裁帝王下，欣然尽其职责。据《通鉴》，高祖好读书，甚至能在马上作文，太和十年（486）以后之诏皆高祖自作。他好贤乐善，对生平游接之人，全然忘记其天子身份。汉族名臣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15\]](#)。故而汉族欲在这一英主下达到治平，颇为努力。其中包含新都洛阳的经营。首都乃天下风俗之标准，这是汉族传统的思维方式。韩显宗有关都城经营的议论具有代表性：

（意译）旧都平城，富室竞以第宅相尚，极为混杂。又商、工业者与士族之家杂居，风俗颇为混乱。又，弹箏吹笛，缓舞长歌，而旁边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年轻孩童们自然奔赴喜好的场所，士族子弟就没有去学馆的了。今迁都之始，朝廷虽以官位定其居所，但官位始终是变动的。应该区分族类以定其居所。且道路应宽广，必须疏通沟渠以完善下水设备。[\[16\]](#)

所谓以族类定居，可能指四民依其职业，士族依其家门，以作区分。氏族分定政策实以肃正风俗为要义，是一种强烈支配当时汉族的思想。

高祖曾诏诸官：近代以来，因家门之高下，官位也自然区别开来。说起来，此习俗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关于此，各陈己见。汉族名臣首领李冲答道：原本朝廷设官，绝不是为了给与膏粱儿地位，而是为了襄助时政，故广取人才是必然的。高祖答道：特别杰出的人才另当别论，出自君子之家门者即使没有当世之用，要之，德行自然纯笃，故用家门之高者是可以的。对此，韩显宗道：历来中书监、秘书监等掌诏命之职位，皆用膏腴子弟；现在为中书监、秘书监者之子，将来果真能堪其任否？高祖道：要之，特别的人才不拘门地，予以拔擢。[\[17\]](#) 据此问答，汉族皆主张人才本位论，而高祖似认

可家门与任官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南朝家门与任官之间有很深的关系，考之以当时的事实，北魏家门与任官之间即使不存在那样深的关系，其间的关系也相当深。举例来说，李彪以其人物之杰出，深受高祖信赖，但因家门卑下，为名族所抑，高祖给他某官位时，还特别下诏解释道，李彪虽缺华资而人物优秀。进升阶位之时，必参考其婚姻关系，已是当时的习惯。尽管如此，在讨论任官时，汉族一方却一致主张贤才主义，这仅是北地传统形式上所谓儒生的闲谈吗？笔者倒以为，汉族名流秉持贤才主义是舆论的真实反映。

《魏书·高祐传》载有高祐的一篇上疏。大意是：高祖时，勋旧之臣与普通官吏之间存在区别，普通官吏以年劳进级，勋旧之臣借由家门之处实多。为了改革这一点，应给予旧臣爵赏，而非官位。[\[18\]](#)此说已见于东汉儒者郑玄《孝经注》，总之，高祐认为，应充分承认历来氏族的社会地位，而官位则委之于君主独裁。一般通检《魏书》可知，当时汉族之间常有告诫子孙避免就任高官，以图家门永续的所谓家训、家规之类。因此他们的希望似在于：在帝王独裁之下，社会地位获得承认。而高祖在此等要求下所实行的，是太和二十年（496）的氏族分定。

高祖的氏族分定有两个目的。其一，定魏勋旧世臣家门的高下，且将其部族称号改为汉姓。其二，定汉族家门的高下。此两者相互关联，家门的高下确定后，使其相互通婚，这样，在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上，胡汉疆界得以完全废除。详细情形载于《魏书·官氏志》、《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条中。要之，鲜卑拓跋氏此时始改作元氏，其他胡族重复的部落名如拔拔氏、乙旃氏、步六孤氏、独孤氏等，分别改作长孙氏、叔孙氏、陆氏、刘氏等，并附上等级；又，对于汉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为清望，纳其女于后宫，以陇西李冲女为夫人。又，魏宗室咸阳王禧娶其领地所属的某家之女，[\[19\]](#)高祖深责之，于是为弟弟六人聘娶高门之女，前所纳者，以为妾媵，而不认作正式的夫人。所选女子有胡

族也有汉族，要之，今后以不作胡汉区别为主旨。在商议氏族分定的大会上，有一则逸话：河东薛氏是有名的门第之家，群臣欲将其认定为河东茂族。然而薛氏的本宗曾自河东迁蜀，故高祖不认可群臣之说。当时，薛氏子孙薛宗起执戟于殿下，以其家自蜀复归本贯河东已六世为由，说道：若薛氏不被认作河东之姓，则将在此自杀。高祖于是予以承认。

氏族分定于是完成。适逢崔僧渊自南朝来仕魏。南朝给予他特别的位置，希望他复归南朝。对此，僧渊复书曰：

（高祖）遂乃开独悟之明，寻先王之迹，安迁灵荒，兆变帝基，惟新中壤，宅临伊域。三光起重辉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20\]](#)

表明北魏人文因高祖之手而化成，这正是北魏的极盛时代。

注 释

[\[1\]. 通常所说的六镇，指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沃野镇，不包括御夷镇。](#)

[\[2\]. 酈道元著，陈桥驿注《水经注》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3\]. 《魏书》卷二四《张袞传》，第616页。](#)

[\[4\]. 据《魏书》卷三二《崔逞传》：“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逞与张袞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袞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袞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第758页。由此，“贤兄虎步中原”是司马德宗（晋安帝）的襄阳戍将郗恢给拓跋遵信中之语，拓跋珪以为“贤兄”之语不合君臣之体，要崔逞等替拓跋遵回信贬东晋君主之号，但崔逞等回信仍称东晋君主为“贵主”。](#)

[\[5\]. 《魏书》卷三三《李先传》作“韩子连珠”。](#)

[\[6\]. 据《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世祖欲多所株连，高允不愿为诏，“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第1071页。据此，世祖以为若不是高允，当诛杀数千口人。](#)

[\[7\]. 《魏书》卷二《太祖纪二》，第38页。](#)

[\[8\]. 《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孝文帝担心北人惊扰，任城王说道：“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

[9].《魏书》卷一四《东阳王丕传》：“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高祖以不年衰体重，亦不强责。”第360页。同传又载拓跋丕受其子等人谋反牵连，免为平民。

[10].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魏孝文迁洛”条。

[11].《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471页。

[12].《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463页。

[13].《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463页。

[14].《魏书》卷九七《成淹传》，第1754页。

[15].《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二年（495）。

[16].《魏书》卷六〇《韩显宗传》：“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箏吹笛，缓

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乱，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第1338—1341页。

[17].《魏书》卷六〇《韩显宗传》：“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隲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第1343—1344页。

[18].《魏书》卷五七《高祐传》。

[19].《魏书》卷二一上《咸阳王禧传》载“禧取任城王隶户”。“隶户”，胡三省注“没入为奴隶之户”。

[20].《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第631页。

第四节 北魏的衰亡

在高祖的全盛期后，经世宗元恪（宣武帝），到肃宗元诩（孝明帝）时代，北魏彻底走向了衰亡。其间不满三十年。以北魏王室为中心的拓跋一族（元氏），内部的团结已然涣散，高祖的远大改革非但不能阻止这种势头，相反如赵翼所说，改革促使魏室走向衰亡之处实多。以下看看皇族内部的情况。

高祖细心谋求宗室的亲密团结。曾为曲水流觞之游，座中皆宗室及汉族名臣等。不久到了日暮燃烛之时，汉族臣僚首领李冲为高祖上千万岁寿，且请辞退。高祖曰：

烛至辞退，庶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1\]](#)

特别是高祖极恳切地训诫诸兄弟；又，因诸王有走向淫乱的危险，高祖甚至特意干涉，为他们从胡汉名族那里迎娶妇人。不过，借用魏收之言，诸弟尽管亲闻高祖如此训诫，却都因淫乱而败。例如咸阳王禧、北海王详，此二人各自在迁都之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关于咸阳王，《魏书》记载如下：

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锦绣，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2\]](#)

又，关于北海王，《魏书》记载：

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3\]](#)

由此可知，这些皇族代表者们货殖与淫乱之甚。

迁都后不久，高祖去世，临终，恳切遗命上述二王与彭城王勰辅佐嗣子世宗。尤其彭城王在当时很有贤明之誉，高祖也颇属望于他。然而，他知道和睦兄弟、共仕世宗是件难事，因此对高祖说道，自己常怀遁世之志，固当竭尽所能，尽忠王室，但如果遭遇困难之境，将即速辞官，恳请谅解。高祖察其心事，交给世宗如下手诏：

汝（世宗）第六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提携道趣。每请解朝缨，恬真丘壑，吾以长兄之重，未忍离远。何容仍屈素业，长婴世网。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不亦善乎？汝为孝子，勿违吾敕。[\[4\]](#)

此足以察知高祖之意。

对于高祖的后继者世宗，《北史》赞美道，“临朝深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而《魏书》则评其缺点，“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如前章所述，世宗一朝屡屡南征，一度显示出攻占四川全省的气势，且洛阳四夷辐辏，杂沓至极，看上去确实显示出全盛气象；然而内部的瓦解实不可掩。尤使胡汉名族都反感的，是世宗亲信汉人赵修，给予他破格的权力，又同时任用汉人茹皓、外戚高肇等。这些人，家门不高，德行不修，尤其高肇以其无识受到名流普遍的嘲笑。然而他们借世宗之宠，图谋排斥高祖诸兄弟，咸阳王禧首先成为牺牲品，接着北海王详受害，又，人望最高的彭城王勰也遭高肇的毒手。于是，高肇受到全体皇族的憎恨，王室的危险由此萌发。

世宗在位十七年卒，肃宗代之。肃宗年幼，生母灵太后胡氏摄政；在她的统治下，魏彻底走向了灭亡。

北魏有铸金人卜吉凶的习惯。如前所述，这是鲜卑及其他北方诸族共通的习惯（参照第二章）。据《魏书·皇后传》，魏故事，立皇后，必使其自铸金人，成者以为吉，定为皇后，不成者不得为皇后。不过，仅以现存史料来看，铸金人定皇后的记事只见于太祖时，且太

祖以后，又开了一个先例：皇太子即位前，赐死其生母。这似全然出自太祖的考虑，要之，此举是为了杜绝妇人与闻国政之弊。于是历代生下太子的夫人都照此例而被杀。这样，一方面，尽管太子生母死得极惨酷，另一方面，成为皇帝的人又必须认先帝夫人中的一人为皇太后，并对她表示十分的尊敬。王鸣盛在《商榷》中详述了高祖对文明皇后所表现的恭顺态度。据《商榷》：文明皇后原是显祖（高祖之父）即位以来的皇太后，是代替显祖生母抚养显祖的一位夫人。显祖年仅十二岁即位，自然文明太后摄政。显祖到十八岁，正是亲临政治之时，却突然让位于高祖。这大概出自文明太后的强迫。不过，显祖在让位后仍干涉政事，不久即暴卒。这明显是文明太后的毒杀。文明太后不治私行，有很多嬖人，若不尽可能将权力握在手上，则有失势之虞。因此毒杀显祖之后，文明太后长久摄行政事。对高祖而言，文明太后是杀害其父的仇敌。然而，高祖对她的恭顺态度，用常识几乎难以理解。极端的例子是，文明太后死后，高祖绝食五日，又，丧中撤酒肉，不接女人，自称“哀慕缠绵，心神迷塞，未堪自力以亲政事”，文明太后去世之年，全然不视政事。即便高祖不知道太后毒杀其父显祖，太后对于高祖也只是祖母而已。又，除了抚养高祖这层关系外，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对于太后行其淫乱之事而掌朝政，高祖之隐忍已是不可思议。太后死后，高祖的缠绵之情，则更完全不可理解。[\[5\]](#) 王鸣盛所言，含有对事实的想象解释，但大体可以接受。总之，这种连中国学者都不可理解的风习，显然不是传统的汉风。

《颜氏家训·治家》篇载：

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阎若璩将此“恒代之遗风”解释为北魏的旧俗。如此，则北魏有尊妇人之风，这一遗风在北方汉族间也广泛流传。事实上，在北魏，正夫

人似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作为中国传统的风习，皇帝王侯除了有正夫人之外，一般还有一定的妾媵。然而，魏无此规定。对此，淮阳王孝友有一篇似带嘲讽的上疏文，曰：

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6\]](#)

夫人有妒忌之心，这在《魏书》中有种种事例。相较于允许拥有妾媵且妻不可妒忌的传统中原思想，这确实是一种性质全然相异的风习。不过，由于不允许有妾媵，这时代的胡族之王侯必定卑贱其身份，从奴婢阶级那里娶妾。当时的舆论已意识到，这实为淫乱之源。总之，正夫人受到尊重是一个事实，而杀太子生母或许是与之相关联的一个事实。然自灵太后起，杀太子生母之风废止，而魏因这一太后而走向灭亡，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妙的因缘。

灵太后胡氏幼年时，随当时贵族间的风潮，一度出家为尼，其后进入世宗后宫中。当时，世宗的嫔御都祈祝神佛，愿生诸王、诸公主而不愿生太子，因为惧怕被杀。唯独灵太后公开对夫人等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尽管同列的夫人等都给她种种忠告，但她不为所动，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肃宗于是出生了。不知因何理由，世宗未照故事赐死胡氏。世宗死，胡氏以太后摄政。群臣上书称她为“陛下”，她自称“朕”。跋扈于世宗之世的高肇，为魏皇族所恶，此时已败灭。肃宗照例恭顺于太

后。在这女主下，太平气象表面上满溢于皇族之中。例如，太后曾宴群臣于都亭曲水，命王公以下作诗。太后诗曰：

化光造物含气贞。

肃宗和之曰：

恭己无为赖慈英。

母子之间一派和气蔼然。太后又曾伴宗室、群臣到藏绢的左藏。她打开左藏，命每人拿走自己所能拿走的绢。汉族名臣李崇、宗室元融“并以所负过多，颠仆于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7\]](#)，为时人所嘲笑。总之，在任性的女主下，群臣似沉醉于太平中。不过，不管宫中如何太平，宫外的情势却趋于瓦解。首先，看看都城洛阳的情况。

如前所述，高祖迁都之初，汉族大臣主张详密经营都城。至世宗时，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一坊方三百步的街衢格局已形成，而内部状况却非常混杂。甄琛上奏曰：

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8\]](#)

又，邢峦上奏曰：

逮景明（世宗年号）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

[\[9\]](#)

综合以上二文可知，洛阳自世宗以来，已成为非常繁华的都城，同时，城内却极混杂，奸徒公然市劫。如《外编》所详述，高祖迁都洛阳时，曾使四方胡族酋长朝贡；又以三长制度管理都城。三长制是这样一种谋划：将民户组合起来，设立里正，使之担当辖内警察行政。

但它显然不可施行，于是其后使守护都城的羽林骑巡视诸坊，弹压盗贼。而羽林骑的素质绝非善良。

羽林及虎贲乃禁卫兵，统帅者是天子左右的所谓侍官。侍官由非拓跋族的胡族酋长之子孙，或魏勋旧世臣之子孙担任，其下所统兵士恐怕是从属于长官的所谓部曲。北魏尤其优遇这些武官之子孙，他们与文官之清流互通仕途。汉族名臣张彝之子张仲瑀欲作改革，使他们通过文官之外的系统进叙。自然，厘正官僚秩序是其主要意图。然而，溺于优遇的这些武官听到这一改革方案大怒，立榜于都城通衢，召集一党，蜂拥至张彝家。张彝严正应接他们，羽林虎贲诸将于是相率至尚书省，寻张彝长子张始均而不获，以瓦石击打省门，“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张）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10\]](#)。其家被焚，始均被投于火中，仲瑀仅免其一死，张彝负重伤，因而得病。[\[11\]](#) 张彝在病中上呈悲痛的奏文，而朝廷仅惩罚了羽林凶强者八人而已。《魏书》著者魏收评道：“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12\]](#)

通过以上叙述，都城亲卫军纪律的弛废显而易见。而范围再广一些，就一般军纪来看，其杂乱之状也是一样的。如前所述，世宗一代，势力主要向南方发展。不过详细说来，持续的南征之举绝非出于世宗自身意愿，只是一二皇族的主张而已。从军诸将实无战意，所望在于恩赏。北魏之法，以对敌杀伤之数加以恩赏，并进勋阶。然而，当时偷阶冒名之事盛行。也就是说，将校们的功劳皆以军队统率者之名申报于尚书省兵部，而此际未参战的将校也记明功劳，并由此进勋阶，甚至实际以自己的奴隶等代为出征，却恰如自己出征一样记录在案者，非常之多。前述张彝子张始均，因为军人贪求恩赏，杀害无辜良民，积首级数万，故而激愤，将这些首级悉数焚毁，以销证据。[\[13\]](#) 又，军队统率者到了战场也并不作战，迁延时日，一味向中央要求军费，或者仅勉力于进升官位，以张自己的权势。综合世宗、肃宗时有关军事的上疏意见，可知这一时代国家军队完全为武人的私欲所

发动，军纪之紊乱实登峰造极。而有识者已认识到军纪紊乱是给一般社会带来不安的重大原因。袁翻上疏称：

（意译）近来因军事而征发之人，其勇力之徒好掠夺良民，若遇强敌，则立即降为奴隶。其老弱者，若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则苦役百端，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如此，使良民尽其力、其技，却极度削减其给用，因冬夏严酷气候，大抵十之七八死去。[\[14\]](#)

又，据高谦之的上疏，百姓不堪征发之苦，背井离乡，土地因此普遍荒芜。这样，以武力为后盾而维系一般秩序的魏，在武力衰颓、官制紊乱等相互作用下，面临着社会危机。然而，在以灵太后为中心的宫廷中，却是太平气象满溢的春天世界。

关于北朝的佛教，笔者将在《外编》展开论述。灵太后时，魏令诸州各造五级浮图，洛阳城内寺塔栉比；就寺塔之数来看，这是佛教的极盛期，同时也是教界最堕落之时。太后乘时势潮流，托言拜佛，肆意游幸。太后好登临城内永宁寺的九层佛塔，也屡临幸其他如嵩山及龙门的石窟寺等，每次临幸都有众多扈从，他们或糟蹋农民的作物，或恣意征发，其骚扰非比寻常。在太后游幸正酣之际，突然自外部发生了一件大事。

久得势于蒙古高原的柔然为高车所攻，其酋长二人向北魏寻求保护。其中一人叫做阿那瓌。魏将其安置在柔玄、怀荒两镇之间。当时，汉族一方的论者都反对这一处置，主张将他留在阴山境外，可充分供给他物资，同时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不过，魏的勋旧世臣，尤其六镇的边将等，以此作为建立军功的良机，主张接受阿那瓌之请，以魏的军队护送他到蒙古。这种议论获胜，魏于是使宗室元孚率三十万之众[\[15\]](#)慰劳阿那瓌。然而，阿那瓌却拘捕元孚以为人质，开始往南掠夺。魏大惊，立即以李崇、元纂为大将，以十万骑伐之。阿那瓌因之遁于北方，此事件暂告一段落。不过，六镇军纪颓废的事实因此暴露，李崇主张对此进行改革。其理由在于：六镇组织原本征发汉民，

统率者皆强宗子弟。然而，自高祖迁都以来，六镇将帅几乎被无视，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他们在官仕及婚姻上不被认作清流，与其族类居洛阳而贪富贵者相比较，自然心怀愤怨。今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免府户为民，入仕次叙，一仍其旧。不过，当时王室没有采用这种意见的明识与实力。果然，叛乱起于六镇，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首先纠合不平的胡汉军人，入侵武川、怀朔二镇。二镇陷落。与此同时，甘肃、陕西一带也爆发了叛乱。据于甘肃秦州的莫折念生，势头尤其强劲。魏王室中已经没有足以镇压莫折念生的名将，南朝齐的宗室萧宝夤被委以镇抚之任。然而，他徒拥大军，一次次战败，又因谋反而被诛杀。这样，当北方及西北的叛乱逐渐扩大时，在东方河北平原地区，葛荣起兵，开始攻略州县。其间，为魏防守、统抚山西一带的，是历来与魏关系不深的尔朱荣。尔朱荣势力深固，因此当时有力的武将逐渐归服他。他们这一派不满灵太后专政，欲使肃宗实际执掌政事。肃宗也颇有借助尔朱荣之力的念头，于是灵太后一派抢先毒杀了肃宗。此事给尔朱荣可乘之机，他以清除君侧之奸为名，进兵洛阳，拥立孝庄帝，又认为肃宗遭不幸，罪在群臣，于是进入洛阳，[\[16\]](#)恣意杀戮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灵太后也成为牺牲品。其暴乱至极的做法使洛阳人士震惊，人们都自城内奔逃，官府内空无一人。因此，尔朱荣舍弃洛阳而回到根据地——山西晋阳（太原），但仍留部下于洛阳，全面牵制魏王室。此时北魏孝庄帝虽为尔朱荣所拥立，却逐渐对其心生反感，因事召见尔朱荣，于殿中杀之。于是尔朱氏一党猛烈复仇，在洛阳城内实施了大屠杀。孝庄帝被幽杀，尔朱氏一族重新拥立元魏一族，使其即帝位，而事实上此时尔朱氏的势力已然失坠。宇文泰在西北逐渐增大势力。又，在东方，汉人高欢显示出统一的实力，故而魏一族或依于宇文泰，或依于高欢，出现了东西二魏的对立。但实权在宇文氏及高氏，因此其后的历史在北周、北齐之下叙述更为方便。

注 释

[1]. 《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澄传》，第468页。高祖还洛阳，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其后又去了流化渠、洗烦池、观德殿、凝闲堂等几处。史料未言曲水流觞之游。

[2]. 《魏书》卷二一上《咸阳王禧传》，第537页。

[3]. 《魏书》卷二一上《北海王详传》，第561页。

[4]. 《魏书》卷二一下《彭城王勰传》，第576页。

[5]. 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孝文帝孝事文明太后”条。

[6]. 《魏书》卷一八《淮阳王孝友传》，第423页。

[7]. 以上参见《魏书》卷一三《皇后传·宣武灵皇后胡氏》。

[8]. 《魏书》卷六八《甄琛传》，第1514页。

[9].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第1438页。

[10].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第1432页。

[11]. 《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

[12].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第1433页。

[13]. 《魏书》卷六四《张彝传附子始均传》：“初，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遣都督元遥讨平之，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始均以郎中为行台，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至于灰烬，用息侥幸，见者莫不伤心。”第1433—1434页。

[14]. 参见《魏书》卷六九《袁翻传》：“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俘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第1539页。

[15]. 据《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正光四年（523），阿那瓌众饥，入塞寇抄，肃宗遣元孚持节抚谕。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梁武帝普通四年（523），“阿那瓌众号三十万”。

[16]. 应指河阴之变。河阴在洛阳西北，今孟津。

第五节 新势力的兴起

北魏肃宗正光四年（523），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首先发起叛乱。据胡三省《通鉴注》，“破六韩”或作“破洛汗”，是匈奴单于苗裔潘六奚氏的转讹。他发起叛乱的地点是高阙，大概在河套地区黄河支流北河之北。魏方面主要担当征伐之任的，是宗室广阳王元渊。据他的上表，可略了解破六韩反叛的原委。也就是说，如前节所述，当时六镇人民对以洛阳为中心的胡汉权力者抱有强烈的反感。恰逢柔然阿那瓌事变，而此时差往讨伐阿那瓌的魏军风纪散乱，十五万众渡沙漠，不日而还；六镇人民目睹这种情形，普遍心生轻侮魏国之情，于是破六韩首先反叛。（破六韩反，《魏书》《北史》共系之肃宗正光五年，今从《通鉴》矣。）第二年，敕勒酋长胡琛于高平（宁夏固原）反，莫折念生于秦州反，于是自甘肃北部至河套地区，叛乱范围逐渐扩大。为魏平定西方叛乱的任务落到了南朝齐宗室萧宝夤身上。

云中的盛乐是北魏太祖金陵的所在，于魏而言，是必当保全的历史渊源之地。然而，肃宗孝昌元年（525），此地似被破六韩夺取。曾入寇于魏的柔然阿那瓌，这时从北方为魏讨伐破六韩；破六韩受逼迫，渡北河进入河套之地，守云中的魏将费穆因之南遁。北讨军总帅广阳王元渊驻兵大同，一味防御，并不北攻破六韩。元渊手下的智略之士于谨招诱当时被破六韩胁迫的西部敕勒酋长乜列河等，于是以北河为中心的地区的发生了大动乱，约二十万胡族降魏。元渊欲将这些降户置于大同，以防备北方，但当时魏的皇族间已互生猜疑，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不愿增大元渊的势力，因而将这些降户分置于河北平原地区的冀、定、瀛三州。元渊认为，这一政策将成为祸乱之源。果然，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河北怀来，北京延庆一带）后不久，在迁定州的降户之中又爆发了鲜于修礼的叛乱。又，南方河南地区的“群蛮”也一时反叛。于时魏王室始察觉事情之重大，下诏募集有力的军人。

如上所述，各地都发生了叛乱。北方的破六韩，其结局不明。西方的莫折念生为高平城民所杀，以高平为中心的匈奴另族万俟丑奴（《北齐书·万俟普传》）的势力代而崛起。这一方面的统率者萧宝夤屡为万俟丑奴所破，遂背叛魏，未能成功，反托身万俟丑奴以度残生。北讨军的统率者元渊，在鲜于修礼反叛的同时，自身也处在容易被叛军拥戴的危险之中，故而请求去东方讨伐鲜于修礼。[\[1\]](#) 然而，他深为有权势的宗室所猜疑，于是在出征时被杀。他恐怕是魏末皇族中最有才器的一人。当时，鲜于修礼已为部下所杀，葛荣代而统揽其众。其后，葛荣的势力逐渐向河北平原地区延伸，不久又杀杜洛周，势力益盛。而在魏室，以灵太后为中心的丑恶的权力之争逐渐变得残酷，以至肃宗成为牺牲品而被毒杀，尔朱荣于是举兵，洛阳一时陷入大乱，此如前节所略述。以下概述尔朱氏兴起的原委。

对北作战的总帅元渊及对西北作战的总帅萧宝夤既倒，魏室已没有有才器的名将了。这从路思令的上奏中可看得很清楚（参照《通鉴》大通元年）。而北方的秩序于是由尔朱氏所维系。尔朱氏是契胡一部族之酋长。其祖曾随北魏太祖征讨各地，有功，被赐予秀容川的谷地。其领内有个祁连池（即天池），因此它无疑就是今桑干河上游山西宁武西方的谷地。至尔朱新兴，据说他所牧牛羊驼马滋盛，以色分群，以谷计数。魏朝廷每有征伐，新兴便献马备粮，以助军用，因之在魏获得了信望。新兴死，尔朱荣袭父封。[\[2\]](#) 据说，尔朱荣好射猎，每设围，教其部众阵战之法。六镇一生混乱，其影响立即波及山西北部地区各胡族，地方长官被杀等事件屡屡发生，尔朱荣讨灭反乱者，维持了此地秩序。然而，在东方河北平原地区，葛荣的威势逐渐强大，其势将南陷邺城。于是，尔朱荣向朝廷请求救援邺城。但朝廷恐怕他尾大不掉，又邺城已有宗室北海王元颢坐镇，因此未答应他的请求。适逢肃宗遭毒杀，时人非常愤恨灵太后左右被视为主谋的汉人郑俨等，尔朱荣于是以清君侧为名，暗通魏宗室元子攸（彭城王勰之子），举兵逼向洛阳。据说，当时从根据地晋阳（太原）出发之际，

对于将要奉戴的魏主人选，尔朱荣仍甚是迷惑，以铜铸高祖等子孙之像时，唯独元子攸像成，尔朱荣遂与之通。[\[3\]](#) 就这样，尔朱荣进入洛阳，在宫中肆意虐杀，且将其拥立的元子攸即敬宗（孝庄帝）移于洛阳北方的河阴，欲代魏自称帝号。洛阳城内陷入大混乱即在此时，史称“河阴之变”。[\[4\]](#) 但禅让之事未实行，尔朱荣又向敬宗起誓，约效忠诚，并与其军一起退回晋阳，又留同族尔朱世隆于洛阳，使其监视敬宗及魏诸族的行动。其间，在东方，葛荣的势力愈加强大，尔朱荣于是请求征讨葛荣。他一举擒获葛荣，且善后处置极敏速，因而颇得东方人士之情。此外，他击败在南朝梁的援助下窥视帝位的元颢，又使同族尔朱天光进入陕西，讨灭万俟丑奴。由此，一时混乱的北部中国显示出恢复秩序的样子。

尔朱荣天性好斗，北部中国的秩序稍复，他便在晋阳亲率军士每天耽于校猎。其亲信元天穆谏曰：今魏室朝臣之风气极宽纵，今秋大猎于洛阳之南的嵩原，可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以其余势南征，先平河南地区的“群蛮”，以之担当北边六镇的防备；回军北还之际，讨平汾水山胡；明年，精简士马，灭亡南朝之梁，以混一天下。因此，士马休息，最为必要。[\[5\]](#) 此言可清楚照见尔朱一党的心绪。由此也可推想，敬宗周围的洛阳朝贵间对于尔朱氏有强烈的反感；尤其敬宗自河阴之变以来，也对尔朱荣有很深的猜疑。因此他们密谋暗杀尔朱荣，以朝命将他召到洛阳。监视洛阳的尔朱世隆不知道这一密谋，却对敬宗等人的秘密会谈抱有疑心，于是对尔朱荣加以警告。但尔朱荣轻视洛阳，无任何戒备便来朝见，于是被杀于殿中。这时尔朱一族中，尔朱兆有大军在山西，天光据陕西，仲远据东方山东的东郡，他们与从洛阳北逃的尔朱世隆之军会合，共进洛阳，开始了复仇之战。虐杀再次上演，尔朱兆执敬宗返回晋阳，杀之于佛寺中，天光、仲远各归旧任，世隆照旧留在洛阳善后。世隆拥立魏宗室元恭即节闵帝，并身当政治要冲；据说，其淫虐之状使天下人莫不厌毒。此时，作为尔朱一党的强敌，高欢出现了。

据称高欢本贯渤海蓍县，故而是纯粹的汉人。不过，其祖父以罪徙居怀朔镇，因此高欢在北边习得鲜卑风俗，其正夫人娄氏是胡部一豪酋之女。据说，他仕镇为队主是凭借外家娄氏的财力。其后升为镇的函使，使于洛阳，适逢洛阳发生张彝事件，高欢见军纪弛废之状，始怀窥视天下的野心，归镇后，勉力纠合同党。考察相关史料发现，高欢所交结的人物多是定居北边的汉族人，大概是浸染鲜卑武勇之风的一群徒众。杜洛周反于上谷时，高欢与同党一起投其麾下，其后去而依附葛荣，最终托身尔朱荣。高欢受赏拔，才器得以发挥，完全是由于尔朱荣；在尔朱荣麾下，高欢转战各地，因功赢得晋州刺史的要职。适逢尔朱荣被杀，尔朱兆在复仇南下洛阳之际，急切催促高欢同行，但高欢推辞了。推辞的原因大概是对魏室作战名义不正，且他对此举成功与否心存疑惧。当尔朱兆击破洛阳北还时，高欢处于危险境地。但当时因魏敬宗之命自北河之北、阴山南方入侵山西的胡族费也头部落纥豆陵步藩势头强劲，尔朱兆防之于秀容，失利，不得不求援高欢。于是尔朱兆与高欢设香火之誓，结为兄弟，共破步藩，杀之。不过，高欢不愿附属尔朱兆。在山西境内，原属葛荣的六镇乱民颇多，他们时常成为叛乱的动因，尔朱兆难于统治，将其处分委之高欢。高欢调停合理，军士颇归服，他又以此等降户贫困为由，请求使他们乞食于河北平原。其意本在谋求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尔朱兆不悟，听允其请；高欢于是进入河北，据信都（河北冀州）为根据地。高欢的独立实始于此，时为531年。

河北平原地区与陕西、山西两省不同，实际上汉族豪强占有势力。例如李元忠，其父在殷州（河北隆尧）西山联合诸李姓数千家，威震方圆五六十里间；葛荣之乱时，李元忠筑垒自保。又，高乾及其弟昂（敖曹）与高欢一样，是渤海蓍人，但其父在河、济间蓄集部曲，或劫掠州县，或倾产以招剑客，并曾与葛荣共同行动。高昂常以汉族部民组织军队，平时训练得宜，后归高欢，转战四方，不加鲜卑兵而屡建大功。他自身蔑视鲜卑的武力，屡以气凌辱鲜卑将。高欢率

兵出至河北平原，先与之通款的是高乾，李元忠也应之；这样，在汉族豪右的拥戴下，高欢在河北南部树立了他的势力。不过，高欢所恃兵力本即鲜卑，因而在动辄不合的胡汉两势力的使用上煞费苦心。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又据说他在号令将士之时，对鲜卑用鲜卑语，对汉人用汉语。[\[6\]](#) 总之，高欢的势力逐渐增大。

在洛阳，尔朱世隆的人望逐渐衰减。高欢于是起兵，欲讨灭尔朱氏。这时高欢使用苦肉计，声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又伪造并州兵符，表明将征兵讨伐步落稽；由此军士对尔朱氏极度反感，一致推戴高欢。高欢从鲜卑人那里得到不凌辱汉人的坚决保证，建义信都，斩杀此地的尔朱氏一族，表明了对尔朱氏的态度。不过，据说尔朱氏当时势力犹很强大，对高欢的反叛未加重视；其间高欢别立魏宗室元朗（废帝）为天子，尔朱氏一族于是一致讨击高欢。然而，尔朱氏一族相互间猜疑颇深，仲远等畏忌尔朱兆专横，不战而遁去，高欢破兆，西进取得邺城，在这里确立坚实的根据地。尔朱一族因之开始畏惧高欢的势力，再次同盟攻邺，但战争失利，尔朱兆还晋阳，仲远遁于东郡。这时，来自陕西地区的尔朱天光的军队欲返回根据地，势必经过洛阳。在洛阳的胡汉朝臣都畏惧尔朱氏，却相谋发起讨灭尔朱氏的行动；结果天光被擒，世隆被杀，洛阳的尔朱势力因之一扫而光。

尔朱氏失势洛阳，高欢代之。高欢废尔朱氏所立节闵帝，又因他所立废帝元朗不协人望，故而定元修（孝武帝）为魏帝。当时尔朱仲远已经失势，且平常东郡汉人畏之如豺狼，仲远一败之后，逃奔南朝，以保其身。唯独尔朱兆犹在山西保有若干势力，而被高欢追击，防御失败后自杀于山中，尔朱氏彻底灭亡。时为魏孝武永熙二年（533）。

高欢已取邺城，又夺得晋阳。他以此二城为根据地，主要身处晋阳进行军事统治。然而，魏孝武帝既然因其在洛阳朝贵中的人望而为高欢所拥立，则他未必甘心做高欢的傀儡。加之洛阳朝贵原本就轻侮高欢出身卑贱，图谋以孝武为中心牵制高欢的事权，于是重用鲜卑名家子孙且被誉为豪杰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分别委以河南南部及关中陕西的军权，以掣肘高欢，又在洛阳重整武备，以张威权。对此，高欢若必以武力夺取陕西，则洛阳当不成问题；又，在政治上，可自夺魏位，或迁魏都于邺城以号令天下。后一计谋曾由高欢的部下提出，高欢不从，他的主要目标似在以武力征服关中。当时，西部的情况极为复杂，自河套至宁夏地区，诸“蛮酋”张其势力。其中据甘肃秦州的侯莫陈悦占有较稳固的地盘。史书虽以侯莫陈悦为代人，但其父在河套之地（史书多云河东河西，《通鉴》胡注以为五原河东西）任驼牛都尉之职，故其出身未必尊贵。而他以战功逐渐提高了其地位。高欢与之交通，以谋贺拔岳。于是贺拔岳亲自出征讨击侯莫陈悦，不幸失败，高欢乘机派部将侯景招抚关中。不料此时出现了一个强敌宇文泰，挫败了高欢的雄图。

关于宇文氏，《魏书》记载如下：

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7\]](#)

据此，宇文氏为匈奴族，其语言与鲜卑不同，且在发式风俗上，比起鲜卑的索头，似与柔然的秃首更接近。不过，《魏书》的记载难以尽信。《北史》叙述宇文泰世系，以其源出炎帝，炎帝后裔普回因猎得玉玺三纽，文曰“皇帝玺”，普回以为天授，其俗谓天子曰“宇文”，故定国号为“宇文”。普回之子莫那始自阴山南徙，居辽西。[\[8\]](#)《太平御览》引《北史》曰“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9\]](#)，也就是说，普回与莫槐显然是同一人，本居漠北或阴山。宇文意为“天子”，拓跋意为“后土”，两者在解释上似有相通之

处。《文献通考》因《晋史》谓宇文为鲜卑族，故认为《魏书》谓宇文为匈奴族是错误的。[\[10\]](#) 大概《魏书》著者魏收是北齐人，所以记述敌对者宇文氏时多少有些曲笔？

考察《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氏条及《魏书》本纪的记载，宇文氏南徙之后的居住地可能在河北边外自今多伦县北上都河西南岸至西拉木伦的上游地区，即所谓的松漠之间。宇文氏常与慕容氏反复激战，其部族最终为慕容晃所灭。于是宇文氏在慕容氏之下任职，北魏灭亡慕容氏后，宇文氏迁居武川。奚、契丹二部族割据宇文氏故地，大概在此之后。适逢魏末扰乱之际，宇文泰为尔朱荣所赏拔，后随贺拔岳平万俟丑奴，行原州即高平（宁夏固原）州事。其后，主要预参贺拔岳帷幄，密谋交通魏孝武帝，以压制高欢。贺拔岳失败以后，宇文泰为众所推，统率其军，使高欢无可乘之机，且讨平侯莫陈悦，在陕甘地区树立了他的势力。

在洛阳，以孝武帝为中心的一派朝臣排斥高欢的动作渐趋激烈，斗争已显现于各方面。体现在以下事实中：高欢所荐举的朝臣等不安其位，相继逃出洛阳。于是高欢先发制人，上表朝廷，请求以大军西征关中，南讨贺拔胜于河南，东征江南。对此，孝武帝在答书中表现出强硬的决绝之意。他说，宇文泰绝不臣之迹，又，贺拔胜开南边之地，为国尽忠。而且他反列举高欢不臣之处，最后以“王（高欢）若举旗南指……犹欲奋空拳而争死”[\[11\]](#) 这种激烈的文辞作结。高欢于是决意进逼洛阳。孝武帝忘了当初言辞之雄壮，未作抵抗而西逃关中，以求宇文泰保护。高欢于是拥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是为孝静帝。当年，自洛阳迁都于邺。于是北魏分作东西两魏，长安与邺都对立，统治着北部中国。时为534年。

注 释

[\[1\]. 据《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深传》（“深”，避唐讳），元渊以为将降户迁往冀、定、瀛三州是祸乱之源，果然，鲜于修礼反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但“其余降户，犹在恒州，遂欲推深为主。深乃上书乞还京师”。回京后，元渊又被派去讨伐鲜于修礼。](#)

[\[2\].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肃宗世，（新兴）以年老启求传爵于荣，朝廷许之。”第1644页。](#)

[3]. 据《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尔朱荣先遣从子尔朱天光等入洛阳，与尔朱世隆密谋废立。“天光乃见庄帝（元子攸），具论荣心，帝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

[4]. 据《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528）记载，尔朱荣逼向洛阳，至河内，遣人迎元子攸。元子攸会尔朱荣于河阳，济河，元子攸即帝位。洛阳百官迎帝于河桥。尔朱荣杀百官于河阴西北。尔朱荣一度想代魏称帝，但终未果行，仍奉帝入洛阳城。洛中士民逃窜，十不存一二。

[5]. 有误。《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荣性好猎……太宰元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济天下，四方无事，惟宜调政养民，顺时搜狩。何必盛夏驰逐，伤犯和气。’荣便攘肘谓天穆曰：‘……顷来受国大宠，未能开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勋也！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嵩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径渡数千骑，便往缚取。待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称勋耳。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第1653—1654页。

[6]. 《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三年（537）：“（高）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高）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

[7]. 《魏书》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传》，第2304页。

[8]. 《北史》卷九《周本纪上》。

[9]. 《太平御览》卷八〇一《四夷部二十二·北狄三·宇文莫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63页。

[10]. 《文献通考》卷三四二《四裔考十九》“宇文莫槐”条：“《晋史》谓之鲜卑。《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又按《后周书》云：‘出自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逃漠北，鲜卑奉以为主。’今考诸家之说，其鲜卑之别部。”

[11]. 《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

第六节 北齐、北周的兴亡

534年，孝静帝在邺城即位，魏室分作对立的東西两魏。十六年后（550），高欢子高洋受东魏之禅建立北齐。又七年后（557），宇文泰子宇文觉受西魏之禅建立北周。北齐、北周两朝在北部中国形式上的对立，始于这一年。不过，掌握东西两魏实权的，本是高欢、宇文泰，故实际上高氏、宇文氏的统治自东西两魏分立之日起就开始了。高欢后被追谥为齐神武皇帝，宇文泰被称为周文帝。[\[1\]](#)

高欢、宇文泰的对立使得北部中国连年发生激战。高氏的势力包含北部中国大平原，在面积、物资上固然远胜宇文氏，不过北魏之下历代以武门名族自诩者多仕西魏，扶助宇文氏，故宇文氏的势力不可小觑。《北史·韦孝宽传》论曰：“齐谓兼并有余，周则自守不足。”如其所言，高氏、宇文氏对立之初，齐的攻击力远胜于周；但周经受住齐的进攻，维持了它的独立。

537年，齐神武亲率大军，自晋阳南下，渡黄河，进至陕西渭水之北、洛水之南的沙苑；此外，另一军自南面越潼关西进，合围长安，[\[2\]](#) 必欲粉碎宇文之军。然而，宇文泰拼死抵抗，且颇有成效，齐军所到之处皆被击败。高欢怒，犹欲奋战，但其势不得不退军。而宇文泰也未追击高欢，从这点看，其力不足以灭齐。沙苑战败，对齐造成最大损害的，实为河东险要之地蒲坂的丢失——自晋阳直接南下的道路被封锁了。

沙苑会战的第二年，主要经营河南地区的高欢勇将侯景，获悉周文帝将谒洛阳帝陵，于是大举攻洛阳，在洛阳北方的河桥、邙山之地与宇文泰军会战。当日浓雾四塞，宇文军前后失去联络，大败。战败的消息传到长安，此前沙苑之战中被俘的齐将等起而谋反，一时长安人情危惧，宇文泰处置迅疾，长安幸得无事。由于河东要地被宇文夺取，当时高欢不能一路南下，只得迂回从孟津渡河西进，听到宇文泰已还长安，于是停止了追击。此战让齐感到河东之地的丢失给它造成

了极大的不便。546年，高欢亲率大军进攻河东，周将韦孝宽的防战极尽其巧，高欢不得其志，又得病军中，以至卒。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成为东魏事实上的主政者。北齐追谥高澄为世宗文襄皇帝。高欢去世当年（547），久专制河南地区的勇将侯景引诱在河南的东魏各将，起而谋反。侯景本是北镇戍兵出身，据说他谋反的动机完全是对高澄的反感。高欢在世时，他已扬言道：“王（高欢）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3\]](#) 不过，北齐内部也不是没有促使侯景起而谋反的环境。名臣杜弼曾以在位文武多贪污者，请高欢治之。高欢说道：贪污之风，天下盛行实久。不过，今齐之军将，其家属多在周，宇文泰常招诱这些将军们。又，江东的梁武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皆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若急正纲纪，恐怕武将们皆西走，汉族豪家皆南走。杜弼又曾劝高欢除去诸勋贵掠夺百姓者。“高祖（高欢）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稍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稍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4\]](#) 高欢实以恩赏使用胡族武将，得其死力。就其临终之言来看，他最亲信的还是胡族武将，而非汉人。可以想象，此际高欢部下恐怕是暗流涌动。总之，侯景反叛，南结梁，西通宇文，以保固其位置；对此，北齐反应极敏速，立即派名将慕容绍宗讨侯景于涡水。侯景战败，南降于梁，如前章所述，这成为梁朝覆灭的原因。

北齐文襄帝高澄在位两年，被梁之降人暗杀，其弟显祖文宣帝高洋继后。第二年（550），高洋受东魏之禅即帝位。因此，形式上北齐的建立实在此年。但禅让运动在高澄时已显露出来，《北史·东魏孝静帝纪》记载了孝静帝与高澄之间丑恶的争斗：孝静帝武艺娴熟，文学修养也深厚。高澄忌之，使心腹崔季舒监视帝之行动。高澄曾与季舒书曰：“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露骨地表现了高澄的猜忌之

情。又，高澄曾向帝举杯曰：“臣澄劝陛下。”对于这种无礼行径，帝表现出不悦之色。高澄见此，又怒道：“朕，朕，狗脚朕！”并使季舒殴打帝。[\[5\]](#)当然，高澄屡与帝相争，每次都照例谢罪，要之，二者势难两立，禅让被认为只是时间问题。而高澄意外遭暗杀，禅让自然延后了。高洋即齐王位后，禅让之事首先由幕下亲信高德政发起。此时，只有名臣杜弼稍稍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高氏、宇文氏各自推戴魏室以号令天下，今夺取东魏之位，对高氏不利。但徐之才认为：宇文氏有夺取西魏的巨大野心。譬如满市逐兔，一人得之，众心自然安定，若先夺东魏之位，陕西地区也会受到影响。此言无疑道出了当时的实情，自然诸朝臣间没有多少议论，禅让就得到了实行。不过，高氏对元魏皇族的迫害相当酷烈，孝静帝遭毒杀，另外，皇族二十五家三千人都同时遇害，被投漳水。又诏诸军人，改姓称元氏者皆复其本姓。

《北史·高祖神武帝纪》论中记述高欢制御胡族之情形，曰：

“至南和梁国，北怀蠕蠕，吐谷浑、阿至罗咸所招纳，获其力用，规略远矣。”[\[6\]](#)又同书《韦孝宽传》论曰：“高氏籍四胡之势，跨有山东。”[\[7\]](#)随北魏瓦解而产生的胡族南侵的势头，因北齐武力而受到阻碍，尤其文宣帝高洋对北方胡族建立了最醒目的功业。当时有两支胡族在蒙古高原取得势力，即北方的突厥、东北的契丹。在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史上，这些胡族愈占重要势力，本书不对它们展开详细叙述。总之，突厥此时杀了柔然阿那瓌，柔然因此举其部属降于北齐，北齐将其安置在马邑川（桑干河上游），并击破突厥，使其乞降。大概以武力向突厥显示中原王朝的威势，在隋唐统一以前这是最后一次。又，对于契丹，高洋自至平州（河北唐山市迁西县东北），将其击破。据说，在这次远征中，他尤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勇武。高洋还把山胡讨平殆尽。山地胡族被称作山胡或汾胡、绛蜀等，其族属系统全然不明，他们似广泛分布在汾水上游山谷之间，晋以后至北魏统一，各朝势力都未能有效压制他们。《尔朱荣传》也说应先平河

南，再乘势讨平汾胡，[\[8\]](#) 因而其根底之牢固可以想象。高洋却讨平了北魏军队未曾到达的石楼（山西吕梁石楼县），悉数诛灭十二岁以上男子，远近山胡皆降。这般武功赫赫的高洋，另一方面却作为典型的暴君流传史册。《北齐书》未记录的事实，详见于《北史》，采取何种史料，差异多少存在，今试着意译均见于两者的记事：

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行市肆。……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姬，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沈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至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游行市鄽，问妇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9\]](#)

高洋几乎与南朝齐东昏侯一样暴虐，大概是一般汉族舆论中最不受欢迎的君主。据说，北齐百官在鲜卑风俗的浸染下，不纳妾。而北齐王室的淫乱之风，始于始祖高欢，高洋时淫乱最甚。赵翼《札记》对此有详述，所据为《北史》本纪。幸而高洋不久死去，其弟高演（孝昭帝）杀高洋的太子而自立。他在位不过一年，但据李延寿之论，当时北周君臣之间猜疑颇深，陕西名流皆瞩目于高演的政治；高演也有兼并之志，常自平阳窥视北周，却赍志而歿。李延寿赞叹道：“经谋宏旷，谅近代之明主。”大概从高欢开始，至高演，北齐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就国富兵强而言，当时在全中国，对立的齐、周、陈三国之中，齐确实居于最优胜的位置。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周的情况。虽然宇文泰迎立了魏孝武帝，但是在高欢拥立东魏当年，孝武帝被毒杀。这无疑是宇文一派所为。接着，西魏文帝元宝炬立，自然政治之万端皆由宇文泰独裁。文帝死，废帝元钦、恭帝元廓相继被拥立。其间，宇文氏的势力延伸至四川。如前章所述，南朝在侯景之乱后，梁王室一族之间反复争斗，遂使四川的大本营成都空虚。宇文泰以之为征蜀良机，令名将尉迟迥以大兵往取之。《北史·尉迟迥传》记载了当时征伐的状况，文简而事情不明。总的来说，《北史》周代记事徒仿古文，内容有空虚之憾。例如，尉迟迥向宇文泰陈述征蜀之计且被采用，其事载曰：

唯迥以为（梁武陵王）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周文以为然，谓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10\]](#)

言意庄重，但难以充分明白其旨。总之，尉迟迥平定了四川。捷报到达朝廷时，正是宇文泰膺惩吐谷浑，自姑臧回到朝廷之际。由此可知，宇文泰在末年，南并四川，西北将以姑臧为中心的甘肃一带置于统治之下。

李延寿论宇文泰曰：“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云。”[\[11\]](#)事实上，颇多北魏名将子弟聚集在宇文麾下。既然这些人已在北魏孝文帝的政策下获得了汉族文明的教养，则北周风俗自然不像北齐那般混杂，且汉族名臣苏绰等又以古道引导它，因此宇文文的治术得以确立。其详情可见《外编》。

宇文泰卒，其子宇文觉继后。觉年幼，他的从兄宇文护受宇文泰遗命，总摄诸政。当年（556），宇文护使西魏恭帝传位宇文觉。北周在形式上创始于此。宇文觉称孝闵帝。宇文泰在世时，优遇原本与其同列的北魏名将，充分给予他们专任之权，以此获得他们的效力。今宇文护拥立北周，舞弄权势时，宿将勋臣们时常产生动摇。不仅如此，宇文觉周围也有人嫌忌宇文护，劝宇文觉抑制宇文护。不过，宇文护细心防备，事皆不成，宇文觉因而被废，而后其兄宇文毓（明

帝）立。明帝毓亲政，军事大权仍专任宇文护。不过，明帝与宇文护之间猜疑极深，明帝于是被毒杀。继后者是有名的武帝宇文邕，但即位初期，他仍使宇文护摄行政事。

北周宇文护掌握实权期间，北齐在高演之后，武成帝高湛即位。其母是柔然女，高欢为得到柔然的助力而与之联姻，故齐人称她“邻和公主”。[\[12\]](#) 武成帝深信佛教，为人神情幽远，高欢传给诸子的好战以及临下以严等风气，在他这里为之一变。他的宠臣和士开曾对他说：“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从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13\]](#) 从此，武成帝将政事委任臣下，完全不作干涉，因而北齐内部纲纪废弛，且武成帝的性格使他在外交上也倾向和平主义。

此前，北齐高洋以其铁腕破突厥。又，名主高演在与北周接境的汾水右岸晋州平阳府筑起坚固城壁，并置一年一代的屯驻兵，以之与北周的堡垒蒲州对峙；又，对于南朝的陈，高演在石鳖（江苏宝应）大规模屯田，为淮南军士提供充足粮食。这样，在西方、南方，高演都做好了下一步大举进攻的准备。然而，北周自始祖宇文泰时起，就向新兴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求援，并送去巨赂，博其欢心，以抗北齐。适逢北齐高演死，高湛继之，其内部纽带已松弛，北周宇文护遂利用突厥之力，进攻北齐。563年，周使名将杨忠从北边直捣齐的根据地晋阳，又命勇将达奚武自河东进出。杨忠军在突厥十万援兵的配合下，次年正月冒雪攻击晋阳。不过，当时晋阳兵备尚强，突厥人知其不可破，恨为周人所欺，开始退却，故全军败北。对于自河东进出的达奚武，北齐名将敕勒人斛律光守卫平阳，杨忠退军后，斛律光寄书达奚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达奚武得书，整军而退。不过，《通鉴》在此战之后写道：“初，齐显祖（高洋）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高湛）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14\]](#) 大约这是两国攻

防的一个转换期。齐虽幸而击退周军，但这一年送宇文护母（在北边动乱之际，与子离散而留齐）回周，以图和亲。为此，两国关系似乎多少有点好转，但由于突厥的要求，战争再度兴起。之前在攻击晋阳城时，突厥几乎不战而退，但据说它退却之际，肆意掠夺，为此晋阳以北七百里人畜无遗。尝到甜头的突厥人强制宇文护再度挑起战争。对于突厥这一强制，名将杨忠强烈反对，而宇文护没有拒绝突厥的识量，于是在突厥的强拉硬拽下出军。他主要在洛阳方面发起进攻，但再次被齐军击退。北齐至此撑住了北周的两回进攻，但它了解到突厥势力的恐怖，于是向突厥奉上大量贡物，与之和睦。

北齐高湛卒，后主高纬即位。高湛时已松弛的齐政，到后主时愈走向崩坏。今据《北史》述后主性行之一端：

（帝）言语涩讷，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自贬损，唯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覡，解祷无方。……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所任便佞之士）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以万数。……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

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御马则藉以氍毹，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饌而亲观之。狗则饲以粱肉。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15\]](#)

名将斛律光为高纬所杀，这确实是对周的有力防御，而此事的主谋是汉人祖珽。根据祖珽的建议，齐新设了文林馆，有名学者李德林等在馆内编纂书籍；因而从表面上看，朝廷内部充满一股汉风的氛围。不过，李德林等有力者并没有为齐尽力，而后主周围的一派对汉族表现出露骨的反感。他们常用“汉狗”“汉丐儿”等称呼汉人。要之，后主及其身边的人恣意舞弄政治，齐已然失去了民心。如前所述，南朝陈国夺取淮南之地即在后主之时。

另一方面，北周武帝宇文邕诛杀久握实权的宇文护，亲临万机，时为572年。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完全是秘密策划的突发事件。一直以来，宇文护常入宫谒见当时的太后，武帝则每每侍立在宇文护身边。宇文护被杀的那天，照例如此，谒见将终，武帝谓宇文护曰：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恐有害身体。自作《酒诰》一篇，欲以劝谏，愿兄于太后面前读之。[\[16\]](#)宇文护读《酒诰》，武帝突然以玉珽（笏）自后击之，宇文护踣于地。同时，武帝唤来宦官，交给宦官佩刀，命他斫杀宇文护。宦官惶惧，斫不能伤。此时，预先与武帝通谋的一人从藏身的户内跃出，杀了宇文护。武帝平日所亲近者皆在外，此事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实现的。不久，宇文护的党派被一扫而光，武帝的独裁得以确立。一直以来，武帝未曾在政事上过问一句，执政后，遂一心采用富国强兵之策，静候伐齐机会。当时防守北齐于汾水西的名将韦孝宽上奏了对齐三策：（一）当前伐齐计划。（二）若不利于战，则实行屯田。（三）若欲取完全之策，则奖励工商，徐养国威，坐讲兼并之道。第一策的理由是，北齐甚至不能收复被力量最微弱的陈国所夺取的淮南，周若与陈联合伐齐，实为最上之计。此上表似深得武帝之心，他立即向心腹人物询问讨齐之可否，话音未落，此人答道应该讨伐，武帝决心遂定。不过，这一计划不曾外泄。建德四年（575），武帝突然召集文武大吏，将此计划公之于众。其缘由极清楚，群臣皆表赞同，讨齐大诏终于下发。规划军事之时，群臣多主张从汾水方面直捣晋阳，武帝不从，专向洛阳进发。然而，北齐在这方

面的守将防备坚固，北周取之不得，空返长安。但经过此战，武帝了解到北齐内部不统一，第二年遂采取直攻晋阳之策。北周大军先向晋州平阳府进攻，由于北齐守将内讧，晋州很快陷落。晋州陷落之日，齐主高纬正与其宠妃游猎天池（祁连池）。急报频频，他却以之为边境小事，不愿牺牲行乐，既而周军逼近晋阳，始还宫城。当时晋阳精锐尚多，齐帝亲自出阵后，齐军士气大扬，齐军南进，欲一鼓作气夺回晋州。两军激战，齐军一时形势不错，夺回了晋州。[\[17\]](#) 武帝一度逃回长安，得到新军后，再次开始进攻。两军激战之时，与齐帝一起出阵的宠妃先逃奔，帝追随宠妃脚步，[\[18\]](#) 这成为齐军大败的原因。大军向晋阳溃逃。经此大败，齐帝气沮，欲使宗室守晋阳，自己逃亡突厥，因此齐已无人认真备战了。唯独高延宗仍持主战态度，齐帝于是将万事托于高延宗，自己从晋阳逃至邺城。周军立即围攻晋阳。高延宗拼死作战，有时还取得奇捷；奈何大势已去，高延宗被擒，晋阳陷落。此前逃往邺城的齐帝在那里不知所措，在群臣的逼迫下禅位太子。不过，周军已长驱直捣邺城，齐室灭亡。时为577年，齐主高纬年仅二十二岁。

周灭齐后，天下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南朝陈却乘周齐交战之隙，进兵北方，自己断绝了与周的和平关系。周军乘灭齐余威，南进而来，其势甚锐；适逢武帝去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暂时中止。

周武帝死时，遗诏托付后事于群臣：

朕君临宇县，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寝。昔魏室将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倾，肇开王业。燕赵榛芜，久窃名号。朕上述先志，下顺民心，遂与王公将帅，共平东夏（齐）。虽复妖氛荡定，而民劳未康。每一念此，如临冰谷。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遭疾大渐，气力稍微……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辅导太子，副朕遗意。[\[19\]](#)

武帝显然有统一天下之志。他有躬率群臣之美德，除刑罚过严而受非难外，一般认为若借他两三年寿命，其志必得实现。但史家所载武帝的最大缺点，在于对太子过严。太子宇文赟，有“非才”的风评，因此武帝对他施以严格的教育。太子朝见之时，与群臣无异，隆寒盛暑，皆不得休息。又，武帝听说太子好酒，于是禁止东宫饮酒，稍有过失，辄加捶扑。其行动也一一受监视。太子于是矫情修饰，由是武帝听不到他的缺失。武帝死，太子立，是为宣帝。在丧中，宣帝恶声就已普遍传开。即位第二年，乐运上表谏诤，数帝八失；但他不知改正。尤其他的苛烈刑戮，最为众声指斥。现在，天下统一的时机已经来到，效忠的却是这等暗君，这引起了普遍的失望。

宣帝在位两年卒，静帝宇文衍继后。然而，宣帝一死，以外戚杨坚辅佐静帝并掌握内外兵马大权的命令突然由太后发出。杨坚是名将杨忠之子。其家固然是纯粹的汉族，但常与鲜卑通婚，因此杨坚有个鲜卑名字叫做普六茹坚。武帝在世时，周室一派的重臣就已忌惮杨坚。宣帝时，杨坚一派与反对派之间似发生激烈暗斗，杨坚自身出至地方上，一时远离了争斗的漩涡。大概抛弃周王室的人们——主要是汉族一派——在逐步推进拥立杨坚以代周室的计划，适逢宣帝暴卒，侍于帝侧的汉族朝臣暗通杨坚，假造遗诏，让杨坚接受了王室辅佐者的全部大权。

杨坚已是周室的实权者，汉族名流李德林、高颎之辈都起誓为他尽忠。不过，曾讨平四川的宿将尉迟迥，地位原本远在杨坚之上，他不愿屈居杨坚之下。且周宗室之中多有与之通款者。因此当杨坚要将尉迟迥从他的任地邺城移调他处时，他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对于杨坚而言，还有一个可畏惧的人物——名将韦孝宽。韦孝宽当时在徐州，主要在实行讨陈的计划，在悉数讨平陈所夺北齐的淮南之地后，他正在返归北方的途中。不过，韦孝宽似乎已与杨坚意志相通，尽管尉迟迥千方百计欲将他拉到自己一边，他却巧妙地避开了，并安全地北进至河阳城。此城有八百鲜卑人镇防，其家人皆在邺。他们看到韦孝宽

士兵很少，心生轻蔑之意，欲相谋响应尉迟迥。韦孝宽向他们许诺厚赏，将他们带到洛阳。恰好杨坚以周帝之名由长安派出大军，任命韦孝宽为总帅。韦孝宽于是征讨尉迟迥。当时，长安人心浮动，名将高官等如何站边难以预料。杨坚企图诛灭那些态度不明确的人，李德林谏止道，如今人情迷于去就，必以宽大人，只需监视与敌通谋的情况就可以了。据说，杨坚采用这一方针后，人心稍安。起初，尉迟迥的势力积累得非常大，但他已是老耄之年，难当实务之规划，举兵仅两月就被击败，以至自杀。同时反抗杨坚的四川王谦也被讨平。此乱之后，杨坚地位稳固，580年被封隋王，次年受周禅，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

文帝建隋以来，或起新都于长安，以固永久定鼎之基，或讨突厥，使沙钵略可汗朝贡，帝业已隆，于是在开皇八年（588）下诏，派大军征陈，次年灭陈，完成了天下统一的大业。隋与陈的交涉详见前一章，时为589年。李延寿《北史》之中包含了隋一代的记事，但笔者认为，隋是赫赫大唐帝国的先声，隋唐的历史可以另外总括起来综合叙述。

注 释

[1]. 其后的论述，高欢、宇文泰有时径称齐神武、周文帝，东魏、西魏也有时作齐、周。

[2]. 据《资治通鉴》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三年（537），东魏恒农城有大量仓粟，宇文泰因关中大饥，就谷恒农五十余日。高欢西征，派高昂率兵进围恒农，阻断西魏的补给。至沙苑之败，高昂从恒农退守洛阳。故南面并没有军队越过潼关，进围长安。

[3].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

[4].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48页。

[5]. 《北史》卷五《东魏孝静帝纪》：“澄尝侍帝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第196页。

[6]. 《北史》卷六《高祖神武帝纪》，第232页。

[7]. 《北史》卷六四《韦孝宽传》，第2290页。

[8]. 见前文脚注所引《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荣便攘肘谓天穆曰：‘……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

[9]. 引文见《北史》卷七《显祖文宣帝纪》。此处说“意译均见于两者的记事”，但基本照用《北史》史料，所以译者直接引用《北史》原文。

[10].《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第2210页。

[11].《北史》卷九《太祖文帝纪》，第330页。

[12].《北史》卷八《世祖武成皇帝纪》：“神武方招怀荒远，乃为帝（高湛）娉蠕蠕太子庵罗辰女，号邻和公主。”第281页。可知，高欢为高湛娶柔然女，号“邻和公主”。

[13].《北史》卷九二《恩幸和士开传》，第3044页。

[14].《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文帝天嘉五年（564）。

[15].见《北史》卷八《后主纪》，第300—302页。

[16].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四年（572）。不过，帝先在文安殿见宇文护，后引之入含仁殿谒太后。在谒见太后之前说了此番话，而非“谒见将终”。

[17].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八年（576），周武帝引还大军，仍留精兵守晋州平阳。齐军围平阳，但未攻下。故而齐军未完全夺下晋州。

[18].齐主宠妃观战，见东偏稍却，恐惧，说“军败矣”，齐主最终携宠妃北逃。似不能说宠妃先逃，齐主跟着逃。

[19].《周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第106页。

外编

第一章 魏晋的文明

第一节 东汉的经术主义

宋王应麟将东汉视为经术主义的时代。他认为，东汉努力于普遍养成经学上所认可的美好风俗，且实际这一努力得到了实现。《后汉书》屡用“移风易俗”一词，此词自然可作两种理解：实现美好风俗的意图，实现了美好风俗的结果。

战国末的大儒荀子特别注重礼，认为应以礼的习得程度来编次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换言之，社会阶级）。今若无视其间位置之次第，将习得了礼的人们看作一个整体，则它即儒者所云“士类”，与无告之庶民对立。若将荀子所言“礼”字普遍换作“儒术”，则可以说前述看法大体表现了东汉人的看法。笔者所主要依据的《后汉书》自然是以朝廷为中心而书写的历史。其列传是士类之传或准士类之传（逸民传、列女传）。其间，经术主义到底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是接下来论述的要点。

东汉士类所实现的美风之一，在于孝义。《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罗列了尤以孝行闻名的一类人物。在序文中，范曄将孝行分作大养、义养两种，以孔子之言“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为大养，“啜菽饮水，孝也”为义养。传中所列刘平以下诸人固然被归为义养之人，而他们必受王者表彰，得到了普遍认可。范曄云：“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范曄在开始列传之前，先叙述了汝南郡薛包（或作“苞”）的孝行：

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

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1\]](#)

惠栋引《汝南先贤传》曰：

苞归先人冢侧，种稻种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饭。[\[2\]](#)

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孝行例子。由此可见，孝义的中心问题实为儒家所传的丧服制。对三年之丧内外的严守、六世共财的法则等，是家族道德的规范。《后汉书·韦彪传》曰：

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3\]](#)

面临父母之丧，为人子者必须如此遵守规范，在表述孝德之时，这也几乎是常用的形式性词句。换言之，在这一时代，孝道表现为家族统制的法则。

同血缘的家族群即为宗党。在中国，乡党与家族往往相伴使用，尤其在汉代，二者似混杂使用。例如《后汉书》列传第四十三《周黄徐姜申屠传》序中载有太原郡荀恁的略传，其中说道：

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4\]](#)

王先谦的《集解》引用沈铭彝的研究，表明“散与九族”在《汉书》中作“分施九族州里”。也就是说，范晔著《后汉书》时仅以“九族”替换“九族州里”一语。因而可以说“九族”含有“州里”之意，反过来也一样。地方有时称“某氏之间”，这似乎也表明宗族团体是一乡党的一部分；从这点看，宗族与乡党绝非对立的概念。相反，史书多有家族孤立于宗族乡党的记录。例如《周燮传》载：

有先人草庐结于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
乡党宗族希得见者。[\[5\]](#)

又《朱晖传》载：

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6\]](#)

对照其后的文句，我们可以看到，“乡党”一词中必定包含了“宗族”之意。朱晖子朱穆作《绝交论》，讥讽东汉末过度尊崇乡党宗族等社会性情谊之弊。

如果我们不将宗族与乡党对立起来看待，则理论上，家族与宗族也不应对立起来看待。因此范曄认为朱穆的《绝交论》是矫时之作，又常以“狷介”评论置家族于孤立状态的诸人。不过，在任何场合，“相对于家族的个人”的思维在这一时代尚未出现。家族实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单位，而显扬于这一时代的有关家族的法规为后世中国文明打下了牢固基础。非常情形下的法规，例如为父复仇，虽屡给国家统治带来麻烦，但一直得到普遍认可。

作为家族一员的个人，其对宗族、乡党的德义自然普遍表现在分与财物上；但进而尽力于地方普遍性繁荣的例子也是有的。例如《王丹传》载：

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孳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7\]](#)

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其他作为处士而振兴地方生产的例子散见各处。

以朝廷为中心而书写的《后汉书》之所以大量记载这种对家的孝义、对宗族乡党的友谊，简而言之，是因为这种行为对当时的政治具

有某种程度的意义。以下从这点作一考察。

一般来说，在整个汉代，郡的长官（太守）可在其权限内向中央推荐地方人物，此所谓察举之制。此时，人物选择的标准是地方乡党的声望。原本当时的郡太守与地方人士平常交往相当亲密。例如《后汉书·郅恽传》记载，汝南郡有一种风俗，每年十月郡府召开宴会，百里以内之县皆赍牛酒来郡府宴饮。^[8]文中所谓“县”可解释为郡府属县的官吏，不过此风俗恐怕应作稍广范围的解释。因为据《伏湛传》，东汉始祖光武帝建武三年（27），因伏湛之请，乡饮酒礼始在郡国施行。据《仪礼·乡饮酒礼》大儒郑玄注，当时郡国于十月举行此礼。汝南郡上述风俗也在十月，正是乡饮酒礼举行之时。故而即便“百里以内之县赍牛酒”是特别的风俗，但总之郡国确实普遍举行了乡饮酒礼。据《周礼·乡大夫》郑玄注，东汉时代郡太守举荐人物时，大抵有孝廉及茂才两个标准，而其时必行乡饮酒礼。被推举为孝廉或茂才的，有时是郡守或县令之下的属僚，有时仅仅是地方名士。尤其当时郡守之下的主簿、祭酒之类，在官制上虽是属僚，但实质上对于郡守似有属僚以上的权威。顾炎武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条中对其中原委阐述甚详。章炳麟《检论》“通法”条将蔡湛碑阴所谓“议民”者解释为参与县政之人，笔者对此难以赞同。三老、故吏、处士、义民之类，虽然在官品上与主簿、功曹之类判然有别，但两者在资籍上有互通之处，且与一般庶民有别。因此在整体考量此等地方士类时，郡守重视他们的舆论（所谓乡论）则属当然；再者，此乡论由经术所统制，这是东汉时代所宣扬的地方文明的特色。

当地方官及其僚属的团体，原则上由郡人担当乡职的团体，以及地方官府特别区分在庶民之外的逸民、义民之类，他们整体组成一社会时，自然在其统制上，对上司尽忠的所谓节义观念就生发出来了。东汉末年，当这地方性的社会发生大混乱时，节义之德反而愈加彰显。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汇集了很多例子。

要之，东汉家族之德——孝义，对宗族、乡党的友义，对上司的节义，此诸德由经学打下理论性基础，并成为支配后世文明的根底。东汉末年流行一种风气：地方有力的名望家死后，其门生、故吏等共同为之立碑颂德。东汉末年的文章家蔡邕屡应人之请，撰定碑文；他常极度铺陈故人之德行，有人认为其文章是无内容的形式性文体之源头，开其后魏晋六朝文风。笔者对此说有同感，然而正因为它形式化，我们据此可明白当时理想人物的模型是怎样的。这里列举彭城人姜肱之碑作为一例：

先生既蹈先世之纯德，体英妙之高姿，立性纯固，百行修备。故其平生所能，事亲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华，萼韡之度。体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静守约，恩及婴儿。恬荡之固，至操动俗。邑中化之，外户不闭，冶藏无隐。及其学而知之者，《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阴阳，有名物定事之能，独见先睹之效。然犹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童冠自远方而集者，盖千余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声远布，华夏同称，名振当世。[\[9\]](#)

也就是说，理想人物始于孝友之德，终于个人的学艺修养。欲取得这一时代的官吏资格，可参加诸生与文吏两种途径的考试。应诸生之试者需预先得到地方官的保举，这需郡守之下督邮的证明。其示例留在《通典·选举门》原注中：

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见授门徒五十人以上。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10\]](#)

对于史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所描写的东汉平和的文明，在综合考察上述诸点时，我们似可得其大致的观念。

注 释

- [1]. [《后汉书》卷三九，第1294—1295页。](#)
- [2]. [惠栋：《后汉书补注》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415页。](#)
- [3]. [《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17页。](#)
- [4]. [《后汉书》卷五三，第1740页。](#)
- [5]. [《后汉书》卷五三《周燮传》，第1742页。](#)
- [6]. [《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第1459页。](#)
- [7]. [《后汉书》卷二七《王丹传》，第930页。](#)
- [8]. [《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汝南旧俗，十月飧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第1027页。](#)
- [9]. [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全后汉文》蔡邕《彭城姜肱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16页。](#)
- [10].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七《职官九》，中华书局，1988年：“其《督邮板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理《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经明受谢。见授门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谢生，三郡三人，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第766页。](#)

第二节 东汉风俗的败坏

前节叙述了所谓东汉经术主义下地方文化的一面。原本经术主义仅作为塑造一般文化的范畴而起作用，它无疑是一种概念性的形式。以私欲为本能的种种家族群之中，有的家族以这一形式调和自身，从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以及权力者的承认，同时显而易见，采取相反行动的家族也大量存在。作为东汉地方模范家族的例子，先介绍樊宏的传记：

樊宏……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推为三老。……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

宏少有志行。王莽末，义兵起，刘伯升（东汉始祖光武帝之兄）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阳，城守不下。……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塹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世祖（光武帝）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进，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长罗侯。[\[1\]](#)

惠栋引《续汉书》，书中描述樊氏农园内六畜、林木、陂池、果谷的景况，而后写道：“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又，其

陂池之广也见于《水经注》。要之，这类人物从上到下都博得了声望。再举冯衍上疏的一节：

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王莽乱），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2\]](#)

可见，殖产、孝道、道德三者的结合带来个人幸福，这是当时人的理想。然而，社会上层之间逐渐产生了与上述家庭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东汉文明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今以汉末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为主，对这方面作一论述。

王符说，当时人一旦富贵，即多败家之行：

贫贱之时，虽有鉴明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人多骄肆，负债不偿，骨肉怨望于家，细民谤讟于道。[\[3\]](#)

又，远在战国之时，与墨子派的薄葬说相反，儒家曾普遍持厚葬说；而东汉末儒者都持薄葬说。但事实上，葬送仪式却被当作一种炫富手段，对于这种糟糕状况，《浮侈》篇说道：

（意译）东汉末，洛阳贵族丧葬必用好棺。此棺以江南櫟梓豫章梗桡制作，此等木材多生于深山穷谷，必得经历艰险山路，耗费大量人力。既已砍伐运出的木材，以牛车运至大江，入海，又由淮水浮黄河，而后达于洛阳。在此，棺始由工匠之手而成。故一棺之成，功将千万。棺之重万斤，再将其自洛阳运往东至乐浪、西至敦煌的广大地区，所费巨亿。又陵墓之中，刻金镂玉，良田造莹，多埋珍宝、偶人、

车马，造起大冢及庐舍、祠堂。又丧葬当日，地方名望家全部会葬，待客之车马帷帐之类，竞为华美。[\[4\]](#)

与王符几乎同时代的崔寔也在《政论》中痛斥厚葬之弊，然而他自己却为了亡父的葬仪及冢莹石碑，卖尽所有田宅，穷乏之余，卖酒为生，由此博得了好评。总之，家族仪式变得极端虚伪，当时甚至常见这类故事：守三年之丧于墓侧庐舍，其间却生出很多孩子，身体反而肥满起来。

当经术主义——东汉文化的根本——为家族私欲之本能所取代，社会将致混乱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生活在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在《昌言》的《理乱篇》《损益篇》中极清晰地描绘了当时豪族奢侈、专恣之状：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理乱篇》）

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损益篇》）[\[5\]](#)

由此可见，东汉末豪族兼并土地，兼营农、工、商三业，恣意享乐生活，结托侠客之类，杀人夺财等事率意为之。《潜夫论·断讼》记载：当时的势力之家为满足奢侈，甚至向人借钱而杀害债主，为此暂且获罪，不久即逢恩赦。犯事者自然再也不可选辟做官，但实际上州司、公府反争取之。又据王符说，在当时的洛阳，有人以杀人为买

卖。就这类事实来看，豪族与官府已相结托，且是财力与权势的勾结（《潜夫论·考绩》），因此东汉盛时的经术主义完全崩坏了。

那么，在这种普遍情势下，无告之庶民的境遇如何？对于加诸自身的不公正，他们可去上司那里控诉。乡里诉讼相助也已成风俗。然而手续繁杂，颇耗费用，且官府互推责任，庶民诉讼无果，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述赦》《考绩》）。于是地方上逐渐没有了认真从事生业的人。王符在《浮侈》篇中说道：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给，比肩是也。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傅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今洛阳贵族，衣服、饮食、车舆、庐舍之盛自不待言，即从奴仆妾，亦皆服细葛、越麻，其中尚有服冰纨锦绣者。犀象珠玉，虎魄玳瑁，金银头饰，獐鹿履舄，文组彩绌。昔传奢侈王者之饰物，今在仆妾之身。贵族嫁娶所用车骑侍僮，庶几可比昔天子一宴而尽其资产。[\[6\]](#)

田舍荒芜，各地都会混杂。财富分配恐怕急速不均化。此必然激起一般性动乱。这混乱到底呈现怎样的面貌？以下试作一简单叙述。

注 释

[\[1\]. 《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第1119—1120页。](#)

[\[2\]. 《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第986—987页。](#)

[\[3\].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三《忠贵第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12—113页。](#)

[\[4\]. 《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第十二》：“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橈梓豫章榱桷；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橈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生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

丧。或至刻金镂玉，櫨梓榱桷，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第134—137页。

[5].《全后汉文》卷八八《仲长统·昌言上》，中华书局，1958年，第949—950页。

[6].《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第十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鹿履舄，文组彩绶，骄奢僭主，转相夸诤，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駟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殮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第120—130页。

第三节 东汉末的乱离状况

东汉衰亡之兆始显现于安帝元初元年至四年（114—117）羌族的入寇。其大体情形已述于《内编》，关于这时汉族所蒙受惨状的一般情况，拟举王符《潜夫论》一节如下：

（意译）氐羌始反，其军未有统制，器械亦不精良，然地方官处置失宜，甘肃、山西边境先遭蹂躏，其后河北、四川地方亦蒙其害。然而未直接受害的内郡人士，对此的议论如何？彼等徒唱放任论，以为祸害自然消弭。朝廷公卿辈亦与之雷同，欲捐弃甘肃，专在陕西抵御氐羌族。其结果如何？甘肃凉州之民，或覆宗灭族，或妇女遭掠，为人奴婢，远见贩卖。人情皆慕乡里。民之畏徙，甚于伏法。伏法则一人死而事谐。若离故乡，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今多数流民逐道东走，流离分散，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而政府犹谋移徙人民于内地，愚昧之至。捐弃荒漠无边之西北土地，迁民于人口充实之诸地，有违民情甚矣。[\[1\]](#)

如王符所说，这时内郡人士对于羌族的入寇并无强烈的反感。不过，其后桓帝元嘉年间（151—153），凉州诸羌一齐再反，自四川、湖北至陕西、山西、河北地区皆受其“害”，汉族间始生惊怖之念。当时流行这样的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

对此，范晔的解释是：甲卒多被征发，只剩妇女割麦。而征发不限庶民，延及有爵位的士族。“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2\]](#)

对汉族的压迫，先自外部而来。接着，大乱起于内部。黄巾就其性质而言，是张角等纠合下层无告之庶民，反抗官宪。不过，黄巾首领原本不是站在庶民的立场上举事的，自然他们得势后，滥用权力，耽于极度享乐的生活。《抱朴子·道意》篇记载张角一派如下：

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至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藪。（平津阁本）

这种暴乱所致的残害，必然不分士族或庶民，而普遍给人们带来苦痛。因此皇甫嵩起而讨平黄巾时，百姓歌曰：

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本传）

士民松了口气，安心了。不过，一旦打乱了的地方统治并不因黄巾的诛灭而得到恢复。白波、黑山分别“肆掠”山西、山东各州郡，同时匈奴、乌桓等民族以掠夺为唯一目的骚动也跟着起来，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苦不堪言。曾割据河北北部的公孙瓒，在今河北易县之南“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时，人民对他寄予信赖。童谣曰：

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

[\[3\]](#)

可见，河北中部平原已不是安居之所。

原本自《诗经》时代以来，北部中国历代皆有流民。但东汉末年，在王符生活的那个年代，他就特别提醒道，洛阳及其他都会游手之徒已非常之多。可以推想：其后内乱所致流民数量的日益增多，超出想象；且洛阳成为战场后，大量游民流散四方。与黄巾首领以一种宗教式迷信纠集愚民一样，进入英雄时代后，割据之徒以武力纠集这些流民也属自然，而两者同样是统一的破坏者。只是这般纠合而来的

势力如何利用，似与英雄的人气关系重大。公孙瓒曾博得普遍的好感，但不久走向失败，《后汉书》本传记载其败因如下：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4\]](#)

侯康《后汉书补注续》注引文开头“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一句时，引用《太平御览》的记载道，[\[5\]](#) 由于此天灾，幽州之民始知采稻，又以枣椹为粮。参照《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的记载，则可认为，先是一般饥民食枣椹度日，其后本应从割据者那里领受配给的军人也只能“仰食桑椹”了。总之，公孙瓒不恤饥民是他普遍不受欢迎的第一原因。又，对于引文所云公孙瓒多宠爱商贩庸儿，惠栋注中特意列举了与公孙瓒盟誓为义兄弟的三人，即卜数师某，贩缦某，以及贾人某。也就是说，公孙瓒显然重用平常为一般士流所轻视之辈，以压迫士流。作为以力为唯一依靠的三国初期的英雄型人物，公孙瓒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一旦英雄时代来临，离开土地流亡的人就限于无告之庶民，地方豪族也逐渐卷入这种时势中。翻检《三国志·魏书》列传，这种例子随处可见，尤其北部中国大平原地区（所谓四战之地）名族的流动非常之多。一一列出则不胜其烦，以下叙述代表性的几例。

董卓被杀后，部将乱斗，陕西地区秩序最乱（参照《内编》）。故此地名族流转他乡者非常多，但严幹、李义二人始终不离乡梓，而其生活情形是：

与诸知故相浮沈，采樵自活。[\[6\]](#)

又同书记载，三辅乱，扶风（陕西兴平）亭长王忠不堪饥乏啖人，率同伙南向武关（陕西商洛东）。当时在荆州的某故知迎接王忠，王忠却夺其兵。后王忠为曹操所任用，曹丕“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

令俳取冢间髑髅系着忠马鞍，以为欢笑”[\[7\]](#)。这虽是小说化的记事，但在当时吃人行为是容易发生的。

在河北北部被称作蓟州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田畴的人。他原是幽州刺史刘虞的部下，刘虞为公孙瓒所杀后，他率宗族及附从者数百人，扫地而盟，立誓复仇，遂入徐无山中。自河北北部玉田县跨越长城之处，有卢龙塞之险，徐无山应是它附近的山。其后，很多百姓慕名而来，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于是山中渐成郡邑，田畴乃为他们设立规约，先制定死刑及其他二十余条法律，又制定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又因其地与乌丸、鲜卑族相接，田畴与他们保持了亲睦关系。在地方豪族领导下建立小独立团体，这是最著名的一例。东汉末三国初，长江流域一带受害相对较小，因而大量流民及北地名族向这一带移徙。孙吴立国凭借北方名族之力颇多，且蜀之刘备、诸葛亮皆北方人，这些都是明证。作为豪族移徙的代表性例子，我们来看看《鲁肃传》的一节。

鲁肃是东城县（安徽定远）人。据《吴书》，鲁肃见天下将乱，进入南面淮山山中练习骑射。既而河南地区扰乱，鲁肃命其所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鲁肃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南向而行。其州闻之，遣州骑追至，鲁肃勒兵持满，谓之曰：“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追骑于是放走了他们。[\[8\]](#) 在弓箭的保护下，男女结作团体移徙的情形跃然纸上。

由以上例子可推知，有很多人为求乐土而移徙。孙吴筑造了建业城，这将在后章详述；在刘表治下，湖北襄阳也相当繁盛，其后似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都会。

清末学者杨守敬著《水经注图》，对《水经注》所记繁华都会，卷末附有详图，其中就有湖北北部的襄阳。《水经注·沔水》叙述魏

武帝平荆州，始在此地置襄阳郡并以之为荆州刺史治所的历史，说道：

邑居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

《水经注》著者酈道元是北魏末人，据这一记载，当时襄阳的繁华可想而知。而可与之对比的都会是河南南部的南阳城，荆州刺史的旧治所。[\[9\]](#) 刘表镇襄阳，刺史的治所大概自然移于襄阳。酈道元时，南阳城似比过往缩小，据说原来的殿基在东城，而新城的西北隅也有殿基，故旧时南阳城规模颇宏大。而酈氏对南阳城没有特别留意之处，就此而言，可推想北魏时南阳已衰微。笔者认为，南阳衰、襄阳盛，始于东汉末三国初期。

南阳临涇水。涇水与汉水会合之处即襄阳。司马迁列举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即南北之潮所合之处，在东是安徽寿州，在西是河南南阳。南阳位于淮水流域的上游，南控湖北平原，西自武关可入陕西，是战国以来的著名都会，在西汉以长安为中心极力实行统一政策的时代，如《史记》所说，它成了南北融会之地。东汉都洛阳后，南阳在交通体系上的位置自然有了一些变化，不过，兴起东汉的光武帝是南阳人，故此地称为南都。有名的张衡所作《南都赋》描述了此地的繁盛景象。且东汉一代特别奖励以南阳为中心的地区的开垦，南阳郡人口显著增加。三国初期，袁术割据此地时，南阳户口犹称数十百万。其后，为袁术、张绣所扰乱，曹操征讨张绣之际，此地似发生大激战，曹操在涇水边恸哭祭奠阵亡将士。大约陕西的乱离跨过武关，延及此地，造成了严重后果。反之，刘表治下的襄阳却一时文运昌盛。

《后汉书》本传曰：

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闾、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10\]](#)

惠栋注引王粲《荆州文学记》曰：

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闾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

据说本传中的“千数”所据的是《镇南碑》。儒者宋忠以及被许为时望的韩嵩都是南阳人，大概荆州的中心已由南阳转移至襄阳了。

南阳这种荒废的现象似同样发生于江苏北部的彭城（徐州）。起初陶谦据徐州时，“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有些流民甚至远自陕西地区移徙而来（参照《后汉书》本传）。然而据说其后陶谦被曹操击败时，陕西流民殆尽。此外，由于徐州动乱，部下笮融于是率男女万口，马三千匹，移徙广陵（扬州）。很多彭城名流因之渡江，其中很多人依于孙氏，襄助其业。

以南阳为起点、徐州为终点的江淮之间，与首都的荒废程度相同，据“江、淮间（人）相食殆尽”（《后汉书·袁术传》），或“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11\]](#)等记载，我们可推想江淮惨状的一般情形。参照前述鲁肃一族大举渡江的记载，则离乱之状可得而知。

曹操曾在给陶谦的罢兵诏书中说道：

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
[\[12\]](#)

又建安七年（202），曹操在故乡谯城下令曰：

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13\]](#)

此足见一般之状况。诗人王粲以《七哀诗》叙述乱离光景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此诗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不仅一般流民之母子不得安处，士流也在乱离的波浪中飘荡。

注 释

- [1]. 参见《潜夫论笺校正》卷五《救边第二二》《边议第二三》《实边第二四》。
- [2]. 《后汉书》志第一三《五行一》，第3281页。
- [3]. 《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第2362页。据本传，似先有童谣，而后公孙瓒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并营建诸设施。
- [4]. 《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第2363页。
- [5].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英雄记》。
- [6].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裴潜传》裴注引《魏略》，第674页。
- [7].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略》，第18页。
- [8]. 《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裴注引《吴书》，第1267页。
- [9]. 此处及下文的论述有误，南阳并非荆州刺史的旧治所。
- [10]. 《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第2421页。
- [11].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14页。
- [12]. 《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裴注引《吴书》，第249页。
- [13].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2页。

第四节 汉末三国初期的政治论与曹操的统治方针

班固作《两都赋》，比较两汉风俗，尤其铺陈东汉风俗之纯美，认为这完全是始祖光武以来人德与施政的结果。作为光武帝施政的长处，班固所举主要之一端如下：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1\]](#)

我们虽不知引文中的“下明诏”指的是哪一份诏书，但总之，作为东汉的经济政策，以重农论者的学说为指导性的理论则是事实。光武帝恳切劝奖节俭、重农。东汉思想家仰之为一代王宪之根本。而通览光武帝的诏令，其中毫无兴国气象，如姚姬传所说，难掩衰萎之气。[\[2\]](#)以下将西汉始祖高祖与光武帝在封功臣时所下诏书作一比较：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本纪十二年三月诏）[\[3\]](#)

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后汉书》本纪建武二年正月诏）[\[4\]](#)

前者以帝王的权威要求功臣奉公之义务的意图强烈，后者以君子温情向人训示退让之德的倾向显著。今不在价值上评判两者，仅就实际情形而言，后者在王者的权威上明显较弱。光武帝所开创的东汉王室的政治方针完全是消极性的，这恐怕受始祖性格的影响较大。然而如前节所述，东汉末年的社会状态是：崩坏之兆，历然在目。东汉传统方针即经术主义不能救之。相反，关于救济之道，东汉末年的思想家都明确主张必须尊重法的力量。

章炳麟《检论·学变》有以下一节：

东京（东汉）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疾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扬雄诸家。[\[5\]](#)

今对于章氏的考证，不再费力一一作注释。但据最后一句，可知章氏对仲长统的《昌言》最为推崇。仲长统生活在三国初期的英雄时代，其学说似对整个三国时代有相当影响。其后，历事曹魏四主的缪袭撰次《昌言》，奉之于朝廷。缪袭还以仲长统与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相比较。章氏盖以其好尚，特举扬雄而略其他。《昌言》三十四篇仅有少部分留存至今。要之，仲长统的想法是：随着时势的变化，德治、法治各当其用，说到底，人主应以至公之心临之。我们从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中《昌言》最初一篇中精选两三句，例如“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又如“任循吏于大乱之会，必有恃仁恩之败；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杀良民之残”[\[6\]](#)，这可看作仲长统在目睹现实

乱离之状后明确提出的政策主张。通过前节引文，我们知道他对现实乱离的感受是多么深刻。如此，他的议论归结到“必罚主义”实属当然。例如《损益篇》曰：

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

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7\]](#)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必罚主义”的意味。当然，与儒者一样，仲长统也以德教为根本，我们倒应将他视为儒者的正统派；而他的思想与风靡东汉的儒者思想，方向完全不同。

可以说，东汉末至三国初期的思想倾向首先由《昌言》所代表。而在实际政治方面，曹操主要担当了乱离最酷烈的北部中国的统治，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他的行为方式。

关于曹操的家世，或以之为曹参之后，或往上追溯，以其源出黄帝。要之，如王鸣盛所言，陈寿作《三国志》时，以为曹参之后，忽又改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应就字面意思作解释。今日仅能确定的是，曹操是宦官曹腾养子曹嵩之子。曹操父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的记载见于《曹瞒传》及《世语》两书，有的学者相信这一说法，有的学者不信，此说并无定论。笔者倒是同意潘眉的意见，认为曹嵩出自夏侯氏（《三国志考证》）。要之，曹操是宦官曹腾之孙，又是与宦官结托的沛郡谯县（安徽亳州）土豪夏侯氏之子。曹操出身宦官之门，为东汉末年名流所轻视，陈琳为袁绍所作的著名檄文中明白贬斥“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结托宦官的夏侯氏，恐怕是为当时清流所摈斥的那种地方土豪。对于曹操的青年时代，《魏书》本纪写道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曹瞒传》写道他“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这多少记录了他的生活作派。尤其其子曹丕在《典论·自叙》

中叙述自己的生活：少时即习弓马骑射之术，最愉快的似乎是游猎于春天的原野。《自叙》一节曰：

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邙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8\]](#)

这是他最怀念的旧事。当然，《自叙》特意写明时代的乱离使他学习武术，但这恐怕是托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其后的明帝身上，曹氏对游猎的兴趣愈加浓烈，为了满足此兴趣，明帝不惜滥用帝王的权威。《魏书·高柔传》记载，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高柔对此表示反对：

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②](#)

由此可见，即使曹氏成了帝王，其家风也丝毫未变。

评说曹操之为人者，皆认为他机略纵横。在军事上，他设奇谲敌，变化如神，又时时“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其他骑射、书法、围棋诸艺，无不精擅。《曹瞒传》不隐藏曹操的短处，甚至专好记录此方面，书中称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恐怕这也是曹操的一面。

曹氏既非清流，为人又机略纵横，因而其下网罗了各种人物。孔桂，便辟小人，以晓博弈、踰鞠即得重用，就是突出的一例。曹操也通过任用各种人才，毫无顾忌地打破了东汉经术主义流于形式的弊端。为了阐明这点，我们先看看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中的一令。[\[9\]](#)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曹操下发一令，向众人表明其心迹。令文很长，简单摘录如下：（一）曹操年轻时，为立名誉，在济南热衷于政治，但为地方强族所迫，其志不遂。（二）回到故乡谯城，在谯东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度一生。[\[10\]](#)（三）不过不

能如意，于是作为军人出仕。当时的愿望在于作为汉室大将军，留下赫赫威名。（四）然而自董卓叛乱、袁术僭伪以来，以至讨灭刘表，他的地位逐步提高，身为宰相，位极人臣。（五）若没有他，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悉数摧毁了这些人的希望，自然他本身并无称帝称王的野心。然而舆论妄相忖度，他于是向诸君明白地表明心迹，同时常对妻妾说，他死后，她们若再嫁，应向他人传道此心。

（六）他的三子已封侯，自己也在相位上，犹掌军权。今此二事，不可辞退，为万安计也。（七）现今食邑过多，欲返还若干。

包含上述内容的命令确由曹操所下发，但陈寿作《三国志》时不载此令。因此此令在什么情形下以何目的下发，并不清楚。裴松之在《三国志》“冬，作铜雀台”的记载下引用此令，粗一看似乎铜雀台之修建与此令有所关联。不过一般认为，裴注在体裁上，相较于注解，为了广搜异闻而采用旧文的情况更多；因此，这应是其中一例。通过此令，中国学者有种种忖度曹操心事的论说，但那完全属于想象。这里不介绍这些附会之说，仅据此令之内容可知：曹操最初追随东汉传统，欲作为汉室一位名臣而终其一生；中间世事纷乱，他作为强有力的汉室保护者而活动；而在今后，他也想始终作为汉室的保护者，同时人们普遍推想他将夺汉室。

不穿凿其动机，仅就其行迹来看，曹操算是逃脱了篡夺的污名。与曹氏关系最深的夏侯惇作为军人派首领，无疑在暗中策划过曹操生前的即位（参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引《魏氏春秋》《世语》），而曹操以周公自任。这随处表现在他的言语（《魏氏春秋》）、文章（《魏武故事》）、诗歌（《文选》）中。不过，曹操虽在名义上不曾称帝，实际上一切命令皆出自其手，东汉献帝只是架空了的名爵授予者而已。曹操欲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持实力的这一坚定决心，明白表现在前述命令的第六条。武力是统制的唯一方法，他明白展现了这一点。

建安八年（203），曹操下发如下两令：

司马法“将军死绥”……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11\]](#)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12\]](#)

以上第一令纯属军令。从第二令中，我们看到，当时犹惯于汉室统制方法的论者之间，军事应任之军人、郡国政治应任之文吏的意见尚强。曹操一反这种舆论，明确表示有事之际，当采用功赏主义的政策。建安八年正是其追究袁绍余党之时。

接着，建安十五（210）、十九（214）、二十二年（217）下发了三条有名的用人令：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本纪）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本纪）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裴注引《魏书》）[\[13\]](#)

以上三令极直接地说出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即不问德行，以才能为主拔擢人才。东汉的经术主义至此已完全被打破了。

建安元年（196），曹操拥立献帝于许。当时太尉杨彪已是汉室柱石，又是四世三公之子孙，其家与袁氏并称，且在家风清白这点上被尊崇为第一名家。然而这一年他险些被曹操杀害。海内名士孔融救了他。据《后汉书·杨彪传》，当时孔融对曹操责以大义，以若不听从，“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之名言抑制了曹操的计划。这一类人始终以汉室为中心，期许曹操为汉室忠臣；然而他们抱持这种思想，势必与曹操不能两立。孔融被杀，杨彪虽仅免其身，但其子杨修终遭屠戮。这时曹操给杨彪的书信确有冷酷刺骨之感：

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古文苑》）

[\[14\]](#)

荀彧是对曹操最尽心力的帷幄谋臣，当曹操幕下计划推曹操为魏王时，荀彧表示反对，遭忌而被毒杀。于是东汉时代的名门或固持经术主义之士在曹操晚年都缄口不言了。大概曹操在名义上推戴汉室，惟其如此，固守东汉传统统治方式的论者犹有发言权，由于此点，曹操被冠以奸雄之名。而事实上，他以其势力统治着杂乱的北部中国。身处这一矛盾漩涡而一时安定了北部中国，这是曹操富有机略的体现。为了自由发挥他的机略，曹操主要在政治上利用了申商的法术主义；《曹瞒传》尤详于此方面的记载：

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太祖马腾入麦中……因援剑割发以置地。[\[15\]](#)

这类例子犹有两三例。要之，曹操的法术主义指的是因时制宜的方法，它绝没有树立客观性标准以确立一般秩序的意味。不过，之所以北部中国暂得以保持安定，不正是因为社会普遍强烈要求这种武力式的法术政策吗？

注 释

[1].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第1368页。](#)

[2]. [《古文辞类纂·序》：“诏令类者……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姚鼐，字姬传。](#)

[3].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78页。](#)

[4].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6页。](#)

[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175页。](#)

[6]. [《全后汉文》卷八八《仲长统·昌言上》，第948页。](#)

[7]. [《全后汉文》卷八八《仲长统·昌言上》，第950页。有校勘曰：“‘奇’当作‘苛’。”](#)

[8]. [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

[9].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所引《魏武故事》载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第32—35页。](#)

[10]. [《让县自明本志令》曰：“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资治通鉴》作：“为二十年规，待天下清乃出仕耳。”](#)

[11].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3页。](#)

[12].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23页。](#)

[13].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2、44、49页。](#)

[14]. [《全三国文》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第1070页。](#)

[15].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55页。](#)

第五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一）

为理解魏、西晋政术的真相，先作如下简单说明。这种说明似有详细论证的必要，我们暂且将其视为事实。通观两汉，政治是以全中国尤其北方中国的豪族群为中心而实行的。豪族群绝没有家门高下，只是地方的社会性势力的保有者而已。中央政府从这些豪族群或通过豪族群拔擢贤才，或如东汉一样，延引经术之士。这是政术中正常的状态。西汉武帝之时，商贾出身的一团体曾获得非常大的势力，这受到了整个豪族群的猛烈攻击；又，在东汉，宦官阶级滥用权力，于是招致了东汉王室的灭亡。这种政治上的不当做法，与前述东汉末的社会混乱一起，引起了中国秦汉统一帝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混乱，而政治中心北部中国的混乱尤其剧烈，自属当然的现象。

中央失御，群雄竞力，地方豪族群自然不知所归，附彼叛此，其间或兴或亡，不计其数。处在这种时势下而欲以东汉末的宽厚之政求得人心的归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袁氏一家世代名族，厚礼结交天下名士，但这仅使一党一派势力过度膨胀，助长了社会混乱而已。曹操严用武力与法令，匡正汉末宽厚风气下流于放纵的政术之弊害，在这点上他可谓天选之才。曹操所选拔的致力于重建地方秩序的人物，特别受到史家陈寿最细致的表彰。被曹操激赏为“真刺史”的贾逵，其传记的一节曰：

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1\]](#)

此例最鲜明地表现了以法术治理地方的方针。以下就实际政务，举一二例。《魏略·颜斐传》曰：

后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2\]](#)

这是陕西首府长安的治理状况。曾治理过北部中国中部河南邵陵县（鄆城东）的郑浑，其传记载：

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3\]](#)

最后，曾经营过魏与吴接境的南边重镇寿春城的刘馥，其传记载：

（汉末）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雷）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陂（芍陂在寿州南，茹陂或作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七门堰在庐州庐江县南，吴塘在舒州怀宁县西。参照《三国志旁证》。）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4\]](#)

以上试举了北部中国北、中、南三方面官吏尽力民治的例子。由此可知，北部中国受到破坏的秩序正普遍走向恢复。

如《内编》所述，曹操征伐陶谦于徐州时曾断然实行屠杀。因此不可认为他从心里欲救生民于水火。而不管曹操原本好恶如何，他都必须拔擢清直有能之士，托以政事。《魏略·杨沛传》一节曰：

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河南长葛东）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累迁九江、东平、乐安太守，并有治迹。坐与督军争斗，髡刑五岁。输作未竟，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邳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邳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从徒中起为邳令……未到邳，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5\]](#)

通过这种方法，曹操巧妙牵制了他所倚赖的军队的跋扈。

曹操任用能吏，希图树立秩序。相较于从曹操的为人中求其原因，从当时流行的正义的观念中求其缘由，更能捕捉到事实的真相。《魏略》记载了如下故事：

（意译）甘肃西北，今肃州，当时称作酒泉郡的地方，自汉末以来，与中央关系甚远，自然秩序混乱。酒泉太守为当地豪族黄氏所杀，又邻郡武威郡的太守也为土豪张氏所杀。酒泉郡以勇侠驰名的杨阿若，以为郡人杀害长官违背正义，难以原谅，遂单骑进入羌族中，借得羌骑千余，讨灭了叛军。[\[6\]](#)

史家鱼豢特意设立“勇侠传”一目，将杨阿若列于其中，其意无疑在于发扬杨阿若所抱持的正义观念。酒泉郡人庞娥亲这一女性为父报仇的故事（因载于皇甫谧《列女传》而闻名），原本源自认可复仇的社会正义之观念，而最使舆论感慨的，恐怕是她复仇后自首以求国法处断的行为。在偏远之地酒泉郡，重官府、服法统的思想如此显著，这一事实使我们认识到汉家一统之制所培育的正义观念。曹操始终保存汉室的名义，并将其政术与一般的正义观念相调和，我们或可从中了解魏初的政治。

文帝曹丕代汉至下任皇帝明帝之世结束的十八年间，魏政权以曹氏为中心而运转。一般认为，法术主义贯通其间。如《内编》所述，明帝尤其是一个代表性的法术主义者。不过“法术”如前所述，只能是消极性的、禁止性的东西，因此仅依靠法术打不开任何新的政治局面。不仅如此，假若法术的适用失之狭隘，则政治烦苛细密，使人不胜其烦。如《内编》所述，文帝已经严禁宗室及外戚干政；至明帝时，禁网过密，似乎颇打乱了大体的统制。例如明帝近侍骑都尉王才孝、乐人孟思二人所为不法而伏罪，但这并不出自处于责任位置的公卿大臣的裁决，而完全出自小吏的告发。由此，杜恕站在官统的立场上，上疏极谏：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7\]](#)

至明帝后的齐王芳时，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当时的校事官——在官统上没有任何权威——滥用威势，程晓又激烈批评此事，上疏曰：

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諂谀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

[\[8\]](#)

此文非常明白地叙述了法术主义渐趋苛细的流弊，以及小人跋扈，破坏官治大统的情形。曹操初入中央时，名臣司马朗曾主张：为树立地方秩序，内郡应遍设兵备。而如前所述，曹操的做法是严禁所统军队的横暴，委任清直官吏，以图恢复秩序。当然，这在曹操一代实行到

何种程度，我们无从知晓；但经过其后文、明二帝，这一方针绝没有依次继承下来。因此杜恕竭力论道：除了与吴、蜀以及胡族接境之地，魏的国家财源之地——被称作腹地的兖、豫、司、冀四州（即黄河下游的北部中国大平原地区），其军备应当撤销。而明帝却以私宠，使军人吕昭领冀州，杜恕悲叹，且在上表中说道：

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扼腕抗论，以孙吴为首。

其意可能在于：文儒派不满军人跋扈，相比曹魏，更同情孙吴。[\[9\]](#)我们再摘取杜恕关于考课法的上表中一节，以作比较：

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商、韩法术流行，文儒之士难掩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鱼豢作《魏略》，为传扬汉代官学——儒术的正统，设立了《儒宗列传》。该传序文载于《三国志·王肃传》裴注，其中说道：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10\]](#)

汉武帝树立如下政策，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中央及地方设置学校，以为教化之本源；且表彰儒学，以示思想统一之标准；以儒学的精神实行学校教育，以所培养的人才成为官僚。然而这政策在形式、内容上的完备是在东汉时代。翻检《后汉书》列传，富有儒学修养的

传主随处可见。然而如鱼豢所记，汉末丧乱以来，太学荒废，文帝受汉禅称帝后，为备其形式，复兴了太学，但其实质不过是避役之子弟暂时安身的寓所而已。如此，以汉代统治为理想的儒生普遍处在悲惨境地，显而易见。

据鱼豢的解释，儒道衰弱，浮华之说于是盛行。站在政术的立场上看，学习儒术之人接受考试从而走上仕途这一历来的方法已然废灭，人才登用之法必须依据某些新的标准。于是自然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有些人在儒术之外，自由而广泛地向显要人士宣传自己的学说，抬高自己的名声，以期得到显要人士的推荐。就儒家的立场而言，这些人即被称作浮华之士。《三国志·卢毓传》曰：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八达之诮，（明）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明帝大概认为，以浮华博得名誉之人，难知其才能如何。然而既不尊崇儒术，也不取有名之士，又以什么甄别人才呢？故卢毓答道：

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11\]](#)

不过，已被推举的人才是否适用，并不清楚。于是，群臣体会明帝法术性见解之意，纷纷议论考课法的问题。前文所引杜恕对于当时商韩流派的痛批即发于此际。公卿议论之后，考课法由刘劭作成，而据说其内容以汉代实行的京房四科考课法为基础，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参考《三国志旁证》）。大概明帝虽有某种意志，而议论有它自然着落之处，且据《三国志·杜恕传》，此时议论纷纷的考课法其后并未得到实施。总的来看，魏王室的特色——法术主义，本是由于乱世建立秩序的消极性方针而已，故而只要后世君王沿袭这一形式，则人心受拘束，国家大体的统制被打乱。魏的做法必然受到后世史家的严厉批评，不仅如此，当时它已成为世人非难的目标。

注 释

- [1].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第482页。](#)
- [2].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裴注，第513页。](#)
- [3].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郑浑传》，第509页。](#)
- [4].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刘馥传》，第463页。](#)
- [5].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裴注，第486页。](#)
- [6]. [参见《三国志》卷一八《魏书·阎温传》裴注引《魏略·勇侠传》，第551—553页。](#)
- [7].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第504页。](#)
- [8].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程昱传附孙晓传》，第430页。](#)
- [9]. [据《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杜恕认为刺史应专心民事，不应领兵。吴、蜀未灭，是军人效力之时，但当时搢绅之儒也高谈军事，不恤民事。“以孙、吴为首”一句，“孙”指孙武，“吴”指吴起。第499页。冈崎氏标点为“以孙吴为首”，以“孙吴”为三国时的吴国。](#)
- [10]. [《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朗传附子肃传》裴注，第420—421页。](#)
- [11].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卢毓传》，第651—652页。](#)

第六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二）

如《内编》所述，魏代汉而建立新王朝时，依据的是禅让的形式。当时，儒者邯郸淳说明禅让曰：“汉历在魏，赤运归黄也。”汉魏禅让在咸熙二年十二月，即该年年末。^[1]这意味着汉的历数尽于此岁，汉的火德自然生出魏的土德，魏的历数开始了。也就是说，邯郸淳以自然的命数来说明王室的交替，魏德因之得到充分的润饰。然而干宝作《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时，将中国古代传说的尧舜禅让与魏晋禅让区别开来，有内禅外禅之说。其意可能在于：尧舜禅让在文德上是完全的，而魏晋禅让只是名义上、形式上的称号而已。不仅如此，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进一步委婉指出：晋宣、景二帝显然抱有篡夺魏室的目的，未能退而养其德。“历数说”之下的禅让形式没有赢得识者的信任，似为当时以来的公论。而赵翼认为：魏代汉与晋代魏，轨迹完全一样，但就威令所行而言，晋远劣于魏。魏曹操坐镇于邺，仅留一二长史于天子所都之许昌，却控制已在盛年的汉献帝，毫无障碍地行使了他的权力。然而，晋自司马懿至其子师、昭二人，大权在握，且常拥立幼主，而不敢离开洛阳一步。^[2]而如《内编》所述，晋的政术在于改变魏法家式的苛酷方针，以宽宏为旨要，从而赢得了士人的归伏。既然司马氏之政亏欠名分，且缺乏实力，却赢得了士人的归伏，那么所谓士人的归伏只能这般理解：晋专念于保存一部分权豪的利益，以此营立司马氏的家门。如此，曹氏虽以法术之政暂且制止了权豪的横暴，今司马氏却以宽厚之政逐渐助长了权豪的势力，中国即将走向分裂。

东汉末叶以来，豪族跋扈之状显著，其一般情形已如前文所述。为进一步阐明此观点，我们姑且看看如下事实：

王符《潜夫论》载，当时地方长官以神明般的威严为一般人所仰望。东汉末叶以后，似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即郡一级行政区划是养成特有人情风俗的要件。例如汉末名士孔融有《汝颖优劣论》，

讨论汝南郡、颍川郡人物之优劣；此外，名士对谈之际，常自豪地谈起出身之郡。在东汉，以真正的文明中心自任的郡，有汝南、颍川、陈留、南阳等。风土志作为一种著述，其先驱似为《陈留耆旧传》

（参照《玉海》）。当对于郡的强烈意识通过地方长官的威严而得以自觉时，换言之，当地方长官正常保有其察举之权，郡的人才得以为汉家一统政治效力时，爱郡之心自然与爱王室之心相合。但东汉末明显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倾向，也就是说，比起郡的长官，郡内著姓更能激起人们对于郡的自豪感。《后汉书》列传叙述人物经历时，往往使用郡之豪族、著姓、名族、大姓等词语；又，南北朝时期喜用的“名家驹”一词也已出现在东汉早期人物赵憙的传中。这些不同的用语是否有意义上的差别，并不很清楚。但蔡邕所作碑文最明白地体现了当时的郡望主义。例如碑文说道，太原郭泰，周之子孙；南郡胡广，古妣姓之子孙；彭城姜肱，古帝之胤。所谓三台五岳之后裔，奕世之德著于图录。这种家门完全立于汉家一统的制度之外，这种家门出身的人，不论当官与否，皆为士流之望。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不久现实中的郡姓也固定了下来。《魏略》有天水郡四姓的说法，指的是姜、阎、任、赵。在蔡邕那里理想的家门，就事实而论，本是一种地方豪族而已。但据《张既传》载，张既家富而门寒，显然，富者未必是郡姓。不过，郡姓恐怕大多是富者。可想而知，汉室垮台，一统之制崩坏后，地方长官丧失了昔时的威严，地方秩序倚赖这些郡姓的情况就变多了。魏通过以力为主的法术主义，勉力抑压权豪。但魏垮台，司马氏兴起。如《内编》所述，司马氏自身即地方豪族出身，与他郡之豪族通婚，自然以宽厚的政术收买豪族的欢心，豪族于是在地方上愈占重要位置——这是汉末以来的倾向。因此，换一个立场看，我们可以说，司马氏的宽厚政术是顺应了汉末以来渐趋激烈的豪族跋扈之潮流的一个政策。而如《内编》所述，三国中的吴也有这种强烈倾向，因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河、长江两流域皆倾向于分裂。

干宝《晋纪总论》有如下一节：

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间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3\]](#)

对于晋武帝重新统一天下，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形，干宝以华美言辞加以润饰。《晋书·良吏传》序载：

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浸以为常。[\[4\]](#)

据文意可见：晋武帝留意民政，有太平治绩，惜哉官僚风气混浊，危及国运。不过换句话说，尽管官场混浊，武帝不也留下了太平治绩吗？——即便这种治绩是一时性的。泰始四年（268），武帝下诏，命郡国守相戒饬属下之长吏。据诏文，武帝命守相分刑狱、风仪、殖产等纲目察核长吏之能否，而不仅仅以军国设施为重。此时吴犹在版图之外，但诏书在文辞上已然显示出一统帝国的气象。且实际上晋除魏之弊政——宗室禁锢令，建立五等封建制，删定刑律，废除屯田，因而用中国常用的语句来说，可谓一派“天下想望太平”的样子。然而事实上，若考察《良吏列传》传主的治绩，就会发现他们的施政方针多异于前代。例如《胡威传》止于记载胡威作为不受贿赂官员的道德；又，《曹摅传》仅记载曹摅新年之际释放狱囚的人情故事而已。略具良吏这一类型特点的是王宏。据本传，起初王宏“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其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后遂开荒五千余顷，其功绩得到上司石鉴的认可。而其后官升河南尹、大司农，为苛碎之政，“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这不正是酷吏这一类型的所为吗？无疑某人在形式上由王

室旌表为良吏的话，则他即良吏。这是晋有良吏而又无良吏的缘由。清人周济《晋略》据旧史立良吏之目，其序论一节云：

世变稍亟，仕多为贫。于是尚廉之说，独斤斤焉。为益止于无害，具位等诸刻木。然且比户歌咏，尸而祝之，困硕鼠而思乐郊，遭水火而觊休息，其亦可悲也。[\[5\]](#)

在西晋，禄位微贱而犹守廉正之德的地方官即为良吏。之所以必然出现此等消极性的良吏，原因不正在于强臣悉数攀援中央官场，以致官场混乱吗？

《晋书·儒林传序》云：

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张华）以博物参朝政，子真（刘寔）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6\]](#)

文意殊难理解。据晋武本纪，咸宁二年（276）立国子学，这是一事；任用荀、郑、张、刘等名士，使各居其职，又是另一事。完全无关的二事何以综合性地记述于此？所以说武帝虽无显扬儒风、拔擢儒宗之意，但应当看到他以有德之人望列于朝廷之意。不过，汉代儒术以在朝有威严的学官布教。仅以有德之士列于朝位，于儒术是全无关系的。周济作《晋略》就没有立儒林传，这是正确的记述方式。至晋，作为官学的儒学完全断绝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地方长官已无威势，官学又断绝了，则不得不说：汉代察举制度也随之丧失了它的精神。于是得官专由人情，是自然之势。应该看到，三国以来的趋势因晋的统一而加速发展。在后节，我们再从别的角度来论证此点。

章炳麟在《五朝学索隐》中论道：魏晋风俗的乖滥起源于汉末；且虚心比较晋与汉末风俗，遽难定其优劣。[\[7\]](#) 其论据主要是晋葛洪《抱朴子·外篇·汉过》诸文。今避开“风俗”这一暧昧词语，而主

要对官场混浊的事实作一考察。葛洪说道：（一）东汉桓、灵间，宦官弄权，先破坏了贡举制度。（二）其次，卖官令出现后，官爵如同商品，司掌选举的中正、吏部之官，并为魁佞。（三）选举既为金钱所左右，则这种金钱关系在任官后官职进转之际仍发生效用，官吏的出世皆仅关乎金钱或权力者个人私情。（四）结果，甄别人物之法乖滥至极。若虚心考察葛洪所论，则不可否认他整体上显然是主观的。例如葛洪说“司掌选举的中正、吏部之官，并为魁佞”，而事实上，中正不见于汉，它的得势尤在晋代。因此只能这样解释：葛洪生活的时代，官场混浊，他脑中先有这样的印象，而求其源流于汉末。如

《内编》所述，宦官跋扈使官场陷入混浊，是一个事实。因此，求西晋官场混浊起源于汉末的解释是正确的。不过，对于官场混浊这一事实，汉末中央与地方普遍抱有强烈反感，这点是东汉精神所在。顾炎武之所以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是因为他注目于这种整体性的精神之流风，而绝没有拘束于一个个事实。然而，东汉末昂扬的时代精神与时俱亡，历史洪流逐步破坏统一的中心而滚滚行进，因此在西晋时代，论说官场弊害的人不像东汉末那样对此抱有强烈反感，而有客观详细的描写。例如关于官场上金钱的异常作用，据《内编》所引鲁褒《钱神论》，我们了解到他是如何以嘲笑的态度旁观当世；以之与葛洪所论相对照，西晋的风潮似容易理解。

如前文所引，除官场混浊之外，葛洪还说到“甄别人物之法乖滥至极”。这是一个尤其值得研究的题目，以下述其大要。

如前所述，汉代取士之途，或以诸生接受经学的考试，或经由中央、地方大官的察举。察举以“四科”取人，而实际上选拔的标准是孝、廉两科。孝也好，廉也好，都是个人行为显现后获得承认的结果，故而乡党的评价给出认定孝、廉的标准。然而正如葛洪所说，汉末以来官场的混浊打乱了这种正常的选举法。而在时间上，这或许还可追溯到东汉中期左雄提出改革案之时（参照桥本氏中国学论文）。

《抱朴子》引用汉末谚语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8\]](#)

由此可知，儒生出身者秀才以及由孝廉、寒素、清白、良将等科而被察举之人，名与实相差甚远。既然魏晋以来儒学扫地俱尽，地方官威严失坠，则术艺的课试、乡举里选之意自然不能正当实行。于是，选举失去一般性标准，个人性的甄别法自然被树立起来。这在讨论魏晋思潮时再加详述，总之自魏末起，出现了傅嘏《才性论》、刘劭《人物志》等代表性著作，将人物的性行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以资甄别。这一方法当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性标准。这一似是而非的方法如何误甄别之实？《抱朴子》载：

于是傲兀不检，丸转萍流者，谓之弘伟大量；苛碎峭峻，怀螫挟毒者，谓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无心者，谓之机神朗彻；利口小辩，希指巧言者，谓之标领清妍；猝突萍莺，骄矜轻悦者，谓之巍峨瑰杰；嗜酒好色，鬩茸无疑者，谓之率任不矫；求取不廉，好夺无足者，谓之淹旷达节；蓬发褻服，游集非类者，谓之通美泛爱；反经诡圣，顺非而博者，谓之庄、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谓之萧豁雅韵；毁方投圆，面从响应者，谓之绝伦之秀；凭倚权豪，推货履径者，谓之知变之奇；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仰赖强亲，位过其才者，谓之四豪之匹；输货势门，以市名爵者，谓之轻财贵义；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之妙；蹙马弄稍，一夫之勇者，谓之上将之元；合离道听，偶俗而言者，谓之英才硕儒。[\[9\]](#)

这里所说的是汉末的过恶，但笔者认为这表现了西晋时代的情态。我们再引王沈《释时论》的一节，以作对比：

空器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枪枪，膂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倭垢者以守意为坚贞。嘲哮者以粗发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为笃诚，掩婪者以博纳为通济，眊眊者以难入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誉，嗛闪者得清剿之声，呛哼怯畏于谦让，闾茸勇敢于饕谗。[\[10\]](#)

与前引《抱朴子》之文相比，虽其笔法有较大差别，但大体上可见晋代取士之杂乱。

注 释

- [\[1\]. 咸熙二年（266）十二月，是魏晋禅让的时间。汉魏禅让在延康元年（220）十月。](#)
- [\[2\]. 参考《廿二史札记》卷七“魏晋禅代不同”条。](#)
- [\[3\]. 《文选》卷四九，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78页。](#)
- [\[4\]. 《晋书》卷九〇《良吏传序》，第2327—2328页。](#)
- [\[5\]. 《晋略》汇传五《良吏》。](#)
- [\[6\]. 《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第2346页。](#)
- [\[7\]. 参考《章太炎全集》第四册《文录卷一·五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页。](#)
- [\[8\]. 《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
- [\[9\].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卷三三《汉过》，中华书局，1991年，第126—127页。](#)
- [\[10\]. 《晋书》卷九二《文苑·王沈传》，第2382—2383页。](#)

第七节 魏西晋间政术的转移（三）

前文引用了王沈《释时论》的一节，《释时论》的主旨原本在于详述西晋时代权豪跋扈之情态，今述其大意如下：

（今）上圣下明，时隆道宁，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1\]](#)

如鲁褒《钱神论》一样，此文整体上洋溢着挖苦和嘲笑的气息。与“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类似的表达，还见于刘毅的奏文中：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

官位既为权豪所独占，而上无裁抑权豪之力；于是只要权豪自身未建立某种统制，天下就不能不走向崩乱。权豪群体果真从其自身生发出某种统制了吗？

魏文帝时，大臣陈群创立了九品中正（即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指甄别人物，分作九等；所谓中正，指实施甄别之职司。汉末，地方秩序紊乱，地方长官特别在地方有司之中临时设立了中正这一不算入官僚系统的职司，以维持地方秩序；至曹魏，陈群遂普遍性地设置了中正。这似为九品中正制的起源。为何设立这一制度呢？汉末至魏初，伴随着地方秩序的紊乱，人物流移的状况严重，汉代实行的乡举里选之法行不通了。于是，地方有力者被授以中正之职，以选拔其管内之人物。这里所谓管内，其意义并不限于地域上的管内，户籍系于管内者，虽其后流移他郡，仍算作管内之人。因此，九品中正本来

的意义在于在乱离之际继承昔日乡举里选的法意。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地方有名者欲保全地位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中正势力急剧膨胀，恐在司马懿执政之后。司马懿在中正之上设置了大中正。而据司马氏政敌夏侯玄的上表，中正写定的品状直接作为中央任用官吏的标准。夏侯玄认为应改正这一弊害，将中正的职能严格限制在次第乡评的原意上。而中正的权力其后仍一味增长。由此看来，对于中正制度的发达，司马氏政策的政治性影响不容忽视。也就是说，中正制度的发达是司马氏宽政（与曹魏法术政策相对，司马氏保证地方豪族的地位）的结果。于是，不属任何官僚系统而于中央政府任用人物之际发挥着有力作用的中正，不久也由要官担任，这一系统另立会署，分享中央的权力。然而，晋的统一建立后，汉以来的一统制所养成的大臣对这一中正制度展开了激烈的非难。刘毅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指出了中正完全依据家门写定品状的事实。故而在中央尚有官吏任免实权的吏部，实际大多只是“门调户选”（《傅咸传》），寒素的察举科目虽仍在，但所推举的似乎仍为豪族之家。[\[3\]](#)最不满这种风气的，自然是卑贱而学富之人士。作《释时论》的王沈就是其中之一。《晋书·文苑传》有位赵至，因乱离降为卑贱士伍，其后游太学，官场仍不得志，遂作赋明志，其中一节曰：

夫物不我贵则莫之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4\]](#)

要之，在中正制度的保证下，晋代豪族掌握了政权。对于这种状况，有名大臣之中已有激烈的非难，又，以文辞闻名者也极力抉剔其弊。一般舆论绝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西晋最大的缺陷就在这里。

顾炎武《日知录》“清议”条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傲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

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5\]](#)

顾氏认为，清议之立是先王法意，魏晋九品中正之设，稍稍维持了这一法意。不过，笔者认为顾氏颠倒了事实。大约在朝有在朝的清议，在野有在野的清议，乡党舆论代表在野的清议，乡党组织越强，清议的约束也就越强；从这点来看，顾氏所论是正确的。不过，清议（笔者尚未检出“清议”一词最初出自何书）在政治家之间的盛行始于晋代。看起来，汉时乡举里选之制实行期间，乡党舆论或许是评价人物的唯一形式；乡党组织因乱离而遭到破坏后，不得不设置中正这一职司，统一乡论。这样一来，清议，一种拟制性的风习就形成了。到底何谓清议呢？以下根据《日知录》及《廿二史札记》述其大要。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沉滞累年。阮简居父丧，行遇大雪，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臠，阮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卞粹因弟裒有不良品行，粹遂以不训遭清议。以上是未任官而遭清议的事例。已为官吏而因清议被黜的事例，如长史韩预强聘杨欣女为妻，时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遂贬韩预以清风俗。又，陈寿因张华之力，已有官职，陈寿为蜀人，母死葬之洛阳，不归丧于蜀，又被贬议，由此终身废黜。刘颂嫁女于陈矫，矫本刘氏子，出养于姑，遂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6\]](#)

此外，《札记》“九品中正”条下尚列举了种种例子。要之，违反家族道德律的人最易遭清议摈斥。

山简上疏之一节曰：

至于后汉，女君临朝，尊官大位，出于阿保，斯乱之始也。是以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于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于朝廷。然后君臣名节，古今遗典，可得而言。

[\[7\]](#)

由此可见，东汉末政界混乱，人物选举不得其当，当此之时，在野之士欲以清议裁议政界，清议之观念萌芽于此。刘毅上表之一节曰：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8\]](#)

州都，即州中正。可见中正之职在于统一管内的舆论。因此，大致可以说，中正这一执掌舆论统一的职司设立后，清议的条目也渐次形成了。

晋朝创立之始，作为曹魏遗老而受殊遇的有王祥、郑冲、何曾、荀勗。他们皆年老而被御史侯史光弹劾，但武帝常优容不许。王祥是以孝行故事而闻名古今之人，在魏末居三公要职。武帝为晋王时，他与荀勗往谒武帝。当时，荀勗对王祥说：“相王尊重，何侯（曾）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王祥答：“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9\]](#)王祥以在家建孝节，立朝办礼仪而为人所知。何曾最热衷清议之论，文人阮籍居丧缺礼，何曾在晋文帝面前斥责阮籍道：“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10\]](#)而他也是党于司马氏，参与魏主废立之人。又，《荀勗传》之一节曰：

“年逾耳顺，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11\]](#)

何、荀二人是当时尽孝道的模范。这样，仕于二姓的前朝遗老，在当时作为清议的维持者而受到无与伦比的优遇，且未受一般官僚的任何指弹。晋通过表彰这些遵守家族道德的豪族，开启了一代风气。而据此完全可以推察，在这种政策下，清议之说愈加得势了。

清议是道德律，与刑律相辅相成。程树德在《晋律考》中列举了数项“晋礼律并重”的事例。其所谓礼，即道德律，指清议之论所生发出的约束性条目，因此礼律处于与仁义对称的关系中。程氏列举了如下一个事例：

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12\]](#)

不过，当时的刑律本身包含强烈的尊崇以孝治为中心的家族道德的色彩，因此从理论上说，不可能另外形成清议的条目。故礼的内容恐怕是随时之物，而绝非具有完备形式的完成之物。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官僚系统以外中正制度成立的同时，刑律系统以外清议的条目被设立，两者一并为时所用。而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民具有应对统一遭破坏局面的极富弹力的特质。

六朝时代，尤其南朝，实行一种贵族制。梁沈约求其起源于魏晋时代所创立的中正制度，认为家门的贵贱造成了士庶之区别。不过事实正好相反：催生这一中正制度的先行条件是豪族群已出现了恣意行使权力的事实。中正参照清议的标准以赢得社会统制，中正制度的这种法意不应予以非难。但事实上，只要中正由地方豪族担任，党同伐异之风则必然兴起。这是西晋一代中正制度遭到极大非难的原因。若单纯着眼于形式上的法意，则这一制度实与时代的舆论相合；虽偶有人论其弊害，却没有一个人主张完全废除它。《傅子》甚至将这一制度比拟于孔子的制作。一般来说，晋人有这样一个特征，即不问是否可行，而体察舆论趋向，设立形式性的规制。刑典的改正编纂大概是其中显著的一例。《晋书·刑法志》一节曰：

减梟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
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
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
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
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13\]](#)

大约晋朝苦心于去除汉律之苛秽，存其清约，尤其寓礼教于刑律。笔者并没有特别研究过刑律的内容，据程树德《晋律考序》，至梁武帝改革为止，晋律一直通用于中国，且分类精密，“较之唐律，殆无逊色”。而据说对汉刑律进行分类以端正法典系统的谋划，魏武帝时已有尝试，晋律已臻完备，但实行如何自是另一问题了。

注 释

- [1]. [《晋书》卷九二《文苑·王沈传》，第2382—2383页。](#)
- [2].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第1274页。](#)
- [3]. [《初学记》卷一一《职官部上》“吏部尚书”条引王隐《晋书》曰：“王戎为左仆射，领吏部尚书。自戎居选，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沉浮，门调户选。”](#)
- [4]. [《晋书》卷九二《文苑·赵至传》，第2378页。](#)
- [5]. [《日知录》卷一三。](#)
- [6]. [参考《日知录》卷一三“清议”条，《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 [7]. [《晋书》卷四三《山涛附子简传》，第1229页。](#)
- [8].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第1274页。](#)
- [9]. [《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第988页。](#)
- [10]. [《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5页。](#)
- [11]. [《晋书》卷三九《荀勗传》，第1150页。](#)
- [12]. [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上）》，中华书局，1963年，第238页。程氏标明“李充传”，据《晋书》卷九二《文苑·李充传》校，《晋律考》少一“行”字。](#)
- [13]. [《晋书》卷三十《刑法志》，第927页。](#)

第八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一）

毫无疑问，两汉的精神指导是儒学。但细究起来，两汉儒学自有差别。借用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语，西汉儒学的特征是“通经致用”“专门学风”，此二者相互关联。大约以孔子为鼻祖的学派虽遭秦始皇的惨烈弹压，却固持所守；汉统一后，汉廷中同情儒学之风渐盛，武帝于是断然以儒学为官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儒者带着统一思想的使命，进入了官场。当时，能够讲明儒家所据经典（即《五经》）的，仅限于专门的学士。而这些专门的学士今已是朝廷学官，故希望以儒学出身者皆聚集其门，学官守一家之说，以防异说的发生。此谓“专门学风”。而武帝时代正是粉饰一统政治的好时机，故而已立为学官的儒学，对于此功业亦不能不处在指导性的位置。也就是说，通达一经，以周世用，即“通经致用”之意味。然而，笔者认为东汉儒学的特征是“实事求是”，而以“移风易俗”为理想。所谓“实事求是”，是指西汉专门学风陷于固陋，故在东汉，诸经的综合性研究逐渐展开；又，西汉学官不视为经典而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具有足够经典价值的某些典籍，如《左氏传》《周礼》之类，开始受到表彰，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学问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通常西汉的学派称作今文派，东汉的学派称作古文派；今文派异常尊敬其鼻祖孔子，古文派则尊崇周公。今文学派汲取孔子的微言大义于经典内部，以用于现世，其末流常有解释繁琐、不合条理之弊。古文派一扫此弊，在经典的综合性解释中求其验证，由此，条理井然的古代人文设施之迹在文献上被建设起来了，在那里，孔子的微言大义之类的奇怪解释没有存在的空间。总而言之，西汉的学问适于世用的意识强烈，相应的，它伴随着（依附政权的）黑暗的一面。东汉的学问理性色彩浓厚，是光明的，相应的，它（因为与世俗有距离）是弱小的。[\[1\]](#) 不过，东汉的儒者显然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即以文献上所得知的人文设施建立一般社会秩序，此即“移风易俗”。

有关两汉学风特征，其大要如上所述。但从实际制度上看，东汉处在学官的，依然是西汉以来今文派的经师。只要儒官还是由帝王生成，儒学与利禄之间就不能不发生关系。这点已为司马迁道破，而最露骨说出这种观点的是儒官夏侯胜，他常对诸生说，经术若明，高位自然可得。故今文经师一般的想法是，谨守其师之读法（即章句之法）而致其学于世用，如此，自然易致无理生造，党派滋生。于是，今文派被古文派——那种站在广阔的综合立场上的学者——斥为固陋学者、章句学者，且因其恋恋于现世利禄而被称作“俗儒”。而古文派自许通儒、通人，耽于学问，自然期待成为人文师表。这种风潮为一世景仰，时望聚集于此，则官学的权威自然不得已而减弱。

在东汉，同一儒学派之中可见这种对立，同时，若把儒学者视为一体，则可见儒生与文吏的对立。东汉中期的王充是讨厌章句的通儒型学者之一。此人最明白地说出了儒生与文吏的对立：

说一经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学一经之业，一岁不能立也。何则？吏事易知，而经学难见也。儒生摘经，穷竟圣意；文吏摇笔，考迹民事。夫能知大圣之意，晓细民之情，孰者为难？以立难之材，含怀章句十万以上，行有余力。博学览古今，计胸中之颖，出溢十万。文吏所知，不过辨析簿书。富累千金，孰与货直百十也？京禀知丘，孰与委聚如坻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论衡·程材篇》）

据此，儒生学习的是圣教，分解章句，通达本旨，非经历非常之困苦不可。且通过这样的学习，其性自然化而为善。然而，文吏学习的是簿书，熟练簿书没有什么困难。而文吏熏染其指导者舞文巧法的习

气，一旦得志官场，所为尽是侵渔百姓之事。这样，在王充眼中，儒风与吏风截然不同。王充抑文吏而扬儒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可儒生：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谢无量云“不”字恐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论衡·谢短篇》）

这里，王充嘲笑了只知分解《五经》章句而无广大知识的儒生之丑态。

东汉末年，马融、卢植、郑玄等大儒辈出，倡导古文之学，官学一隅下的今文经师，其影响日渐微薄。安帝以后，博士处在“倚席不讲”[\[2\]](#)的悲况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全体的衰微，马融、卢植、郑玄等代表东汉儒学的综合性通儒，举起古文的旗帜，逐渐掀起支配学界的风潮。与此同时，以进出官界视同儒学生命的西汉风气为之一变，东汉儒学的中心思想似在优游儒学、涵养德性上。郑玄《诫子书》最能体现此中消息：

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未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墓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

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饥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3\]](#)

郑玄所期于子者，在于节约治家，尽亲族、乡党之情谊，以及亲近儒术，钻研经典，慎治威仪；他没有一句提及官场的荣达。儒学大约就这样开始规制人伦了。不过，这种意义上的儒学虽不问在朝在野，广为社会树立道德性标准，但同时由于与利禄之途绝缘，它似乎不足以维系一般人士之心。这点暂且不论。东汉中期以后暂时式微的官学，在顺帝时于表面上似乎突然勃兴了。皮锡瑞《经学历史》一节曰：

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至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4\]](#)

据此可知：顺帝以后，太学一时诸生三万人，古来未有之盛况；不过，这是因为权要子孙被遣就学的结果，随之传统章句讲经之法息止，浮华之风流行。据《仇览传》，当时太学飞名誉、曳长裾之人，多是主簿之子孙。[\[5\]](#)也就是说，太学至此已成为权贵子弟的养成所了。如此，代表两汉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已无必要，时代思潮向着不局限于儒学范围的方向发展。据《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曾受聘袁绍，座中聚集了驰名四海的宾客，他们视郑玄为儒者，而未以通人许之。质问发自各方面。郑玄巧妙应接，宾客始服之。汝南应劭自荐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郑玄笑答道：“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应劭有惭色。[\[6\]](#)这一故事似专归美于郑玄，而据诸宾客的言辞，可知儒者与通人判然有别。相对于今文之拘儒，古文派巨匠马融曾被称作通人。今儒者不分古今之流派，皆不被许为通人。应劭著《风俗通》，史家范曄评论其书：

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

[\[7\]](#)

也就是说，范晔明确从儒者的立场批评《风俗通》，而时人视作通人的，或许正是应劭这样的洽闻之士。

汉末汝南月旦之风进入首都，熏染太学豪华子弟，并与当时政界混乱之时势相互作用，遂使论说时势、品题人物之风盛行，所谓“四通八达”的流行语也出现了。这些通人辈的徒党（即清流党）成为言论界的指导者。混乱时势之下的异常昂扬的感情自然显露于言辞，以此可定其人之声誉，而貌色使人仰观其人之威仪，言貌二者成为获取时誉的手段。例如当时在太学最有声誉的太原郭泰，《后汉书》本传说他“善谈论，美音制”，又，他与名士李膺同舟渡黄河时，众宾望之，以为神仙。[\[8\]](#)至魏掌握局势，言论界的这种风潮仍未中止。北海孔融，声名著闻海内。据《后汉书》本传，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居曹操执政下的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荐举贤士，海内英俊都信服他。然而曹操立朝，极力采用法术政策，孔融重汉家传统，与之相争，遂被曹操置于闲职。当时曹操与孔融书信的一节曰：

孤（曹操自称）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由此可见，汉末清流之徒被采取军国式政策的曹操视为浮华之徒党。其后，孔融为曹操所杀，其罪状之一节曰：

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9\]](#)

祢衡见于《后汉书·文苑传》，他曾裸身击鼓，斥骂曹操，[\[10\]](#) 被时人视为狂生，但以才机纵横为世人赞许。据上述引文，他曾与孔融戏讽亲子关系，又一起以颜回、仲尼自任。这固然确乎是一时醉狂之下的谐虐，而因才机颖出，遂脍炙人口。特意搜集这种言辞，罗织罪状，固然是小吏舞法之甚，但在抑制自由言论的表达上，恐怕是有效的。

为曹操执掌选举的，有崔琰、毛玠二人。崔琰是“声姿高畅”之人，据裴注所引《先贤行状》，“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然而此人也被曹操赐死。其事如下：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遂赐琰死。[\[11\]](#)

据此可知，曹操为魏王，受到言论界的普遍非难。在这点上，崔琰反是曹操的同情者。然而崔琰言辞有少许暧昧之处，就被治罪了。而在罪状付诸审判期间，崔琰通宾客，门庭若市，又对宾客“虬须直视”，发表议论，于是被处死刑。[\[12\]](#) 由此我们看到，汉末以来交会荐达之风是魏氏最忌讳之处。崔琰被杀后，毛玠接替他的职位。[\[13\]](#) 本传之一节曰：

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裴注引《先贤行状》，对毛玠之事叙述更详：

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

显然，毛玠斥浮华之党，极力奖励节俭之风，并以此选用人才；这正与曹操的意志相合。曹操极力奖励节俭，见于诸书，章炳麟《检论》大抵将它们归于一处，我们据之述其大概：

又自洛邑、许昌之际，士守恭俭，故有位至列卿，盐豉蒜果，不过一简，日食干饭，以纸补被。魏武虽豪家，后宫食不重肉，衣不锦绣，茵蓐不缘，物无丹漆。其臣化之，朝

府大吏，或挈壶飧以入官寺，日食酱浮，而有赐子一绢，犹疑以在官妄得者。[\[14\]](#)

综合以上来看，魏武自身就极端节俭，并要求官府以此选举人才，而汉末以节义论世、议人，结果造成结党之风，魏武将这些朋党一概视作浮华之士，予以弹压。

文帝曹丕之方针不类其父，据《魏书》，他宽仁玄默，以德化民，有圣贤之风。[\[15\]](#) 该文辞所指内容并不清楚，要之，它所说的大概是：对于其父曹操的峻严政策，曹丕有所缓和。然而，他在位时间极短，且第三代君主明帝曹叡最以法术主义而为人所知。如前章所述之大略，曹叡也曾下诏严禁浮华之士。《魏略·李胜传》有如下记载：

（李）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16\]](#)

据此记载可知，升李胜之堂者，互相援引，结为朋党。而如《内编》所述，他们这类人其后以曹爽、何晏为首领，欲抑制司马氏，却被诛灭。从表面上看，曹操所弹压的孔融一派与曹叡所禁锢的李胜一派皆

浮华之士，两者在结交朋党、议论朝政上并无不同。然而他们非议朝政的理论根据是否相同呢？关于此点，我们进一步作一些论考。

注 释

[1]. 括号内的内容，是译者请教福永善隆博士，根据他的指教添加的，原文没有相关内容。若有错误，责任在译者。

[2].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第2547页。

[3].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10页。

[4].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74页。

[5].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传》，考城令王奂以仇览为主簿，钦佩仇览之志，谓“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主簿后”指太学诸生在仇览之下，解释为“主簿之子孙”似不妥。

[6].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11页。

[7].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附子劭传》，第1614页。有校勘记：“按：汲本‘释’作‘识’。”冈崎氏原著即作“识”。

[8]. 《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第2225页。据李贤等注，范曄父名泰，“太”避其父讳。

[9]. 以上有关孔融的叙事，参见《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

[10]. 《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下·祢衡传》。据本传，曹操欲见祢衡，祢衡不肯往。曹操忿而招祢衡为鼓史，又大会宾客，阅试音节，令鼓史脱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至祢衡时，吏呵斥之，要求改装。祢衡遂脱掉全部衣服，裸身而立，慢慢改装。事后，孔融劝祢衡去见曹操，祢衡却坐在曹操营门前大骂。

[11].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第369页。

[12].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第369页。

[13]. 据《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第375页。

[14].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煊书〉初刻本、〈煊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3页。

[1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所引，第88页。

[16]. 《三国志》卷九裴注所引《魏略》，第290页。

第九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二）

前节有这样的论述：汉末官学权威失坠，儒学因与利禄绝缘，反保持了它的纯粹性质，同时它无力成为当时思潮的中心；尤其官学成为处士横议之府后，诸生专矜严言貌，显扬自身，结交朋党。关于处士横议之事实，若从曹操军国主义式的立场来看，则他们是浮华之士；但从处士自身的立场来看，则他们的举动原本有着正当精神的指引。顾炎武之所赞赏，得其实也。然则其中心思想谓何？曰移风易俗。

儒者一般认为，移风易俗的方式莫如礼乐。礼实为移风易俗的根本。原本礼被视为条理人情的方法，与个人最直接相关的是家族，个人于家族的道德受到极大的重视。只要此点被明确地意识到，则个人于国家或公共的道德就不得不居于第二义。治国者也使个人充分完成其私德，以此获得自然的治平；借用顾炎武之说，此即以其私合其公。[\[1\]](#) 东汉的儒术主义，其思想性目标即在于此点。然而，宦官跋扈蹂躏了这一精神，于是舆论沸腾。对于这里所谓“移风易俗”之精神，我们的视角不应局限在官学所养成的儒生上。实际上，它是两汉文化的集结，尤其是东汉所显扬的一种精神。东汉古文学风的生成也似乎暗含这一精神的因子。既然私德——家族道德得到最高的评价，那么积极维持这一传统精神的人，自然欲打倒破坏私德的宦官一派的权力者，以恢复东汉传统之政术；消极维持这一传统精神的人却认为严守家族道德，不干预国家事务为好。《后汉书·党锢列传》所列人物属于前者，明哲保身的君子多属后者。不过，以思想本身为中心来看，实际上明哲保身者在享受个人调和的生活。而积极维持汉家传统的党锢一派，当曹操执政时，却被作为浮华之士而受弹压。在当时混乱至极的北部中国，这实是不得已的政策，但以言论维持正义的企图终归失败，我们为彼等士人深深惋惜。同时，消极地享受个人调和生活者一派，逐渐剥离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愈耽于以个人自身为主

的逸乐。党锢中心人物李膺为朝野属意，立于改革潮头之时，同为时势所许的荀爽寄书劝诫李膺，其中一节曰：

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2\]](#)

荀爽是愿旁观时势、悦山乐水之人，且以此劝诫李膺，此即所谓明哲保身的君子。此类君子何所乐？延笃寄给李文德的书信曰：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间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方之于吾，未足况也。[\[3\]](#)

此人以儒术修饰外形，而闲居之际由诸子百家进入思想悦乐之境。蔡邕的《操琴歌》曰：

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蹕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4\]](#)

蔡邕通过琴进入具备自然律调的虚玄世界。这些人都深染儒风，而以儒术为外形，以虚玄世界为内容，由此发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境地。原本在文学的世界里，自西汉初期起，神仙思想突出，这无疑缘自楚辞。东汉硕儒张衡作《思玄赋》，其中虚玄思想就很突出。神仙与虚玄固然流别不同，但不管怎样，虚玄思想浸润着东汉儒者是显而易见的。

以儒术养成社会之德，以虚玄思想开畅个人心意。两者相调和之中，出现了明哲保身的君子。而另有一类人，以虚玄思想为中心并以

之自律，与普通所称“君子”颇不相同。《后汉书》的《独行》《逸民》两传（尤其是后者）之中，此类人物颇多。今检阅《后汉书·逸民传》，自野王二老至高凤之间系范曄父范泰所搜集，其后为范曄所加。范曄续补的人物尤多好黄老，并有神仙方术之行。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儒学大家马融及文章家苏章与他同乡里，时人推崇矫慎甚至超过此二人；又，《高士传》的著者也尊崇矫慎的纯远之德。吴苍寄书劝矫慎出山，其中一节曰：

仲彦（矫慎之字）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5\]](#)

由此可知，这种隐遁者也获得了当世的声誉。他们在行为上带有神仙家之风，故与明哲君子有别，但在社会评价上，两者并无区别。《后汉书·方术传》中也多有这种人物。要之，我们必须看到：自东汉末至三国初期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儒学未能维持独尊地位，同时个人的德性在社会评价中占有重要位置，以各种思想为背景的人物以其各自的特征而受到尊敬。文化的形态复杂化了。

个人德性受尊重，于是人伦品藻之风兴起。在这种场合，鉴别标准不单在于其人是否对国家行政有贡献或是否通达经术，人品雅俗方面尤其重要。最显著的例子是牛医之子黄宪被许为当时君子的故事。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6\]](#)

时人用孔子弟子赞美孔子的语句来赞美黄宪，而黄宪却没有什么可闻的事迹。

若互评人品，其间无关乎利害，不失为盛世风流之事。不过，如果具有政治性背景的一人物居中心位置，执品藻之权，则其间必然滋生朋党。如果品藻者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则理论上各种人才在君王明鉴之下，当各得其所。魏文帝死后，其弟曹植所作诔文，其辞中有：

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启祚，合契上玄……才秀藻
朗，如玉之莹，听察无向，瞻睹未形。……心镜万机，揽照
下情。[\[7\]](#)

所说的是，受上玄之德，以明镜一般的心智照破洞冥。作为君主所需具备的资格，这似乎最受重视。应贞述晋武帝之德曰：

游心至虚，同规易简。……神心所授，不言而喻。[\[8\]](#)

其意相同，大概以玄虚思想润饰君德。

即使君主德泽万物，其下实际司掌选举者仍有必要根据官职选配相应的人物。于是人物鉴别之术为刘劭、傅嘏等学者所研究。而他们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

此前，中国讨论“性”的方法大约有两种。其一，以阴阳五行说论宇宙之生成，因之演绎而解释人生，这是机械观式的说明方法。其二，从特异性上认识人性的本质，主张合目的性的解释。显然，前者为性恶说，后者为性善说。而阴阳五行说为儒家所吸收似乎主要在西汉中期以后，因此前一种解释方法自然较新。东汉儒者许慎解释

“性”，犹守儒家正统，取性善说而不疑。郑玄依违两者之间，有人认为，究其主要思想，又与许慎一样，不曾失去传统之解释（参照《无邪堂答问》卷三）。[\[9\]](#) 不过，郑解之中有以阴阳五行说而演绎人性之处，自不待言。而三国主要继承的实为此说；章炳麟说，三国时代的性说，除杜恕一人外，皆奉性恶说。以这种思想为背景，人物

甄别之术被提出来了。例如刘劭在《人物志》中说，性禀阴阳二气，有刚柔之差；体五行而著形，据形之各种相，可逆推其性。所谓“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等等。这种分类法到底含有多少真理，笔者没有什么定见，但有一事是明确的：不管观相术如何精美，观相者苟存私意，则此术的应用即为不可能。故刘劭说：“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然而此术原本就是为了甄别人物而提出来的。故而假如为了实际目的而应用此术，则岂可保证所谓“圣人之察”不会拘局而陷入权道？荀粲曾与擅论才性的傅嘏及夏侯玄有过问答。当时荀粲对二人说：“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10\]](#) 如此，对于以独超之神识而得以理解玄虚世界之人，刘、傅之徒所谓圣人玄察的东西似乎终究没有什么价值。不仅如此，事实上刘劭所制定的考课法并无新意，甚至未得以实施。故而这一时代的取士也只能通过东汉末以来的言与貌的方式进行。而言辞之雅恐怕最便于脱离实事而说理。何晏、王弼之辩辞似由此而彰显。

何晏注解过《论语》。他的新解之中有多少汉儒旧解以外的新说，而通过这些新说可否窥得他的虚玄思想，笔者并无研究。不过，读他所作的《无名论》及《无为论》，可较容易了解他思想的大略。据《晋书·王衍传》，何晏、王弼始倡虚玄思想于天下，传中引用了何晏《无为论》。[\[11\]](#) 《无为论》是何晏的根本思想，但要切实探究他的思想，则自《无名论》进入反倒便利。这大概是因为对于当时由刘、傅所倡导的名理论（即研究才性以定人物高下之学说），《无名论》采取了正面反击的态度。何晏认为，名与誉终究是相对之物，在二者约束下，可招致同类，而不能包括异类；而《无为论》表明，无为是阴阳、万物相生的基础。不过，若讨论其思想之所起，则对刘、傅之徒的名理论的反驳意味较为浓厚，在这点上夏侯玄似乎也是同一论调。（《无名论》，参照《全三国文》引《列子·仲尼篇》注。）

故而何晏跟随当时的风潮，对品评人物抱有强烈的兴趣。《魏氏春秋》曰：

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景王师）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12\]](#)

所谓以玄言评人，高自标置。由此，言、貌之中，言辞尤受重视；形容貌色时，也不像汉末那样重威仪，而运用比喻并洗涤俗气的描述方式多了起来。

何晏以神自任，即如上述。不过，他以“无”为本体，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之情。王弼与之相反，将圣人的神识与凡人的五情区别开来。这恐怕是因立论之体不同而引起的分歧。毋庸置疑，二人皆自认有独超的神识。而以这种抽象性的理论处世显然是无谋的。在这点上，荀粲远为彻底，他以六籍为糠粃，超脱现世，蹕然象外（参照《三国志》注引《荀粲传》[\[13\]](#)）。总之，在围绕朝廷的权势者之中，如果特别地夸示思想性的优越并同声相求，则自然容易招致普遍的反感；何晏遂被作为浮华之党遭到排斥。这样看来，被魏武斥为浮华的孔融一派与被明帝斥为浮华的何晏一派，形式虽无差别，其思想性内容却相差甚远。而一旦由于玄言而雅俗悬隔，当时的权豪就提倡清议，以约束自由言论。这与司马氏的宽政相互作用，思想界的混乱日甚一日，至清谈流行，混乱达于极点。

所谓清谈，简而言之，就是置身心于远离世俗的幽玄境地，并相互谈论由此得来的思想。所谈之言称作玄言，其中心思想则求诸老庄之说（即玄学）。若仅将它当作一种流行的社交，则另当别论；若以老庄之说严格规制其生活，则任达之行于是乎产生。以竹林之游闻名的贤者们可归于好任达之行的一群。肇始于何晏、王弼，由荀粲所加强的流派，在竹林贤者这里表现出最昂扬的姿态。其中心人物应是阮籍和嵇康。以下故事最明白地显示出阮籍的思想。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晋武）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14\]](#)

阮籍的轻妙言辞实是对当时最严格的家族道德的讽刺。在他眼里，父系制度下的家族组织难道不是非自然的吗？然而他却以至纯的性格而为人所知。当其母临终之时，阮籍恰与客围棋，客闻其事，欲立即停止围棋，但阮籍留之决了胜负。其后饮酒二斗，举号一声，吐血数升。及将葬，吃肉饮酒，临诀时果又吐血数升。且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当时的名士裴楷前往吊之，阮籍只是“散发箕踞，醉而直视”；不过，裴楷如常吊唁完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15\]](#) 至于嵇康，则其才气之烈，风怀之清，不由得让人想起东汉末的蔡邕。“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一般的诗情，足使千古钦怀。而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至性过人”，却“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此阮、嵇二人为言清议的何曾，说名理的傅嘏、钟会一派所恶，嵇康被杀，阮籍晦伏方外得免。特别夸耀任达之行的有阮咸、毕卓等。阮咸在母亲丧中与奴婢私奔，毕卓盗饮官衙之酒，睡于路途之上，等等。[\[16\]](#) 这些任达之士以公然蔑视礼法、嘲笑当时的君子而驰名；而在一般政治论上公然提倡无君论的则有鲍生。鲍生认为，上下阶级立，则争夺之祸起，故君位之立乃社会之恶的根源。

上述任达者之流，或抱至纯之性而痛苦于矛盾之中，或蔑视礼法而后快，或放言而觉兴味，各有特殊的表现。总的来看，他们既然是权势之家的子孙，则对其所属阶级之存在而言，似为叛逆者。不过，晋武帝对此等思潮并未加以压制。此中大约有武帝性情宽厚的因素，但正因为玄学强有力地支配着当时权势者的思想，此等任达之行反被自然看待，成为赞美的目标。据《晋书·卫玠传》，卫玠曾赴任豫章

太守。[\[17\]](#) 豫章有担任节镇的大将军王敦，其长史谢鲲作为竹林遨游者之一而为人所知。卫玠是名家子，好玄言，据称其风貌如珠玉，朗然照人，是所谓无俗气之人。王敦谓谢鲲曰：

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18\]](#)

由此可知，魏正始之间何晏、王弼所倡导的潮流广泛波及士流。故而此时代的权豪即使不以任达之行追求老庄学式的生活，以玄学涵养风雅之怀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素养。而最以清谈闻名一世者，莫若王衍。“清谈”一语，笔者始见于《王衍传》。据本传，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谈老庄之时，常执玉柄麈尾，整容仪，而其手色白，正如玉柄。其音吐大约也是朗然的。总之，朝野翕然仰慕。王衍厌恶妻子郭氏贪鄙，口未尝言钱。其妻某夜命下婢以钱绕床。王衍晨起，因钱不得下床，呼下婢曰：“举阿堵物却！”这一故事流传千古。[\[19\]](#) 时俗放荡，何晏、阮籍最受崇敬，至王衍，其声誉甚高，权势亦重，流风所被，风教陵迟。当时名臣裴頠深忧之，遂作《崇有论》，以抗虚无。其中一节曰：

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20\]](#)

裴颢以博雅之士而为人所知，与晋世一流人物张华为同类型者。故而他原本就没有站在纯粹儒学的立场上，因之在《崇有论》中犹将立论之本系于《老子》。正因如此，其所论之力量不免弱小。要之，当时居权势之位者皆满沾虚柔之风气，当此之时，公然有任达之行的阮、嵇诸人反是思想上的勇者。而好主张政治论的傅玄、傅咸、刘毅、刘颂、李重、段灼、阎纘之徒，据汉以来的传统，条分析理，不可谓不巧妙，尤其为寒门清苦之士激扬其声气。但如《晋略》著者周济所云，此难以行之于晋世。最终思想上的虚无潮流与政治社会的混乱相互作用，西晋灭亡，中原板荡。但剥离政治现象，仅站在思想本身上看，超越世俗的“神识”所理解的世界在中国人之中变得明确，这在精神文化上的贡献，决不应轻率评价。

注 释

[1]. 顾炎武《日知录·言私其豷》：“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2].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第2195页。

[3]. 《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第2106页。

[4].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下》，第1989页。此是蔡邕所作《释海》中胡老援琴而歌的歌辞。

[5].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矫慎》，第2771页。

[6]. 《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第1744页。

[7].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第86页。

[8]. 《晋书》卷九二《文苑·应贞传》，第2370—2371页。

[9]. (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此题本不必引郑说也，必欲引之，则当引《礼中庸注》《诗烝民笺》，乃与性善相比附。”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

[10]. 《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裴注，第319页。

[11].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成，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校勘记曰：“皆以无为本 原作‘皆以无为为本’。王懋竑读书记疑七：文多一‘为’字。按：王说是。《通鉴》八二引正少一‘为’字，今据删。”第1236页。

[12]. 《三国志》卷九《魏书·何晏传》裴注，第292页。

[13]. 《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裴注，第319页。

[14].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60页。

[15].《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61页。

[16].《晋书》卷四九《阮咸传》：“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第1362页。《晋书》卷四九《毕卓传》：“太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甕侧，致醉而去。”第1381页。

[17].《晋书》卷三六《卫玠传》：“玠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乃扶舆母转至江夏。……遂进豫章。”第1067页。据此，卫玠以动乱而移居豫章，非赴任豫章太守。

[18].《晋书》卷三六《卫玠传》，第1067页。

[19]. 参考《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20].《晋书》卷三五《裴頠传》，第1045页。

第十节 魏西晋间思潮的转移（三）

在秦汉时代，可视为宗教的大约是《史记·封禅书》所称的方仙道。当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在山东地区旅行时，孔庙被诸生们当作神圣的灵场，且当时流传的有关孔子的故事具有浓厚的超人类式的色彩，这是事实。且其后儒家为谶纬思想强力支配，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同样也是事实。不过，因为孔子学问的中心绝不在于这一方面，所以不能因其偶然附加的着色而赋予儒教宗教式的性质。然而，方仙道如何被认为带有宗教式的性质呢？

司马迁关于当时方仙道的知识，综合起来大要如下：所谓仙，是指自由变化形体，或羽化登天，或作为不老不死的存在居于三神山，被侍奉于祭坛（祭祀百鬼精灵或神）者；而信仰这些得仙道之神人（即仙人）的一群人被称为方士。津田氏^[1]对神仙思想有精深研究，他认为，升天思想与不老不死思想，性质有别，发生亦有先后，仙道的本质是不老不死，而非升天。这或许犹待将来进一步研究。如津田氏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文人思想家等深深憧憬的目标其实是升天思想，而方仙道之所以为世俗权力者秦始皇所欣慕，在于仙人被认为持有不老不死之药。如《史记》明确记载，信仰仙人的方士吸收战国末年兴起的邹衍五行之术，又参与汉武帝求仙道时进行的各种祭祀。据此，则汉代方仙道的内容颇为复杂，似包括理论方面的阴阳五行、数象，以及仪式性方面的各种祭祀。

原本伴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出现，作为一般性的倾向，祭祀在皇帝权力之下有很强的仪式化倾向。荀子认为，礼是文饰之物。随着时代的推移，礼逐渐组织化，自《史记·封禅书》到《汉书·郊祀志》，再到《后汉书》的《礼仪志》《舆服志》，典礼化的轨迹显著，这仅看篇名也可明白。而从《史记·封禅书》所记述的中心问题即汉武帝的宗教政策可见，参与各种祭祀的方仙道者、方士之徒，从某方面看，是武帝权威的有力匹敌者。不过，作为实际的历史现象，

两者并不对立，方仙道被统合在皇帝权力之下。这样，武帝不但像秦始皇一样寻求不老不死之妙药，还欲效仿传说实已登仙的黄帝。“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2\]](#)不过，不管是升天，还是不死，本是关乎信仰之事，世俗皇帝以权力是实现不了的。最终各种祭祀统合于皇帝所立的太祝之官，“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而据说皇帝自己放弃了升天不死的企图，方士之徒遂为皇帝权力所疏离。[\[3\]](#)

《史记·封禅书》详细记载了方士的活动。与此同时，扁鹊、苍公等医者，《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的卜筮者等则另外作为列传而汇集在一起，且司马迁明确将医术视作方术，故方士与方术之士在《史记》中显然有所区别。但二者之间共通的要素也极显著，在《汉书》中此间的区别就不明了了。《汉书·艺文志》以刘向父子的见解对当时的书籍加以分类时，设置了方技一类，其中包含了各种与方术相关的书籍，而方技之下的最后一个小目是“神仙者”。这里所谓的“神仙者”无疑是《史记》所谓的方仙道者。故在《汉书》中，神仙者流即方术之士，又《汉书·郊祀志》等将方士直接称作方术之士。要之，在《汉书》中，析言之则神仙、方术两者有别，统言之则两者相通。然而《汉书》在什么地方认为两者有别呢？《艺文志》论“神仙者”曰：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4\]](#)

录《抱朴子·论仙》一节，与之作一比较：

（仙人）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蹶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驰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人，安得见之？假令游戏，或经人间，匿真隐异，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觉乎？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仙人——神秘世界真生活的体验者——的面目。而这侍奉于神秘祭坛者，《史记》中的方士，到底拥有何种特殊的手段呢？今无从知道《汉书·艺文志》神仙类目中所列书籍的内容，但通过篇名可知他们大体以服饵、导外、炼金之术为主。《抱朴子》著者葛洪特别注重服食，尊崇炼金，而据孙星衍校刊《抱朴子内篇》方维甸序，葛洪以《抱朴子》传承了神仙家的正统。然而葛洪特重炼金，金成之后，必先举行仪式，供金以祭祀门户鬼神、閭之清君等。又，此派戒律以为，必入于深山，不为俗人所见；且山仅限于正神居住的名山，其他山就算是深山，但因为邪恶之神居住，所以事情绝不能成。[\[5\]](#) 由此可知，为了保全真性命，进入神秘世界，与之相应的仪式和条件是必要的；在这点上，我们大概可以确切认识到此派的宗教式性质。要之，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一方面，以皇帝为中心所统一的祭祀的典礼化渐趋精密；与之相对，另一方面，神仙道逐渐在形式上完善了这一神秘的宗教。据方东树《汉学商兑》，此等神仙家所栖居的山室或称静室，或称精舍，后人立祠山下祭之。由此可知，神秘的体验者是一般人崇拜的目标。

我们再通过正史看看方术者流。《汉书》将神仙者流归入方术者流之中，已如前述，而《三国志·魏书》（就著者时代而言，它紧挨着《汉书》）则明确设立了《方技列传》一目。著者陈寿在《方技列传》评中说，该传记载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管辂之术筮，远效司马迁之体裁，以广异闻。因此陈寿所谓方技之中未包含神仙家，可谓正确继承了《史记》的传统。然而，在《后汉书》（就内容而言，相比《三国志》，它还属前代）的《方术传》中，著者范曄汇集了所有系统的方术者，超越《汉书·艺文志》方术类别范围，属于儒家系统的也包含其中。且据钱大昕的研究可知，在取材方面，范曄还利用了被视作小说的《搜神记》。因而《后汉书》此传当然受到非难：体裁、方法皆打破传统，流于驳杂。不过，从方术这一点来看，以儒者知名的张衡的阴阳术、郎！的咎征术并不占特殊位

置。而通过范晔的书写方式，我们似可充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其思想系统如何，又随之不管在方术的内容上有多少差别，方术这一形式在当时普遍流行。接下来极粗略地分析一下《后汉书·方术传》的内容。

《后汉书·方术传》列了近四十位人物。其中使用最多的方术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其共通的特征是预测天意并因之避开所生灾害。而这些方术的施行既针对个人，又广及于一般社会。因为这些方术可施行于一般社会，所以对地方政治负有责任的明于儒学的官吏也有必要通晓方术，以避开一般性祸害。当这些方术特别以君主或王室为中心而发挥它共通的性质（即预测天意，避开灾害）时，由此产生了官学儒学的讖纬说。讖是“未来记”[\[6\]](#)。写下有关未来的预言，如范晔所说，“关扃于明灵之府，封滕于瑶坛之上”[\[7\]](#)，是神秘世界的产物。纬也称内学，据说儒者可通过纬书了解所学经典中未明示的含意。六日七分之方术等即出于纬书（参照《经学历史》）。讖另当别论，诚如范晔所言，纬书也当视为方术之书。《汉书》特别推崇的《洪范》五行说自然也在其中。总而言之，一般人对于天意都先存恐怖之心，而以个人之智识将其开化，大概可以说是方术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

《后汉书·方术传》还有一派与上述一派旨趣颇不同，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此即祈祷、气禁、幻化、役鬼诸术。此诸术共通的性质是祈愿或役使被认为充满宇宙的精灵，以期消解个人乃至一般社会的灾害。从中可见此诸术的魔术式力量。若以中国式的说明方式，将前述一派方术视为神道设教，则此一派可谓鬼道设教的巫术之流。当然，方术者中也有能施行两派方术的人。例如，樊英特为东汉顺帝所征召，却不为礼于君前。当被天子斥责时，他有如下有名的应答：

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
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

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8\]](#)

此言是汉代通行的道义观念的表现，在这点上樊英是了不起的士君子。而他不仅具有以方术预知天意的特殊智识，且擅于压胜术，是在故乡南阳远远地消灭了成都大火的巫师。在《后汉书》全书中，这种事例似大量存在。尽管如此，前述两派性质上的差别显而易见。

《方术传》既有特擅神术、神异之道、神道之人，也有作为方士而被记载之人。不过，尽管语言表现方式有区别，他们都是神仙方士之流裔。《费长房传》中一老翁说“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9\]](#)，最是长于幻术之人。而这类人物，除了容易混同为仙人王子乔的王乔外，大体生活在东汉末至三国时代。当时，他们或许被总称为道士？《抱朴子·勤求》篇曰：

故世间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而管见之属，谓仙法当具在于纷若之书，及于祭祀拜伏之间而已矣。[\[10\]](#)

这里所谓“世间道士”显然指学习仙法之人，结合东汉末张陵一派被视为道士的事实来看，可以说，神仙者流一般被称为道士。

据《抱朴子》诸篇，葛洪自身对于当时世俗所流行的祈祷、问卜、巫祝——主要是祈祷——抱有极大反感。可见在一般世俗之中，此种风气何等盛行。以下来看《道意》篇的一节：

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訖尽，筐柜倒装而无余。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于锋镝之端，自陷于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尽

于祭祀之费耗，穀帛沦于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11\]](#)

《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有如下事实：

《傅子》曰：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12\]](#)

这几人都是当时反抗司马氏的势家。也就是说，这些强族之间也流行祈祷求福之风。

《晋书·愍怀太子传》记载了祈祷的一个样本，据称是文士潘岳所作：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13\]](#)

此等皆巫师平常之所为。而引入祈祷，合之以神仙之术，因之开创了新宗教的，实是张陵一派的五斗米道。这里出现了神仙者流转向道家的机缘。不过，对于这一新倾向，葛洪这样的传统神仙家抱有强烈反感。他尤其攻击黄巾首领张角等以小术诳惑百姓，取财并耽于不义之荣华，以及当时地方官恐致己身之祸祟而将太平道视为一般信仰，不予取缔；他甚至说奉神明、祈祭皆无关乎仙道。[\[14\]](#)然而，在《论仙》篇中他又明白记录召神劾鬼之法，证明鬼神的存在，又祖述幻化之术或气禁之术。因此葛洪攻击张陵一派，仅在祈祷一点。不过，原本祈祷与其他巫术之间，即便其方法不同，其根本性质也不当有相互反驳的理由。如此，不得不说，使葛洪愤慨的不是祈祷的性质；他的愤慨仅是传统派对于神仙道新倾向（即与世俗相关联，并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反感而已。

那么，张陵一派的五斗米道之所以获得社会势力，即如葛洪所言，仅在于它引入了祈祷之术吗？笔者倒认为这一派为旧来的神仙道带来了作为宗教团体的统一组织，这是它获得势力的机缘。《内编》已对此事作了一般叙述，这里没有必要复述。总之，这一派在道师、祭酒、鬼卒这一宗团内的行政性统规下，通过征集五斗米谷或使人头戴黄巾纠合信徒，且通过使信徒诵读老子五千言建立它作为宗团的体统。这实为后世道教奠定了基础。

山内氏在《中国佛教史之研究》[\[15\]](#) 中解释《后汉书》所载明帝给楚王英诏书中“楚王诵黄老之微言”一句，认为：佛教徒诵读经典，以为这于自身有功德利益，楚王诵黄老，其意思是一样的。这恐怕是正解。不过这里应注意的是，在汉代，记述佛教之事时浮图、黄老之名皆并称，几无例外。可见当时浮图、黄老之间并无明确的观念上的差别。原本《后汉书》中记载“好黄老之言”的例子颇多，尤其是《逸民传》中的人物多属黄老派。关于“黄老”之名称，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大概认为，现存的老子《道德经》中的语句，其他古书往往作为黄帝之言而引用之，因此黄老之术的名称就产生了。也有人从“黄老”之名称尤其通用于汉代这一事实出发，认为“黄老”之名称始于西汉初黄生传老子之学（夏曾佑说）。不管怎样，“黄老”之名称通行于汉代，而它以虚静自守之说为内容，与神仙或方术在性质上全无关系。《后汉书·方术传》中作为好黄老之言者而被记载的，只有折像一人，但就大体倾向而言，此人与《逸民传》中的人物类似。尽管如此，记述浮图时必与黄老并称，这是为何呢？今日似乎看不到解决这一疑问的材料，我们应当采取中国式的阙疑态度，不过作如下假设，未必失当：外来宗教佛教在进入中国，渐为中国人所信仰的自然过程中，与黄老思想（它具有与佛教某种程度的相似）合体而使两者难以区分。

黄老、浮图并称是如上假设的当然结论。两者并称时，内容主要指向的是佛教。故如山内氏所言，诵黄老之言似乎不仅是为了记诵。

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黄老之言一变其传统性质而带有宗教性了。而汉代一般所称的黄老，其主要内容无疑是老子《道德经》，因此被视为作者的老子被附加上宗教性的性质也极为自然。

东汉末年桓帝延熹八年（165），祠老子于苦县。学者边韶撰其铭文，据武内氏[\[16\]](#)《老子的研究》之意，由这一铭文可知：第一，当时有一种神秘的老子观，即老子是长生不老之人，自羲皇以来屡化现于此世，为圣王之师。第二，尽管如此，边韶自身始终跟从传统的解释，将老子视为一个隐君子。因此当时祭祀老子时，朝臣所采取的完全是仪式性的态度，这无疑与祭祀孔子是一样的。但据武内氏的研究，祭祀老子的同时，也祭祀了被视为仙人的王子乔之冢。我们可以推想，不管表面的仪式如何，其暗中似有神仙一派的活动。尤其《后汉书》本纪记载，第二年祠黄老于濯龙宫。王先谦《集解》中《太平御览》引《续汉书》曰：

祠老子于濯龙宫，设华盖八座。

《续汉书》写作“老子”，《后汉书》写作“黄老”。而《后汉书·襄楷传》载：

又闻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17\]](#)

因此，恐怕写作“黄老”是正确的。然而，襄楷接着论及“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以及天神送玉女于浮屠而浮屠不顾之说。关于后一说，中国的注解者求其出典于《四十二章经》。由此看来，濯龙宫的祭祀无疑是黄老、浮屠并祭的。《通鉴》专系之于佛教，认为桓帝祭浮屠，其法渐盛；这大概也是一面之事实。同时据《襄楷传》，此前顺帝时，宫崇献上了据称其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尽管于吉是葛洪等尊崇之人，但据说他曾来吴立精舍，烧香读道书（《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可见这一当时的神仙家无疑在佛教的影响下，将老子奉上宗教的祭坛并念诵其《道德经》。于是似乎可以说神仙家一变而成为道士了。据武内

氏《老子原始》，抱朴子葛洪虽被视为神仙的正统派，却认为老子《道德经》有神秘的价值。

《后汉书·楚王英传》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楚王英效仿佛教信徒之例，为沙门及伊蒲塞供奉盛饌。山内氏据此认为东汉明帝时已有汉人佛教教团的存在。其后三国初期，作为聚集徒党的手段，笮融又采取了供奉盛饌的方法。以宗团的方法聚集徒党，这在佛教似是一个开始。而佛教教团既已存在，因佛教而致其学说得到显著发展的神仙家（即道士之徒）也组织宗团，并非不可思议。张陵一派的五斗米道即生发于这种氛围中，黄巾也因之纠合徒党，他们都是汉家传统政制的破坏者。曹操始相济南，极力攘除奸邪鬼神之事，据《魏书》“世之淫祀由此遂绝”[\[18\]](#)。而黄巾一对曹操的做法似乎抱有强烈反感，其后曹操在兖州征伐黄巾余党时，他们送给曹操如下檄书：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19\]](#)

但最后黄巾作为“邪教”之党而遭剿灭，而五斗米道在晋朝则作为天师道而愈加繁盛，上流名家之间也逐渐信奉它。

以上主要就神仙至于道教的大体倾向作了一番叙述。为方便起见，外来佛教的相关问题将另辟章节加以叙述。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黄老思想从隐君子所弄训诫之辞一转而由神仙家之手进行宗教性的创造后，三国西晋的思想家已不言“黄老”而言“老庄”了。大约如洪亮吉所说，自何、王至阮、嵇的一派即属于此。与此同时，庄子所发扬的放达气象也自然产生了。要之，大抵汉代传统的思想遭到了全面破坏，这是明显的事实。

注 释

[\[1\].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有《神仙思想的研究》等相关研究。](#)

[\[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4页。](#)

[\[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第1403页。](#)

- [4].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80页。](#)
- [5]. [《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
- [6]. [“未来记”即预言未来的书。日本有《圣德太子未来记》。](#)
- [7].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上》，第2703页。](#)
- [8].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上》，第2723页。](#)
- [9]. [《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费长房传》，第2743页。](#)
- [10]. [《抱朴子内篇》卷一四《勤求》。](#)
- [11]. [《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
- [12].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附唐咨传》，第774页。](#)
- [13]. [《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1459页。](#)
- [14]. [《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
- [15]. [山内晋卿：《中国佛教史之研究》，佛教大学出版部，1921年。](#)
- [16]. [武内义雄：《老子的研究》，改造社，1927年。](#)
- [17]. [《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第1082页。](#)
- [18].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4页。](#)
- [19].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9页。](#)

第二章 南朝的文明

第一节 江域被化小记

我们从以下两点观察文明光被于长江流域的现象。

一、汉代南北的人口比较

桑原博士在论文《由历史上观察中国南北》[\[1\]](#)中，主要以贯通古今、区分南北的方式调查研究了人口与人才分布状况。作为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准备，笔者主要想比较一下汉代的南北。南北自然地域的划分标准与博士有所区别，在划分南北的基础上再比较一下人口与人才的分布状况。

这里所说的南北比较，是指北部中国与中部中国的比较。以水脉而言，是指黄河、淮水流域与汉水、长江流域的比较。但参照桑原博士之说，中部中国将四川一省剔除。这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

按以上标准划分南北（即北部与中部）后，我们看看《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所著录的人口比例：西汉时期是北五对南一，东汉时期则变为北二对南一。再通过两书考察地方的人口流动，则有如下结果：

（一）渭水流域即以西汉首都长安为中心的陕西一带，人口急剧减少。

（二）黄河下游南岸，即山东南部与江苏、河南两省接壤的地区一带，人口的减少仅次于渭水流域。

（三）大体上山东全省表现出人口减少的趋势。

（四）洛水地区（即黄河中部地区）尽管是东汉首都洛阳的所在地，其人口却与西汉持平。

（五）河南省南部与湖北省接壤的南阳地区，人口增长率最高。

（六）江苏省长江沿岸地区至三吴平原地区，人口保持增长趋势。

（七）湖南省、江西省人口急剧增长。

据记载，西汉人口总数为五九五九四六八四（59594684），东汉为四九一五〇二二〇（49150220），约有一千万的绝对性减少，而如上所述，进入东汉，长江流域地区人口却普遍增长。今若省去对各个地方人口增减理由的推寻，单以南北人口比例而比较两汉，则可以说站在全体中国立场上，南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汉代除征收土地租税之外，还征收人头税，土地租税自然应当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人头税尤其是最显性的国家收入，因此可清楚看到南方在国家岁入上日益重要。又，汉制郡国（地方行政的最大区划）每二十万人口举孝廉一人。故而随着南方人口增加，为官的机会变多，这种盖然性可想而知。

我们再通过《汉书》《后汉书》比较一下郡县的数量。西汉的县数为一五七八，东汉减为一一八〇。西汉郡、国数为一〇三，东汉为一〇五，东汉有所增加。而至东汉，县数减少最多的地方是渭水流域与山东省之一部，反之，江苏省江南部分、江西省、湖南省之一部等县数是增加的。关于东汉县数减少的原因，《后汉书》认为因县的存在，官多役繁，地方民力负担重，县数减少是为了减轻民力负担。因此大概可以说，县数减少的渭水流域及山东之一部不堪置县的负担，相反，长江流域之所以县数增加，是因为它能承受其负担。而这仅是从财力方面来看的消极性解释。原本县是与地方民政直接相关的机关，是地方行政的根本，因此长江流域县数增加这一事实或许表明，通过县，中央政府的施政达于地方的机会更多了。至于郡国数，两汉郡国的管辖范围及名称有异同，稍显混杂。但到了东汉，江苏、浙江地区的会稽郡分立吴郡这一事实——考虑到这时郡国贡士之制——或许表明，此地与中央政治取得联系的机会更多了。

据《汉书》《后汉书》的列传考察一下人物分布的状态，则对于北方，南方的人数几可忽略不计。显然，两汉时期的政治专以北方人作为中心而运行。

以上分南北对两汉时期进行了考察，接下来转换观察点，将南北作为一个整体，看看两汉时期人文化成的状况。

二、儒术的广被

章炳麟《检论》有如下论述：

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唯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东平王求《史记》于汉廷，桓谭假《庄子》于班嗣，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讎之事，书既杀青，复可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邠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2\]](#)

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发明了简单的纸。本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发明纸以来，纸的需求渐广，天下称之为“蔡侯纸”。[\[3\]](#) 蔡伦原是湖南人，据盛弘之《荆州记》记载，蔡伦其后居住在河南省南部枣阳，此地之人遂以造纸为业。当时蔡侯纸的用途不得而知，但由《蔡伦传》之意可知，它至少有利于书籍的普及。

据《后汉书·贾逵传》，贾逵选今文派（西汉以来的官学）的公羊、严、颜三派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自身所奉古文学左氏，此际给予竹简与纸书写的经与传各一通。[\[4\]](#) 周寿昌在《后汉书注补正》中说：“简是旧传，纸是后写者，自是遂多用纸而竹简稀矣。”[\[5\]](#) 周氏此说恐怕将此纸视为蔡侯纸，[\[6\]](#) 但它应是范晔所云“用缣帛者谓之为纸”意义上的纸。笔者作一假定：在西汉时代，写在缣帛上的儒学典籍相当广泛地流布于郡国。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定，我们接下来叙述的事实将难以理解。

汉武帝实行表彰儒学、罢黜百家的思想统一政策，并在地方兴立学校，普及儒学，以教化地方，这两项事实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自不待言。此后儒学确立为士大夫的必修课，实际上《汉书》

列传所载人物苦心学问的事例随处可见。例如：《汉书·兒宽传》载，兒宽曾受业于武帝时代的学者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供诸弟子烹炊，即学仆）。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遂成为儒学教养深厚的政治家。匡衡是有名的学者，但据本传，他家贫而为人庸作，以供学费。据《西京杂记》，匡衡为乡里的一位富豪庸作，富豪有很多书籍，匡衡提供无偿的劳力，作为补偿，读完了富豪的藏书。以上这些都是北方人。据说，江南吴人朱买臣担着柴卖时“行且诵书”，在《春秋》《楚辞》上造诣颇深。若像这些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当时人常携带书籍读书，则其书应当是缣帛之书。因此可以说，西汉中叶以后，向学之风普遍盛行。而儒学最彻底地风靡上下，实在东汉时期。宋代学者王应麟称东汉为经术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翻检《后汉书》列传，各人传中几乎都记载其人研究什么经书，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当时的趋向。

东汉时期儒学风靡上下，已如上述。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研究学问的方法已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西汉的专门学风在东汉得到了解放。所谓专门学风，是指儒学经典“五经”必各有一派师授，弟子不可违背师说。当然，儒学自武帝以后为帝王所承认，讲经典的博士官是司职教化的朝廷官吏，故成为其弟子也即欲取得官吏资格；当时的史料明确指出了这点。如此，仅专研一经的博士官，以其权威及其狭隘的独断学说布教化于地方，自然有其无理之处。

如前文所引用的那样，章炳麟认为西汉末刘向父子校讎群书并以缣素写定以来，专门学风被打破了。这恐怕也是学风转换的一个动因。总之，东汉学者斥专研一经的西汉学者为章句之儒而致力于综合理解各经，其后甚至出现这样的倾向：他们不满足于综合各经，而博通经学以外的书籍，并以此称为通儒或通人。这种自由讨论之风与书籍的流布相辅相成，使中国全土逐渐表现出一致的文化形式。

儒学是起源于北方山东省的学问。武帝时，儒学虽凭借官府之力获得了绝对性的尊崇，但西汉一代，它尚未成为一种充分的社会势

力。这从如下事实可得而知：昭帝（武帝之后的皇帝）时，朝廷官吏与儒学者议论盐铁可否专卖之际，朝廷官吏对山东儒墨采取了嘲笑的态度。然而，东汉时代儒学成为社会势力，对于当时指导庶民（被视为无告之民）的士大夫而言，儒学是必备的教养。关于这点，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有最清晰的认识：土地差异自然带来有差别的人情、习惯，是为“风”；一定标准下所作成的统一的社会道德，是为

“俗”。作成“俗”即“教化”，其责任者是帝王，其标准在于儒家的经典“五经”。而班固认为，善美风俗的成立实在东汉时期，关于它如何实现，他详述于《西都赋》《东都赋》（两者描写了两汉首都之光景）。张衡也有相同的赋。要之，东汉学者确实相当自负于当代文明。这一强大文化的要素似乎拥有超越南北土地的差异从而广被四方的因子。《后汉书》列传往往有传主赴任地方后，以儒学主义改正各地陋俗的记载，尤其是打破南方地区迷信的故事散见各传。例如：据《李忠传》，李忠为丹阳（治今江苏南京）太守时，此地因越人之风俗，不好学，李忠乃兴立学校，讲习礼仪。又据《栾巴传》，栾巴为豫章（江西南昌）太守，改正了此地破产以祈祷山川鬼怪的土俗。据《宋均传》，宋均为九江（安徽寿县）太守，在其管辖内的浚遒县（安徽肥东），祭山之巫以百姓男女各一人为尸主，作为山公山姬，岁岁改易，百姓不敢嫁娶。于是宋均下令，以巫家为山公山姬，巫家遂叩头谢罪。而最有名的是曾为会稽（江苏绍兴）郡守的第五伦。会稽俗多淫祀，民杀牛以供之，百姓为之困乏，第五伦见状，冒着极大的阻力将其禁绝。传布正确的教化于天下，实是东汉儒者的理想，因之《后汉书》最重关乎个人道德、社会道德的记事。

东汉经术主义的政治如何浸润到南方？我们以会稽郡为例作一说明。《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所引《会稽典略》载有东汉末年此郡太守王朗与会稽人虞翻的问答。以乡土山水物产之美、人物之优秀自夸是此时代的一般风习，这种自夸之情极为强烈，虞翻所说也属此类。他首先列举了乡土孝子董黯。此人平素尽心孝养，后日又为亲

复仇。其次，他列举了陈嚣。此人以退让之德感化乡人，所居遂成义里。其次，他列举了著名政治家郑公、钟离意，又列举了学者赵晔、王充，再列举了尽力于民政的种种人物，最后及于烈女曹娥之事。有名的不屈节于帝王的严遵尤其是虞翻引以为豪的人物。据《后汉书·方术传》，会稽太守第五伦其后为中央政府司徒之官时，令史家班固作推荐会稽山阴人谢夷吾的文章，其文曰：

（前略）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焉绝俗。[\[7\]](#)

东汉末年，豫章名士徐稚甚至闻名于洛阳。桓帝向陈蕃问其为人，以及北方有名诸人物与徐稚谁为先后，陈蕃答道，就家门、地理位置而言，北地名士处在自然养成优秀人格者的环境中，而徐稚出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必当推为第一。结合《谢夷吾传》，在中夏之人看来，显然江南地区的文明更低一层。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区域，儒者理想中的各类人才正逐渐辈出。

注 释

[\[1\]. 桑原鹭藏：《由历史上观察中国南北》，收入《东洋史论丛·白鸟博士还历纪念》，1925年。](#)

[\[2\].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朱维铮点校：《〈熹书〉初刻本、〈熹书〉重刻本、检论》“订孔上”，第432页。](#)

[\[3\].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蔡伦》，第2513页。](#)

[\[4\].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注云：“严彭祖、颜安乐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严、颜之学。”第1239页。据此，“公羊、严、颜三派”应作“公羊严、颜两派”。](#)

[\[5\]. 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卷四“简纸互用”，《续修四库全书》本。](#)

[\[6\]. 蔡侯纸诞生于和帝时，章帝时还没有出现。](#)

[\[7\].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谢夷吾》，第2713页。](#)

第二节 建康的奠都与南地的文运

中国自战国以来，建立统一帝国的机运显著，至秦汉遂出现了一王统治的大帝国。西汉武帝至宣帝的治世尤其发挥了作为帝国的威力。以长安为中心包含其东西三辅之地的所谓大长安与东部洛阳连结，这一地域似成为全帝国的首脑，政治经济的中心机关在此运转。为维持其经济上的中心位置，以大长安或洛阳为起点，运河之网纵横布满北部中国南北。于是黄河之水连淮水，淮水之流与长江通潮汐。西汉元帝以后，以大长安为中心的经营方针有了一个转变，东汉光武帝承袭其流，迁都洛阳，确立对于地方的安民绥抚政策后，其间文运逐渐浸润江域，已如前述；但整个两汉时期，文明的中心无疑仍在北部中国。在当时的北人看来，长江流域多为自然资源丰富、水稻丰稔之地，而化自然资源为社会人文之用的是北人的智能，土地卑薄、人心偷惰的南方人欠缺这种能力。《左传》所谓“楚材晋用”主要就政治人而言，而作为政治人，南人被认为有缺点；接着作为经济人，南人同样被认为有欠缺。除了某种特例外，时人普遍作如是观。而孙氏建立吴国，定都建康，保长江而抗魏国的事实，使从前北人优越的看法至少有大修正的必要了。在述其大略之前，先就建康奠都作一说明。

建康（或曰建业）自然是今日的南京。孙氏割据以来，以至整个南北朝，建康都是南朝首都。不过，孙氏奠都以前，此地几未著闻于史。东[1]及北临于大江，又绕以群山丘阜的南京台地，久久不为人知，人们安静地生息在这里；孙权是因了什么缘故奠都于此呢？历来，江苏的平原乃至三吴之地的中心都会无疑是今日的苏州——《史记》的吴会。若传世的《越绝书》是东汉人的著述，则我们完全可知，东汉时苏州已有宏大的城郭，且以此城郭为中心的运河已向南北开凿；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想，苏州是三吴姓族托身之都邑。因此当孙氏平定江东时，先出现了苏州阊门有天子气的谣言；晋人左思《吴都

赋》也先着墨于苏州的形势，而后进入建业离宫的描写。大约孙策在江南建立立足地时，三吴（以苏州为中心）望族的协力是最多的。不过为了保全江南，必定有必要对北方进行军事防备，且扶助孙氏的政治家及军人首领多是自北方迁来的豪族。可以说，为了建立对北方的军事防备要地，且为了协同北来豪族与南土姓望，使其尽心于一朝廷之下，在一片形势较好的新土地上建设国都——即便当时的建都者未有明确的认识——是颇自然的选择。

南齐谢朓的诗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概括描写了建康气象，而建康的繁华达于顶点实在梁武帝时。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用《金陵记》，文曰：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洎陈高祖复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2\]](#)

据此，四方各四十里之间为“城中”，其中户数近三十万。但建康城（即六朝时所谓台城）仅限于覆舟山下至秦淮水北十里较狭窄的范围。以台城为中心，四方有石头、琅邪、丹阳、临沂诸城，且秦淮一带有庶民纷杂的市场，若这些地域全部包括在建康名下，则《金陵记》所记难说是夸张的。梁武晚年，北来武将侯景的叛乱使得建康凄凉荒废。建康的繁华极于梁武，其衰颓也发生在梁武在世时，因此可以说南朝史尽于梁武。然而帝王的居所台城本身未必是一座完整的都市。《世说》云：

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3\]](#)

南州即当时的姑孰，在今安徽当涂附近。大约桓温有据姑孰篡夺东晋的野心，当他营建都城时，取法北部中国之都城，使街衢井然，以之

对比台城，则台城街衢纡曲，殊劣。为东晋始祖元帝营建建康的王导在这一点上受到了非难。王东亭以江南地势与北部中国地势不同为由为王导辩白，本是一时的应对之辞而已。而据称东晋继承了吴旧城，由此可推测，吴建康城本身的街衢就是纡曲的。不止街衢混杂，作为都市的吴建康城——与北部中国的首府相较——普遍呈现出混杂的样貌，这见于西晋左思的《吴都赋》。意译如下：

（吴）在建业之地作临海、赤乌二殿，又立弯碕、临碕二大门。天子御道两侧树以青槐，亘以绿水。诸官署绵延七里，其间军营栉比，以至南面之淮水。淮水作塘，接续长江之岸，沿流民家并立，又越水而南，丘陵起伏之处，吴豪族虞、魏、顾、陆子孙之第邸相连。果是名族子孙，思虑深而德行高。而其邻则有江西鄱阳之任侠者一群，常于市中呶酒较力，热衷赌博。向着此等都市人，商人水浮陆行，方舟结驷而来。市场未有整理，物品杂乱摆于街衢，种类相异的都市、田舍物品流转于一店。往来男女驻足于物品前。商人叫卖。穿葛衣麻衣的人们杂沓交织，其间轻舆穿过。楼船过肆，自远方带来琉璃、玳瑁及其他珍宝。叫卖之声喧哗不绝。[\[4\]](#)

而对照描写的北部中国之魏都是这样的：

（意译）黄河流域高爽之气象是长江一隅之湫湄所不能比的。中原不幸爆发内乱，整个渭水、黄河流域荒废殆尽。而当魏建都之时，先考古礼以作社稷、清庙。以之为中心建筑都城，军营、官署、市民住宅等皆保持一定秩序，由此行人自然守礼，斑白不提，行旅让衢。市场有统制而不混杂，没有扰乱风俗的货物。尤其朝廷的官吏、学者、军人等皆具威仪、风采，无教养的南地之人不能望其项背。[\[5\]](#)

左思为了铺陈魏都清肃之风俗，极力描述吴都的杂乱，显然这恰与东汉班固作《两都赋》是同一形式。不过在街衢的齐整、市场的管理等

方面，魏都与吴都形成对照或是当时的一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像左思那样，据此评判两都价值之优劣，但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建康城具有自由风气的一面。笔者倒对这一点抱有兴趣。

以建康为首都，长江流域暂且得到了统一。如《内编》所述，北来的武力持有者们压迫山越，保全了江南的和平。通过南土巨族，国家政治逐渐开始运转。吴之四姓富于教养，虽左思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推察，孙权称帝，断然与魏对立，尤其对吴人建立自信心带来了大的影响。那么事情的原委如何呢？

吴孙权起初对魏采取似服从又似独立的暧昧态度。这时吴派往魏的使节为了使吴对魏的地位不失坠，煞费苦心。特别是魏文帝好嘲笑吴帝无学，或魏的高官们露骨地表现出对南土人士的轻侮之情，对此，尽力保全吴的体面是吴使的立场。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三国志》裴注所引《吴书》的记事：沈珩，吴郡人，作为使节至魏时，

“魏文帝问曰：‘吴嫌魏东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备。’”他完成使命归吴后，建议孙权致力农桑、整治战备。[\[6\]](#) 我们通过使者之言可知，即便是在形式上仍然承认魏的时候，吴也对自身的独立保有充分的自觉。而孙权称帝后，视中原为朔土、指北人为北虏等公然载于史书，此时在形式上，南土正是存有帝都的封域。

据《三国志·虞翻传》裴注引《江表传》，孙策在寿春时曾与马日！相见，且与中州士大夫会谈，他们都评价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7\]](#)。然而扶助孙策，其后仕于孙权的彭城张昭，著闻中原，并曾挫魏使之高慢；尤其河南人冯熙出使魏国时论吴国之富强、吴帝之为人足与魏对立，文帝以利诱之而不屈，遂自刃以全使命（吴纪引《吴书》）。[\[8\]](#) 他们虽是北人，但王者出于南，不可不尽臣节于南。必须看到，吴国之存在对秦汉以来中原中心的传统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而据《三国志·朱治传》可知，在孙权长久的治世中，南土人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占据优势

地位，吴之四姓子弟为官各处，占据要地。与此同时，甚至北人左思也明确表示吴之四姓富于教养，则吴人自身对其教养有所矜持，自不待言。陆机《吴趋行》即明白表明了此种感情，其要旨在于：吴的都市苏州有朱、张、顾、陆四姓，积德树功，礼让济济，化及四方。对于这种家族教养的自觉，也必然使他们将其所仕帝室视为有尊严的存在。陆机《辨亡论》一节曰：

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虽醖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术，敦率遗典，勤人谨政，修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9\]](#)

在陆机看来，吴实因庸主孙皓而灭亡。或者说，吴的名族抛弃孙皓，遂使吴灭亡。而灭吴统一天下的西晋武帝却不能闲置既以才德而著闻中原的吴之名族。武帝不仅使吴都城建康保持旧时模样，还发诏拔擢吴之人才于中央。陆机作为其首领而北上，尽力推荐吴人，使之立于中央要路。不过，事实上北人对此极为反感，陆机遂成为牺牲品，其他名族也舍弃北方政府南归。适逢西晋在内乱中垮台，在王导的指引下，五马南渡，于是以司马氏为中心，旧时吴都再次成为首都，江南文运更进一步开化。

“五胡之乱”时，北地名族大量迁移到据于建康并复兴晋室的司马氏麾下。元帝初入建康时，王导感到先有必要获得东南人士的归服，于是采取拔擢南人于朝廷要津的方针。不过，为五胡所伤残的北地豪族大抵推戴司马氏以谋其位置之安全，因此南土的北人势力逐渐强大。在两股势力的冲突下，南土豪族周氏等遂遭破亡的惨祸。东晋自接近末年起，逐渐确立了以建康为中心、以王谢二族为贵族首领的政治及社会特征，同时，吴郡或会稽姓族等也各以其家门获得了社会

上的地位。以此等贵族为中心的文明样式逐渐趋于确立。关于其社会形式及文化内容，笔者或在别稿中论述其一般情况。

注 释

[1]. 似应作“西”。

[2]. 《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昇州》引《金陵记》。

[3]. 《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二》。

[4]. 《文选》卷五《吴都赋》：“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鞞睥。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櫺，连阁相经。闾閻譎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右号临邛。……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粲粲。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吕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歧嶷继体，老成弈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轍。陈兵而归，兰锜内设。冠盖云荫，闾閻阗噎。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詵之客。缔交翩翩，僎从弈弈。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翹关扛鼎，拼射壶博。鄱阳暴虐，中酒而作。于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都塹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闾闾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胎，商贾骈望。纨衣终服，杂沓僉萃。轻舆按轡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珮。縑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儼嘉崇穆，交贸相竞。喧哗惶呶，芬葩荫映。”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2—105页。

[5]. 《文选》卷六《魏都赋》：“况河冀之爽垲，与江介之湫洧。……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变为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绳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而是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策，亦既允臧。……建社稷，作清庙。……习习冠盖，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第117—127页。

[6].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书》，第1123页。

[7]. 《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江表传》，第1318页。

[8].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书》，第1130页。

[9]. 《晋书》卷五四《陆机传》，第1471页。

第三节 南朝治下江南的一般经济状况及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

其一

如前节所述，汉代认为，江南地区即便自然资源分布丰富，而将其化为人文之用的实为北人。且江南虽土地肥沃，但其耕作方法不脱火耕水耨的朴素性，人民偷惰，无贮蓄之心，因此经济能力有所欠缺恐是事实。然而至东汉时代，待一般文化自北方浸润南方时，江南也随之得到开发，这是可以想象的。如此，可通过哪些方面来见证这一事实呢？

中国以农为国之根本，古今都一样。就农业而言，栽培谷物的土壤的开发，在社会秩序的维持上，在国家正常财源的给养上，尤为最必要的条件。中国自古有包含各种谷类的五谷或六谷、九谷等固定名称。各种谷类被种植，同时五扰、六扰等名称所包含的各种家畜被饲养。这主要指黄河流域的情况而言，因此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土地实优于其他地区。然而秦汉帝国建立后，以运河为主的交通路线使北部中国纵横相连，与此同时，谷类被投入市场，商人以之为投机物，自然多种谷类之中价格出现了差等。两汉时，麦、稻米两谷种最受尊崇。尤其稻米在东汉时代似受到最广泛的喜爱。中国各种史料明确记载，稻米固然广泛种植于中国各地，而长江流域尤为这种谷物的一般种植区。而东汉以后，北部中国推广稻米种植，淮水流域的种植最受奖励。为此，灌溉方法也极受重视，灌溉系统这种人为设施自然也及于江南地区。江南的筑塘工事大约是其明证。据《通典》所引，东汉章帝建初中（76—83）〔曾巩《越州鉴湖图序》为汉顺帝永和五年（140）〕[\[1\]](#)，会稽太守马臻在今浙江东部绍兴附近开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据《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征发人役兴修水利之际，士族免役，而会稽的塘役则士庶无别，皆课以徭役。这或许是东汉以来的习惯。又据《晋书·孔愉传》，句章

县（在今宁波附近）“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2\]](#)。又综合马臻的溉田政策来看，可知汉时绍兴至宁波的浙东地区，溉田是受奖励的。《史记·货殖列传》将整个江南视为实行火耕水耨的自然式耕作法的区域。而到了筑塘溉田时，可知江南已不依赖朴素的耕作法而得以厚其民生、安其室家了。

当三国鼎立之世，北部中国的魏热衷于屯田政策，置典农校尉以督开垦事业。吴也有典农校尉，它取得怎样的实绩未有明证。接着，至东晋建都建康后，张闾在曲阿筑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有名的葛洪作文颂其功绩。曲阿在今江苏丹阳，位于三吴平原北部。若《越绝书》为东汉人所作，则可知汉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南北都有筑塘的事实，又综合张闾的筑塘来看，可知三吴平原大概盛行溉田政策。而《南史》载，宋元嘉时“起湖熟废田千余顷”，说明南京台地也不例外。

笔者往往使用“三吴平原”一语。所谓“三吴”指的是什么区域，考证家是有争议的。而作为笔者的用例，这里将三吴简单定义为以太湖为中心，汇入太湖及由太湖分出的诸水之流域。史书还有“吴会”的用例。笔者将它定义为包含浙东、浙西两地平原之地。自今南京台地至两浙的地区，六朝时均属扬州之域。试检《宋书·州郡志》，属宋统治的州总数为二十二，其中人口十万以上的州数达十三，不过除扬州外，没有人口超过四十万的州。[\[3\]](#)然而，唯独扬州人口有一四五五六八五（1455685），其中吴郡一郡有四二四八一二（424812）。具有广大行政区域的扬州以外各州均不曾有匹敌此一郡的人口，因之宋中央政府的正常租税几乎大部分由扬州维持则显而易见。当然，关于人口之多少，现在所举数字未必准确，但扬州地区在六朝时恐是人口密集区。宋时，孔灵符以山阴（即绍兴）人口稠密，田土稀少，上表请求将无赀之家迁徙至余姚、鄞、—三县，以开垦湖田；宋孝武帝从之，此地遂成良业。

《隋书·地理志》叙述扬州之风俗与丹阳（即南京）之繁华曰：

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4\]](#)

此志所云“火耕水耨”及“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完全承袭了《史记·货殖列传》的叙述，直到现在，中国人之间似乎还会不经意地使用此语。在文章上无实际内容的套话陈陈相因，是史书的通弊。如“火耕水耨”，西晋名臣杜预已明确承认：在土广人稀之地施行火耕水耨，初得实利。[\[5\]](#)且所谓南人无蓄积之资，六朝北人犹以之为口实，有人还从房屋的构造来说明其理由。如《内编》所述，江南的房屋多以竹茅建造，无地窖，不能贮藏谷物。不过，岂有贮藏谷物仅限于地窖之理？且从经济上看，贮藏谷物时间之长短到底哪个更有利？要之，从蓄积并利用财富的精神旺盛与否，可看出其地之人心是否巧于经济。不管怎样，《隋志》所谓江南人“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也仅是形式性的因袭文字而已。或有人认为，史料说江南房屋用竹茅建造，看上去不是表现了江南民间的贫穷吗？这是因地制宜，无须辩解。据竟陵王子良的上表可知，江南稍富实的民家也用瓦屋。总之，《隋志》总叙江南风俗的文句只是陈词滥调的因袭而已。而《隋志》叙南京之繁华，说其市廛列肆之盛媲美洛阳、长安，当与事实不违。大约南朝宫殿及势望之宅邸虽已为隋所荡平，其市况犹保存了旧时面目。不难想象，以此五方之会——南京为中心，水路交通网铺张于四方。以下简述其大概。

三吴平原的中心，是以太湖为主以及与之水波互通的大小几个湖泊所在的一带，总称五湖。若今常州金坛南的长荡湖也包含其中，则南北朝时期围绕这一广大湖泊地带主要有四个重要的郡治。即今金坛所在的当时的延陵郡（扼守湖泊地带的西北部），太湖之西的义兴郡（无锡宜兴），其南的吴兴郡（浙江湖州），其东的吴郡（苏州）。

四郡之中，吴郡无疑是最大的都会，建康未为帝都以前，三吴平原本以吴郡为治化的模范之地。《史记·河渠书》曰：

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6\]](#)

有学者将这里的“三江”与《汉书·地理志》的北江、南江、中江及《尚书·禹贡》的三江关联起来解释，然而其说不可简单相从。我们仅可知秦统一以前吴地已有运河的开凿而已。据司马迁的说明，此运河的开凿除便利舟行外，还兼充灌溉之用；尤其在土地低洼、湖水相连的江南，很多地方都可看到：筑塘以谋疏通水利时，舟船的航行与溉田是两者兼顾的。据《越绝书》，吴地至今无锡也筑塘了，又太湖南至浙江杭州，再往浙东地区的交通路线也开通了。《越绝书》的记载比较简单，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以吴地为中心的南北水路交通被打开了。然而自三国时期孙氏定都建康后，运河首先以建康为中心而设计。笔者认为，自今南京西北狮子山下至台城西之仓城先通了运河，再由此向西连络至石头城下。大概在孙吴时代，建康城绕以大江之水，以便物资漕运；而东晋至刘宋，秦淮水自赤山塘通于赤山湖，经茅山山中的柏岗通于长荡湖。此即破岗渚。于是南朝首都建康的水路可直连三吴中心苏州。而据《南齐书·州郡志》载，丹徒之水通吴会，因此至少在南齐时就有了自丹徒（即镇江）连通苏州的运河。[\[7\]](#)结合《越绝书》的记载，可知此运河应通过无锡。又据《南史·丘孚仲传》可知，自曲阿（江苏丹阳）至延陵（金坛）有运河相通。[\[8\]](#)因此至少在南齐时，三吴平原因水路而纵横联络是毫无疑问的。

《越绝书》记载了一条自苏州南经杭州，再往浙东的通路；又如前所述，在浙东的中心会稽，马臻有长湖筑塘之举。《汉书·地理志》所载自余姚入海的分江水或《水经注》的南江，今暂且不论；对于屡出现在南朝史书或文集中的“浦阳江”，后世学者认为它包含现在的曹娥江与钱清江，同时此二江似因浦阳江而通流。也就是说，浦阳江即赵宋以来直至今日的浙东运河前身。笔者也认为此说是妥当的。

为使南京台地与两浙之间互相联络相通，南朝开凿了以上运河。毫无疑问，这明显促进了土地的开发、交通的便利。而为了交通的便利，南朝各代所采取的政策也是不容忽视的。

翻检南朝的文书，特别醒目的是“埭（棧）”及“桁（航）”字屡屡出现。据《辞源》的解释，埭是这样一种设施：用土堵水，两岸树立转轴，船过时，船头系一粗绳连结转轴，再用人或牛推动转轴，将船牵引过去。桁是为了系留舟船而设于津渡的工事。不过“埭”与“桁”混用的例子较多，大体其一资于运船，其一便于系留。最著名的桁，是建康城南门朱雀门外的朱雀大桁，据《南齐书·顾宪之传》，朝廷设此大桁有一种征收交通税的意味，风涛迅险，人力不捷，或恐致胶溺，故作之以便公私，民亦乐政府之所为，不惜纳税；此种意味也适用于埭。其所论极不明了，但总之这些设施确实以朝廷之名而设，或为朝廷所管理。而埭的所在似乎多伴随运河的开掘，大约穿渠，立埭，设关司以取税。这一过程顺利时，自然野无怨声。以下来看埭的所在。

《御览》引用《吴录》：吴孙权在句容县内开水道，立十二埭，以沟通建康与吴及会稽诸郡，故历来由镇江溯大江而入建康之船舶，此后即沿此运河而直入建康。此即所谓破岗渚。但笔者并不觉得此事可信。不过，这一运河确实至少在刘宋时就有了。又，自云阳至延陵的运河以长岗埭命名，因此显然那里也有埭的设施。但对南朝中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似为浙东四埭。据《南齐书·顾宪之传》，所谓四埭，是指浦阳的南、北津，柳浦，以及西陵的牛埭。据《通鉴》胡注，浦阳南津为梁湖堰，北津为曹娥堰。这两堰是连通梁湖（今上虞北）的浙东运河的终点。柳浦的位置不清楚，而西陵的牛埭无疑设在今浙东运河西方的起点西陵。可知浦阳江在浙东物资的东西运输孔道上，自西陵渡浙江，至于钱唐（即杭州），运河直通吴郡苏州。而据说仅西陵牛埭税，官格一日三千五百钱，若加以适当管理，浙东四埭一年格外收得四百万钱。[\[9\]](#) 两浙间交通之频繁由此可见一斑。

增征上述四埭的交通税，是西陵戍主杜元懿的意见。他说道：

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10\]](#)

也就是说，三吴地区歉收，而会稽丰收，故商人往来特别多。两地区丰凶不同时，谷类的移动自然发生，不足称奇；但历史上的很多事实也未必合于自然之理。例如据《晋书·陶回传》，陶回曾为吴兴太守，其时三吴的饥馑非常严重，朝廷特听许相互鬻卖，以拯一时之急。而陶回反对，认为应开仓廩以赈饥乏，“辄便开仓”。他完全从政治的意义上来陈述其理由，而朝廷特以诏书命令相互鬻卖，不正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相互鬻卖不为汉以来传统方针所认可吗？而相比开仓赈饥，相互鬻卖以使过与不足相济似更自然。因此刘宋大明八年（464）之诏为饥馑之际转运谷物的商人提供了特别的方便：

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宋书》无“粟”字，今据《南史》而补焉）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11\]](#)

除了南朝政府关于交通以及饥馑之际谷物转运的方针之外，犹应注意的一事是刘宋时期特别采取的劝诱种麦的方针。《晋书·食货志》记载，吴孙权亲自在建业试验八牛耦耕之法，“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12\]](#)。这一方法似为汉代赵过在北部中国创设代田法之时的遗法，孙权之意或在奖励麦的种植？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诏曰：

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南徐治扬州，南兖治镇江，南豫治和州）。[\[13\]](#)

自今日江苏北部运来麦种，命江南地方官在其管内种之，同时奖励淮水地区种稻。这一政策为孝武帝所继承，大约是刘宋的主要方针之

一。原本江南专为稻作，因之在汉代被视为人文低下之地，因此南朝奖励麦作，其开发江南地力以成穰穰美土的效果恐怕是显著的。反之，淮水地区在东汉至三国魏时期极力奖励稻作，文帝也欲复活稻作，其结果似乎不太成功。《南齐书·徐孝嗣传》载：

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谿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水田虽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14\]](#)

徐氏固非不提倡复活稻作，却奖励时节上适宜北土之性的菽麦。淮水地区在政治上位于南北的中间，因之对依赖水利的稻作多有不便，这种政治性原因或许使政府逐渐断绝了在北地进行稻作之念？

江南谷土开发之事，约略如上所述。而谷物之外，绢麻等衣料也有必要作一考察。笔者没有研究过产丝之蚕以及养蚕之桑的历史。三国分立后，晋左思《吴都赋》记录孙吴的特产，其中有八蚕之丝。要之，所谓“八蚕之丝”，与《御览》所引《吴录》“南阳郡一岁蚕八绩”及《永嘉郡记》“永嘉有八辈蚕”一样，表明人们饲养了在三月至十月的八个月间各月皆得吐丝的八种蚕。[\[15\]](#) 据南齐竟陵王子良的上奏，东晋时，国家向人民课绢布以作赋调。如此，可见江南广泛生产绢。且宋文帝极力奖励桑麻的种植，又梁良吏沈瑀明确要求每家种桑十五株。[\[16\]](#) 据子良的上奏，东晋经刘宋至南齐，绢的价格逐步下落，约至十分之一。这或是因为绢的生产逐步增加了？绢固自有其价值，但织绢以制作各种用品的技术，果是江南人所擅长的吗？建康定为首都后，远方各族或许朝贡首都，朝廷必厚报其使，王室遂需经营商卖——这是中国历代的通例。因此朝廷必有尚方署织出的绢物，今无法就现物来作考察，而在文献上，《御览》所引《王子年拾遗记》有如下记事：

吴主孙权居昭阳宫。赵夫人乃织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17\]](#)

这一朝廷制作似乎自然刺激南人习得此技，《吴书·华覈传》描述建业风俗之奢侈如下：

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遂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18\]](#)

据此，南人长于仿效，又好向外夸示其富。这一南人的特征为北人所共知。不过通观整个南朝时期，在各种工技上南人似乎尚输北人一筹。《御览》引《魏文帝诏》：

江东为葛，宁比罗纨绮縠？[\[19\]](#)

可见罗纨绮縠是北方产物。《颜氏家训》比较南北，说南人事外饰，极舆马之齐整，北人事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又说“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20\]](#)。麻布也多出自淮北，它常与江南之谷对称。《宋书·周朗传》“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即指此。要之，在南朝治下，江南之地可谓迎来了谷土开发最显著，绢的生产及纺织技术逐步提高的时代。

其二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大致能明了江南经济力增进之事实。在这经济力之上建立起来的南朝中央政府，通过怎样的方针适当管理还是不适当地阻碍了经济力的发展呢？以下作一极简要的叙述。

《后汉书·百官志》就县所管辖的乡里组织有如下叙述：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

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21\]](#)

在中国，直接治理人民的是县。而据范晔如上记载，属县管辖的乡村组织由乡、亭、里等组成。据范晔《百官志》总序，其《百官志》大体“依其官簿，粗注职分”，故“本注曰”是范晔所注。今据其注可知，五家为伍，以这种组合形式为单位组成什、里，里为百户的组合。据沈约《宋书·百官志》所记汉制，可知里为百家的组合，十里为亭，亭实千家，乡即万家的组合。《后汉书》不如沈约所述那样明了，但推“本注”之意，或正与沈氏意同。以户数组织乡村本为《周礼》《管子》等所极力主张，但据笔者的考察，至少西汉的制度与其旨趣大不相同。当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组织在《汉书》志[\[22\]](#)中有记载，但其中里、亭丝毫没有包含一定数量的户口的意思。据《汉官仪》，“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将十里看作里数，因之有亭长所辖为其半即五里的记事。因此在这里，里必定表示距离。又，通过阅读《汉书》，我们认识到，亭作为行旅宿舍的同时，还是部落民简单的诉讼裁判场所。如此，亭应视为集十个部落（里）并主其治安及诉讼的一个机关，因之里只是部落的意思。大约统辖十部落的亭的配置大体依里数来定。故一部落（里）的户数原本没有一律的必要。汉朝大体以自然生成的部落为基础并统之以亭、乡之制度，乡有平均统内力役、赋税的有秩，又有掌教化的三老，掌治安的游徼。而由顾炎武《日知录》可知：这些乡官被授予民爵，与官吏抗礼。然而在自治制度崩溃的同时，乡官的权力逐渐微弱。于是《通典》所载晋制：每县五百户以上为乡，率百户置里吏。这实以户数为标准重新组

织了乡村，《后汉书·百官志》本注的“一里百家”，恐怕是根据晋制而想象的。沈约以百家之里为标准，算出亭、乡的户数，以之拟为汉制，更推广了范晔的错误。杜佑《通典·职官典乡官门》皆不载此等之说，或是严密考察的结果。

晋朝之所以尝试以户数规划乡村，或与它新采用户调式的课税方法相关联。魏朝创设了户调式，以亩课田租外，每户征绢二匹、绵二斤。至晋朝，以户之男丁定其调。这恐怕是取代汉朝算赋制而创设的制度，相比汉朝算赋制的人头税，它采取了户税的形式。晋朝或许为了便于征收户税，因而以户数组织乡村？若如此，则不得不说：为了使县这一中央政府派出机关进一步发挥它对乡村的强制力，因此有了这种乡村组织的设置。但以西晋之微弱，这是否得以实行则是另一个问题。

据《宋书·百官志》，汉乡村机关的有秩、三老等，有的县设了，有的县未设，各随旧俗，无定制。其文意本指东晋以来江左制度而言，可知大体南朝县之下的乡村制度没有整齐划一的条规。

然而关于租税，整个南朝大体采用了魏晋以来新立的户调式以及田亩之租。初定田租，在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宋孝武帝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参照《通典》），且据竟陵王子良的上表，民户必以绢布输官似为东晋以来之制，东晋无疑有了向每户征收绢布的制度。为了理解户调式的性质，需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量。（一）就租税征收物而言，汉朝的算赋（人头税）以钱缴纳，户调式则代之以绢绵。缴纳实物之议，早为东汉宰相张林（明帝时）所发，三国时又在事实及言说上得到了确认。（二）如前所论，户调式以统治者的权力强制按户课税，具有政治性意味。随着自治制度的崩溃，这一课税方法在魏晋之际创设。因此在全面的历史意义上考察，则大体包含上述两种性质的户调式课税法，正是在统一的中心已然崩溃的北部中国得到实施，而在一般经济兴隆向上的江南地域，它是否得以适当的运用

却是一个疑问。带着这一疑问，我们观察一下南朝财政政策所表现的事象。

南朝的财政政策之中，议论最热烈的是钱币政策。在北方，三国曹魏以来，钱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大体是贫乏的，这在第三章有所论述。而在南朝，钱币问题讨论得如此喧嚣，因此南北钱币问题显然不可同样处理。关于中国的钱币问题，原本自西汉武帝以中央管理天下之铜山，铸造五铢钱而确立钱币品式以来，五铢钱深受一般社会信任，如章宗元所说，钱币的历史进入了五铢钱时代。汉代五铢钱的流通范围颇广，今随朝鲜等古坟发掘品而出现的五铢钱暂且不论，但通过以下记载可知五铢钱曾普遍使用于江南地区：据《三国志》裴注所引，会稽太守刘宠迁任中央政府之际，若邪山谷间的五六老翁人赍百钱为他赆行。[\[23\]](#)当然，这是否为五铢钱，多少有点疑问。今据《文选》宋谢惠连《祭古冢文》，宋时建康之东的东府城外掘得古冢，断非豪族之冢而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汉时建康不过是一微小寒邑而已，此冢也只是普通人家之冢，其中犹埋藏着五铢钱，据此可想见：在汉时江南县郡治所，五铢钱曾普遍流通过。汉亡，吴、蜀各自割据称帝，他们皆铸造新币，以期流通民间。吴孙权铸造了嘉禾年间的“大泉五百”钱及赤乌年间的“大泉当千”钱。同样，蜀国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百”与“陌”同，盖“足陌”之意，钱质与钱价兼表，以标准的五铢钱定为百，“大泉五百”及“大泉当千”各指五铢钱五枚、十枚。据《晋书·食货志》，吕蒙取荆州时，孙权赐钱一亿。这以“大泉当千”计算，钱价太高，但有空名，民间颇患之，故此钱不久即被回炉。[\[24\]](#)吕蒙取荆州在赤乌之前，《晋志》的记事稍有疑点。不过据裴注所引《江表传》，吴所铸大钱确实都在赤乌三年（240）废毁。[\[25\]](#)在五铢钱受信赖的当时，大钱似乎终究还是行不通。

《晋书》记载，元帝渡江建立东晋时，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

钱”[\[26\]](#)。东晋所用赤乌旧钱，王应麟等认为是“大泉当千”钱（《玉海》卷百六十）；不过，如前所述，它铸造后三年即被销毁，王说恐难成立。倪模《古今钱略》据江秋史之说，绘晋之“比轮五铢”钱，大概是背面重轮（比轮之名所因矣）的钱币。据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诏，比轮钱为官私贾人所喜好，又广州夷人竞相获之，铸败作鼓，故而禁止货与夷人并命监司禁止销坏此钱。[\[27\]](#)显然，这一钱币品质比较优良。但此钱于何时、为谁人所铸，史无明文，以意推之，东晋初年所用赤乌旧钱之中，此钱殆近于标准货币，所谓“四文钱”的品质也似乎比较优良。但整个东晋一代，并不见政府特设钱局铸币的事实，所谓赤乌旧钱比轮、四文等由何种机关所铸，也茫不可知。尽管如此，从政府几乎将其视为标准货币且明令禁止销毁此钱或货与夷人等方面来看，朝廷对货币似乎是有统制的。因此其后桓玄取得权力，主张废钱用谷帛——北部中国曾有过这种议论——时，孔琳之力陈此举之无谋，且认为孝武帝禁止销毁比轮钱的当时，经济状况是极良好的：

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28\]](#)

此文句为《晋书·食货志》所采用，但它在《食货志》中与前后文的关系完全分离，几乎成了没有意义的语句。

刘宋建立，在其全盛期的文帝元嘉七年（430），初立钱署法，铸四铢钱。据说文帝之所以铸造新币，是因为忧虑古钱日渐为人剪凿，而新伪钱币日多。所谓“古钱”，恐怕指比轮钱之类。据《宋书·颜竣传》，此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钱同，百姓因而未有盗铸，而据《宋书·何尚之传》，所谓古钱比轮之类多被剪凿，遂新造稍轻的四铢钱。[\[29\]](#)不过，这一新币品质极优良，似乎起到统制市场的作用。其后政府逐步采用增加收入的方针，元嘉二十四年（447）发行“当两大五铢钱”，此方针愈加显著。发议者为江夏王义恭，赞成者沈演之认为，当时钱币遍行，及于荒服，而现在货币数量少，今国家铸大

钱，高其价值，物价腾贵，国亦受利。[\[30\]](#) 对于此等“国利论者”，何尚之认为，原本泉货问题的解决必须以一般民众的信任为基础，故改铸古钱非良策，况且无实价的钱币以虚价行世，徒使“富人货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其意盖在顺从东晋以来的方针，认为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实行钱币改革。不过朝廷强制实行了改革，但公私不便，不久即罢。然而宋孝武帝再次以中央集权之政策新铸四铢钱。为使之通行，政府做了相当的强制，但其品质极差，明帝时遂被废止。

如上所述，刘宋的货币政策大体是失败的。刘宋末期，沈庆之提议广听私铸，“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以铸钱。这一提议基于私铸已多的实情，欲允许私铸，为之建立禁制，以统一钱币。这无疑是一个理想化的提案。因此刘义恭以其不可能实行而反对。明确提出异议的是颜竣，他提出的对策是：（一）政府开署采铜，（二）绝器用之途（谓禁私铜也），（三）定其品式，（四）日渐广铸。这一提议或许比沈庆之的提议还更理想化。宋齐换代，在齐朝全盛期的武帝时期，孔觐提出了与颜竣几乎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刘宋专铸钱以利政府，好造轻钱，这点有根本性的弊害。[\[31\]](#) 但即便他说的是事实，政府也仍然毫无改革之力。武帝使诸州郡收买私铜，又欲将四川雅州府严道县的蒙山铜矿收归政府管理，而这也只是重复了一遍失败的历史。总的来看，优质的五铢钱因其货真价实而得到了民间的信赖，且当时铜完全不用于耕战（见于沈庆之议），政府实际上管理不了铜矿，故而假如政府不固执于它的收益政策，则似可绝其铸钱之意。据《通典》详细记载，实际上梁武帝时，除海外通商要冲的交广地区使用金银货币外，在被视为钱币流通区域的长江流域，各种钱币并用；且据梁顾烜《钱谱》，据称为蜀刘备所造的“当百五铢”钱流通于三吴地区，首都建康也颇多此钱（据《古今钱略》引洪志）。可见不管何人何地铸造，良质的货币必然在各种货币之间显示其标准的价额并受尊重。刘宋时期何尚之在非难文帝铸造大钱的文章中曾立一公式，即一定量的钱币伴随一定的物价。这大概道出了

钱币自然的妙用。无其力而欲得收益的政府之铸币政策，常导致一般经济的紊乱。梁武帝也不能例外，在铸造轻钱强制发行，结果变得更糟糕时，他下发足陌令，发行虚价的足陌钱，使钱币愈加紊乱。要之，整个南朝，政府都没能安定钱币，它们为其后大唐统一国家确立钱币政策提供了失败的经验。

如上所述，南朝铸币政策之中蕴含了政府充实财政的企图，而从国家的体制来看，财政的正常运营原本在租与调。租调有定制，因之国家财政得以确立，是由于刘宋始祖武帝所实行的土断法。关于土断法，《内编》已有详述，总之我们看到，北方流民土著接受州县管辖，向政府提供租调及力役。而如后节所述，至宋，南朝的贵族制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尤其文帝元嘉年间士族与庶民的区别明确写定在户籍上，因此租调及力役的负担者庶民、为庶民所养的士族，这两阶级大体变得明了，从中可见国家的秩序。而时流及为政者认为所定租调不足，强制实行种种课税法。据《通典》，在南朝，大致军国所需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本无恒法定令，故州县任意量定，以为征赋。这是南朝临时税的概要，其中尤其成为民之怨府的是财产课税之法。宋后废帝元徽三年（475）诏曰：

费财足以充限者，督令洗毕。

此指免除财产税，[\[32\]](#) 但其虐民之状见于周朗的上疏：

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货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33\]](#)

齐萧子良也有几乎相同的上疏。据周朗的上疏，这种税额以钱币征收，可知中央政府有收钱币之必要。而吸收钱币之事过度实行时，原来征收现物的调布也以金钱折课。这不是为了得到军国所需的杂物，而是因为比起征收现物，折纳金钱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就萧子良的上表来看，例如估算一定量的绢布为一定数额钱币时，故意以绢布昔时高价为标准进行征收。且上纳的钱币必须轮廓齐整，一般民众为了得

到这种良质钱币，深感苦痛。总之，宋孝武帝以来，钱币主要集于中央，为此一般民众在经济上非常苦痛。且为了施行其政策，朝廷不委任正当的州县机关，而直接从中央派遣台使，强制征收，其弊害已详述于《内编》。但中央是否因此丰富了物力呢？宋末虞玩之上表曰：

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陶，砖瓦双匱。敕令给赐，悉仰交市。[\[34\]](#)

大概所吸收的钱币未入中央的正当机关尚书省，因而尚书管下没有材物，只适时在市场上购买急需品而已。至齐，因萧子良的上疏，武帝遂立永制，规定诸州县的布帛一半取实物，一半折钱币。这一明令发布后，即使税率逐渐变重，一般民众犹得免于暴吏诛求，因而符合他们的利益。但这丰富了中央政府财政的同时，却使得市场上钱币枯竭，因此出现了如下市易法：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一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京口）二百万，南荆河州（寿州）二百万，江州（浔阳）五百万，荆州五百万，郢州三百万，湘州（长沙）二百万，司州（义阳）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历阳）二百五十万，兖州（广陵）二百五十万，雍州（襄阳）五百万，由中央派遣台传，于所在市易。[\[35\]](#)

如上所述，宋元嘉以后至齐，南朝财政政策似乎是直接或间接以钱币为中心而建立的。然而至梁武帝，比起此等钱币问题，他明确了户籍，对浮浪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加以限制，且以男女确定布绢（户调）的征收率。要之，梁武帝试着通过一般性法规，设立租税的定额。但在历来仅措意于形式性建设的梁代，这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行，今无从探究了。

注 释

[\[1\]. 据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八二《州郡一二》，第4832页，该版本《通典》正作“汉顺帝永和五年”，非“后汉章帝建初中”。镜湖，又名鉴湖、长湖。](#)

[\[2\]. 《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第2053页。](#)

[\[3\]. 据《宋书·州郡志》，南徐州有四十二万余人，青州四十余万人。](#)

[\[4\]. 《隋书》卷三一《地理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86页。](#)

- [5].《晋书·食货志》引杜预语：“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 [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07页。
- [7].《南齐书》卷一四《州郡上》：“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第246页。
- [8].《南史》卷七二《丘灵鞠附从孙仲孚传》：“明帝即位，为曲阿令，会稽太守王敬则反，乘朝廷不备，反问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凿长冈埭，泻渎水，以阻其路。敬则军至，遇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第1764页。
- [9].《南齐书》卷四六《顾宪之传》，第807页。
- [10].《南齐书》卷四六《顾宪之传》，第807页。
- [11].《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4页。
- [12].《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3页。
- [13].《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2页。
- [14].《南齐书》卷四四《徐孝嗣传》，第773页。
- [15].《太平御览》卷八二五《资产部五》载：“《永嘉郡记》曰：‘永嘉有八辈蚕：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
- [16].《梁书》卷五三《良吏·沈瑀传》：“永泰元年（498），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第768页。
- [17].《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布帛部三》。
- [18].《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第1468页。
- [19].《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布帛部三》。
- [20].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卷一《治家第五》，中华书局，1993年，第48—51页。
- [21].《后汉书》志第二八《百官五》，第3624—3625页。现存《后汉书》八志三十卷由梁刘昭从司马彪《续汉书》抽补，非范曄所著。
- [22].周一良指出，应作《汉书·百官公卿表》。《评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第127期；收入《周一良集》第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98页。
- [23].《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传》裴注引《续汉书》，第1183页。
- [24].《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5页。
- [2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江表传》记载赤乌九年（246）孙权废毁大钱诏书，第1146页。
- [26].《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5页。
- [27].《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5页。
- [28].《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6页。
- [29].《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上（文帝）患之。”第1734页。
- [30].《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第1735—1736页。

[31]. 《南齐书》卷三七《刘俊传》，第652页。孔觊在齐高帝建元四年上铸钱均货议，后文“使州郡买铜”的也是高帝，不过“会晏驾事寝”。

[32].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元徽三年）夏四月，遣尚书郎到诸州检括民户，穷老尤贫者蠲除租调；丁壮犹有生业，随宜宽申；货财足以充限者，督令洗毕。”第184页。
“货财足以充限者，督令洗毕”应指富有者须缴纳租调。

[33]. 《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第2094页。

[34].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85页。

[35]. 齐武帝的一份市场购买清单，见于《通典》卷一二《食货十二·轻重》，第288页。

第四节 南朝的社会制度

三国至西晋、五胡时代，北部中国动乱频仍，人民逃离故土，流散四方。西北到甘肃凉州，东北到辽西至河北北边，南方恐怕直到交趾的广大地区，为他们提供了居住地。显然，大量北人涌入长江流域，由此引起的种种动乱可参见《内编》。对于此混乱，国家无疑通过土断政策（东晋孝武帝之世，桓温开始实施，宋武帝充分实施，其后梁陈皆适时反复实施）大体建立了秩序。其详情见于《内编》。这一政策的社会意义主要在于使北方流人土著于现居住地，形成村落，附于国家的户籍，以担负租税、力役。然而在南朝，至少自东晋末以后，户籍有黄白两种形式。称作黄籍的大体指士族之籍，白籍或指庶民之籍。为何会有两种户籍呢？笔者有如下假定。

凡黄籍，在西晋即一般户籍。《玉海》地理部引《太平御览》中的《晋令》：

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

这样，黄籍用木札注录已在官役者之名。原本据汉以来的土著政策，民众即便流亡他乡，仍必系本籍于故土，其后复归故土，此为常道。然而自东晋末至刘宋所施行的土断政策打破这一常道，欲使流人土著于新居住地。对于一般民众，政府可强制实行这一政策，但以士族自居者则不欲改其本贯。于是政府设立一种特例，对这种人仍旧注其本贯。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诏曰：

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1\]](#)

南朝户籍用纸而非木札。因此，是否被设特例的士族之籍即称黄籍，相对的，新注录户籍的庶民之籍即称白籍呢？当然，黄白两籍已见于

范宁的上疏，这是宋武帝土断之前的事，可能桓温土断之时已有这一特例。这样，南土之士族是否也在某时被编入黄籍了呢？

如上所述，士庶之籍是有区别的。我们进一步思考：以户籍区别注录士庶以前，士庶之别必先已存在，反过来，土断政策逐渐区分士庶，尤其南土贵族对北方贵族所采取的态度等愈加固化了这一制度。总之，刘宋将区分士庶之事视为国家宪章。庶民之上是士族。其下当然有着各种奴隶（从因犯罪而质作于尚方署或系寄于东冶者，到称作编户之奴隶者，其种类必然很多），笔者对此尚未有精细研究，故存而不论。关于士族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南朝士族愈在上位，社会上的特权与家门之间的联系就愈紧密，愈在下位就愈近于庶民。因此上层名家之系统，大体上不管王室兴亡如何，都长久维持了其社会上的特权，而比较卑贱的家门，士庶之混淆则极其容易。为此，齐代极力调查家门与户籍，以保持社会秩序并增加中央收入。不过，区别士庶的社会制度绝不存在于中国本来的思想中。此外，统治北部中国的北魏孝文帝以国家权力确定家门高低，这恐怕也影响了南朝，南朝于是出现了梁武帝的形式性统一国家，自此以后，家门所拥有的特权明显被加以限制。欲了解南朝种种事象，大体必须了解上述社会制度。

宋前废帝时，在总录万机的刘义恭之下，颜师伯为尚书仆射，以武功起家的柳元景为尚书令，总领官吏选叙之事。这三个人结党，又与当时在朝廷内部伸张权势的寒门出身的戴法兴、巢尚之等勾结，选叙之事全以财货与私情行之。这实是对家门与官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社会习惯的挑战。尚书府吏部的蔡兴宗，作为名族首领，尽其权限所及进行顽强抵抗。他令吏部吏员充分调查旧贯故实，又与同僚袁愍孙商量制作了有关官吏选叙的大体草案，示于颜师伯，并诘难颜师伯一派选叙不当。颜师伯一派大怒，以袁愍孙等人为诽谤大政者，免官，贬蔡兴宗为交趾新昌太守。这在当时是非常处置，史家记载“朝廷莫不嗟骇”。其后颜师伯复破格拔擢寒族，却归罪名门首领谢庄、王昙生。[\[2\]](#) 沈约评之曰：“岂徒失政刑而已哉！”由此可见，中央庇护

名门的特权是政治常道，地方上自然也是如此。建康腹地三吴地区的郡太守多由姓族名门子弟充当。他们悉数委任事务于部下吏员，专事风流之游，以舒幽怀，将自然之治平视为拿来之物。然而宋孝武以后，王室以集财力于中央为急务，无视地方太守的权限，派台使以事诛求。这实际上扰乱了贵族制统制下的一般政象。刘宋一代确实因贵族制确立而兴盛，因贵族制淆乱而衰亡。

宋亡齐兴，表面上齐无疑维持贵族制，恢复了秩序。但实权已逐渐脱离名门势族之手，且姓族子弟自身在维持家风、固守社会特权上逐渐松动，而欲以文辞谋求声誉于朝贵之下。齐暴君明帝及东昏侯肆意玩弄权力，更在破坏南朝贵族制上与有力焉。梁武帝在北朝影响下树立国家的法制，欲在其下建立贵族的统制时，可以说南朝特有的贵族制事实上已经消失了。

南朝贵族中具有最高门第的，可概括称为“甲门旧族”。相对的，以武功而得官位的家门属于所谓的“勋门”。若将二者对立起来看，则王室当属后者，因此其家门的兴亡比前者更快。不过，两者作为贵族的门第都很高，从这点看，王室也只是一种贵族而非他物。充分了解这一贵族制特质的帝王，其统治显示出最平和的政象。宋文帝元嘉之政如何在名族合议制下运行，详见《内编》。不拘于人君一人特别措意与否，这种政治运行方式本是南朝的特色，王鸣盛通过《宋书》的《颜竣传》《孔季恭传》注意到这一点。若这种形式在绝对君主制之下运行，则必以朋党之论判其正邪。而在南朝却不曾见到“朋党”之语的使用。章炳麟在其《文录》中论此意曰：

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

而他认为“贵贱有等”是其缺点。他所看到的不求公车征聘之名誉、不作朋党以张声望的南朝士大夫的特质，确实是信实的。不过，将这点归于南朝士大夫自身修养，将贵贱的社会制视为缺点，以笔者之见，这显然是章氏认识不彻底。对绝对君主之意志保持独立的南朝士

大夫的特权，使他们得以不关心世俗之月旦——这样来理解是妥当的。

合议制的特点在于求事理之平允，尤其在判定罪行方面有其特长。章炳麟《五朝法律索隐》认为，南朝士人判定罪行时有四个特征，即（一）重生命；（二）恤无告；（三）平吏民；（四）抑富人。若他人控告士族有罪时，合参礼律、宽仁公平被视为理想的做法（参照《宋书·蔡兴宗传》）。而另一方面，名族有所矜持，俗务不系于怀。大概下僚吏员对校簿籍，做好事务的立案，名族高官认为据之断以公平之理，可通达政情。因此实际事务是吏员在运作。此等吏员一般由寒族担任，赵翼《札记》写道，名门之族不关事务，实权移于寒族。以笔者之见，这也是赵氏认识不足。自中央的都令史、令史至地方军府的主帅（典签）之类固然由寒族担任，但他们似乎多为三吴富人子弟，与名族、勋官关系紧密，占据着官僚中的适当位置——这样来理解是妥当的。但王室如果不想作为贵族之一种，而欲施展其独裁威力的话，它自然会给此等寒族实权，以制约贵族；赵翼所引用事例多属此种。这点与唐中期以后发生的胥吏阶级与官府对立的现象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顾炎武对此有充分的理解。

南朝贵族制在法规性的形式上得到了认可，不过南朝贵族原本不像封建贵族那样生活在社会性的信仰之中，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免有消极的一面。故而为了维持家门，他们专以谦让素退为旨，避免经营资产，且以此为常道。但这只是从维持家门这一点来看，若将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则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贵族实际有社会性乃至经济性势力。在社会性关系方面，南朝史书中屡屡出现“义从”（或“义故”）与“门生”之语，或省约二者曰“门义”（《南齐书·王奂传》）。“义从”有两种用法，《宋书·柳元景传》等所见“义从”指站在官军一边的地方土豪；而它一般似指与名族有某种身份关系者。《宋书·沈勃传》载孝武帝宣明沈勃之罪的诏书，其中有：

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3\]](#)

又《袁豹传》曰：

居位无义从之徒，在野靡并兼之党，给赐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门，则游食者反本。[\[4\]](#)

东汉的史书中往往有“门生”“故吏”之语，此“义从”恐怕相当于“故吏”。“门生”本指因名门的推举而取得官职者。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南齐书·王琨传》载，吏部选局用两门生，不用其他任何贵族之门生。“两门”恐怕指王、谢二族。[\[5\]](#)以势族为中心结成身份关系的现象固然不始自南朝，但必须认识到，在贵族制确立的当时，这一现象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历史上。

以下我们来看名族的经济性关系。刘宋时期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豪族占有山湖、川泽。早在东晋时期，政府就出台了对此的限制措施，宋武帝统一后，尤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尽管如此，民俗相因，烧山封水、保为家利之风未尝断绝。于是羊玄保感到有必要出台新的对策。他认为，“凡是山泽，先常爇炉种养竹木杂果为林茆，及陂湖江海鱼梁鰕/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又制定条格，依官品占山三顷至一顷。原本王室及其一族好占山湖。例如《南齐书·郁林王纪》载罢省御府诸署池田邸冶以还民之诏，同书《高帝纪》载二宫诸王不得封略山湖之诏。地方行政机关（州县）也占有山湖。《宋书·武帝纪》载：“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6\]](#)诸诏书之意皆期于将山泽移于自由民之手，但事实上我们足以看到，山泽正是为贵族制中帝王以下各官僚势家所瓜分。

势族常伴有经营园田之事。《宋书·谢弘微传》载，同族谢混一门，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门徒业使等围绕此一门，各有侍奉。所谓业使，大概指佃客之类。僮仆的性质尚不明了，其中或含有为了逃脱州县苦役，故意丢弃自由民资格而托身势族者。例如《南史·东昏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7\]](#)

又，势族好设立邸肆。他们在中央、地方都会之地设立邸舍、店铺，并租赁之，《内编》已著录一例。《宋书·蔡兴宗传》载：

会土（会稽）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
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8\]](#)

这不正表明势族实施租赁进而放贷以取利息吗？放贷取利，也见于《王弘传》等。此外，势族整治各种工技，占有碾硃之利，这往往散见诸书。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与王室所为——占有营田署，以罪犯耕作，或在各种冶署使役奴隶，又设立邸肆——在性质上并无不同。

读南朝史书，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公私区别不明显。《宋书·刘敬宣传》载：

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余户。[\[9\]](#)

文中所谓“私屯”，明指宣城郡下诸县所立军屯，其中有造作器物者。它尽管为州县这一正当机关所设立，却称作“私屯”。《梁书·武帝纪》载以下二诏：

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
（大同七年）

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
（大同十一年）[\[10\]](#)

屯即军营，传即驿传，治即理事之所，署即舍止之所（《通鉴》胡注）。“公私屯传”，正与“四方所立屯传”意同，大约泛指州县为其便利乃至利益而设立者。埭、桁等，本为州县所作，其后朝廷企图

将其统一为朝廷机关，前节对此有所论及。由此可知，中央政府与州县机关之间，并无明白的权限以联络彼此。《宋书·庾炳之传》载：

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于道。[\[11\]](#)

刘雍使州郡吏员往势族那里运载土产。梁徐勉以风度之安详为名流所钦慕。我们来看看他的生活：门人故旧等“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徐勉皆拒而不纳，而“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而其庭园景况如下：

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迴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读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12\]](#)

总之，势族致力货殖，据故旧劝徐勉之言可知。虽有不好货殖者，实又不可免。而在以权力露骨诛求方面，勋门子弟或出自贵族而掌握权力者是最显著的。宋黄回等或是其代表者。

势族在社会、经济上所结成的关系，略如上述。因此这一制度的永续，必然意味着国家收入持续减少，人口（即自由民）持续减少。梁武帝欲模仿北魏之制，以创国家统一之局面，并企图限制贵族权力，使之统属于国法之下，但这些大多只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国家似乎逐步显出了弱点。据贺琛的上表，当时天下户口减落尤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百姓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而对于权贵豪奢之状，贺琛说道：

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竟为剥削，虽致货巨亿，罢

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酺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13\]](#)

贵族制存立期间，名族细心维持家门，但到了贵族制末期，名族以文辞在权贵之间谋求声誉之风渐盛，结果处于末路境地的势族却似乎耽于奢美淫荡。大约一世之风尚非可因梁武之勤约而改变。梁亡，陈立。此后南朝进入乱离时代，完全没有能够保持家门的势族了，唯独淫靡之风似乎继续恣意增长。于是待大唐统一后，南土才得以复兴其活力。

注 释

[\[1\].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5页。](#)

[\[2\]. 《宋书》卷七七《颜师伯传》：“（大明）七年（463），（颜师伯）补尚书右仆射。时分置二选，陈郡谢庄、琅邪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师伯子举周旋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上以奇资品不当……师伯坐以子领职，庄、昙生免官。”第1994—1995页。据此，则谢庄、王昙生是因颜师伯子周旋寒人之事免官，且时间在蔡兴宗贬新昌之前。](#)

[\[3\]. 《宋书》卷六三《沈勃传》，第1687页。](#)

[\[4\]. 《宋书》卷五二《袁豹传》，第1499页。](#)

[\[5\]. “两门生”指两个门生，而非王、谢两门之门生。《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转吏部郎。吏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尝属琨用二人，后复遣属琨，答不许。”第577页。](#)

[\[6\].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义熙八年（412）刘裕诛讨刘毅后，在江陵“下书”江、荆二州，第29页。](#)

[\[7\]. 《南史》卷五《齐纪下·废帝东昏侯》，第156页。](#)

[\[8\]. 《宋书》卷五七《蔡兴宗传》，第1583页。](#)

[\[9\]. 《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第1412页。](#)

[\[10\].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第86—87、89页。](#)

[\[11\]. 《宋书》卷五三《庾炳之传》断句作：“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于道。”第1520页。](#)

[\[12\]. 《梁书》卷二五《徐勉传》，第348页。](#)

[\[13\]. 《梁书》卷三八《贺琛传》，第544页。](#)

第五节 南朝的风俗思潮梗概

在中国，一般认为帝王政道对当代风俗有直接而至大的影响，在某种范围内，这无疑是一种事实，《内编》对此有所叙述。不过帝室及以它为中心的朝廷风俗，因当代君王之政术如何而有所变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一般风俗也常左右帝室或朝廷的政术，而我们可以察知，一般风俗本身不管帝王政术如何，自有其变化。在笔者看来，东晋末年以贵族为统一之中心的制度已然建立。开启南朝的宋高祖刘裕给予这一制度以法制性根据，由此建立了一般秩序。刘裕由武将而崛起为帝王，少时本是无学之人。成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整饰姓族之容仪（参照《宋书·郑鲜之传》）。立于刘裕之朝、于一朝风俗的树立有功劳的，是东晋以来的名家子弟王弘。据《南史》，“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放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王弘虽处于最有权势的位置，却家无余业。[\[1\]](#)名族谢灵运是与王弘对立的人物，据说他有贵族子弟常有的阍闾之间的丑闻，忿而妄杀一人，因而受王弘弹劾。原本弹劾是御史府的职责，然而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淮之知而不弹，王弘于是越权而弹之。其理由在于：谢灵运的行为无疑蹂躏了清议，如不治罪，有碍国宪。当时王弘是尚书仆射，作为全体官僚的首席，他认为自己对清议问题负有责任。总之，官员在家，必须严受清议制裁。

沈约在《宋书》王惠、谢弘微、王球等传后评论道：

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士君子当以体正为基，蹈义为本，然后饰以艺能，文以礼乐，苟或难备，不若文不足而质有余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于上帝，嗇夫喋喋，终不离于虎圈。江夷、谢方明、谢弘微、王惠、王球，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贞心雅体，廷臣所罕及。《诗》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信矣！[\[2\]](#)

江夷、谢弘微之传多叙其治一家之私德，而不见他们为国家有若干效力。大约他们以谦让素退的家风，止于清议轨范，即为一般人所景仰，从而博得规范世道之君子的声名。

王者若顺应此社会性的一般风俗，则治平自然而成，若更积极地宣扬此风俗，则足以规制后世。宋高祖刘裕试着拔擢了处士宗炳、周续之。刘柳举荐周续之，叙其为人曰：“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3\]](#)又，文帝使处士雷次宗在建康鸡笼山开设学馆，并让他以处士身份自由教授生徒。这几人都收入《宋书·隐逸传》。“隐”，盖“自晦”之义，所谓不求出世。如此，所谓素退之君子，正可从这些人物之中看到它纯粹的模型。王者眷顾这些人物，似可立一世之风仪，但原本一般世人对他们的景仰先已存在，王者只是追随了世人的景仰而已。

章炳麟在《五朝学》中说：“粤晋之东，下迄陈尽，五朝三百年，往恶日湔，而纯美不忒。此为江左有愈于汉。”对风俗优劣的判断，因人而异，但若以风神清雅，不牵于世俗之利作为一般景仰之目标，则在这点上认可江左风俗之价值的章氏之说，大体值得首肯。

当我们客观性地认识了某风俗时，相应地，是否常常可以认识到理论性地支持这一风俗的思维方式呢？以下来看南朝的情况。

本田氏《中国经学史》[\[4\]](#)有一节概说南朝的经学，他认为：南朝经学继承魏晋之流，以老庄学（即玄学）之说解释经书；且《南史·儒林传》所列诸学者多嗜老庄之学，尤其有学者专授《周易》

《老》《庄》，埋头著书疏解《老子》《庄子》。与经学解释中糅合玄学一样，事实上当时的文学也多糅合了玄学思想。例如对于作为诗人在古今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陶潜、谢灵运二人，我们容易接触到他们尊崇老庄思想的词句。综合此种事实，很多学者认为南朝思想最受玄学的影响。章炳麟似认为，玄学为思想界提供了最强的根底。

今不详考时代前后的问题，而站在概观南朝的立场上看，则本田氏的经学史论已充分证明，经学解释取用玄学之说的同时，又取用了

佛教思想。尤其在《论语》《易》等最容得自由解释的经典中，佛教教理似乎轻易得到了应用。本田氏还认为，梁皇侃在《论语义疏》中有以儒教为外教、以佛教为内教的说法，而本田氏推定这一说法原原本本采用了当时儒者间的流行用语。又，关于《易》，本田氏认为，梁伏曼容的《周易解》“蛊元亨”注有“万事从惑而起”之语，这直接让人想起佛教的无明缘起说。此外，铃木教授在《中国文学研究》[\[5\]](#)中特别注意到，文学家谢灵运的《山居赋》有很多赞美佛法的语句，尤以流丽的文句描写法鼓之响、颂偈之声等。可见，给南朝思想以强烈影响的到底是玄学抑或佛教，似尚难断言。

回头想想，东汉一代的特色——儒术主义在三国曹魏正始年间被何、王的玄学打破，至晋又受到以竹林七子为中心的清谈者流的重大打击。前章对清谈的意味已有详述，约言之，清谈指相互谈论在虚玄世界所得的思想，它在行为上表现为好违反由儒术所规制的社会道德，此谓“任达”，时人从儒术的观点上轻侮地称之为“浮华”。而当这种意味的清谈逐渐脱离一部分人士而普遍性地流行开来时，相对于沉浸虚玄世界以获得哲人式的思考，人们倾向于以辩证式的论说方式及其所表现的华美言辞博得社会交际中的声誉，且卖弄言辞之际的优雅态度也成为博得社会性声誉的一种手段。西晋灭亡，五马南渡时，集结在东晋王室周边的北地衣冠之族，大多对第二种意味上的清谈有兴趣，其中心人物实为王导。赵翼在《札记》中说，晋人清谈之际用麈尾，“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6\]](#)。王导的麈尾尤其有名，有将麈尾称为王家物的例子。他本是清谈之徒，常招众宾于别墅西园，丝竹并奏，以开雅会。与会者皆弄“钩深味远”之言辞，相互谈论深奥的哲学，以此为常。郭文曾被招在座，对这些幽妙言辞下一箴言——“不达来语”。郭文一般被归类为佛家，其“思由忆生，不忆故无情”之语宛然得自佛教思想。[\[7\]](#)总之，由此可知东晋初期清谈流行的状况。在东晋，与王导并称的谢安也曾因任达之行而遭当时朝臣非难。要之，就王、谢二人皆为一世所

景仰而言，可以说内含虚玄、外显任达的清谈之风大体盛行于东晋。

东晋以朝廷贵显为中心的清谈的流行，已如上述。不过与其说它如西晋的清谈一样，是对儒术主义的反抗，倒不如说它是一种为了交际的社会性道具。正因如此，若反复使用这一道具，只会使清谈堕为口头禅，为识者讨厌而已。实际上，郭文所下的冷语不正足以证之吗？自然，朝臣处于政务相关的责任位置，过于耽溺清谈，则有紊乱政道之弊，儒者范宁对此予以痛击。今暂不论此点，而以脱离政术的立场就思想本身作考察，则不应该忽视以下这一事实：当时思想家已愈加显著地倾向于批判构成清谈内容的玄学本身。王坦之及孙盛是其代表者。

王坦之属于西晋勋臣王浑的系统，这一家族有清恬处世的家风。王坦之不满时俗放荡，不敦儒教，尚刑名之学，于是著《废庄论》。其一节曰：

即濠以寻鱼，想彼之我同；推显以求隐，理得而情昧。
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譎，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晋书》本传) [\[8\]](#)

就其论旨而言，王坦之固然以庄子徒寄怀幽玄为非，却也认可善人借之以开心境。但他不以之为最高之学，主张通过孔子、老子之意认识幽玄的同时，适应时变。他在此文开头引用何晏批评庄子的话——“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 [\[9\]](#)，盖以正始学风最为学之精纯者。

东晋史家孙盛有《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及《老子疑问反讯》。后者从理论上指出《老子》全篇内在思想上的矛盾，其要旨在于以老子为知道者而非体道者。大约推尊老子且将其置于与孔子相同的位置，是正始之学风。而在清谈者流这里，庄子作为最重要的角色而活跃于思想界。而今庄子的价值先为王坦之所黜，老子又被孙盛定为“非大贤”。此两者之说在何种程度上动摇了舆论尚不清楚，不久进入南朝，以思想为中心的论题集中于佛教相关的种种问题，玄学、儒学优劣论自然而然消失了。而学者潜心研究的，是《仪礼》的问题。据严可均所辑《全宋文》，此事易得证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清谈的余响在东晋一代尚强，但不久宋兴，南朝政纲树立，清谈之风遂逐渐消灭，哲人文士各依凭儒学，托怀玄学，或浸淫佛理，又一面安静讲习礼经，钻研佛律，规束其身，而未必专求一面。若一并考察贵族制在南朝的成立这一表面上的事情，则恐怕由这一制度而位置得到保证的人们，在其处世上能够观照、综合各派哲理，而未感矛盾于其间。《易》所指示的变化理论，或许为这种情况带来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不过《易》的变化绝无思想的客观性。

王羲之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10\]](#)

大约东晋末世族之士为了隐遁其身，不强如昔贤一样作艰苦牺牲，他们在清闲之地营建别墅就可以了，即便在那里没有置酒高会的豪兴，也可安享田野风光。对于深受中国文化濡染的人士而言，江南的温柔风景实是打开心胸的一乐境。

如前所述，清谈的余响尽于东晋，至宋开创南朝时代，风气已转，士人不必将思想约束于某一派理论，对于佛、儒，或玄，可各取其趣味之一端而自由观赏之。在这种情形下，盘桓于一般名流心底的自然是触发他感情、带给他兴味的眼前风物，其表现形式或是诗歌，或是绘画。南朝人的思潮就这样凭借艺术之力而表现出来。故曰南朝是艺术主义的时代。

宋谢灵运有“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的诗句。盖情之触发而生兴趣，美即在此中，其间之消息不可分辨。“情赏”一语似出自这里，前面所述梁代徐勉文中已出现此词。而将它形式性地表现出来，即广义的文章了。梁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对“文”的定义，清楚地表现了南朝的思潮：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11\]](#)

也就是说：天地有象形，即天地之文。有形无形的万品万象或以形，或以色，或以声，各呈文藻。人也秉承五行之秀气，与天地并立，是谓三才。天地之文，即人之文。可以说，南朝人的确是在森罗万象之中观看到“文”的文化人。

《文心雕龙·情采》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之语，大约情绪精纯与否，是决定文之高卑的根本。若从这种观点来论“文”，则徒饰辞句的南朝末年文章尤其没有价值。不过，这自是别一个问题，必须看到，南朝人在有形无形的自然之文的触发下有所感兴，作为其一端，留下了关于山水的美丽诗文篇什。其代表人物自然是谢灵运。对于谢灵运在诗赋中如何纤细地描写自然，铃木博士有所论述，他还说道，灵运诗赋得巧致之妙，殆巧致之至而合乎自然。若“自然”一词失之宽泛，我认为可以代之以“山水”一词。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说，玄学对东晋诗文影响甚大，谢灵运以“兴会标举”，在文格上垂范后世。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唯谢灵运可代表宋初之文章，可以说因为他，世人始知爱好山水这种趣味性。

铃木博士说道，相对于谢灵运出神入化地描述山水之面目，陶渊明则自然地描写了田园之景物。对于彼之“巧致”，此可谓“朴素”。有人认为陶渊明儒教教养深，有人认为他的中心思想是玄学。以我之见，陶渊明是在田园的自然之中享受恬静家庭生活，并以自然性的朴素将此至乐描绘出来的诗人。“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野老胸中，未必专主某一学派的理论。陶、谢二人各在独自领域把握自然之一端，并将其表现了出来。齐代谢朓或以此二诗人所创之流为基础并加以新鲜变化。总之，我们必须看到，南朝诗文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绝不可抹杀的重要性。

与南朝诗文一样，南朝书画无疑也在中国人文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此等造形的艺术需要直接就遗品来赏识它所表现的东西，这自当有专著为之，此处不作论述。

以上叙述了南朝思潮之一般及其特殊表现。但在以情赏为主的文学或其他艺术上，我们完全看不到表现强大意志的热情或活动的姿态，若以这种要素作为艺文的主要价值，则南朝艺文的价值不大。因此南朝艺文有其局限。《后汉书》著者范曄特别标榜节义，叙述汉末美风，在这点上可谓是比较《汉书》著者班固更卓越的史家（语本于《0 轩今语》）。然而范曄不满时望何尚之等人的优柔政术，因讥谤而以谋反的罪名被杀。他奉儒教为中心思想，这点或许不为时流所容。

笔者通过“文”论述了南朝思潮，但这不是对“文”本身的论述。“文”的论述另有其专著。笔者认为，以情赏为主之文若得其自然、有其条理，则所表现的美当与造化之功相等；但若流变而浸染宫殿粉华之气，或徒模月露之形，争夸新巧，则所谓“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盖亦亡国之音乎”。[\[12\]](#) 世所谓齐梁体盖指这一面，这些人聚集在帝王或宗室勋贵之下，好叙说现世荣华或享乐的哀思。这种风潮早在宋孝武帝时就已显现，此后断续发展，至齐梁之际似变得显著了。其详细情形从略。

注 释

[\[1\]. 《南史》卷二一《王弘传》，第572页。](#)

[\[2\]. 《宋书》卷五三《江夷传》，第1526页。](#)

[\[3\]. 《宋书》卷九三《隐逸·周续之传》，第2280页。](#)

[\[4\]. 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27年。1934年有江侠庵、孙俔工两种中译本。](#)

[\[5\]. 铃木虎雄：《中国文学研究》，京都：弘文堂，1925年。](#)

[\[6\]. 《廿二史札记》卷八“清谈用麈尾”条。](#)

[\[7\]. 以上参见《晋书》卷九四《隐逸·郭文传》，“思由忆生”《郭文传》作“情由忆生”。](#)

[\[8\]. 《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6页。](#)

[\[9\]. 原文应作“鬻庄躬，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

[\[10\]. 《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第2102页。](#)

[\[11\]. 《文心雕龙义证》卷一《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0页。](#)

[\[12\]. 《隋书》卷七六《文学列传》序，第1730页。](#)

第六节 南朝的佛教

笔者不通佛学，完全不知佛教思想在中国如何展开。但不了解佛教在政治及社会上的影响，就不可述说南北朝的历史，以下专就政治及社会上的佛教影响来展开叙述。

关于佛教初传问题，一般认为，东汉明帝感梦而接受佛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但今日学者多有怀疑。境野氏在《中国佛教史》[\[1\]](#)中反驳此说，而采用《魏书》所载西汉哀帝时佛教进入中国的记事。这与明帝感梦说一样，也认为佛教由中国朝廷引入；没有理由弃彼取此。我们倒可依从山内氏《中国佛教研究》之意，以东汉明帝时楚王英信奉佛教之记事为最可凭信者。且山内氏认为，理应看到当时已存在某种程度的佛教教团。也就是说，民间已发生的佛教信仰为汉宗室楚王英所信奉，佛教由此偶然出现在正史记录中。佛教初传等问题在文献上并未有定论。

楚王英的封地在江苏省北部泗州。泗州当南北交通要路，当然还谈不上是天下的中心。那里的佛教相关记事是佛教在中国史乘中的首次出现，这虽说偶然，却略难理解。一般来说，佛教多从西北穿越沙漠进入中国，这自然与梵典输入的路径相合。《魏书·释老志》考阿育王塔的分布，列举了洛阳、彭城、姑臧、临渭。[\[2\]](#)著者魏收大概以之为中国最早建造佛寺的地方。今对照地图考察，则姑臧在甘肃北部，是与西域交通的要冲，由此沿秦岭山脉东至临渭，再经洛阳、开封至彭城，这本是西北至东南的交通大干线。若它们有古老的阿育王塔，则由此可知佛教自西北至东南的传播路径。不过，据《高僧传》

《佛祖通载》等容易知道，到处都有阿育王塔的传说，江南也颇多。因此不能据魏收之说而认为佛教必由西北传来。原本北部中国的门户常自西北打开，但南部中国与印度、缅甸等海上交通也便利且频繁，相较西域与北部中国的交通，两者哪个更便利尚不可断言。因此不能以最初出现于中国史乘的佛教记事为由，判定佛教必为北传之物。要

之，佛教沿着何种路径传来中国尚不明确。在何时、如何传来等问题一片混沌之间，佛教甚至已拥有了在南北中国交会点泗州为汉朝宗室所信奉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势力。

明帝时因楚王英而为人所知的佛教，在其后很长时期内不见记载，但至东汉末桓灵之际似乎一时获得了势力。这表现在：（一）桓帝濯龙殿落成，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之乐，祭祀佛与老子，由此可知佛教在朝廷内受信奉。（二）据《后汉书·襄楷传》，襄楷对佛教具有比较精确的知识，由此可推想当时或许有某种佛经的汉译（说本于山内氏）。（三）笔者在前节有过推论，即汉末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或许向佛教借用了其组织及思想之一部，由此当时佛教具备了社会性的势力。若参照汉末笮融以佛教聚众在江苏一带兴起祸乱等事实，这点更加明了。

以上对东汉末佛教作了概述，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整个汉代浮图必与黄老连称（说本于宋翔凤）。这表明当时对于佛教完全没有明晰的概念。又，人们似乎认为佛教与楚王英或笮融相关联，容易成为社会祸乱之源。随着佛教相关知识的正确普及，这种情况渐次得以改正，桓灵之间，安息人安世高开始汉译佛经，奠定了正确理解佛教的基础。所谓安世高，据说是人名“Arshak”的汉字音译（境野氏《佛教史讲话》）。

汉亡，进入三国。据佛教方面的史料，尤其就佛教与朝廷的关系来看，相对于北方的魏国，南方的吴国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高僧传》“康僧会”条有关支谦记载道：

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3\]](#)

该书认为支谦本月支人，故他虽为孙权的博士，却不载于吴志。但这是《高僧传》著者慧皎本身的想法，还是说慧皎仅是记录了旧文，尚难断定。尤其韦昭之“昭”因避讳而改作“曜”字等，不免让人怀疑

这是东晋时期的记事吗？当然，内山氏认为韦昭为太子中庶子，不在孙权时代，从这点看，这一记事不可采信。记事是否可信暂且不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记事很早就已存在。从常识上看，以外国人做博士官值得怀疑，在这点上笔者如山内氏一样，不采信上述记事；不过，这种记事早已出现，或许表明支谦在某点上与孙权有过交涉？支谦不是沙门，是优婆塞，于佛经翻译有过贡献。因此如沙畹所言，他不曾有过教化一般民众的努力（说见于《五百谭序》）。接着，自南方来的沙门康僧会得到孙权的归依，始得立寺塔于建康大市一隅，江南建佛寺即始于此。此即所谓的建初寺，其记事见于《高僧传》。但《传》的书写方式着重在建初寺的建立。同样的记事也见于《建康实录》，孙权为其“于大内立坛，结静三七日得之（舍利）”。由此可知，孙权保护支谦、康僧会等，使他们或译经或传道。

吴亡，天下一度为西晋所统一。西晋时代的思想界以清谈的流行为代表，而很多佛教者流认为此清谈本身亦受佛教影响。这恐怕只是自我吹嘘之论而已，理论上并无强调两者关系的理由。但西晋灭亡，司马氏一族在北来衣冠之族的围绕下开创东晋于孙吴旧都时，衣冠统领王导、庾亮之徒与当时建康南郊石子岗上高座寺之僧吉友（“友”字，《御览》引作“支”）相互往来，事见《僧传》。固然，作为清谈之余响，当时衣冠好弄辩证法式的论理，在这点上似易与佛僧相交欢；另一方面，自孙权起的士族崇佛之风是否自然使得衣冠与缁衣相结好呢？

衣冠与缁衣相交好，而后衣冠子弟熏染佛理者渐多，这些所谓居士之徒在自由立场上批评儒佛道三教，各随所长，辨别认识，自然巩固了佛教的立场。又，出现了身为衣冠子弟而埋身淄流、以法轮之旋转自任者。例如《僧传》所见竺潜是东晋元勋及叛将王敦之弟，释道宝是名臣王导之弟，竺道壹是吴之著姓陆氏。这未必限于江南，垂名后世的名僧，除了来自外国者，多为姓族子弟出身，若有寒微出身者，《僧传》常常特记其缘由。于是，佛教外来宗教的面貌逐渐模

糊，对当时贵族的生活而言，佛教似乎不可或缺。东晋成帝以后，作为佛家之檀越而著称者有何充、王珣、郗超等。当王敦之弟竺潜去世时，东晋简文帝特赠赙钱十万并作慰笃之诔文。必须看到，在形式上朝廷实际已将佛教作为治化之一助。

东晋以王室为中心的贵族群体已对佛教有所理解。若有德之僧出而为之指导，则一世风尚无疑翕然响应。支遁实为教界之明星，闪耀于东晋中后期。他是诸名士交际的中心，给予他们关于佛教的深刻理解力。在建康南面的土山，他曾统率何充以下二十四位清信士，设八戒法斋；在叙述当时光景的三首诗中，他明白地吟咏于寂静中升圣坛烧香忏悔之情状（高雄氏说，见于《中国学》）。据他东归时向哀帝的上表，可知晋王室待之以宾礼。

释道安，作为有德的佛教导师，著闻北方。他以徒众数百驻于太行之恒山，适逢冉闵作乱，不能维持其僧团，然而于情又不忍解散之，遂自山西渡黄河，驻于洛阳南面的陆浑，又为慕容儁所逼，遂南入襄阳。这里属于南朝国境，因凉州刺史杨弘忠的好意，道安建檀溪寺，且造佛像，集此地之瞻仰于一身。此地学者习凿齿是极自负之人，遇见道安后，与书谢安，称扬道安的道行。其中说道：“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4\]](#) 道安以个人德望所规制的此僧团，实在南地始受重视。这时当东晋孝武帝之世，孝武帝特别下令给他与王公相同的供给以及当地土物。其后道安为前秦苻坚所召而北上，其弟子慧远进入江西庐山，慧远对江南诸名族的影响甚至大过支遁。

道安使南人惊奇之处在于他道行的圆满。慧远在此点上继承了其师（这通过所谓慧远条制也可明了），而他之所以特别适合在江南传道，在于他文辞的畅达、学问的内外通晓。据说道安唯独允许他读俗书。庐山所结白莲社实是慧远的一个道场，在那里他与俗世居士谈佛理，以期往生西方，同时又讲丧服、会文章。因为他，江南名流如何

深化对于佛教的理解，据宗炳《明佛论》《难黑白论》等似可明了。笔者固不通佛学，但感觉相比宗炳所说，孙绰（与支遁关系密切）《喻道论》的理解似乎更深刻。

如上所述，南朝名流及王者皆敬重佛僧，且愈加深通佛理。以下换一个视角，从僧侣一面进行观察。慧皎《僧传》将名僧分为十科，虽以译经科为首，但《僧传》的重心实在义解科。此科僧侣多为汉族，且驻江南传道者占十分之八。而此等名僧之传必记录他们为当世名流所赏识，以叙其德行。慧皎是梁时之僧，南朝僧侣无疑以结交当世名流为无上的荣誉。笔者认为南朝佛教的特异之处实在于此。而细思接下来所述“沙门是否应敬王者”之争的经过，这一特色更可明了。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初次发生沙门是否应尽礼于王者之争。发议者是秉持儒风而执政的庾冰，门下省官僚为之声援。反对者是信仰佛教的尚书令何充，博士官等为之声援。博士官原本有维持中国礼教之责，此时却一致站在何充一边，这是有趣的现象。庾冰一方认为：（一）向王者行跪拜之礼，古今如此。（二）佛教是神道之一。神道有无难辨。若有，也属方外之事。疑佛教以方外为由，矫形体、违常度、易礼典、弃名教。而探索文中之意，大概王者招僧侣，听其讲经之风已然存在。此种场合，全体官僚皆向王者跪拜，独僧侣与王者抗礼，殊无理由。这是发议者一方的主要理由。此外他们也指出，僧侣多为汉族出身者，且皆常人之才。反对者的意见大体说：佛教是神道之一的问题暂且不论，佛之五戒实有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冥冥之潜操，此点可取。且自汉迄今，久行无弊。今若强令其行跪拜之礼，佛教必然堕落，故因循旧习为好。大约一方坚决主张汉族礼法，另一方认为佛教虽行异族礼法，但应涵容之；一方欲求礼法的纯一，另一方提倡礼法的宽容性。结果，何充等人的反对论取得胜利。其后，东晋末桓玄再次以全体官僚一致的形式提出此问题，慧远极力驳之，桓玄也顾及众论，撤回了他的主张。最后，宋孝武帝大明年

间，此议再起，孝武帝一时令沙门礼敬王者。而据《僧远传》，此制罢于景和年间，更遵旧章。另一方面，名流及帝室近亲谒见名僧之时，往往“接足作礼”；其后梁武帝屈万乘之尊为三宝奴，这时南朝时代已到末期了。

通过如上叙述可知，名族与高僧所结成的社会性因缘也将帝王包括其中，这实可说是为贵族制所统制的南朝特色。不过就佛教所组织的教团来说，随着它的发达，会与一般社会发生矛盾，因此它必受行政上的规制。以下述其大要。

东晋末桓玄提出沙门礼敬王者之议的同时，又主张沙汰僧侣。据《慧远传》，桓玄欲沙汰缺乏僧侣素养者，只将庐山慧远的教团当作例外。据说当时慧远寄书桓玄，陈述必须肃正教团内部风纪的理由，并自立条制，因此桓玄也任由僧团进行自治性改革，对强制性的沙汰行为有所节制。慧远的这一条制被称作“远规”，似为各僧团提供了一个标准（《僧碧传》有“远规”之语）。如本书有关北朝佛教的章节所述，佛教与帝王关系紧密是北朝的一个特色，慧远条制或许很快影响了北方，在后秦姚兴政权下，僧团内部设立了僧主、悦众、僧录等行政机构，他们似从帝王那里得到了社会待遇及经济供给。其后，南朝也效仿之，宋武帝时即有镇寺之法主——释道猷。宋孝武帝时，常出现“天下僧主”一词，但这是否意味着南朝存在对僧团全体的管理，值得怀疑。反倒是“荆土僧正”“东土僧主”“都邑僧正”等用例似乎说明南朝在各地方都建立了一种对僧团的统制。与北朝一样，其任者也受到朝廷的特别待遇。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佛教逐渐成为国家机关之一部而遂行其教化任务。

僧正或僧主职任性质如何，笔者尚未探明。它的主要任务或许在于以自慧远开始的条制之类维持僧团风纪？国家已认可佛教为社会教化的帮手，而佛教以国家承认的僧正等僧官组织实行自治性的内部管理。这里有南朝的组织运作。《佛祖统纪》认为，梁武帝开始认可以佛律处罚犯罪僧侣。不过，僧徒的恣意行为却愈来愈多，中大同元年

（546），因为主僧的管理没有效果，武帝遂欲依照一般律令处断。而当时每遇僧侣威吓，武帝因自身受具戒为佛弟子，故不得强制处分之，[\[5\]](#) 表明南朝所树立的组织实际上难以解决僧团内部的腐败。

宋文帝时，丹阳尹萧摩之请求限制铸像及建寺。他的具体建议是：铸像必须经中央政府许可，若违背诏书铸像，则照律没收铜；又，建寺须向地方长官申请，同样，若违背诏书建寺，则没收宅第、园林。据《宋书》，这一意见被采纳；但据《释慧岩传》，当时宰相何尚之认为这一政策虽有道理，却难以实行，故而表示反对。或许这一意见被诏可而未能实行。此外，宋孝武帝时，沙门中有犯谋反大罪者，孝武帝欲乘机强行沙汰僧尼，却也未能见行。总之，国家对教团的种种限制企图多归于失败。这大约是因为南朝佛教为全体贵族所支持，帝王之威严远不能左右它。不过也许正因为帝王不能决定其兴亡，南朝佛教才没有如北朝教团那样显著的弊害。质诸史乘，以上推定或可确证。

梁武帝欲实现新的国家的统一。他复活儒教，整理礼乐，统制贵族于国家所定位阶之下。同时，他还充分保护佛教，舍身为佛弟子，欲兼俗权与法权于一身，以造天下之治平。然而事实上，在这一空想式帝王之下，时人是否加深了对佛教的反抗心理呢？

儒佛道三教，可从调和或融合之处观之，同时也可从各自对立之状观之。若对三教问题的推移阶段作大略的划分，则一般可以认为晋宋之际主要是三教调和乃至融合期。慧琳《黑白论》被佛教者一方斥为佛道异端，又，慧琳还因参宋文帝帷幄而为一般士流所憎恨；不过，《黑白论》的色彩完全在于三教调和。然而，自宋齐之际至梁，我们可从对立之状认识三教。齐武帝时，顾欢《夷夏论》即三教对立的一个代表。此论本在发挥“以道教包括佛教”之旨，但以夏化夷、不可以夷变夏大约是中国固有的感情，当这一感情披上理论外衣以显示道教的优越时，思想界似受到一大冲击，反对的论说也极多。总之，这种议论鼓动了思想界，我们从中可见时代的动向。至梁武帝

时，据说他作为法权的维持者，劝其下官僚全体信奉佛教，但这时儒者范缜倡导神灭论，在思想界激起大波澜。这一问题同样也是随着佛教的传来才为中国人所讨论，而其影响之深值得注意。总之，思想界这种动向或许实际上与人们对于佛教教团的反感之情相应。这一点最痛切地表现在梁武帝时郭祖深的上表中：

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

又，对于教团财产甚多、渎乱风俗之事，他说道：

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
几亡其半。[\[6\]](#)

荀济亦痛批佛教之弊害，为武帝所嫌，于是去而臣事北齐（参照《通鉴》）。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僧侣代表释宝唱最用心于分类总录古今经典，尤其应时要之需，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飧接神鬼，或祭祀龙王。[\[7\]](#) 又，义解类的释僧旻也试着分类编次一切经论，这恰与儒家汇集礼乐是同一义的，这大约与统一国家的形式相对应。不过，在帝王保护下的这种统一的形式恐怕无关乎佛教本身内在深层的统一。天台宗不是在反佛教思想勃兴的刺激下崛起，且在后来的思想界中具有莫大的权威吗？

注 释

[\[1\]. 境野哲，号黄洋，著有《中国佛教史讲话》（共立社，1927年）、《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共立社，1930年）等。](#)

[\[2\].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28页。“临渭”校改作“临淄”，可参考校勘记。](#)

[\[3\]. 《高僧传》卷一。](#)

[\[4\].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5\]. 参见（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三八：“太清元年（547）……时释子多纵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诏下，藏法师执不可，帝不能夺。……帝自受具戒，寝处略同沙门，虽宫禁亦恣僧游览。一日藏师竟登御座……帝特不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63—864页。](#)

[\[6\]. 《南史》卷七〇《循吏·郭祖深传》，第1720、1722页。](#)

[\[7\].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但文散群部，难可备寻，下敕令唱总撰集录，以拟时要。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飧接神鬼，或祭祀龙王。](#)

部类区分，近将百卷。八部神名，以为三卷。” 中华书局，2014年，第7—8页。

第三章 北朝的文明

第一节 “五胡之乱”期的北部中国

东汉末年以来逐步崩坏北部中国，因西晋末发生的皇室及豪族群的权力争斗而完全陷入动乱漩涡之中。这详述于前文。大量流民因动乱而背井离乡，除了无告之平民，豪族无疑也身处其中。移徙长江流域的诸衣冠之族暂且不论，我们将北部中国作为一地域，则其间豪族的离合聚散之状，除一二例外，今已不可详知。不过，人民抱团移徙他乡时，有行主指挥之（《祖逖传》）；相对的，乡村相聚而筑造土坞以防卫故乡时，有坞主统括之。北地自陕西至河北、山东一带自不用说，自四川至江淮之间，坞主之存在往往见诸史乘。民众或随行主移徙，或依坞主自卫，他们之间自然容易发生利害冲突，乱斗往复，几无间断。这实是胡族势力自然被引入内地的社会因子。而胡族的优势武力并不能立即镇压这些动乱，胡族武力的无统制反而推高了动乱之波。北部中国一带不得不承受这无可避免的苦难时代。

在上述黑暗时代，中原人士为不失去自身所创造的传统精神而努力奋斗，这值得赞赏。据称上古王朝革命时，旧朝太师、太史抱着乐器、图籍奔于新朝，以图维持固有的文明；秦汉以来为统一文明所统制的中原人士必欲保持其文明，固为事理之当然，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当此情境的真挚态度。

最初进入中原的是匈奴刘氏，其酋长刘渊是作为汉族文明的理解者而载于史乘的。然而后继者刘聪却被记载为一个暴虐君主。为约束这一暴君在中原传统范围内行事，陈元达始终精勤，最终不被容纳而自杀，他可谓最典型的北方人士。总之，北方人士的苦心——使胡族所持武力在正当的中原精神范围内活动——有时或能实现，但总体而言，五胡时代无疑是这一传统被破坏、被蹂躏的时代。

匈奴刘聪及羯部石虎当政时，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屡屡发生，在史上留下暗影。刘聪时，宫殿内外发生诸多变异。例如“癸未，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己丑，刘氏卒，乃失此肉，哭声亦止”。这说的是刘聪宠乱后宫，进御失序。夫人刘氏本晋太保刘殷女，与刘聪同姓，在同姓不娶的中原，她一开始就是“问题夫人”。又，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又交宫门，又交司隶御史门，“有豕着进贤冠，升（刘）聪御坐。犬冠带绶，与豕并升。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1\]](#)。其他变异还有东宫之门自然倾坏，内史之女人化为丈夫，等等。汉代以来常见于记载的灾异如彗星、地震、蝗害等，当然也很多，这些灾异是汉族人士用以警醒刘聪的材料。石虎时妖怪也很多。例如“石然于泰山，八日而灭。东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邺西山石间血流出，长十余步，广二尺余。太武殿画古贤悉变为胡，旬余，头悉缩入肩中”[\[2\]](#)。又，石虎欲造某种事业，而不管做多大的努力都不成功，[\[3\]](#) 这类故事流传二三。显然，暴虐胡王所引起的一般乱象或道德破灭等通过这种迷信的面貌反映于历史上。梁犊于是起而大掠，又，石虎死后，冉闵发起了对羯部绝望式的大屠杀；匈奴族被逐出中原。《晋略》著者周济论道：石虎残暴，而保十余载命脉，“梁犊凶焰，炎炽千里。自戍卒而外，未闻有一夫释耒揭竿而应者。其后乱自上起，亦非下叛，是岂峻刑密网，固足以禁持愚贱……此亦足以见遭乱之民之易静而难动也”[\[4\]](#)，此盖卓论。在武力的暴压下，生民完全失去反抗的气力，于是听任无秩序武力的行使。不过，利用民众对胡族的反感而恣行屠杀的冉闵，后被慕容鲜卑勇将慕容恪生擒，他在燕主慕容儁面前被斥问时，答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其后，冉闵被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5\]](#) 他为汉族吐气，大概得到了普遍的同情。

前秦苻生也嗜杀，与石虎不相上下。其残暴之状详见《御览》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

（苻）生荒暴日滋，残虐弥甚。群臣朔望漏尽请见，生曰：“知尽乎？须待饮讫。”……临朝，酒怒色厉，多有杀戮。或连月昏醉，弗堪省览。或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或生剥牛羊驴马，爇鸡鸭，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观以为乐。[\[6\]](#)

我们比较此暴状与南朝史乘有关暴君的记载，容易发现其共通点。也许有人在其间看到了事实，但笔者认为它们多是形式性表现方式。

《洛阳伽蓝记》载赵逸之言曰：苻生仁而不杀，恶德皆归其身。且匈奴两暴君时所显现的自然妖异非常少。原本中国历代五行志中所编灾异常与暗君一起记载，故这类记事应排除不论。因此笔者认为，从文献上看，可以冉闵之乱为节点，将“五胡之乱”期分为前后两期。大约前期是汉族反胡感情最混乱的时代，后期是胡汉之间逐渐融合的时代。

必欲使胡族依从汉族礼法的这一希望，是汉族对胡族常有的几乎形式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以外，这时代胡汉的结合尤其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西晋时期的权力所有者是以皇室为中心的豪族群；胡族君主新获权力，灭亡西晋，而西晋宫廷的皇后及贵嫔多纳于胡王内廷；同样，失去正当君主的豪族群与胡族势家通婚。于是胡汉势家重新结成社会关系，以图维持权力。上述新现象大体与胡族入主中原同时发生。不过这种新势力以胡族武力为背景，与西晋时代豪族群相比，它有可能酿出更深酷的社会罪恶。以下来看石勒及石虎在胡汉关系方面的政策。

石勒非常优遇北部中国的衣冠，在这点上，他是受汉人爱戴的君主。他在军中设立君子营，引之为顾问，又管束胡人，防其凌辱衣冠，且使有名士族百户居于都城襄国的一个区域，名之为崇仁里。此等皆其证据。又，他治理地方的方针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保证地方豪族势力，其地不驻胡军，任地方名望家为地方官，使之招徕流民，恢复荒废土地的生产力。

（二）在某些地方，在胡族武力的保护下，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以移民耕作荒废土地。所生租税或归中央政府，或供军费。

以上两方针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不过在地方政情已生龟裂之际，石勒通过适当实行这种方针，获得了汉族的好感。在保护豪族这一点上，石虎似比石勒更进一步。其诏曰：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7\]](#)

实际上，这不正是以晋时的九品制保证豪族权力吗？又，原本为刘曜所统的陕西豪族，在刘曜灭亡后，被移徙东方，他们大多丧失特权并被课以戍役。石氏一族王擢上表说此等衣冠华胄宜免戍役，于是此地豪族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姓之兵籍被蠲除。不过尽管在表面上采取了这些政策，石虎仍成为汉族之怨府。为何如此？大约豪族群的统制由清议及礼律所维持，然而胡族君主在其拥有武力这一点上，必然立于此豪族群之外。当他恣意行使权力时，豪族群的统制易被打破，豪族以一人为中心而产生离合。因此在石虎的暴威下，或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或官吏选举之际耆德遭排斥，势门童幼多为美官；乃至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当然，石虎也为众论所动，免去其首要责任者之职务，但通观其前后方针，弊害逐步增大显而易见。如果再考虑到石虎还将内地军权委任其下各胡部酋长，则我们可知北部中国乱象的真正原因。

如南朝编所述，自北方南迁的衣冠之族在渡江之初，因其坟墓之地被夺，对胡族的反感很是强烈。但桓温试行北伐时，南朝人士脑中对被胡族蹂躏的中原之地已没有顾惜之情，而视东南为美土，乐得生

活在这里。北部中国豪族犹守祖先土地，而眼见胡部之乱斗及其兴亡无常之状，社会上自然产生了豪族耻于通婚胡族势家、只管墨守家门清规的风气。张采亮的《风俗史》注意到“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氏等，苟非士族，虽帝王亦不与联姻”[\[8\]](#)的事实，认为北朝士族在严守家门界限这点上甚至超过了南朝士族，但这大约是“五胡之乱”之际一部分士族所采取的风习。若考虑到北部中国未建立起如南朝所见的贵族制之政治社会，则这种现象发生在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注 释

[\[1\]. 以上两处引文，见《太平御览》卷一一九。](#)

[\[2\].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73页。](#)

[\[3\].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先是，季龙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殿观莫不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季龙恚甚，斩工匠而止作焉。”第2776页。](#)

[\[4\]. 《晋略》第八册《国传三后赵石氏》“论曰”，光绪二年味雋斋重刊本。](#)

[\[5\]. 《晋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传》，第2797页。](#)

[\[6\].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

[\[7\].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

[\[8\]. 张采亮：《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第二节 北魏的统治

北魏正式称帝号君临中原，始于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灭慕容部，取中山，将北部中国平原地区六州二十二郡之守宰、豪杰、吏人二千家，徒河、句丽杂夷，三十六署之百工伎巧十余万口，移于新都平城时。天兴元年（398）诏曰：

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1\]](#)

诏书大概认为，民俗虽殊，但以德抚之是王者的使命所在。据《魏书·王建传》，太祖始破慕容宝军于参合陂，欲将大部分俘虏放归河北故土。王建表示反对。太祖说道，若从王建言，吾恐绝南人（指河北地方人）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义。但王建固执己见，胡部诸将咸以王建之言为然，太祖不得已从之。果然，河北人深怕投降后成为奴隶，持续勇敢抵抗魏军。[\[2\]](#)使太祖为“伐罪吊民”之言的，显然是汉族的智慧；以汉族传统精神君临北部中国，实是太祖之宿命。

这时东晋犹存江左，对于正统天子之所在，士人之间尤有疑问。于是天兴三年（400），魏帝发出如下诏书：

《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3\]](#)

对于天命之必在魏的理由，上引诏文尚不明确。总之，魏帝以东晋为僭伪之国、应伏刀锯之诛者，以此表明自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

就这样，魏的国体确立了。同时，为了防备世俗一味谋求高官尊爵，魏以人主之意志定爵位之轻重。如此，学校兴，陶冶人才之道

立，国家体系大体确立了。

使太祖事业更强盛的是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他以其铁腕讨平北部中国“僭伪”诸国，又远逐柔然，于部族旧居（云中盛乐城）会诸胡酋、祭祀太祖时，其景况完全显出君临天下的王者之体。他给南朝宋的书信，叙魏之国家树立久远、武力光照四边，且曰：

宋氏受终，仍晋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4\]](#)

书信大概认为，东南之所以保持独立，完全因为魏重惯例，以好意保全它。当此之时，魏之政刑极严明，即便是汉族势家，也常兢兢自戒，其大略据《魏书·杨椿传》杨椿诫子孙文最可明白。

高祖（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采取了激进的汉化政策。因之国家由刑政之治转为礼乐之化，在形式上最深地体现了中原传统的精神。高祖施政，最显著的是礼制改革。此前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立太祖庙于白登山，每岁必具大牢祭之，皇帝亲临，以为常例。其他飨祀诸神者，凡一千二百处，高祖皆减裁之。其后又废止了亲临白登庙之事。这样，汉族重视的明堂、太庙之祭祀再次成为学者论究的中心，有威仪的礼乐于是乎施行，“野合之讥”完全消失了（高祖诏意）。曾在幽朔之地逐水草的拓跋部人于是一变而具有礼文的装饰，其姓改为汉族风格的姓，连胡语也严禁使用了。

在这种国家之下，自三国末至西晋所实行的豪族中心的政治表现出怎样的变化呢？如前节所述，即便在“五胡之乱”之际，胡王也必须采取保护姓族的政策。但在绝对君主制下，姓族特权原本果真是没有矛盾的存在吗？以下暂时以北部中国的姓族为中心而作一考察。

南朝建立了以贵族为中心的政治组织，垂一代之治统。其贵族多自北方移徙而来。其家虽在江南，本贯却仍系于北部中国。在这点上，他们与北部中国的豪族关系极深。对姓族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持家门。因此在北部中国势力转换之际，这是他们最费苦心之处。举一个例子：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将曾为南朝宋武帝刘裕所取的山东

地区收归魏势力下之际，此地豪族迷于去就。山东平原（今邹平南）有豪族刘休宾，其兄弟乘民、延和等皆为乡里所尊崇。当时休宾为宋边将，镇梁邹（邹平北），清河豪族崔灵延、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在其下奉宋命。其妻为鲁郡（西埠）崔邪利女。适逢她与长子文晔归宁时，魏勇将慕容白曜入历城（济南）劝降，崔邪利遂与刘休宾妻及其子文晔共附白曜。[\[5\]](#) 于是白曜告知刘休宾此事，且执刘延和妻儿送梁邹，劝刘休宾归顺。不过刘休宾对魏的实力犹有怀疑，对于归顺后自身位置如何也心有不安，故约在历城会面，[\[6\]](#) 大约是为了探知魏军虚实。结果条约达成，刘休宾遂归于魏。“五胡之乱”之际维持了家门的北部中国之豪族，大多托身各胡族君长，在此意味上，他们心里绝未认同魏这一国家。

据《魏书·崔道固传》，崔道固出身清河名门，母贱，为嫡母所出之兄弟等轻侮，于是欲在南朝宋之下求仕，从家中得到旅费，过了江。不过此时的南朝，宋孝武帝在位，[\[7\]](#) 已是贵族制确立之后，因此据说崔道固在南朝因非我族类之故，极受冷遇。据这一事实可推定以下二事：（一）北方豪族为光大门户，不以同仕南北两朝为耻。

（二）南朝贵族制已确立，大体而言不欢迎北方人南来。后者如前章所述，在东晋末就已出现。因此不管北方豪族的愿望如何，事实上他们当以北方为中心而彼此联结。

另一方面，南朝逐步结成贵族制的事实或许对北方豪族有所刺激。王慧龙，本籍未明，是魏太宗时的洛城镇将。总之，他确实自江南而来。时人一般相信他出自南朝名门王氏之族，魏之名相崔浩即认为他有王氏骨相之特征——鸱鼻，叹道“真贵种矣”，其弟崔恬遂以女妻之。[\[8\]](#) 由此可见南朝王氏如何为北人所钦羡！如《内编》所论，崔浩实欲以豪族之力抑制世祖，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一般认为，在整个代都时期，北魏刑政严明。公孙轨死时，世祖曾对宰相崔浩说：“吾行过上党（山西南部），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

从车百辆，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擘，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轨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诛之。”[\[9\]](#) 世祖此言最明白地表现了代都时代的刑政。如《内编》所示，史家赵翼详细说明了北魏族诛的惨酷；而《魏书》著者魏收却从中看到刑政公明这一点。诚然《魏书》列传的豪族中也有房法寿这种公然为强盗的类型，而考虑到豪族宗党组织的强固，族诛之法盖有不得不实行的情由。但我们不能忽视一点：断行族诛之法的魏王室犹存有不染汉族风习的北方淳朴之风（崔浩之语）。

据北魏王室的通例，胡汉两部大臣分作左右而议国政，但胡汉的对立不仅在政治上，它还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基础。据《魏书·崔玄伯传》，太祖曾有感于汉朝故事，“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虽名族美彦，不得尚焉”[\[10\]](#)。反之，据《崔鉴传》，在高祖孝文帝尚未更改胡族姓为汉姓时，某王欲娶崔鉴女，崔鉴嫌其胡族复姓，拒绝了。[\[11\]](#) 前者，王室嫌与汉族通婚；后者则相反。大体而言，在代都时代，围绕王室并得到其信任的似为宾附的胡酋，这大概使得北魏不顾念中原豪族的感情，保有了刑政之公明。

北魏处在超越北部中国豪族感情的立场上，但在其权威下，它容许五胡时代以来不断采取的保护豪族的方针，以保证一般行政的安定。天赐元年（404），太祖召集朝臣于西宫，令汉族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胡族诸部子孙失家业者，赐爵。这成为先例，太宗派遣使者拔擢豪门强族、先贤世胄，世祖遂得以充分实行这一政策。当时的汉族，即便强烈鄙视胡族，事实上也不得不在魏王室下谋其家门之保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于是乎皆集于代都。高允作《征士颂》，其中一节曰：

魏自神䴥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

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其就命三十五人……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12\]](#)

胡叟曾游凉州。当时沮渠氏犹未灭亡。“五胡之乱”，凉州独受汉族张氏统治，此地人士一般以华风自任。胡叟会程伯达，论及世运，认为此地不久将归大魏所有，自今可出仕魏廷。如《内编》所述，魏世祖将讨凉州时，于其地利并不了解；而敏感于世运变化的势族，甚至比魏室更早地预知了凉州的灭亡。此地宋繇、张湛、宗钦等以儒术闻名，张湛的易学为崔浩所重。随着沮渠氏的灭亡，这些儒者皆仕于魏室。宗钦入魏，见中原衣冠之族皆仕于朝廷，赠诗高允曰：

崑峨恒岭，滉漾沧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启兹令族，应期诞生。华冠众彦，伟迈群英。[\[13\]](#)

山东地区完全成为魏土，如前所述是在显祖时。当时，此地望族来代都者似处在极端穷迫之境。《高允传》曰：

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高允）姻媾，皆徒步造门。[\[14\]](#)

这样，自东南山东至西北甘肃，其望族皆集代都，他们在严格的北魏君王下屡受杖罚（《高允传》），常小心谨慎，保其家门，以所受廩食，仅甘于质朴的生活（杨椿诫子孙书）。

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且实行激烈的胡俗汉化政策。如《内编》所述，这两件大事都出自高祖独断，而其详细理由不明。代都不足以供养胡汉众多人口或许是迁都的重要原因；又，淳朴的部人渐染奢侈淫荡之风，为以汉族礼文约束之，朝廷于是采用汉化政策。而在汉化政策的最后，朝廷改胡族姓氏为汉族姓氏，同时撤销胡汉之别，一律由朝廷定氏族的高下，由是树立了贵贱等级，奖励胡汉通婚。其结果是

否果真有利于魏王室本身的永续，另当别论，但笔者认为这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关系极重大。以下作一说明。

此前，树立贵贱等级、明确婚姻与阶级之关系的尝试已开始于高宗文成帝。和平四年（463），诏曰：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

又诏曰：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之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15\]](#)

据诏意可知，高宗欲明确贵贱之制以树立社会秩序；若合观高祖完全撤销胡汉之别，在此基础上区分氏族之甲乙，则这种政策在形式上暂且完备了。

胡族是否存在以贵贱区分等级的社会制度，不太清楚。至少从文献上可以说，将这种社会制度教给胡族君王的是汉族。不过对汉族而言，这也是一种理想而已。特别是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尊重氏族之风，无论如何也不出三国末、西晋以来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的范围。这一制度的中正由朝廷任命，但它长久实行后，自然产生习惯，仕宦的家门和其间的阶级相互间多少有了一定的顺序；由于这一政治性原因，社会性阶级于是有了某种程度的确立。不过与此同时，纯粹继承儒教系统的贤才主义也盛行于北部中国。这实是北部中国未能如南朝那样充分建立贵族制的原因。贤才主义原本容易与君主绝对制相结合。当然如《内编》所述，高祖在取用人才上却重家门，汉族大臣反而主张贤才主义。这看似有矛盾，但就高祖自身而言，裁定家门高下的是他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欲将其裁定的社会制也反映在行政

上，而绝不因社会制本身而使他自身受到束缚。因此历来作为习惯而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度，反因高祖的改革而发生了大变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改革的结果，新裁定的胡部贵族融入汉贵族之中，不是拥有为官上的选举权了吗？相应的，历来的习惯被打破，王者的责任或许变得重大了。以下对中正制度所受的影响作一观察。

据《魏书·甄琛传》，甄琛死后，关于其谥号的问题，吏部郎袁翻奏曰：

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16\]](#)

这是肃宗孝明帝时的上奏。由此可知，当时连最重要的行状也不出自中正。又据《通典》，高祖后的世宗（宣武帝）、肃宗之世，朝廷扩充中正，以配各州，遂使选举紊乱，以致废止了中正制度。魏亡后，北齐犹有中正之名，然而中正之实早已亡于世宗之世。若一并考虑以下事实，即因为文武通仕之例，大量武官欲作为文官出仕，肃宗时张仲禹抑之而引起武人的大骚动等事实，则可以看到，胡族强烈要求与汉族在同一立场上以文官出仕，而汉族传统的中正之法不适用于胡族，不久中正制度本身不是到了破灭的境地吗？

支撑北部中国民族的中正制度遭破坏，胡汉豪族为官悉争选举一途。高祖迁都后，尤其留意此事，五品以上，亲自与公卿一起选定。而这一英主歿后，北魏已无法抑制时代潮流，即便有人（如郭祚）制定详细条制以救其弊（参照《魏书·郭祚传》），朝廷最终也仅能以崔亮的停年格来禁止豪族为官位奔竞而已。当时吏部以这一停年格杜塞人才任用之途，魏因之丧失人物，然而如顾炎武所说，崔亮此法的

设计实有不得已的苦衷，[\[17\]](#) 大约这不过是高祖大改革中所蕴藏的固有祸根逐渐显现出来而已。

不仅选举之法失统，其他汉化政策的失败之迹也随处可得指摘。

例如关于学校设施，《魏书》及《北史》的《儒林传》都说北魏自太祖树立学制后，学校设施的增设连绵不绝，至高祖迁都，最为完备。这本是惯常的记事，其实行如何另需考察。高祖时，郑道昭上表的一节曰：

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18\]](#)

而同时高允建议高祖置学官，上表曰：

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19\]](#)

一说太祖时学术昌明，一说自西晋灭亡直至于今，学制不立。其言全然相反。要之，两者无疑皆有一面之事实，这或许表明学制实际未曾实行。下面我们看看学校的中心——国子学的情况：

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20\]](#)

又，郑道昭的上表中最明白地表现了国子学荒疏之状：

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21\]](#)

且云：高祖定学制后，不满一纪，官学已凋落，硕儒耆德，卷经不谈。中央既已如此，地方之状况可想而知。

又如旧俗仍旧之状况，最详于高允的上表：

前朝（高祖）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饶**，罔有仪式。又俳优鄙艺，污辱视听。朝庭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22\]](#)

要之，由这些足见高祖的改革已逐渐生出破绽。

选举失统，学制不立，风俗混浊，这样，谗幸之臣自然愈渐跋扈。阳固作诗二首，以讽时政：

巧巧佞佞！谗言兴兮。营营习习，似青蝇兮。以白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蜚，毒何厚兮？……

……志行褊小，好习不道。朝挟其车，夕承其輿。或骑或徒，载奔载趋。或言或笑，曲事亲要。正路不由，邪径是蹈。不识大猷，不知话言。其朋其党，其徒实繁。[\[23\]](#)

由上足知高祖的改革渐生弊害。不过，汉家一统之治法被打破，中正之制兴起；今中正之制被打破，新的国家统治之法将要兴起。在这一大势推移的过程中，孝文帝的伟业——将与汉族殊风的胡族融进汉族治法之中——影响后世尤其重大。在活跃于北周、北齐对立之际的众多英雄中，有很多汉族文明教养深厚的胡族名将。对于阅读此段历史的读者而言，这是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

注 释

[1].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2—33页。](#)

[2]. [据《魏书》卷三〇《王建传》，王建认为“纵敌生患，不如杀之”，诸将咸以为然，“乃坑之”。其后太祖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中山百姓据守，太祖问为谁据守，皆曰：“群小无知，但复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之命耳。”](#)

[3].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7页。](#)

[4].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元嘉）十九年，虏镇东将军武昌王宜勒库莫提移书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属，而移书越诣徐州曰：……宋氏受终，仍晋之旧，远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心东南之略，是为不欲违先故之大信也。……”第2334页。元嘉十九年（442），刘宋平定仇池，氏王杨难当投奔北魏。北魏库莫提移书益、梁二州，而移书越诣徐州，就刘宋平仇池事提出抗议，扬言进攻刘宋。刘宋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臧质接到移书后，即答书辩护，指责北魏伐宋为无理。“这实际上是两国之间通过边境都督而进行交涉。”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7页。](#)

[5]. [崔邪利为清河东武城人（据其子崔怀慎籍贯可知），在魏世祖进攻邹山时，时为刘宋鲁郡太守的崔邪利与往依鲁郡的刘休宾妻及子文晔降魏。此处“鲁郡崔邪利”“历城劝降”“共附白曜”等皆不确。其后，慕容白曜表请以刘休宾妻崔氏及子文晔，劝降刘休宾。（据《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等史料。）](#)

[6]. [具体去探知魏军的，是兼主簿尹文达。](#)

[7]. [据《魏书》卷二四《崔道固传》，此时应是宋文帝在位，“时刘义隆子骏（孝武帝）为徐兖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为从事。辑（道固父）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崔道固或未“过江”。](#)

[8]. [准确来说，是崔恬听闻王慧龙是王氏子，以女妻之。崔浩因姻戚之关系，见到慧龙，叹为贵种。见《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

[9]. [《魏书》卷三三《公孙轨传》，第784页。](#)

[10].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第621页。太祖赞叹汉朝和亲匈奴，遂效仿之。](#)

[11]. [《魏书》卷四〇《陆叡传》：“（平原王陆叡）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叡婚自东徐还……”第911页。史料非出自《崔鉴传》，此外，崔鉴也没有拒绝嫁女于陆叡。](#)

[12].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81页。](#)

[13]. [《魏书》卷五二《宗钦传》，第1155页。](#)

- [14].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89页。](#)
- [15].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22页。](#)
- [16]. [《魏书》卷六八《甄琛传》，第1516页。](#)
- [17]. [《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
- [18]. [《魏书》卷五六《郑道昭传》，第1241页。](#)
- [19].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77页。但此表上于显祖，非高祖。高允以九十八岁高龄卒于太和十一年（487），在孝文帝迁都、推行汉化政策之前。](#)
- [20]. [《魏书》卷五三《李郁传》，第1179页。](#)
- [21]. [《魏书》卷五六《郑道昭传》，第1240页。](#)
- [22].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74页。此是高允对高宗的上表，这里的“前朝”被注解为“高祖”，可知冈崎氏将此视为世宗时的上表，以证明高祖汉化政策之失败。但高允卒于高祖迁都前。](#)
- [23]. [《魏书》卷七二《阳固传》，第1610页。](#)

第三节 北魏的政术

前文屡屡论道，自东汉末以来，北部中国大体走在全盘崩坏的路途上。这在经济上最鲜明的反映，是北部中国政府废止钱币铸造的事实。据《通典·钱币》：曹操为汉献帝宰相时，欲使用五铢钱，但当时铸钱之事久废，曹操也未特别铸造新币。接着，魏文帝遂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然而，民间“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明帝时司马芝于是建议更铸五铢钱。[\[1\]](#)《通典》完全依据《晋书·食货志》的记事，但据《宋书》孔琳之上奏中所引用的语句，司马芝虽提议使用五铢钱，但未见其提议铸造新币。且《三国志·魏书》载，太和元年（227）四月“行五铢钱”，这是否直接表明魏铸造了新币，亦有疑问。又据《孔琳之传》可知，当时（东晋末年）朝臣之间有一种说法，即“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2\]](#)。要之，或许可以说，魏没有铸造货币。

既然魏政府未铸造货币，自然一般市场也似乎未见钱币的流通。对于这一现象，孔琳之解释道，“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故在这种情形下，魏不能像汉那样以钱币征收人头税，于是新出现了户调法，除按亩课田租外，建安八年（203）还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

魏亡，西晋代立，魏所出现的现象似乎原原本本延续了下来。但通览《晋书》列传，晋在名臣物故之际等赐予大量钱币，几乎可说是滥赐；又，如《内编》所述，西晋朝臣之间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拜金风潮。从这一点看，钱币绝未失去其流通性质，反而因其数量少，其价格或有增大？而钱币的一部分似被权贵们收藏，其流通性逐步减弱。

至五胡之乱世，石勒一度铸造了货币。其钱见于《钱录》等书，要之，这是暂时性的现象而已。其后，钱币完全绝迹。尽管北魏逐步君临中原，但孝文帝（高祖）都洛之前，全无铸币之事。故《魏书·食货志》云：“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3\]](#)

肃宗孝明帝时，任城王澄上表曰：

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4\]](#)

这指当时河北的状态而言。可见大体高祖太和以前，北部中国以缣与布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尤其缣作为货币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试举数例：据《魏书·赵柔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缣”[\[5\]](#)；又据《刘芳传》，刘芳“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6\]](#)；又据《崔孝暉传》，崔孝暉赴任赵郡太守时，其地经葛荣之乱，“斗粟乃至数缣”[\[7\]](#)。这些都以缣表现物价。且缣必言数，绢必言匹。上引《赵柔传》载，“有人遗柔铔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市。有人从柔买，柔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赵柔不取，遂与前者。据辞书，缣是绢类之中较重而色微黄者，它或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可一枚一枚计数，以表现交换时的标准价格。可知在北魏太和以前，缣或许带有几分标准货币的性质，其他诸如绢、绵等都是货币代用品。此外，就缣的形制而言，它或有六尺？（《魏书·薛虎子传》）

北魏的租税无疑有两个方面，即魏晋以来征收的田租及户调；而屡成为问题中心的，主要是户调。今据《通典》所引魏令，原则上每户一夫一妻征帛一匹、粟二石，另外，根据一户之内人丁、奴婢、耕牛数量的不同而定其税率。[\[8\]](#)要之，北魏户调的税率远低于西晋户调的税率。在太和年间税率改定以前，这一魏令或许得到了普遍的施行。《魏书·于忠传》载：

旧制：天下之民绢布一匹之外，各输绵麻八两。[\[9\]](#)

这似与以上魏令相当。当然，绢布（帛）一匹只不过表示税率标准而已。因此不制丝的地方，则纳麻布；又据薛虎子的上疏，在制丝的地方，也有纳缣以替代绢布的。总之，太和以前，北魏征收极轻的户调及田租。而太和以后，户调的税率跃升为三倍，田租几乎十倍。这时

魏室刚采用汉化政策，结果税率却大幅上升，这看起来颇矛盾。其间有什么缘由呢？

据《魏书·食货志》，高祖太和八年（484）始班百官俸禄，品第各有差；为此，每户增征帛三匹，田租增征粟二石九斗。同时，又载：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10\]](#)

此处“先是”一语极暧昧不清。但对照此后庄帝之政策[\[11\]](#)可知，所谓“以九品混通”显然亦将百官包含其中。故以上引文大约与班制百官俸禄有关联。且《北史》载太和八年（484）诏，[\[12\]](#)其中含有此文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先是”所云无疑与太和八年班制百官俸禄同时。如此，可知由于太和的改定，税率跃增。

对于支付百官俸禄之事，当时中央及地方的反对声都很大。据《高闾传》，魏宗室淮南王他曾激烈非难俸禄制度。又，薛虎子自徐州上疏说，支付官俸而加征租税苦害地方人民，请求恢复旧制。对此，文明太后态度颇坚决，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亏通式。”[\[13\]](#)

在当时内外的非难声中，百官俸禄之制得到了实施。当时的朝臣对它持何种见解呢？淮南王他非难给俸时，高闾反驳，认为置立邻党、班宣俸禄是经久之道。又，高闾政治论的一节曰：

惧蒸民之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14\]](#)

由此可知，班制百官俸禄与建立邻党之制紧密关联，又与其后均田法的实行相通。笔者认为高闾是这一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总之，为了正确理解班制官俸的问题，有必要一并研究邻党制（即三长制）及均田制。

据《魏书》本纪及《食货志》，均田制之立在太和九年（485），三长制之施行在太和十年（486）。然而《北史》本纪不载这一均田制，但所述三长制与《魏书》同。《通典》《玉海》据《北史》“给田制”条，将均田制系于太和元年（477）。因此两制施行年代有二说，终难一致。然而《魏书》《通典》皆以均田制为李安世所提议，其上表中明言“三长既立”，若三长制之施行在太和十年，则均田制之实行当然必在太和九年之后。因此，就此点而言，《魏书》《通典》之纪年皆可怀疑。又，据《魏书·韩麒麟传》，韩麒麟于太和十一年（487）上表，表达了如下意见：

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15\]](#)

若太和十一年以前均田制既已发布，则韩麒麟不应重新建议计口授田。故基于李安世、韩麒麟两传，《魏书》《通典》的纪年皆不足信。总之，均田制的发布应在太和十一年以后。

三长制之记事详见《魏书·食货志》、同书《李冲传》。但《食货志》叙述三长制时，含有《通典》作为魏令而引用的上述租调法相关的记事。《食货志》似认为此租调法与三长制一起施行，然而细究前后之关系，到底难以理解。因此笔者依从《通典》，《食货志》或有错简，乃至魏收撰述有误。

所谓三长制，指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的制度，它以《周礼》的法规为基础。但实际上如《内编》所考证，西晋时已有以户数组成村落的尝试。这种地方制度的创制，是基于何种理由呢？《李冲传》载：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16\]](#)

所谓宗主，参考其他用例，似指同族之中被选来统理一族全体事务者。“督护”的用例，笔者尚未想到。不过，北地强豪在移徙之时，必同与之有某种身份关系的其他强族一起行动，且这些强族都有部曲，这几乎是通例。因此相对于同族之中的宗主，由人的关系而结成的一种社会，其司掌者或称“督护”？总之，三五十家聚为一户，其下有着大量的荫附者（似以军规制之，则谓之部曲），此荫附者虽逃离国家版籍，却为豪强的赋敛所苦。但北魏树立宗主督护，明载于史书，无疑这种因乱离而发生的自然现象原原本本地为国家所承认。不过这种社会组织的存在，使得赋役不公，贫富悬隔，于是北魏新立三长制，赋予三长某种特权，主要欲使之登记天下户籍。

关于三长制的效果，《魏书·食货志》载，初，百姓皆不乐之，兼并之家尤嫌之，但施行之后，事务简捷，经费较昔时节省十余倍。体味这种记述方式，则此中并未提及匡正赋役不公平的最初意义，而只列举了节省事务经费这一于国家财政上有利之事而已。这是基于何种原因呢？此前，魏世祖太延元年（435）末诏书之一节曰：

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货定课，哀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17\]](#)

也就是说，国家征课人役、赋税之际，推奖亲民官（县宰）与管下之乡邑三老计议，按人民财产多少公平负担。这里所谓“乡邑三老”恐怕不是特设的机关。然而三长这一机关新设后，地方户籍同时也清楚了，县宰可直接通过这一机关征集赋役。且户籍既明，地方豪强之徒此后也就不能侵夺国家户籍。我们应当从这种角度认识三长制的效果；通过三长制，将豪强之徒的既得利益夺归国家，以图负担之公平，这种意味是绝没有的。

国家通过三长制确定户籍，以期调发公平且便速。在此基础上，确定百官俸禄，又固定租调税额。由此，国家始在行政上得到了整理。

班制百官俸禄，本有督责官吏清廉之意。此前百官无俸禄时，最被视为模范地方长官的是崔宽。其传之一节曰：

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宽（治弘农时）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又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18\]](#)

大约崔宽在营私的同时，又得奉公，在这点上其功绩得到认可。不过这终究不是期于统一的国家之治体，北魏于是改正积年之弊，班制百官俸禄。那么，这一改革的意义在哪里呢？

《北史》太和八年（484）诏书之一节曰：

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当据《魏书》改作“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9\]](#)

分析此文可知，孝文帝为班俸禄而增税，因之罢诸商人；又平均预调，定二匹之赋，以兼商用。这样，此前商人似做了官吏工作的一部分，并因之获利。这种事实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例？

凡当时商民，大约属于诏令中常说的“工商杂伎”或“工商皂隶”这一阶级。其中工伎各有隶属于中央、地方官府者，尚方锦绣绶罗之作坊及其他御府内库等皆有最多的隶属者。其他还有称作“杂营户”的：原本太祖道武帝令诸漏户输纶绵，自后他们作为制作细茧罗縠之户而注籍。他们大量附隶于中央、地方的官府或豪族。于是，贩卖这些工伎（国家的附隶者）制作品的商人就自然存在了。而此等商人屡结托强豪，苦害百姓。高宗和平二年（461）有如下诏书：

（意译）近来地方官向人民催促应纳中央政府的定额之调。但民间实际无绢或绵，而受强制，人民不得不收买绢绵。大商富贾乘机向人民假贷绢绵，获取巨利，十日之间，盈利十倍，不在少数。此事需与官吏结托，所获利益双方瓜分。一般民家为此困于冻馁。尔后禁向人民假贷。[\[20\]](#)

这样就取缔了商人的暴利。其后，高祖在太和二年（478）下诏，令工商杂伎悉赴农，使诸州课民种菜果。这大约是解放隶属官府の工商，使之成为自由民。太和十一年（487），高祖遂下诏解放尚方等工伎，且四民如欲造尚方的制作物，任之无禁。探究此等诏书之意，要之，国家欲以农业为中心，并认定工商的自由；同时，正百官之俸禄，期其清廉，以征课公平的赋税，来自诸商人的官府收入等全部均摊于税赋之中，且九品混通，皆受负担。《北史》太和八年（484）诏中所谓“预调”，其意殊难解，或杂调之类？另外，反对三长制施行的言论之中，存在否定混通九品以课赋税的说法；而当把以百官治天下之主义，以及作为官府机关而征收租税の三长放在一起考虑时，我们可以理解三长制是足以破坏历来习惯の新制度。而高祖延兴五年（475）有如下诏书：

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21\]](#)

也就是说官僚系统中，尤以亲民官（县宰）专督赋调。其意甚明。

官治之方针既确立，三长之制又新设，国家行政机关暂得整备；魏欲进一步通过施行均田制来维持一般社会之秩序与安宁。以下概述此法之起源及性质。

秦汉以来土地の私有已被视为一个事实，但汉族传统土地公有思想未曾断灭，尤其在儒学影响最盛の汉代，常有实现这种理想の尝试，王莽改制即为显例。当东汉末年北部中国强族兼并盛行、贫富悬殊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主张改革者更具明确の现实性，他们欲复兴这种思想。荀悦の占田说即其一。所谓占田说，指以口数占有田土并设立限制，人们可耕种而不得买卖其土。它的着眼点固然在于与私有田土制并行，但它期于赡给贫弱，以消极性地防止兼并之弊。同时，崔寔、张仲统等还主张向宽地移民。至晋，武帝接受石苞之说，制定了占田法规。（以上据《通典》）这大概是荀悦之说的具体化。不过，它实行与否尚不清楚。其后西晋灭亡，北部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

动乱中，受害者不仅是无告之平民。流民四出，中原值虎狼之厄。北部中国对此深有记忆者，当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时，欲再依传统精神，以致天下之治平，于是提出均田法，这正可谓时运之际会。不过，这只是追寻思想本流之说而已，实际的历史在自然而然之中酝酿了树立这种理论的情势。这一点亦不容忽视。

进入中原以来，胡族或强制性或自发性地迁徙人民，这屡见于史书记载。仅就北魏而言，载于《魏书》纪传的非常之多。若以北魏首都平城为中心而作考察的话，北魏自太祖时起，为了保障都城粮食供给而采取了迁徙新民、与之耕牛、计口分与田土的政策。尔后这种政策不断实行，其间也发生了中原人民因不愿迁徙代都而反叛之事。这时胡族一方主张严惩叛乱者，而汉族大臣则主张赦免，这种对立见于《崔玄伯传》。又，除了迁徙汉人，北魏还讨灭其他民族，将其部众迁于张家口边，与之农器，又计口授田；这见于《太宗纪》。又，世祖太子拓跋晃通过强制畿内百姓有牛之家借牛给无牛之家，无牛之家以人力相偿等方法，推奖垦殖。据本纪，其后此法在高祖延兴三年（473）普遍推行于各州郡。

以上以平城为中心概述了此地所施行的移民政策，分与田土且奖励垦殖之事；不用说，这些都出自国家的强制。与这种意味的移民政策不同，对于因流民四出而荒废的地方，北魏奖励垦殖的方法是汉代通常采取的以“地著主义”为根本的流民本贯安置。例如世祖太延元年（435）诏曰：

羈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22\]](#)

当三长制施行，三长与县宰协力登记户籍时，理论上这一“地著主义”应当实行；但事实上完全不可能，于是有了均田制的实施。

据《通鉴》，太和十三年（489）[\[23\]](#) 李安世上均田疏。其议论的要旨为：（一）理论上贫富应平均。（二）人民应编入国家户籍。

（三）现在的情况是流民极多，三长制度虽立，但流民若归故乡，土地或在他人名下，或为豪族所兼并。流民诉之官司，而两方皆有证

据，官司难断。（四）故作为现在的政策，即便其间有不正之处，诉讼中的田地宜限年断，除归于今主之外，别无他法。（五）同时现在无主之田地，宜均分给新归来之人民。以这一上疏为契机，均田法得以实行。其大要是：十五岁（即赋课人头税的年龄）以上，男夫一人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死后此田地需归还朝廷。另外，种桑、榆、枣的土地，男夫一人受二十亩；这是世业，不需还田。有奴隶或耕牛之家，相应给田。所谓“露田”，杜佑释为无树之田，宋代郑樵释为无主之田。政府将它认定为公田，制定还授之法，听许人民使用。相对于“露田”，“桑田”则为私有地，其买卖本是自由的。

由以上叙述，可得出如下结论：（一）起初以都城大同开发为目的而实行的强制移民，因均田法的施行而适用于一般郡国，以安定社会秩序。（二）北魏不可能实行汉代私有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地著主义，于是转而实行半私有土地制度基础上的自由占居主义。若一并考虑到当世一流政治家高闾的人民自由迁移论，则这点更加明了。高闾说道：

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遂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24\]](#)

均田法既立，社会因之得保安宁。于是高祖迁都洛阳，始铸太和钱币，确定其与绢匹的交换率，百官俸禄都以钱币支付。不过，铸造货币的未必是国家，北魏时常派遣钱工在所鼓铸，同时允许民间铸币，只是其铜必精炼，无所和杂。如上，高祖诸政策略完备，这正是北魏的黄金时代。

高祖孝文帝实是鲜卑族属所出最光辉的英雄，同时或许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之一。恐怕在孝文一代，其创设的诸政策必定得到了实行，但孝文死后，新方针与反动方针的混乱似乎使一般社会再次发生动摇。例如百官的权威得到认可，士族之类悉欲通过选举一门求其立身之地；三长制虽立，而三长们在上官的暴虐下只管诛求而已。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之一节曰：

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以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25\]](#)

由上文可知，百官俸禄不以钱币支付。据任城王澄的上奏：魏王室所铸太和钱，不用于深受南朝影响的徐扬之市；又河北犹无钱币之利用。而魏室所当采取的唯一手段，是使各种地方钱币自由流通，其贵贱之差，不得不依乡价而定。[\[26\]](#) 由此均田之制虽明载于法令，其实行情况如何却无暇问之。但对于北边，世宗时似乎犹欲以均田制来维持地方秩序。源怀上表曰：

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27\]](#)

注 释

[\[1\].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八《食货八》，第179页。](#)

[\[2\]. 《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第1560页。](#)

[\[3\].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63页。](#)

[\[4\].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64页。](#)

[\[5\]. 《魏书》卷五二《赵柔传》，第1162页。](#)

[\[6\].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第1219页。](#)

[\[7\]. 《魏书》卷五七《崔孝暉传》，第1270页。](#)

[\[8\]. 《通典》卷五《食货五·赋税中》：“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病老笃贫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第92页。](#)

[\[9\]. 《魏书》卷三一《于忠传》，第743页。](#)

[\[10\].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52页。](#)

[\[11\]. 可能指《通典》卷五《食货·赋税中》：“庄帝即位，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第94页。此处九品一般指户等，而冈崎氏或以为官品。](#)

[\[12\]. 《北史》卷三《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八年）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第99—100页。](#)

[\[13\]. 《魏书》卷四四《薛虎子传》，第998页。](#)

[\[14\].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205页。此为高闾上表中颂赞文明太后之语。](#)

[15].《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第1333页。

[16].前一句见《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0页。后一句见《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55页。

[17].《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86页。

[18].《魏书》卷二四《崔宽传》，第625页。

[19].《北史》卷三《高祖孝文帝纪》，第100页。

[20].《魏书》卷五《高宗纪》：“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第119页。

[21].《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第141页。

[22].《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86页。

[23].《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即太和九年（485）。北魏太和九年冬有“均田诏”。此处“太和十三年”或有误。

[24].《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206页。

[25].《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第1736页。

[26].任城王澄的上奏，见《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65页。

[27].《魏书》卷四一《源怀传》，第926页。

第四节 北齐北周政术概论

前文论述了北魏孝文帝诸改革逐渐显露出破绽的一般情形。以下特别就改革导致地方不安这一点作一考察。

第一，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弊害之一，是它造成了消灭拓跋部武力的机会。毫无疑问，北魏之所以能君临北部中国，是因为它的武力。武力的消亡使得祸乱容易发生。据《魏书·杨椿传》：当初太祖平定河北平原时，为威慑其地，设八军府，各配兵五千。秩序稍定，割之以置南境，一军才千余人，但主帅如故。然而杨椿减省其中四军。这是宣武帝时的事情，由此可知，鲜卑主帅在镇防内地方面作用不大。其他如一般兵备及军纪的废弛之状，《内编》已有详述。

第二，孝文帝改革的理论性归结，必在官僚体系的建立。其中对地方安宁最负有责任的是县宰。然而事实上，北地由九品中正制度所构筑的豪族集团也拥有势力。此二者固然并非不可调和，但更容易乖离。《北史·元文遥传》曰：

齐因魏，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1\]](#)

由此可知北魏县宰之卑贱。同时，士人悉经选举一途而出身，中正制已紊乱，因此豪族集团历来的习惯被打破，地方秩序难免陷入混乱。肃宗孝明帝末年，高谦之上奏曰：

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縲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2\]](#)

由此可知，县令与豪族之间乖离不通，豪族有自立倾向。

今据魏史记述中原地方乱离的一般情况。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本多劫盗，李崇乃在每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

四面诸村闻警报者击鼓应之，以传次村，如此村村相戒，皆守要路。[\[3\]](#) 兖北有平原郡，北齐时“妖贼”刘黑狗在此聚徒为害，及于沧海。管辖此地的苏琼令村居相互连接，此地遂免遭危害。[\[4\]](#) 这些是山东西部的状况。由此北入河北南部，则是自北魏至隋唐常为“祸乱”中心的广阿泽。据《韩茂附子韩均传》，起初此地在魏的势力下，处在安宁的状态：

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均清身率下，明为耳目，广设方略，禁断奸邪，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5\]](#)

在魏的武力下归于安宁的此地，值魏末北边乱起之际，再次陷入了混乱状态。崔楷上表曰：

窃惟殷州地实四冲，居当五裂；西通长山，东渐巨野。顷国路康宁，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时鸣。况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赵趣北界；邺下凶烬，蚕噬腹心。[\[6\]](#)

殷州平时尚有奸宄，今遭葛荣等乱，地方的动摇可想而知。殷州，广阿泽之所在，北齐勋臣高昂即自此地归附北齐。

山东、河北地区之乱状，已如上述。在山西地区，当薛修义叛时，村邑皆迷其向背，其状详于《杨侃传》。杨侃为察看村邑归顺于谁，使台军举烽火，严命：村邑降者，各亦应之而举烽火，若不然，则视为不降者，将屠杀之。于是各村恐遭屠杀，本无降意者亦举烽火，火光数百里。薛修义见之，不战而溃走。

以上自中原地区至山西，其大部分在魏亡后归北齐所领。北齐王室以何种政术治理此祸乱之地呢？

如《内编》所详述，北齐高欢依靠北边鲜卑（常被以洛阳为中心的鲜卑贵族贱视）之力，又为中原地区的一派汉族强豪所拥，在如何

调和利用这两大势力上费尽心思。而北齐王室在其势力逐渐稳定后，似又诛灭了以洛阳及邺都为中心的魏王室一族（所谓诸元），且对中原地区的强族加以极大的压迫。《通典》所引《关东风俗传》载：

“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7\]](#) 今其事不明。据《北史·毕义云传》，“家在兖州北境，（义云）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器物”[\[8\]](#)。又据《羊烈传》，与毕家武将出身不同，羊家颇富文雅。而两者皆兖土强族，似声气相通。北齐王室屠杀诸元，且压迫毕、羊，自然是为了发挥王室威力，期以统制天下。以此点为中心考察北齐政术，则可以说北齐在魏孝文帝所开创的统一方向上继续前进。以下试解其意。

《颜氏家训·风操》篇云：

近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9\]](#)

由此可知，齐欲重定百官品序、食禄，以创百代典式；反对者为士族之徒，赞成者为文学之士。文学之士的政治地位是北齐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据《北史·文苑传》序：在北部中国“五胡之乱”之际，“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至北魏，文学逐渐复兴，尤其孝文帝“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然而“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10\]](#)，未合大雅。魏末至北齐，中原人士似颇倾倒于南朝文风。梁沈约、任昉最受北朝爱慕，其他如何逊的诗集也似为洛阳显贵所争读。因此自魏末至北齐，黄河、长江间似颇因文学而气类相通。加之梁因侯景之乱垮台以后，南朝衣冠之士归于旧土者颇多，文运之盛掩盖中原。北齐王室大集文学之士于邺城，遂立文林馆，文学之士悉网罗其中。固然应选人士之中有不知文学者，又如《颜氏家训·名实》篇所记，

中原地区迟钝的士大夫中有不自知而妄以文学之士自任者；但我们不得不说，据其声誉而开拔擢之途，又以文取人，完全出自北齐王室的创设。

在北齐，相对于显示新方向的措施，反动性的倾向也不断反映在史书上。举《北齐书·儒林传序》中的例子：北齐虽有国子学，生徒不过数十人。贵族子弟以通经学而入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北齐又强制诸郡设立学校，“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11\]](#)。由此可知，北齐王室在其全境强制立学，而贵游子弟对儒学已失去兴味。这实际表明，在儒学范畴内陶冶士族阶级是困难的。序文还记载了如下奇妙现象：

幸朝章宽简，政网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侶，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12\]](#)

可见尽管贵游子弟之教化不尽如人意，但就河北地区一般情形而言，人民不喜实务而热心于通经学以求出身宦途，这种风气是明了的。不讲求使此风气通达的方法，是北齐政策的缺点所在。

以上北齐新政策及燕赵风气等都暗示了将要到来的隋唐一统之际所施行的新政策。但事实上，相对北齐的新政策，瓦解北齐统治的反动性倾向在史书上有更强烈的反映。

中原士族既不知以儒学羁束其身，因而只图维持其地方势力。再引《关东风俗传》：河北中部瀛、冀诸刘，其南方清河张、宋，濮阳侯族，以及山西并州王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其时强弱相陵，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13\]](#)。《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载：“（清河）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14\]](#) 因此对于士族弄甲兵以维持私家权势之

事，颜之推在《家训》中予以痛批（《省事》）。由此可知北齐反动势力的盛行。

在这种一般世相中，魏所创设的均田法等原本不可能得到施行。在北齐，三长制的组织有一些改变，“三长”也改名为“三正”，但它大体上继承了北魏遗意；又均田制，其条格有所变更，但其意味也得到了继承。然而，其实施却给社会带来种种弊害，此明载于《关东风俗传》。以下述其大要：其一，授受无严格之法，争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其二，滥授赐田，以之为永赐，听其买卖，且政府自身亦贸易公田。其三，政府强夺人民田土，以充公簿，且滥授于人。其四，政府官吏及权豪肆意占有田土，河渚山泽肥饶之处悉归其所有。其五，“纠赏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买匿，听相纠列，还以此地赏之。至有贫人实非剩长买匿者，苟贪钱货，诈吐壮丁口分以与纠人，亦既无田，即便逃走”。其六，口分田，听其帖卖，“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其七，“懒惰之人，虽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卖其口田以供租课”。总而言之，上则国家没有确立条制、整顿官规之善意；下则豪族、有司相倚以图私利之风盛行。今就北齐而言，大约在助长时势所要求的新倾向以造统一的机运上，齐王室太过无力，政府自身却溺于反动风潮，北齐于是走向没落。

相对于北齐在邺及代都领有中原、山西地区，北周起初专以陕西台地为根据并控制甘肃，对抗北齐。自“五胡之乱”以来，陕西地区是各种胡族汇聚之地，它虽为北魏武力所统一平定，但即便在北魏孝文帝的全盛时期，也不能说它足够浸染了魏的政化。其事据《魏书》李冲及卢渊传可知。据《李冲传》，高祖迁都洛阳后，决意南征，别以一军讨汉中，并计划在此军占领汉中后，从陕西地区[\[15\]](#)征发差遣六千戍屯兵。其指令是秘密下发给陕西地区刺史的，大约因为氐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割据此地，若征发差遣之事公之于众，少数民族或易生叛乱。孝文帝用心如此周密，李冲犹认为不妥，他说置戍卒于汉中，完全等同于弃之于绝界之外群贼之口。由此可知，北魏的权威未能深

入贯彻于关中（即陕西台地）。又据《卢渊传》，卢渊认为：高祖迁都以来，关中之民竞设斋会，假称豪贵，以相煽惑，于众座中公然诽谤朝廷；故目前最应该诛灭此等渠帅，以在此地树立权威。魏末萧宝夤在此地发起叛乱，至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武帝以抗北齐时，关中之地于是为独自的政术所统制。

北周武帝宇文邕诏书之一节曰：

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挺天纵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叡典，诞述百官，厥用允集。[\[16\]](#)

大约诏书认为宇文泰在以下方面的成就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依《周礼》重新制定六官，解决了北魏高祖以来树立官统这一大问题。这时所确立的形式或为《唐六典》的先声。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宇文泰全力振肃官纪这一点。

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宇文泰发出如下教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其知贤也，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时。彼人主者，欲与我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则昼不甘食，夜不甘寝，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尊之以轩冕，而不以为惠也。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也。位不虚加，禄不妄赐。……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反。[\[17\]](#)

使宇文泰发出此令的，无疑是名臣苏绰。为了强国富民，苏绰制定了六条诏书，宇文泰使魏帝颁行之。其一，“先治心”：上自公卿，下迄州宰，“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其二，“敦教化”：“扇之以

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亶亶，中迁于善。”其三，“尽地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若不从者，“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又“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其四，“擢贤良”：州郡大吏之选不限门资，唯在得人；末曹小吏，必取志操清白者；又正长之职，期得一乡之选。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时为军国之世，虽未遑减省租税，然当令平均，抑制豪强之奸巧；又绢之织纴，麻之纺绩等，必先时劝课；又关于纳税之时期，期以斟酌贫富，差次先后。[\[18\]](#) 要之，上自公卿，下迄乡里三正，皆在一贯的官统上隶属于上一人，以期实现德治主义的汉族传统。

据史书所载，宇文泰对苏绰的深厚信赖殆为稀见之美谈。苏绰死后，仪葬出长安城外，宇文泰亲自送之，“酌酒而言曰：‘尚书（苏绰）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失匕于手”[\[19\]](#)。苏绰的六条诏书及计帐之法皆是肃正官纪的简明方策而已。显然，正因它简明，才富于可行性，而这也在于负全部责任的宇文泰的诚心。北周在这点上，可谓北魏的继统者。

原本北周在建国之初，东、北分别受北齐、柔然压迫，且孤立于物质贫弱的陕西一隅，势力最弱小。毋庸置疑，它能够自立，颇得益于宇文泰的全盘规划。其中，府兵制度的创设最是应时良策。谢启昆《西魏书》引宋陈傅良《历代兵制考》云：“宇文泰相魏，辅以苏绰经济之略，于军尤详。六军百府，始仿周典，而稍还兵农不分之旧。”其制大约在西魏大统八年（542）施行，也就是说确立禁卫军之组织，府兵隶属其下。禁卫军统括于柱国大将军八人，其中宇文泰总揽一切之政，自然在军事权上也是独裁的，元欣只是作为西魏懿戚徒拥虚位而已。最终在宇文泰的独裁下，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又分统开府二人。一开府领一军，合二十四军，分掌禁

旅。[\[20\]](#) 在这样组织而成的禁卫军制下，即将所掌府兵隶属焉。府兵制是这样一种制度：将民间有才力者编入兵籍，免除一切力役及租调，使之在农闲期讲阵战之法，其马蓄粮备等六家供之。大约强制性地将一部分农民编入兵籍，而不夺取其农民资格，使之在平时仍从事农耕。一方面，这一制度或是催生后世中国兵士这一特别阶级的远源；而就当时而言，它解救了一般农民被野蛮暴力征发的苦痛，自然在确立社会秩序上发挥了作用，这点似应予以最高的评价。此外，依据《周礼》的制度，兵部成为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综合这两点，可以说府兵制对绝对君主制度之建设颇有贡献。

据《北史·苏威传》，苏威体会其父苏绰平常之言，仕隋文帝，以轻减租税为其一生事业。大约苏绰最感到负有责任的是因军国之需要，不得不向一般民众征收过重的租税。不过不仅仅是租税过重，大统十一年[\[21\]](#) 由李彪献策而施行的屯田政策也完全为了富国强兵，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意义。其大要在于：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口十分之一，使之屯田，“料顷亩之数”，官府以“赃赎杂物”买牛分配给屯田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而作为补偿，蠲免其正课及征戍杂役。这与前期以来屡屡实行的营田法除条规细部不同之外，性质完全相同。要之，它只不过夺取一部分人的自由民资格，使之成为官府之隶属而已。

如上所述，北周全面实行了强国政策。唯有一事，表面上似完全违背了强国政策：与北魏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相反，北周却采取改汉姓为胡姓的政策。魏氏之初，仕于其下的各部族，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后他们大多绝灭了，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这大约只是纯粹的称号而已，而这样确定下来的诸将，其所统军人，多改其固有之姓。[\[22\]](#) 今无法指摘其事实，但作为汉族的隋王室杨氏称普六茹氏，恐是其中一例。又《西魏书》据郑樵《通志》列举了大量汉族称胡姓的例子。宇文泰为何采取这种反动政策并不清楚，但在笔者看来，既然统国、大姓等只不过是

纯粹的名号，则汉族变胡姓也好，胡族冒汉姓也好，要之胡汉之间易得通融，在如此几度改姓之中，胡汉之境界不反而自然消弭了吗？如今，胡汉贵种主要以武将勋官之位阶排比编次，兵卒多以汉族农民充当，于是长久以来困扰北部中国的国家之组织问题得到了解决——国家之组织有了大体的形体。最终，在名副其实的严厉的绝对君主宇文邕的率领下，北周灭亡北齐，揭开了其后天下统一的序幕。

以下对南北朝之大势作一通览：北部中国经“五胡之乱”，至北魏，渐有统一的气运；但其间当长江流域的南朝在文明相对较浅的土地上创造贵族制并放出光华时，北方汉族完全思慕南朝。然而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北部中国明显地萌发出统一的机运，这反过来刺激南朝，催生了梁武帝的改革。但是在贵族制下开展其文化的南朝，梁武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统一的倾向为北朝的齐周所继承、助长，自北周至隋，统一遂得以完成，其后由大唐而达于集大成之域。不过，北部中国建立了以全体官僚为中心的“国家”这一机关，这是不是增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隔呢？例如为社会所尊敬的旧门第之子孙，尽管处境贫困，其受尊敬程度不亚于国家显官。国家显官甚至王室，皆好与旧家通婚。至唐全盛期，这一风潮犹有余痕。当然，其后这一风潮终焉于国家之威压，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已，但家族是在根基上不可拔除的社会单位，家族观念与新建立的国家机关似乎很难融合。我们以后探究隋唐时代，或可阐明此点。

注 释

[1]. [《北史》卷五五《元文遥传》，第2005页。](#)

[2]. [《魏书》卷七七《高谦之传》，第1078—1079页。](#)

[3]. [《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65—1466页。此事在孝文帝时。“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

[4]. [据《北齐书》卷四六《循吏·苏琼传》，“贼”起时，苏琼为南清河太守，“琼所部人连接村居，无相染累”，第643页。](#)

[5]. [《魏书》卷五一《韩均传》，第1128—1129页。](#)

[6]. [《魏书》卷五六《崔楷传》，第1255页。](#)

[7]. [《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第62页。](#)

[8]. [《北史》卷三九《毕义云传》，第1427—1428页。](#)

- [9].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第六》，第72页。
- [10]. 《北史》卷八三《文苑传》，第2778—2779页。
- [11].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第583页。
- [12]. 《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第582—583页。
- [13]. 《通典》卷二《食货二》引《关东风俗传》，第62页。
- [14]. 《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宋世良传》，第639页。
- [15]. 据《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准确来说，应为雍泾岐三州。
- [16].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第64页。
- [17].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29—30页。
- [18].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382—391页。
- [19].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395页。
- [20]. 谢启昆：《西魏书》卷一〇《百官考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1页。
- [21]. 李彪是向孝文帝献屯田策的，可参见《魏书》卷六二《李彪传》。冈崎氏可能参考了《通典·食货二·屯田》中的史料，但史料原有讹误。王文锦等点校《通典》时，史料原文作“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脱“孝”，“大统”应作“太和”，点校订补为“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参考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食货二》，第43页，第53页之校勘。
- [22].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36页。

第五节 北朝佛教梗概

据《洛阳伽蓝记》及《魏书·释老志》，东汉初年开始显现于历史的佛教，至东汉末年，突然获得了社会上下的信仰，至三国，梵本颇有汉译，至西晋，当时王都洛阳已有四十二所寺院。又，汉人出家而成为名僧智识、为世人所尊信者，有被慧皎列入义解科的朱士行、译经科的法祖等。据《法祖传》，法祖初在长安，为西晋宗室河间王颙所敬重，“八王之乱”时避于陇右。他深为道俗所尊信，陇右镇将张辅欲以之为僚佐，粉饰其势力，法祖持节不屈，因而遇害。因为法祖在陕西、甘肃全境声名很高，听到他遇害的消息，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而来，适逢张辅亦被杀，群胡分散，分法祖尸，各起塔庙。[\[1\]](#)这则故事最明白地表现了当时名僧受尊信的事实。其后，整个五胡、北朝时期，汉族名僧智识绵延辈出，随之求梵本于西域乃至印度，兼巡礼胜迹，以慰平生渴仰之情者，除法显、宋云等赫赫有名者外，不胜枚举，翻检《僧传》即可得知。大约在西晋以后不断的动乱中，北部中国的汉族，其思想一味倾注于佛教。因此北朝佛教于人文之历史关系最深，同时另一方面，混乱的政治现象不断影响佛教界，使其几度兴废，这点也值得注意。

西晋灭亡，北部中国进入“五胡之乱”的时代。有的历史学家有一种设想：佛教获得汉族上下之信仰以前，已先为北狄、西戎所信仰。但果有明白的证据吗？就中国的史料而言，其说恐难取信。不过，在北部中国，加深且推广佛教信仰的机缘在于胡族君王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后赵石勒及石虎与佛图澄的交往，就是一个例子。

佛图澄的传记在《晋书·艺术传》中。据东晋宗炳《明佛论》，干宝撰西晋历史，孙盛继而撰东晋历史之一部，而他们的撰著中丝毫没有涉及佛教；因此《晋书》的《佛图澄传》并非采自这些史书，所依据的显然是佛教者一边的材料。慧皎的《僧传》列佛图澄于神异科，《晋书》作者遂采之列入《艺术传》。而对于被《僧传》列入译

经科的鸠摩罗什，《晋书》同样将他列入《艺术传》，这是什么缘故呢？《晋书》的编纂，常有体例不纯之讥，这恐怕是它当受的批评。今不管这种形式上的问题，则佛图澄列于神异科也好，列于《艺术传》也好，事实上他都被视为方术者之类。这样一个方术者在北部中国佛教的广布上大有贡献，我们不正可以从中看到北部中国佛教的特征吗？

佛图澄是月支人。起初他来洛阳，欲立寺，而当时帝都为匈奴所覆灭，其志不果。适逢石勒南下屯兵葛陂，专事杀戮，沙门亦多有遇害者，佛图澄遂立志拯救苍生之难。恰巧石勒部将郭黑略已受五戒，佛图澄于是通过郭黑略参石勒帷幄。这样，佛图澄就作为石勒的有力忠言者而出现在历史上，他或预知未来的命运，或以咒愿烧香救人灾厄，等等。此外毋庸置疑，他还曾热心布教。石勒死，石虎愈尊信佛图澄，于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出家公认许可的问题，就在佛图澄与石虎那里得到了解决。

关于此事，《僧传》及《晋书·佛图澄传》多少有些繁简的差别，而其意大体相同。据《僧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虎下书问中书省：一般庶民应事佛否？又，沙门之中有为躲避力役而暂事佛者，是否有必要通过某种办法料简此等人？这两种询问看起来相互矛盾：如果难以容许一般庶民事佛，则其后关于料简事佛之人方法的询问就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因此似可认为，石虎这种询问暗含了他对佛教的公认许可。然而，中书著作佐郎王度明确提出禁止佛教之说，并得到中书令王波的同意，可知对于石虎的咨询，中书省的意见是禁止佛教：自汉代至三国魏，其间朝廷虽容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其神，而汉人皆不出家；今赵国制度承继汉魏，凡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其有犯者，不管身份如何，一律与淫祀同罪。不过，中书省的这项决议恐怕在石虎意料之外。因此他断然下令：

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2\]](#)

汉族既认胡族为君主，禁止既行的外国宗教就没有理由。在这点上，石虎的裁断大概是正确的。不过这样一来，胡族君主与汉族官僚将难以调和的论理抗争公开化了，原本石虎所企图的料简假托佛教的奸民这一实际问题着落于何处呢？如前所述，东晋桓玄曾提起料简僧众的问题。但那是作为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发展为北部中国那样的论理抗争。这里可见北方的特色。如果论理往前推进，完全区分夷夏之别，则担负国家租税与力役的庶民通过进入佛教教团，直接侍奉佛教而不承担对国家的义务等，恐怕就属于难以容许之事了。总之因为石虎，佛教在北方得到公认许可。在他的保护下，佛图澄热心传道，据称他的门徒前后达一万，他所历州县兴建了八百九十三所佛寺。北部中国的佛教于是乎开创了它的盛运之基。

佛教史家普遍认为，鸠摩罗什在姚秦完成的佛典翻译大业对中国佛教教理的展开贡献极大。笔者不通佛学，有关佛理的问题一律回避。就佛教与俗权的交涉而言，则有一个通例：自石虎以来，君临北部中国的胡族君主身边多有作为忠告者的僧侣。如沙门智通之于姚襄，释道安之于苻坚，沙门支昙猛之于慕容宝等。不过另一方面，因君主之好尚、势力之起伏，这种关系容易对佛教界全体造成某种影响。石虎死后，冉闵起而大肆屠杀石族及羯部时，佛图澄的坟墓也遭到凌辱（《僧传》），释道安于是不得不率其僧团南徙，在洛阳之南又为慕容儁所逼，于是驻于襄阳。这或许是石虎倒后，僧团所蒙受的一时的法难？当然，道士法饶参冉闵帷幄，然而法饶属于佛、道何种宗教并不清楚。而且除了僧团普遍所受灾难外，僧侣个人还多蒙受帝王施加的灾难。例如昙无讖为沮渠蒙逊所敬重，当他受北魏世祖之请而东行时，却遭蒙逊暗杀。又，权力保护下的僧侣之间，自然易起党同伐异之风。最明佛律的佛驮跋陀罗就是因流言之罪为旧僧所迫，离

开有名的佛教保护者姚兴后，才得以在江南庐山静静施展其本领。至于说到僧团全体反抗帝王权力之事，则在前燕之世，已有沙门天下的说法了。[\[3\]](#) 所谓北朝前期（北魏权力尚未在中原确立）的佛教史概要，已如上述。

北魏开创者太祖拓跋珪也是佛教的保护者。当他灭亡前燕，[\[4\]](#) 君临中原而定都平城时，下令于城内建立佛寺，并以汉族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统摄全体僧徒。如前章所述，后秦姚兴时有僧正之官，国家为白徒提供俸禄。北魏的道人统恐怕也是此类。法果成为道人统后，决定使全体僧徒敬拜太祖。其理由在于：太祖是当今如来，故僧徒宜应尽礼。但法果向人开谕其意时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5\]](#) 不管其明辨如何，沙门拜天子的问题在北魏很容易便得到了解决，如此，人主与佛教的关系变得最为密切。世祖拓跋焘统一整个北部中国后，北魏的威权愈加稳固，与此同时，首都平城成为佛教全盛之地。当世祖讨平凉州姑臧，迁沮渠氏一族于平城时，似有很多僧侣一并迁入平城。姑臧在“五胡之乱”之际，常为佛教中心，据称村村皆有寺塔。然而以佛教保护者自任的世祖，一变而成为最激烈的佛教迫害者，这颇难理解。

关于世祖废佛，道宣《广弘明集》穿凿其事，不可取信。今据《魏书》《通鉴》之意作一概述。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下诏：民间有师巫挟藏讖记、阴阳、方伎之书，常流布妖邪之言；又沙门之徒，亦性质相类。故“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6\]](#)。朝廷大约视师巫、沙门及工技为种种社会罪恶之根源，而欲扫除之。此诏绝非排斥佛教本身，它是皇帝为了遂行作为佛教保护者的适当任务而采取的合理措施。然而在其后的太平真君七年（446），世祖却发布了有名的废佛诏。

此前，世祖在宰相崔浩的劝说下，敬重道士寇谦之，或建道坛，或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此等措施有较深尊崇道教的色彩。不过，世祖

并没有因此丢弃太祖以来北魏王室作为佛教保护者的家宪。只是北部中国的佛教历来结托王权，而今道教新得皇帝信用，二教之间必生嫉妒排挤。其间情事今不能详知，但佛教一方的史家皆视寇谦之及信用寇谦之的崔浩如仇敌，从中可推测二教之关系。适逢甘肃北部爆发了“盖吴叛乱”。此人仅被记载为卢水胡，其部族系统不明，但他自称天台王，署置百官，这无疑是借佛教名义而聚集徒党。盖吴与南朝远通声息，一时势力极强。世祖为讨平盖吴，自至长安，偶然于长安一寺发现弓矢矛盾，再加搜索之后，大得酿酒具及各地富人、显官等寄藏的种种物品，又发现沙门造窟室，与贵室之女私行淫乱。此事似乎有力催生了世祖的反佛情感，恰在讨平盖吴回到平城不久，废佛诏就下发了。诏书说道：中国天下淆乱，变为丘墟，千里不见人迹，全因佛教之故；佛教虚诞无实，乃大奸之魁。其中，将佛教视为汉人无赖者假托老庄所造之物，显是采用了道教一方的说法；毫无疑问，世祖的反佛之情为道教一派所利用了。总之，世祖命诸州坑沙门，毁佛像。[\[7\]](#)

对于废佛诏，太子拓跋晃最为反对，其言虽不获用，但他暗中使远近预知其事，因此四方沙门亡匿获免，金银之宝像及诸经论等也得秘藏。不过，北魏境内的土木宫塔莫不毁坏。又据《僧传》，当时躲避法难而进入南朝境内者似乎颇多。其后禁令的实行多少有些缓和，总之，世祖一代禁令得以实行，其后高宗即位，再次使人们自由信仰佛教。不过在匡正伴随佛教而来的弊害方面，高宗完全继承世祖意志，制定了严格的条规：限制造寺数量，诸州郡县人口密集之处听建佛图一区，但建设费用则不加限制；又，对沙门的素质及数量加以限制，只听许良家出身、性行良顺者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边鄙十人。这时或许确立了州镇维那、京师都维那发行度牒的制度，官府与僧局一起管理僧徒。世祖废佛，如诏书所说，乃“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而这一大迫害却肃正了伴随佛教而来的祸恶，确立了国家的宗教行政，这一点看高宗的善后措施就可明白。

高宗确立了佛教行政，而其制度愈趋严密。例如同样在高宗时，沙门统昙曜建立了僧祇户、僧祇粟的制度。关于僧祇粟，松本博士的《中国佛教遗物》[\[8\]](#) 有大致的说明。要之，在官府的许可下，地方一定数量的平民乃至其他民众以租税形式缴纳谷类，维持其地之僧团。僧团管理谷类，满足僧团生活的同时，以之进行一般的救济事业。此外，还有佛图（塔）户。以违反法律的犯人隶属寺院，使之耕作寺院所领田土，输纳谷类。可知宗教团体在国家的认可下，有了向它纳赋或隶属于自己的人民，佛教教团的位置因之变得安稳牢固。同时，当时还有“昭玄”这一名称（《佛祖统记》三十八卷），可知处罚僧侣犯罪的部门无疑与州镇维那所在的僧局一同肃正僧侣。这些教团组织的设置，为国家担起了一般教化和社会救济的事业。

如前所述，高宗时期，宗教行政组织得以设置，佛教教团的位置一并得以确立。同时，美术史上有名的云冈石佛也出现在平城之北。关于这一佛教美术遗迹的表现样式从何而来、其美术价值如何评价，美术史家有着种种议论，不过，石佛的面容显然带有强烈的非汉族的异域风格，而为了造石佛，汉族人民恐怕被迫付出了很多的人力与财力。但据松本博士的说法，同样是云冈石像，相比旧石像，新石像多少增添了一份柔和之相。当高祖迁都洛阳，新开凿龙门石窟时，鲜卑族的全盘汉化或许也逐渐给美术增添了一份柔和之相。且高祖在迁都以前，不仅屡次申明僧团条规，严格料简无籍僧侣，还斥退有籍而戒行不精者，遂罢免诸州僧尼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又以州之大小限制出家人数，又立《僧制》四十七条。迁都洛阳后，他大约完全不拘历来习惯而施行了他的理想，因此僧团条规也应得到进一步的严守，且据《释老志》，这时昭玄曹有官署以断僧务，据《洛阳伽蓝记》，昭玄曹紧挨御史台之南，[\[9\]](#) 或许僧团受俗官之统制渐趋严密？大约昭玄曹所罚，仅是死刑犯而已，余犯据僧团内禁而断，[\[10\]](#) 而其内禁要皇帝一一认可。例如僧侣的私有财产，对于亲戚的不平而僧侣所当采取的行为，个人造寺者要遵守的规则，等等。而这些法规的设置似乎改

变了僧团的风仪，据《释老志》，当时沙门道顺、惠觉以下，并以义行为一世所重。

据任城王澄的上奏，高祖迁都后设定都城之制时，城内限永宁寺一寺，郭内唯尼寺一所，其余悉在城郭外营立。但这一规制完全为高祖之后即位的世宗所打乱。世宗实可谓过度尊信佛教而破坏高祖大计之人。当然从表面形式上看，国家加深了对宗教的干涉，例如僧祇粟的用途由州镇刺史监督等。不过国家的干涉是僧团条规已普遍紊乱的结果，不久国家的干涉亦不能制止这种紊乱倾向，于是引发了社会祸乱。

僧祇粟部分带有救济贫民的性质，而僧团多以之营利。且僧祇户原与一州一寺主义相辅相成，有其限制，但这一限制渐被打破，于是寺院乱立，且僧团恣意设定僧祇户，抢夺国家良民，强制其纳粟，遂有“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之事。又，僧侣因其亲识，私度奴隶或罪犯出家，引起僧团的腐败。世宗一代，国家尚能对此等弊害加以相当干涉，至肃宗时，灵太后弄权，任由僧团堕落，自己也沉溺在这堕落的漩涡中，却以此为太平之象。魏室的命运显而易见。

我们再回头看看北魏末年佛教的景况。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详细记载了都城洛阳的佛教景况。今述其概要：洛阳内外，寺院之数凡千余，其中最著名的是永宁寺。魏都尚和平城时，永宁寺即犹如护佑国家的灵场，迁都洛阳以来，在洛阳营建永宁寺是高祖预定的计划，而其完成实在灵太后时。尤其寺中的一所九级浮图，“角角皆悬金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波斯沙门菩提达摩曾游此寺，“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据说灵太后好登临此寺，名臣崔光谏止之，不听。

如前所述，高祖已计划营建永宁寺。高祖在世时建到什么程度，史无明文。而世宗宣武帝时，城内新建了瑶光寺。这实有违高祖城内

只立一所寺院的遗制。此寺讲堂尼房五百余间，其特色尤在于它是贵族处女的修道场：

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11\]](#)

这奇特的修道女在尔朱荣叛乱之际，为秀容胡骑所污，颇遭洛阳人讥讪。

城外西北的永明寺亦为世宗所建。世宗过度信崇佛教，异国沙门相继来此乐土，世宗于是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12\]](#)

除帝王营建的寺院之外，宦官刘腾所建长秋寺亦有特异风习：

四月四日此像（释迦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譎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13\]](#)

这实是四月四日释迦像由寺院引出时所上演的奇伎。又，城内景乐寺以大斋时所设女乐闻名：

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14\]](#)

作为尼寺而有此游乐，这里日常绝非“归诚一乘”之地。其后此寺不限女乐，诸乐并用，尤其作为奇术者的集会场所而闻名。其他古怪的寺院如东方建春门外建阳里士庶二千余户所建立的瓔珞寺，也以妙伎杂乐为人所知；其附近的景兴尼寺，藏有金像，四月四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15\]](#)。

如上所见，洛阳有贵族处女诚心归诚的尼寺，同时很多寺院一派如下景象：伎乐奇术者随琵琶、箜篌、笙箫的乐音而乱舞，满城士女

陶醉其中。这时洛阳正溺于太平风气中，以西方城外的大市为中心，工匠酒楼相连的退酤、治觞二里以西，连绵二里，南北自洛水达于芒山十五里，其间号为王子坊。“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而河间王琛最为骄奢，殆前古所未有。[\[16\]](#) 面对洛阳这种混乱的一般风俗以及寺院无限制的乱立，僧侣自身也必然感叹佛教果向何方。世宗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奏曰：

历来皆有造寺限制之条格，今日视若空文。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如此，僧侣之清行绝不可保。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此非出于信仰，全由利己之心。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故禁制不得不立。[\[17\]](#)

与僧侣立场不同，俗人政治家非难佛教者颇多，他们主要着眼于财政。其大略为：（一）因王室为主的造寺，民众担负了过重的租税。

（二）因民间的造寺，户数减少，民众皆欲名义上出家，以免租税之负担。这种言论在灵太后执政时期尤其多。或许这是因为在汉族女后执政下，言论有了自由。李瑒甚至公然在太后面前对沙门都统僧暹说佛教是鬼教，以致僧暹向太后泣诉李瑒之谗诬。大约对僧团乃至佛教的反感不仅仅源自国家运营上的实际问题。这时对于佛教的叛逆反而因佛教之名而兴起。冀州沙门法庆以幻术聚众，联结地方有势力的李归伯，起而谋反。他自号“大乘”，令人饮一种狂药，服之者父子兄弟不相识，法庆遂驱此众杀人。“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18\]](#)

佛教界日益混乱之时，北魏灭亡了。在帝王庇护下，佛教繁荣于都城；当高欢邀东魏迁邺时，诸寺僧尼亦随之徙邺，于是洛阳的繁华一朝而亡，佛寺塔宇亦归灰烬。《伽蓝记序》云：

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19\]](#)

洛阳佛教流入邺都。受东魏之禅的北齐文宣帝高洋也是有名的佛教保护者。文宣帝新置昭玄大统，以沙门法上任之，吏员五十余人，以僧尼四百余万、四万余寺属之，使皆受其命。[\[20\]](#) 与《魏书·释老志》统计的北魏末僧侣、寺院之数（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相比，领土更小的北齐，两方面的数字却皆有增加。然而风潮所赴，与僧团之质如何未必相关。先前随佛教而来的异国伎乐奇术之类，至北齐逐渐进入朝廷的内乐之中，形迹颇著，提倡雅乐的儒者因之哗然。今且不论其是非，佛教历来演奏自西域输入的种种伎乐，以之为媒介，使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皆得享受同样的娱乐。至北齐，朝廷引入此伎，这不是创造了王室与民众一脉相通的机缘了吗？即使古代帝王的威严因之而受损，但只要全体之统制建立，这种机运当有被助长的倾向。

北魏末年以来，北部中国上下，佛教之流行愈盛。又，当时南朝梁武帝甚至自为三宝之奴，大约时运所会，中国全土皆倾慕佛教。正因如此，对于僧团腐败堕落的情形，僧俗两界都有深刻认识。非难佛教的荀济曾提醒梁武帝：“比丘徒党，行淫杀子”，又，僧团热衷贮财，“交纳泉布，卖天堂五福之虚果”。[\[21\]](#) 北齐章仇子陀慨叹僧团占有良沃土地，且“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22\]](#)。这些僧团腐败本应据禁律改正，但历史事实是，国家自身也卷入近于杂乱的佛教界的潮流中。北周武帝讨平蜀地后，曾在此地为僧的卫元嵩上疏请求设立国家宗教。其要旨是：造平延大寺，无道俗亲疏之别，周主即

是如来，其领内民众即为圣众，供国之征役，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以作一大佛教国。[\[23\]](#) 这固然是一种空想，而僧侣一侧的史家大多认为此议乃武帝废佛的动机。但武帝如前节所述，是一个模范专制君主——他将最严格地完成基于富国强兵（可谓北周国策）之上的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当时不问南北，都屡有代表儒佛道的智识在帝王御前辩论，此谓“讲论”。在此场合，三者或单是佛儒二者，既有相互论难，又有相互融合疏通。据《周书》，天和四年（569）及建德元年（572），武帝两次御正殿，量述三教，建德二年（573）遂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据道宣《广弘明集》，这一议定并非出自各派代表辩论的结果，而完全出自武帝的裁断，这或许与事实相符；然而认为武帝意中即有消灭佛教的想法，恐怕是佛家揣摩之言。建德三年（574），武帝严令一齐禁断佛教以及道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同时下令营建通道观，以圣贤之微言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为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24\]](#) 道宣记载，通道观学士多属道教一派。事实到底如何呢？其中无疑也有僧侣。周史简略，殊难知其委细，但想来北周传统的国家统一政策当时颇为汉族衣冠认可，这或许促使武帝设立了三教合一的教化机关？而我们或应充分认识到，卫元嵩设立国家宗教之议为这一教化机关——通道观的设立提供了一个大的暗示。

武帝废佛在北周境内进行到何种程度并不清楚。不久，讨平北齐后，北周又在中原之地强制实行了废佛政策。据《广弘明集》，当时此地四万寺庙并赐王公，充为第宅，料简沙门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这时武帝应对北齐佛僧，公言“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25\]](#)。而据《广弘明集》卷十，当时佛僧犹欲努力借皇帝之力维持佛教。以帝王为如来，以王公为菩萨等恐怕是北魏初年以来佛家所用比喻，这一比喻却被武帝说破——“帝王即是如来，宜停丈六”——这使佛僧名誉尽失。当时僧侣一致上奏曰：

道不自道，非俗不显。佛不自佛，惟王能兴。是以释教东传，时经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26\]](#)

他们欲托帝王庇护，感情哀切。

废佛政策随着武帝的去世而缓和，宣帝立即复兴了佛教，但这时据王明广之言，一州一寺主义再次得到了严守。武帝废佛政策的影响等可在隋唐史中论述，笔者以废佛之记述结束本节。汉末三国时，已出现了道陵一派的道教。这一新教如何结合旧有的道教，又，道教作为整体如何发展等问题，有论述的必要；但今日尚未充分研究这方面，故完全从略。

注 释

[\[1\]. 《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帛远”：“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法）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悲恨不及，众咸愤激，欲复祖之仇，（张）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渚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胡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

[\[2\]. 《高僧传》卷九《神异上》“晋邺中竺佛图澄”。](#)

[\[3\]. “前燕”是否应作“后燕”，“天下”是否应作“天子”？也就是说，“在后燕之世，已出现了沙门天子”。据《资治通鉴》卷一〇七后燕建兴五年（390）：“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转寇广都，入白狼城。”](#)

[\[4\]. 拓跋珪灭亡的是后燕。](#)

[\[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31页。](#)

[\[6\].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97页。](#)

[\[7\]. 参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8\]. 松本文三郎：《中国佛教遗物》，东京：大鐙阁，1919年。](#)

[\[9\].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中华书局，1963年，第17—18页。](#)

[\[1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诏曰：缙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第3040页。](#)

[\[11\].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第55—56页。](#)

[\[12\].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第173页。](#)

[\[13\].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第52—53页。](#)

[\[14\]. 据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第58页，“太斋”，校改为“六斋”。](#)

[\[15\].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二，第80页。](#)

[\[16\].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四，第163页。](#)

[17]. 此为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而非沙门统惠深）的上奏。参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045—3047页。

[18]. 《魏书》卷一九上《京兆王子推附子遥传》，第445页。

[19]. 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原序”，第7—8页。

[20]. “僧尼四百余万”“四万余寺”有待考证。《续高僧传》卷八《齐太统合水寺释法上传》：“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所以四万诸寺，咸禀其风……”第261页。

[21]. 《广弘明集》卷七。

[22]. 《广弘明集》卷七。

[23]. 《广弘明集》卷七。

[24].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第85页。

[25]. 《广弘明集》卷一〇。

[26]. 《广弘明集》卷一〇。

后记

冈崎文夫博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作为弘文堂书房中国学丛书第七篇而初次面世，是在昭和七年（1932），距今已三十多年。其间，此书极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不待言；时至今日，仍未出现与之匹敌的综合性通史。本次弘文堂书房重印此书，要我订正误植、误字等。但所给的时间较短，我只能订正注意到的主要错误，几乎未据原典核实所引史料。另外，《魏晋南北朝通史》出版以后，博士的研究愈加深入，他将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新的研究笔记做成了讲义。部分研究笔记幸得保存，我本想对照《魏晋南北朝通史》和研究笔记做一些必要的补正，时间却不宽裕。

可能有些先生不太了解冈崎文夫博士的简历，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博士字焕卿，号樱州，明治二十一年（1888）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富山县妇负郡妇中町西本乡，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大正十三年（1924）东北大学助教授，大正十五年（1926）东北大学教授，昭和二十四年（1949）退休，翌年三月二十四日逝于家乡。主要著作除《魏晋南北朝通史》外，还有《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史概说（上）》《古代中国史要》《司马迁》《江南文化开发史》（后者与池田静夫氏合著）等，另有大量论文发表在杂志上。此外，未发表的研究笔记、原稿现因整理，保存在我这里；研究笔记涉及战国史、秦汉史、隋唐史、宋代史等。

佐藤武敏

昭和四十三年（1968）一月

译后记

关于冈崎文夫氏的生平著述，除了本书《后记》外，还可参考小学馆《日本大百科全书》中宫崎市定氏撰写的“冈崎文夫（1888—1950）”条目：“中国史，特别是中国中世史研究者。出生于富山县妇中町（今富山市）。由第四高等学校进入京都大学史学科，醉心内藤虎次郎教授的学风，毕业后升入大学院继续研究。留学中国两年，回国后，任佛教大学教授，1924年（大正十三年）被招为东北帝国大学助教授，后为教授。1949年退休前在仙台，与同僚青木正儿、武内义雄并称‘中国学三羽乌’。其学不拘章句而务大局，著有《古代中国史要》《魏晋南北朝通史》《中国史概说（上）》等，《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尤称名著。另有大量论文，在问题的选定、论证上有天才般的灵感。”（条目为本人所译。按：‘三羽乌’意为弟子、部下或某领域之中特别杰出的三人。）

经检索，冈崎氏的著述被译成中文的仅有《中国史概说（上）》（中译本书名为《中国史学》，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东方书局1945年出版）以及一两篇论文。国内缺少详细系统介绍冈崎氏研究的文章，可能与这种译介状况有一些关系。《魏晋南北朝通史》是冈崎氏的代表作，当它1932年出版时，甚至中国国内也没有关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专著。这本著作极大影响了日本的中国中世史研究。它的翻译出版对我们了解日本相关领域的研究脉络以及冈崎史学或许有所帮助。

以下简述《魏晋南北朝通史》的版本及译文的一些体例。

《魏晋南北朝通史》至少有三个版本。（一）1932年弘文堂书房初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公开了电子版，可供下载。（二）1968年弘文堂书房重印版，冈崎氏的学生佐藤武敏氏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这是译文所据底本。（三）1989年平凡社《东洋文库》本，

但只有《内编》。（据《内编》“编辑附记”，《东洋文库》请东北大学安田二郎氏校订《魏晋南北朝通史》，分《内编》《外编》两册出版，校订方针参见《外编》的解说。但我未检索到《外编》。）这一版改正了一些错字以及史实错误（例如时间错误等），又以现代假名、汉字替换昭和初年的旧假名、旧汉字，并将一些汉字写作假名，以便阅读。本人参校了这个版本，它对原书的一些修正，基本予以遵从。

关于译文的一些体例说明：

（一）脚注均为本人所加。如《自序》所说，冈崎氏在行文中尽量注明引文出处，除了在论述中点明所依据的文献名或卷次、传主外，还常将出处小字括注在相关论述后。但这与今日的学术规范有些差距。译文尽量核实原始材料，并将出处注明在脚注中。

（二）一些可确信的、便于改正且不影响原文逻辑的错字以及史实错误，径改。不确定或不便径改之处，原书剪裁史料不当之处，不敢自专，皆在脚注中简要说明，以供读者参考。

（三）原书对引文的称引，约有四种方式：（1）史料原文的照录；（2）史料原文的训读（尽量保持史料原文的句子成分，补入适当的日语助词、助动词和活用词尾，将史料原文译为日语）；（3）意译（大致把握史料原文的意思，用日语表达出来。作者有时加入自己的理解，或者把多处史料糅合在一起）；（4）介于训读与意译之间的引文。对于前两种，译文挪用史料原文。意译的引文基本当作现代日语翻译，同时尽量参考史料原文。介于训读与意译之间的引文需要灵活处理：基本是训读，夹有几句意译的，仍挪用史料原文，意译之处当作现代日语翻译，并在译文下加下划线；意译占多数的，当作现代日语翻译，括注“意译”，然后在脚注中注明相关史料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四）由第三条可知，本人尽量挪用史料原文。所谓“挪用”，包括挪用现代整理本的标点符号。而整理本中的一些校勘成果，在脚

注中予以说明。当然，如果原书标点符号与整理本相差较大，则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五）译文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除“蛮族”多改译为“胡族”外；“家族”“统制”等一些日语词汇有时译作“家庭”“统治”等更好，但译文仍大多保留了日语词汇。

《魏晋南北朝通史》出版时，现代史学刚起步，文献的整理极少，学术规范不够完善，当时的著作相对较难翻译。以上体例未必得当，请读者参考、批评。

我要特别感谢仇鹿鸣师兄、李碧妍师姐给我翻译这本名著的机会。接受翻译任务时，兴奋、感激之余，也有一点忐忑，怕辱没了这本名著。译起来之后，这种忐忑与日俱增，每遇到难点，总是懊悔自己的不自量力。四年多来，工作之余常伏案苦译，但没有以下诸位师长的帮助，译稿绝不敢拿出来。

我的姐夫蔡茂月是莆田一中的一名优秀语文教师。我每译一节或一章，首先给他审阅。他一字一句地读，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改正了大量语病、字词不妥、句子不顺、翻译腔等问题。谢谢姐夫看了我四年的译稿，没有你的帮助，译文将难以卒读。

我的师兄，鹿儿岛大学教师福永善隆博士，一直以来都十分关照我。在翻译上遇到难题，我也毫不犹豫地麻烦他。我们之间往返邮件数十封，他的解说每每让我的疑惑涣然冰释。谢谢福永师兄，没有你的帮助，译文的很多错误将得不到改正。

浙江大学林晓光老师翻译了内藤湖南氏《东洋文化史研究》、川胜义雄氏《魏晋南北朝》等多部力作，常在博客上记录翻译心得。我冒昧联系他，请他审订我的译稿。林老师自谦不敢审订，却也在百忙之中读了部分译稿，予以了一些肯定。我受到莫大的鼓励，多少安定了忐忑的心。

仇鹿鸣师兄逐字逐句审阅了译稿，随处勾画、修改，并对译稿的风格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我遵照师兄的意见，最后统一修改了一

遍。

译文的底本是仇鹿鸣师兄帮我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复印的。参校本
是傅德华老师帮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小林一美藏书中复印的。

译文的责任编辑是曾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吴志宏女史，这是译文的
幸运。

我的日文和中文水平都很有限，译文一定还有很多错误。请方家
不吝赐教。

2019年1月10日于桂林